古拉格群岛

亚·索尔仁尼琴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内部发行）
统一书号：10067·261
定　　价：2.90　元

古拉格群岛

（上册）

1918——1956

（文艺性调查初探）

亚·索尔仁尼琴　著

田大畏　陈汉章　译

田大畏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本书上册根据1973年
巴黎YMCA出版社俄文版译出

古拉格群岛（上册）

亚·索尔仁尼琴著

田大畏　陈汉章译　田大畏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625印张 499千字 插页9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61　　定价：2.90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作者像

译 者 的 话

自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俄文版在巴黎问世以来，在各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古拉格”和《古拉格群岛》这两个名词经常出现在国外各种文字的书刊上，我国资料中也时有所见。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代表作，它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若干资料，为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把此书翻译出来，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古拉格群岛》一书卷帙浩繁，分为七部分，共约一百四十万字，内容庞杂，涉及苏联十月革命后约四十年间的各种人和事，写作上又有些特点，因此，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下面仅就本书的作者、书名、写作经过、写作特点、某些特殊用语以及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沿革等作些简略介绍。

一

作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文学。毕业后当中学教员，同年应征入伍。1942年毕业于炮兵学校，当过炮兵连长。他曾两次立战功受奖，晋升至大尉。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前线因政治问题被捕，在劳改营关了8年。1953—1956年被流放到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恢复名誉”，在梁赞当中学教师。1962年发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该书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大量发行，因而出名。同年，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69年因在

国外发表“反苏”作品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参加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发起的“人权委员会”，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同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金。1973年12月末《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1974年2月13日苏联当局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名义发布命令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现居美国。

索尔仁尼琴的主要作品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第一圈》（1968年）、《癌病房》（1968年）、《和平与暴力》（1974年）、《列宁在苏黎世》、《小牛撞橡树》、《风中之烛》（均于1975年）、《缓和》（1976年）等。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疯狂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列宁和斯大林采取了完全的否定态度。

二

《古拉格群岛》乍听起来很象个地名。其实不然。其中“古拉格”是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具体机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字头缩写词ГУЛАГ的拼音。“群岛”一词的俄文是АРХИПЕЛАГ，与许多西方文字相通，即群岛之意。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由于缺少对海洋的接触，人们往往把“岛”看作是遥远的、难以到达的、与世隔绝的所在；许多岛虽然由于某种共同特点而成为群岛，但它们毕竟还是各自孤立的，相互间是不能通行的。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的全苏的劳改营比作由一个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进而把整个苏联形容为这样的群岛。

《古拉格群岛》是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写作的。本书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始终不知道《古拉格群岛》的具体写作时间。只是

在1976年看到第三卷末尾的作者“后记”及“写在后记之后”时，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从1958年4月27日至1968年5月，用了整整十年。这里所说的1958年4月27日显然是指正式开始编写的日子，因为如果说到为本书积累材料的工作，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那是早在劳改营服刑和流放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鉴于当时的环境，他采取了完全隐蔽的方法写作。作者说，这本书的全部稿件，甚至它的每一部分的稿件，都“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甚至“到最后编辑加工的时候”作者“一次也没有看到全书的原稿放在一起过”。因此，作者也承认，在这种条件下写成的这样大部头的作品难免有内容上的某些重复，结构上的松散以及文字上有时佶屈聱牙。

三

《古拉格群岛》共由七个部分组成，分三大册出版。上册（包括第一、二部分）介绍从逮捕到进入劳改营之间的各个阶段；中册（三、四部分）专讲劳改营里的情况以及囚犯和一般公民的精神状态和某些人的具体遭遇；下册（五、六、七部分）着重描述劳改营中的反抗、暴动和逃亡事件等，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至1962年）苏联社会的所谓法制情况。每一部分都有历史概述、今昔对比，同时穿插着作者的自述。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极其有限的。这是他的作品的一个特点。他善于让读者透过尽量压缩的空间和时间看到人物的复杂性格、内心世界、人们之间的关系以至他们所处的环境、整个社会和时代。《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的是劳改营里一天的生活；《第一圈》描写所谓“天堂岛”上的四天；《1914年8月》写东普鲁士战线上的十一天；《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只写一件事；《玛

特辽娜的家》只谈一个家。但是，《古拉格群岛》则完全不同。《古拉格群岛》所反映的时间长达四十年，地点是几乎遍布苏联全境的劳改营、监狱和边远的开发建设地区，描写了数百个人物的命运。它很象是“群岛”的历史，但又毕竟不是一部具有严格科学性的历史书，更不能把它单纯地说成资料汇编。作者正是想到了本书的这些特点，才声明自己“因为没有机会看到有关‘群岛’的记录材料”，“不敢冒昧地以‘群岛’历史的编纂者自居”，并因而给书名加了个乍看不大容易理解的副书名：“文艺性调查初探”。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在这里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采用了不同的手法。既有自传性的侃侃叙述，也有报告文学式的真人真事描写；有历史事实的考证，也有法律条文的诠释；有作者的随想，也有见闻实录。时而可以听到温顺虔诚的诉说和祈求，时而则是慷慨陈词甚至挑衅性的辩驳、攻击。作者通过这些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政治、道德观念，但他并不全是自己讲述的。他通过所谓“多声部”或“复调音乐”的手法，让许多声音同时围绕着一个问题讲话，让它们互相争辩、否定、补充、加强，从而把问题提到更高的水平，使描写刻划进一步深化。这时他又往往运用一些生动的比喻，赋予事物以某种具体而鲜明的“形象”，从而加深读者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如“群岛”、“土著”、“癌扩散”、“水流”、“下水道”、“犄角”等等。除比喻外，作者还善于使用讽刺、幽默的笔法和辛辣、尖刻的对话，或者使用明显的反话来加强效果，加深读者的印象。

在语言方面，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俗语、谚语、古旧俄语（作者在劳改营期间身边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编纂的弗·达里的《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宗教语言，同时，他把过去难登大雅之堂的所谓“劳改营语言”、盗贼流氓使用的黑话（甚至脏话）也写进了作品。他常常用这一类的词句表达一些他

认为无法用普通词汇表达的重要概念。这就带来某些阅读上的困难，致使西方为此出版了专门的索尔仁尼琴字典。

另外，如前所述，特殊的写作环境也给作品留下了某些印记，特别是在结构方面。

四

《古拉格群岛》中提到劳改犯人和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时，使用了五花八门的名称，各有不同含义。下面择其中最常见的作些简要说明。

为了表示苏联国内犯人人数的众多，强调他们有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国土”和“语言”，索尔仁尼琴把苏联所有犯人统称为一个“民族”，或称为“岛上的土著”。犯人又分为三种：一、政治犯（ПОЛИТИЧЕСКИЕ）；二、“日常生活犯”（БЫТОВИКИ）；三、盗窃和刑事惯犯（БЛАТНЫЕ）。

苏联法律中并不使用“政治犯”这个词，他们把所有被判刑的人一概称为刑事犯（УГОЛОВНЫЕПРЕСТУПНИКИ）。在本书涉及的时代，作者所说的“政治犯”大都是根据1926年颁布的苏联刑法“国事罪”一章第五十八条的各分条判刑的人（因此，书中也把这些人叫做“五十八条”——ПЯТЪДЕСЯТВОСЪМЫЕ）。其中也有不少是根本未经判刑就关进监狱的。这些人中包括真正因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被捕入狱的，也有在历次大规模镇压运动中（被所谓“水流”）“被冲进”监狱和劳改营的，他们并没有触犯国家的刑律（或只有轻微的过失），只是因为属于某阶级、阶层、党派、宗教教派、民族，或者因为曾被俘或曾侨居国外而被监禁、劳改、流放的。这里当然也包括从党、政、军机关中被清洗出来的“人民公敌”（ВРАГИ НАРОДА）

和他们的家属。

政治犯按照其社会成分和所属党派又分为三类：一、“以前的”（БЫВШИЕ），指原来的贵族、白军军官、旧官吏、立宪民主党人等；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党人（СОЦИАЛИСТЫ），包括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等；三、共产党人，包括托洛茨基派、共产党内的其他反对派以及所有被清洗的共产党员。索尔仁尼琴自已又在上述各种人当中划了另一条鲜明的界线，把他们概分为两大类：即“真正的政治犯”和“正统派”。前者是在思想意识上根本与当局不一致的人，而“正统派”（ОРТОДОКСЫ）则是作者予以嘲弄的所谓“思想纯正分子（БЛАГОНАМЕРЕННЫЕ）或“无不同政见者”（БЛАГОМЫСЛЯЩИЕ）。

所谓“日常生活犯”，一般指既不属于“五十八条”，也不属于盗窃惯犯的人。这个词不是法律名词，只是犯人中习惯的称呼。

盗窃犯或刑事惯犯（УГОЛОВНИКИ），书中也叫做窃贼（ВОРЫ）、贼骨头（УРКИ）、“带色的”（ЦВЕТНЫЕ）等。其中积极与当局合作并充当杂役的被称为“母狗”（СУКИ）；不巴结当局的叫做“正经贼”（ЧЕСТНЫЕ ВОРЫ）。这两种人都同样在劳改营中欺凌其他犯人，他们把不属于他们一伙的犯人称为“福来儿”（ФРАЕРЫ），即“傻瓜”、“大头”、“蹩脚货”的意思。

劳改营里有一部分犯人担任各类辅助劳动或服务工作，叫做杂役（ПРИДУРКИ）。俄文ПРИДУРКИ有“藏奸耍滑的人”的意思，所以书里说是个“不客气”的称呼。劳改营的大部分犯人从事一般劳动（ОБЩИЕ РАБОТЫ），即各该劳改营的主要作业，这种人被称为“卖苦力的”、“干大活的”（РАБОТЯГИ）。还有一些因身体极度衰弱而不能劳动的犯人叫做ДОХОДЯГИ，

意思是"等死的"、"快完蛋的"，有时译成"老弱病残"，有时译成"奄奄一息的人"。

当局还在犯人当中安插一些奸细。这类人在监狱中叫做"耳目"（НАСЕДКИ），劳改营里叫做"坐探"（СТУКАЧИ）。前一个俄文词的原义是"孵小鸡的母鸡"、"成天照看小孩的女人",后者是从СТУЧАТЬ（敲打，敲门）转化来的词，意思是这些人经常敲长官的门去打小报告。所以，本书中专讲告密者的一章便用了形容敲门声的"砰，砰，砰……"（СТУК， СТУК， СТУК……）做标题。作者认为受到当局鼓励的告密行为（СТУКАЧЕСТВО）是导致苏联社会道德败坏的重要因素。

书中这类具有特殊含义的用语相当多，无法一一介绍，必要时在文内以"译注"形式加以说明。

五

在本书所涉及的四十年中，苏联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名称有过多次变化（见下表）。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提到这些机关时一般用其名称的缩写字，而且并不严格地使用各该时期的正式名称。这就给人以庞杂不清的印象，因此有必要稍加说明。

下表所列的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总部一直设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卢宾卡（ЛУБЯНКА）广场的一座大楼里(现在这个广场叫捷尔任斯基广场。这座大楼革命前是一家保险公司)。因此,一般习惯用"卢宾卡"这个词代表苏联的国家安全机关总部，同时也代表设在这座大楼里的"内部监狱"。由此，"去卢宾卡！"也就有吃官司或坐牢的意思。

作者在书中除使用机关的缩写词外，还对在这些机关工作的人员使用了一些由机关缩写词演变来的、带有讽刺和轻蔑意味的缩略词。例如ГЕБИСТЫ（国家安全人员）、ЭМВЭДЕЩНИКИ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沿革表

年代	名称	负责人	名称俄文缩写	名称缩写中译名
1917.12—1922.2	肃清反革命怠工及取缔投机非常委员会	捷尔任斯基	ЧЕКА, ЧК	契卡
1922.2—1922.12	国家政治保卫局	捷尔任斯基	ГПУ	格别乌
1922.12—1934.7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捷尔任斯基（1922—26） 明仁斯基（1926—34）	ОГПУ	奥格别乌
1934—1943	内务人民委员部	雅果达（1934—36） 叶若夫（1936—38） 贝利亚（1938—43）	НКВД	恩克沃德
1943—1946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贝利亚	НКГБ	恩克格勃
1946—1953	国家安全部	阿巴库莫夫	МГБ	莫格勃
1946—1956	内务部（1953年曾与国家安全部短期合并，统称内务部）	克鲁格洛夫	МВД	莫沃德
1953—	国家安全委员会		КГБ	克格勃

（内务部人员）、**ГЕПЕУШНИКИ**（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等。有时也笼统地称他们为“契卡人员”（**ЧЕКИСТЫ**）。尽管“契卡”早已改组，但**ЧЕКИСТЫ**仍是苏联官方常用的一个词。不过，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与上述各词并列，它也带有挖苦讽刺的意思了。

劳改营里除一般管理人员外，还有国家安全部门特派来的外勤人员（ОПЕР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Е，简称ОПЕРЫ），译做“行动特派员”，他们专门负责对犯人进行政治监视和“营内侦讯”（ЛАГЕРНОЕ СЛЕДСТВИЕ）。犯人们把这种官员戏称为他们的“教父”（КУМЫ）。派驻在军事机关的国家安全部门叫做“特别科”（ОСОБЫЙ ОТДЕЛ），这个科的人员叫做“特科人员”（ОСОБИСТЫ），等等。

以上只是提供一些有关作者和本书的基本情况。此外，便于读者阅读，我们除在正文中加若干注释外，还参考本书的英、日译本为每册编写了总计四百余人的人名索引简介，分别附在各卷之后。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这充分表现在本书的大量议论中。由于译者掌握的材料不够全面，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1年2月

几年来，我怀着压抑的心情没有把这本早已写好的书付印：对生者应负的责任超过了对死者应尽的人事。但是现在，当国家安全机关反正已经抄走了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别无他法了。

亚·索尔仁尼琴

1973年9月

一九四九年，我与友人们偶尔在科学院的《自然界》杂志上读到一篇值得注意的简讯。那里以细小的字体写道，在科雷马河上进行发掘时，不知怎样地发现了一片地下冰透镜层——凝冻的古流，其中冻结着古生（几万年以前）动物区系的代表物。科学通讯员作证说，这些又似鱼类，又似蝾螈的东西保存得如此新鲜，在场者们击碎了冰块，当即就**乐意地**吃掉了它们。

为数不多的杂志读者们，对于鱼肉能在冰里保存如此之久这一点，想必是颇为惊异的。但是很少有谁能领会到这篇冒失的简讯的真正巨大含义。

我们却马上就懂得了。我们清楚看到了全部场面：在场者们怎样迫不及待地击碎冰体；他们怎样侵害鱼类学的崇高利益，你挤我拥地敲下千年肉块，拖到篝火旁去，化开后就饱餐起来。

我们所以懂得了，因为自己就属于**在場者**之列，就属于大地上独一无二的强大“泽克”* 部族，也只有这个部族才会**乐意地**吃掉蝾螈。

科雷马是最大最有名的一个岛屿，是这个地理上撕裂开来而心理上则束缚于大陆的奇异的古拉格之邦的凶残极地——这奇异之邦是个几乎看不见、摸不到的地方，泽克（犯人）族人也就居住在那里。

这个群岛纵横错落，互穿杂布于包围着它的另一个国土之内，插入它的城市，悬挂在它的街道之上——而有些人对此依然毫无所知，很多人仅仅略有所闻。只有去过那里的人才知其全貌。

可是，他们却缄默不语，好似在群岛上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我国历史的意外转折使得关于这个群岛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情况公诸于世。但就是那些拧紧过我们手铐的手，现在却有意和解

---

* 俄文“犯人”的缩写字的译音。——译者注

地摊开手掌说："别这样嘛！……不要翻旧帐了吧！……提旧事者失一目！"然而这条谚语的下句却是："忘旧事者失双目！"

数十年岁月流逝，舔尽了往日的斑斑伤痕。有些岛屿在这个时期内已经动摇了，漂散了，在它们的表面上，已经飞溅着极地的遗忘之洋的浪花。于是，在未来世纪的某个时候，这个群岛，它的空气，以及凝冻在冰透镜层里的它的居民的残骸，将变成好似那种难以置信的蝾螈。

我不敢放肆去撰写群岛的历史：我没有机会阅读文献，但什么时候谁会有机会呢？……那些不愿回忆的人已有（还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所有文献消灭净尽。

我在那里度过的十一年光阴，我不认为是一种耻辱，不认为是一场恶梦，而且我几乎爱上了那个丑恶的世界，而现在还由于幸运的机缘，成了受托处理晚近的一些故事和书信的代理人，也许我将能从骨头和肉里，并且还是从活生生的肉里，从今天还活着的蝾螈的肉里，拣出一点东西来？

献给

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但愿他们原谅我，

没有看到一切，

没有想起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此书由一人来创作是力不胜任的。除了我从群岛带出来的一切——亲身感受的、记忆所及的和耳闻目见的以外，写作这本书的资料，是（二百二十七人名单从略）在一些口述、回忆和书信中提供给我的。

我不在这里向他们表示私人的谢意：这是献给全体受难者和受害者的我们合力建造的纪念碑。

在这名单中，我想要特别提一下那些花了许多劳力来帮助我使这个东西拥有图书学上的依据的人，他们提供的书有的是今天图书馆的藏书，有的则早已注销，因而要找到保存下来的一本是要有巨大的坚忍不拔精神的；尤其要提到的是那些在严峻时刻帮助藏匿这份手稿、后来则加以复制的那些人。

但我敢于说出他们姓名的时刻尚未到来。

索洛维茨老囚犯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维特科夫斯基本应是此书的编辑者。然而，**在那里**度过的半辈生涯（他的劳改营回忆录也就称为《半辈生涯》），使他过早地瘫痪了。已经不会说话，他只读了写好的几章，便确信一切**都将得到说明**。

如果自由在我国长时期内仍不能透露光亮，因之这本书的传递也将冒极大的风险，那么，对于未来的读者们，我也应当代表死难诸人致以谢忱。

当我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任何有关劳改营的回忆录或文艺作品，我都一无所知。在一九六七年以前的那些工作年代里，我逐步获悉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和Д·维特科夫斯基、E·金兹布尔格、O·阿达莫娃-斯辽兹别格等人的回忆录，对于这些作品，我在叙述过程中将作为人人皆知的（终究也将会这样呀！）文献事实加以援用。

下述诸人违背自己的意图，与自己的意志相抵触，为本书提

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保存了许多重要事实，甚至数字和当时所呼吸的空气：M·Я·苏德拉勃斯-拉齐斯；H·B·克雷连科——多年的国家总公诉人；他的后继者A·Я·维辛斯基及其法学家帮手们，其中不能不特别提出И·Л·阿维尔巴赫。

为此书提供了资料的，还有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首的**三十六名**苏联作家，他们是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关于白海运河的那本可耻书籍的作者。

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用，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留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

目　录

第一部　监獄工业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第一部

监 狱 工 业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

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第一章

逮捕

这个神秘的群岛是怎样进去的呢？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感到惊异。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军事委员部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象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说它是你整个生活的急转剧变？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它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

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这一时刻只能从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为了什么?!?”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千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滑稽泥糊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逮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们的脚，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为了什么??……”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别的也装不进去了。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文学概念的东西——将不在你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子雄赳赳地跨进门来。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以待旦。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确实也是活受罪）。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穿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那里会给吃饱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谎话。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里作威作福。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在逮捕机车司机英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1] 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古物爱好

① 当1937年砸卡扎科夫大夫的研究所的时候，"执行组"把盛有他所发明的溶成物的容器打个粉碎，虽然已治愈和可治愈的残疾病人在四周一瘸一拐地蹦跳着，央求保全那有神效的药物。（官方认为溶成物是毒物，那为什么不把它保存下来作为物证呢？）

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〇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象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②

---

②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列宁的原文是“一个杰出的党的工作者。”——译者注）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〇年在巴布施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施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子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人。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象没有发生过似的。

夜间，“乌鸦车”* 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青的一代举着旗帜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根本没有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还可以按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

---

* 指囚车。——译者注

度，③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伊尔玛·明戴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是头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部演出时间，而在演出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梳着褐色辫子的美人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刚给自己买了蓝色的连衣裙料子，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青人走来请她坐上马车（而车夫却已经明白了，便皱起了眉头：机关是不付车钱的），要知道这并不是幽会，而是逮捕：他们现在就拐到卢宾卡，驶进黑洞洞的大门。如果说（过了二十二个春天以后），穿着白制服、身上散发出贵重香水气息的海军中校包利斯·布尔科夫斯基给一个姑娘买了块大蛋糕，那末请不要发誓保证，这块大蛋糕定会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员划得刀痕纵横，并由他本人带进他的最初的牢房

---

③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方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显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 苏联历届肃反、内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直属监狱的所在地。——译者注

去。不，无论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广众的逮捕，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然而，它做得干净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配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出这个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到家里敲门进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管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点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进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道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出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户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阴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春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感动了——这么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谢，他欢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青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出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象没有，虽然……”年青人态度十分亲热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伊凡内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子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象知交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人的这种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么能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如果你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高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道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塞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式样都象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你被带到工厂出入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娅）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他们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

* 亚历山大的昵称。——译者注

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象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饱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象干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

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巴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种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流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根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顶替。象安·巴威尔那样，偶然落入围捕圈或陷入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具结不出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А·И·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罗格里沃地方学校的主要教师。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个农民走到他身旁转达了某人的话："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快离开吧，你已经上了名单了！"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道整个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会把我抓起来？……（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象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得："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

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他二十三岁被关进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唸唸有词：“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把其他人大批关进去，这也不象话，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谁弄得清楚：“也许这一个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人类逻辑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来。

因此你干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弄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踮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抵抗。④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裤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出家门槛？逮捕是由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为了什么？”在转圈子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

④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感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入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头、锤子、火钩子，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道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就给杀人凶手迎头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乌鸦车”——赶走它，或者扎穿车轮。机关不会马上算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娅·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舖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象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

如果……如果……。我们缺少爱好自由的精神。更要紧的——是缺乏对真实状况的认识。我们在1917年的一次无节制的爆发中消耗尽了。随后就急于顺从屈服，心甘情愿地屈服。阿尔多尔·伦索姆描述了1921年在雅罗斯拉夫尔召开的一次工人群众大会。中央委员会从莫斯科派人来同工人商讨关于工会争论的实质问题。反对派的代表Ю·拉林向工人们说明，他们的工会应当保护工人不受行政侵害，他们拥有斗争得来的权利，谁也无权侵犯。工人却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之。他们干脆不明白，他们要这种保护来防备谁，他们干吗还需要这种权利。而当总路线的代表出来发言，咒骂工人不守纪律和懒惰，要求他们作出牺牲，进行无偿的加班劳动，节缩食物，象军队一样服从工厂行政领导——这却使群众大会欣喜若狂，鼓掌欢呼。对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实在是咎由自取。

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体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德林娜·奥利茨卡娅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

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千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青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溜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象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自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象都在瞧着我！他们象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

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自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自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 * *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揪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象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索尔仁尼琴。回来。"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主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人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为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扎哈尔·格奥尔盖维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没有！他继续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灵魂，他从桌子后

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我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我伸出手来，（当我自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我伸出过手！）在噤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他握着我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仅已经不是大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

玻璃在震颤。德国炮弹的爆炸在二百米远近的地方撕裂着大地。它引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较远的后方，在我们本国的土地上，在稳定的生活的保护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5]。

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忆录。因此，我不去叙述我那四不象的逮捕的极其有趣的细节。在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我，并请我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我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我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关于这个临时用作禁闭室的德国农家的小贮藏室，倒不能不说几句。

它有一个人身材的长度，而宽度——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我正好是第四个人。把我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我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我们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我心里象烧

---

⑤ 实在好得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毕竟是可以做到的！——特拉夫金没有受连累。不久前我高兴地与他见了面，并第一次结识了他。他现在是退休的将军和猎人协会的监察员。

着一团火。半天前我那个大尉当得愈自信，现时在这小屋地下挨挤就愈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我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讶：

“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我的同监难友——戴着黑色软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战争年代里深深喜欢上了的一类人（我自己要复杂些和坏些）。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露着线痕。在弄脏了的军服上，色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深红色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驻扎的村子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身上弄得湿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进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骚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腿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点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

是啊！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奸，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间谍机关长官的“战地随军夫人”——便出来了一个后方机关的中士，立即恶狠狠地从三个作战部队的军官肩上撕下按方面军

的命令核准给他们的肩章，摘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们的勋章——现在等着这些曾用履带辗平过也许不止一道敌军交通壕的好汉们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个军事法庭如果没有他们的坦克也许到不了这村子里来。

我们把煤油灯熄灭了，它已经烧光了我们这里赖以呼吸的一切。门上开有一个明信片大小的旋转口，走廊的间接光就从那里落下来。好象担心白天到来后我们在禁闭室里会变得太宽敞，马上给我们添进了第五个人。他穿着新制的红军大衣，戴着也是新制的军帽走了进来，当他转向旋转口时，让我们看清了一张长着翘鼻子，满颊红晕的容光焕发的脸。

“兄弟，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人？”

“从那一边来，”他敏捷地回答，“是间谍。”

“开玩笑吧？”——我们发愣了（由间谍自己说出自己的身份——谢宁和图尔兄弟* 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小伙子懂事地叹了口气说：“军事时期哪能开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不然怎样才能从俘虏营回家？”

他刚开始向我们叙述，一昼夜前德国人怎样把他带过战线，要他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桥梁，而他却跑到最近的一个营去投降，又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士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头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个粗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

* 都是苏联作家。——译者注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融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弄得肮脏不堪，那么乱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色阴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紧点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臭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色大伤疤却清晰可见。

"你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轻声地问道，没有显示出愿意赶紧回到那散发着煤油气息的禁闭室的意思。

"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准尉用骄傲的过分响亮的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反间谍人员很喜欢这个用"死亡"和"间谍"两个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灭尔施》*，认为它是很吓人的）。

"在我们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软盔挪到了脑后，头上露出还没有被剃掉的头发，他在火线上磨出膙子的屁股正迎着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风。

"你们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过实际需要地大声吠叫。

"红军。"上尉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用眼光扫射了一下这个未成事实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监狱气息。

---

* 俄文为СМЕРШ，由"死亡"和"间谍"两字缩写组成。意思是"消灭间谍"，是军队反间谍机关（除奸科）的代称。—译者注

第 二 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现在一骂个人迷信的胡作非为，老是再三地钉住那个如鲠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给人的脑子里留下个印象，好象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关过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头没有任何统计资料，但不怕错说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经涨满过我们监狱下水系统阴暗恶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〇年的水流，浩如鄂毕河，把一千五百万上下（说不定还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冻土带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识字的人，他们既没有写申诉书，也没有写回忆录。对于他们，侦查员无须成夜成夜地埋头苦干，也不必花费时间作笔录——只要村苏维埃的一纸决议就够了。这股水流溢进、渗入了永久冻土带，今天连最热心肠的人士也差不多没有谁回忆这件事。好象它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良心受到损伤。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的了。

以后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叶尼塞河：顺着污水管道，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几百万几百万当了俘虏（那是为了我们！）被赶到德国而后来返回祖国的人驱逐了（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烧灼伤口好使它赶快结痂的疗法，免得整个人民的身体都需要休息、喘气、休整）。但在这股水流中，多数也是普通人，也没有

89997

写回忆录。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党内资历的人、受过教育的人，也卷进去了，也把他们带到群岛，他们周围有许多受到株连的人留在城市里，而且有多少笔杆子呀！——他们现在一起写呀，说呀，回忆呀：三七年！人民苦难的伏尔加河！

可是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加尔梅克人、或者**切臣人**说：“三七年”——他们只会耸耸肩膀。对于列宁格勒说来，以前已经有过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么？而对“二进宫”的人或波罗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艰难吗？如果热心于文体和地理学的人们责备我，说我还忽略了俄国的另外一些大河，那么请稍候一下，因为各股水流我还没有说完呢，容我在下面细说。有了水流就不愁不汇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 不进行练习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被歌颂的并高置于全体活人之上的机关（他们自己用这个难听的词来称呼自己）的一根触须也没有衰亡，相反长得愈来愈长，筋肉愈来愈壮——那就很容易猜到，他们是**经常**在进行练习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脉动，压力有时高于设计标准，有时低于设计标准，但监狱下水道从来也没有空过。我们被压榨出的血、汗和尿，经常拍击着管壁。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吞进和流走的历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时交替。水流一会儿较大，一会儿较小，还有一些涓涓山溪、沟槽泄水以及被截获的单独水滴，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

往下按时间顺序列举的事实，既包括千百万被捕者所构成的水流，也将涉及普通的不显眼的几十人构成的小溪。但这还很不

* 俄语中“орган”一词既可作“器官”解，也可作“机关”解。——译者注

完全，还很贫乏，还受我洞察历史的能力所限。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来作许多补充。

在列数史实的时候，最难的是开端。因为追溯的年代越远，留下来的证人就越少，传闻湮灭了，模糊了，而编年史却没有，或者已经成为禁书。同时，把特别残酷无情的年代（国内战争）同本可发发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也是不怎么公平的。

但是，在爆发国内战争以前，早已看得出来，象现在这样的俄国，有着这样的居民成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自然都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当时就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了。专政的最初一个打击落在立宪民主党人头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极端的革命传染病，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极端的反动传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开成的首届立宪会议预定会期内，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了对其党人的逮捕。大约同一时期，对“立宪会议同盟”、“士兵大学”系统实行了抓捕关押。

根据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这数月里，“克列斯特”、“布蒂尔卡”及许多同一类的外省监狱，塞满了大富豪、社会知名人士、将军和军官，以及各部和整个国家机关的那些不执行新政权命令的官员。契卡的最初一项行动，就是逮捕全俄职员协会罢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个通令指出：“鉴于官吏们的怠工……各地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不放弃没收、强制和逮捕等手段”。[1]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2]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

① 见《内务人民委员部公报》，1917年第1期，第4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280页。

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③ 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④ 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⑤ 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

谁被包括在这个广泛的害虫定义中，我们现在已无法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俄国的居民成分太不划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小集团。地方自治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都是害虫。在文科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教会的教区理事会满是害虫，教会合唱团里害虫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虫，所有男女僧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连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们去参加苏维埃工作，譬如说参加铁路工作时，没有书面起誓保证拿着武器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虫（我们还将看到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事例）。话既然说到铁路就说说铁路吧——有很多害虫躲在铁路制服下，必须把他们揪出来，对某些还要拍打拍打。还

③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280页。

④⑤ 同上

有报务人员，这些不知为什么大量地是不同情苏维埃的不可救药的害虫。关于铁路员工全俄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工会，也说不出什么好话，那里往往充满了敌视工人阶级的害虫。

仅仅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集团，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足够几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种各样的可恶的知识分子、不安生的学生、各种怪人、真理寻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从罗斯身上清除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总是妨碍严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过时了的诉讼形式和法律规范，而且还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卫生大扫除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肃反委员会——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判决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就担负起了这项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胜利，开始掏空和撒净圣徒的遗骸*，拿走教堂用具。为了捍卫遭到破产的教会和寺院，爆发了人民骚动。到处敲起了警钟，东正教徒们跑来了，有的还拿着棍棒。当然，有的必须就地开销，有的要抓起来。

现在对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那些还没有送进牢房就已经崩了的人算不算进监狱流量中去？所有被贫农委员会在村苏维埃办公室旁边或院子后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栏？每省都揭开了成嘟噜的阴谋（梁赞两起、科斯特罗马一起、维西涅沃洛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辅几起、莫斯科几起、萨拉托夫一起、契尔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里格尔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鲁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尔斯克、魏里戈

* 基督教堂内保存的圣者遗骸。——译者注

鲁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们的参加者来得及哪怕是一只脚踏上了群岛的土地？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就不必列入我们研究的对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乱（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斯克、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被镇压外，我们对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个名称——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尔宾斯克枪杀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枪杀了谁？……往哪里写呢？

解决下列的问题也有不少困难：是否应把好几万的人质算在这里，或者应列入国内战争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些本人并没有被控犯什么罪甚至没有用铅笔登录过姓名的和平居民，他们被抓来消灭掉是为了恐吓和报复军事上的敌人或暴动起来的群众。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和军官阶层中则应取得大量人质。”⑥（好吧，譬如说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 一组人谋杀未遂后，不光是把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国所有的大学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来，那又如何呢？）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决议——显然是在列宁的主持下——建议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清除铁路积雪工作“进行得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地区的农民取作人质，“如果以后不完成清除积雪工作，他们将被枪决。”⑦人民委员会一九二〇年底的决议允许把社会民主党人也取作人质。

然而，在仅限于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时，我们就应当指出，多年间滔滔不绝的“背叛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

---

⑥ 见《内务人民委员部公报》，1918年第21—22期，第1页。

⑦ 见《苏维埃政权法令集》第4卷，莫斯科1968年版，第627页。

* 民意党人，列宁的长兄，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判死刑。——译者注

春天就开始流淌了。所有这些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几十年来只是假装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们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装模作样。只是在革命的急遽进程中，才立即暴露出这些社会叛徒们的资产阶级本质。那自然就应当把他们抓起来！在逮捕立宪民主党人、驱散立宪会议、解除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和其他团的武装后，紧接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们开除出一切苏维埃之日起，这种逮捕就进行得较多较齐整了。从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长久地假装成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赶到了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只要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在任何一个城市发生工人骚动、不满、罢工（这些骚动、不满、罢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发生过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动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后来是喀琅施塔得，并逼出来一个新经济政策），契卡就在安抚、让步、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这些骚动的真正罪魁祸首抓起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狱——他们在布蒂尔卡监狱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对他们的审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⑧在一九一九年那年，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也被关进监狱。（因

⑧ 见M·Я·拉齐斯著：《内部战线斗争的两年》。契卡活动的通俗评述。国家出版社1920年莫斯科版，第61页。

此也就没有开成会。）⑨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科罗连柯——“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⑩“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⑪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⑫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

⑨ 见M·Я·拉齐斯著：《内部战线斗争的两年》。契卡活动的通俗评述。国家出版社1920年莫斯科版，第60页。

⑩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47—48页。

⑪ 同上，第48页。

⑫ 同上，第49页。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〇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他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〇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滥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罪犯和日常生活罪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犯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

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13]，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〇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〇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14]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社会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基什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

---

⑬ “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科罗连柯：1921年8月10日给高尔基的信）。

⑭ 参看《战争与革命》杂志1926年第7—8期。图哈切夫斯基著：《同反革命暴动的斗争》。

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科罗连柯，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科罗连柯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⑮——“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林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任斯基和雅果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象马依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

---

⑮ 科罗连柯在给高尔基的信（1921年6月21日）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会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用和沙皇制度相同的手段惩办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

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

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⑯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牢。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乩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嘉也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А·И·阿勃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

---

⑯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1959年5月24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连·华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代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彻底消灭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妮亚·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

（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

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浪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

* 孟什维克在国外办的刊物。——译者注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曾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斗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

---

* 希腊的一个岛屿。——译者注

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娅，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坐探〔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坐探〕；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也夫娜·约塞——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大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

说来可笑，但由于荒唐的传统，从旧俄保存下来了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它有三个分会：莫斯科分会（E·彼什科娃、维纳魏尔），哈尔科夫分会（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彼得格勒分会。莫斯科分会很守规矩——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被取缔。彼得格勒分会（老民粹派谢甫卓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罗夫斯基）则表现得颇为讨厌和狂妄，它卷进政治事件，寻求施吕塞堡要塞*老囚犯们（诺伏鲁斯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仅帮助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接济反革命分子。它于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动家们被流放。

岁月在流逝，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温便会在记忆中销蚀。我们今天看那蒙眬远方的一九二七年，觉得它是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年头。而实际上它是很紧张的一年，时常被报纸上的爆炸性新闻引起震荡的一年。当时在我国产生的感觉和制造的印象是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战争的前夜。苏联驻华沙政治代表的遇害占据了六月份报纸的大量版面，马雅可夫斯基为此写了四首惊雷般的诗作。

---

* 著名的沙皇时代的政治犯监狱。——译者注

但事不凑巧：波兰道了歉，暗杀伏依科夫的唯一的凶手⑰在当地被捕获——诗人号召如何执行和对谁执行呢：

“用团结，
　　用建设，
　　用自制
　　和惩治，
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
　　拧下脖子！”

惩治谁呢？拧下谁的脖子呢？于是就开始了“伏依科夫招生”。向来如此，在发生任何骚动和紧张情况时，就把“过去的人们”关起来，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起来，而且不需什么特别理由还把知识分子关起来。实际也是这样——在城市里该把谁关起来呢？总不能是工人阶级吧！“近立宪民主党”知识界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经给折腾够了。那么是否到了动动那些貌似进步的知识界的时候了呢？对大学生必须进行清理。这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应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团！
自己的
　　队伍
　　　瞧得锐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团员

⑰ 这个保皇分子看来对伏依科夫是实行个人的复仇：乌拉尔省粮食人民委员П·Л·伏依科夫在1918年7月领导了枪杀沙皇家族后的毁尸灭迹的工作（剁碎和锯断尸体，焚尸扬灰）。

真正是团员

或者

只是

假装成共青团员？”

方便的世界观也就产生方便的法律术语：社会预防。它施行了，它被接受了，它立即为大家所理解（不久以后，白波运河建设工程的一个长官拉扎尔·柯甘就会说：“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无辜的。但你是有教养的人，应当理解，这是在实行广泛的社会预防！”）。真的，这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整个这堆知识分子破烂货，如果不是在世界革命战争前夕把他们关起来，那什么时候关起来呢？大战一开始——就晚了。

于是，在莫斯科就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进行有计划的掏挖。到处都有什么人应当抓起来。口号是：“我们要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叫全世界都吓得发抖！”“乌鸦车”、小汽车、有篷卡车、敞篷马车甚至在大白天都纷纷向卢宾卡、向布蒂尔卡奔驶。大门口发生堵塞，院子里发生堵塞。对于抓来的人连卸车和登记都忙不过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城市里。在顿河罗斯托夫，三十三号大楼的地下室里，这些日子连地上都已经挤满了人，新抓去的包依科好不容易才找到坐下来的地方）。

这条水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几十个年青人时常聚在一起举行事先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许可的音乐晚会。他们听音乐，然后喝茶。茶钱是他们随意出点零钱凑的份子。完全清楚，音乐——是为掩护他们的反革命情绪，凑钱也根本不是为了喝茶，而是用以帮助正濒于灭亡的世界资产阶级。于是把他们全体逮捕，分别判了三年到十年（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五年），而不认罪的首恶分子（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瓦伦卓夫以及其他一些人）——**枪毙**！

再一个例子。在同一年，流亡国外的高等法政学校学生在巴

黎某地集会庆祝传统的“普希金”高等法政学校纪念日。此事登在报上。显然，这是受了致命伤的帝国主义耍的花招。于是，所有留在苏联的前高等法政学校学生都被逮捕，与此一起，还把“前法学院毕业生”（另一所这样的特权阶层子弟学校）也抓了起来。

“伏依科夫招生”的规模暂时还受着北方特种营的定量的限制。但是古拉格群岛已经开始了它的恶性的生存，而且很快就会把它的癌细胞扩散到国家的全身。

尝到了新的味道，新的食欲也就产生。摧毁技术知识界的时刻早就到来了，这些人过分地以为自己不可替代，并且不惯于迅速领会上级的意志。

这就是说，对于工程师们——对于资本主义旧主子的这些仆从们，我们历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们从革命初年起，就把他们置于工人的正当的不信任和监督之下。然而，在恢复时期，我们还是容许他们在我们的工业中工作，而把阶级打击的全部力量指向其他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经济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越成熟，计划的数量越增多——而这些计划是经常互相冲突和打架的——旧工程界的暗害本质、它的假心假意、狡猾和叛卖行径，就显得越清楚。革命的哨兵更加锐利地眯缝起眼睛——只要他把眯缝着的眼光射向哪里，哪里就立即发现暗害行为的巢穴。

从一九二七年起，这项肃反工作就开足马力进行，并且立即有真凭实据地向无产阶级揭示了我们经济上失利和短缺的全部原因。交通人民委员部（铁路）——有暗害行为（怪不得难以坐上火车，怪不得运输经常中断）。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有暗害行为（断电）。石油工业——有暗害行为（买不到煤油）。纺织工业——有暗害行为（工人穿不上衣服）。煤炭工业——有大规模暗害行为（所以我们挨冻！）。金属工业、军事工业、机

械制造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矿山开采工业、黄金白金冶炼工业、水利事业——到处都是暗害行为的脓疮烂疱！四面八方——都是带着计算尺的敌人！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了揪出和抓捕暗害分子忙得喘不过气来。在各首府和各省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法院在进行工作，翻腾这堆粘糊糊的脏东西，劳动者每天从报纸上惊异不置地获知（有的并没有获知）他们的新的卑鄙勾当。他们知道了帕尔钦斯基、冯-梅凯、维里奇科，⑱还有多少无名之辈呀。每个部门、每个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都应当在本单位找寻暗害行为，而刚一开始——马上就找到了（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某个革命前毕业的工程师如果还没有成为被揭穿的暗害分子，那一定可以怀疑他是这种暗害分子。

这些老工程师是怎样一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啊，他们多么善于用各种方法穷凶极恶地进行暗害啊！尼古拉·卡尔洛维契·冯-梅凯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假装成很忠于新经济的建设，能够长时间兴致勃勃地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并且喜欢提出建议。他的一项最有害的建议就是：增加货运列车长度，不要害怕重载。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下，冯-梅凯被揭穿了（并被枪决）：他想使线路、车轮和机车损耗，让共和国遇外国武装干涉时没有铁路使用！过了短短的时间，新的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使用重载列车，甚至两倍、三倍超载的列车（因为这项发明，他和其他领导人获得了列宁勋章），这时，坏心肠的工程师们就以极限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大叫大嚷，说这太过分了，说这将毁灭性地损耗机车车辆，于是他们就因不信任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的优越性而公正地遭到了枪决。

---

⑱ A·Ф·维里奇科是一个军事工程师，前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授，中将，在沙皇的军事部里领导过军事通信局，被枪毙了。唉，在1941年他会是多么有用呀！

这些极限论者挨了好几年打，他们在各部门摇晃着自己的计算公式，并且不想理解人的干劲能帮助桥梁和机床提高强度（这是整个人民心理大翻个的年代：那种“要快就不会好”的瞻前顾后的民间智慧受到嘲笑，那则“欲速则不达”的古老谚语被颠倒过来）。对老工程师们的逮捕有时延缓，只是因为接班人还没有准备好。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拉德仁斯基是伊热夫斯克军事工厂的总工程师，起初因“极限论”、因“对备用强度的迷信”（由于这种迷信，他认为奥尔忠尼启泽签署的扩建工厂的投资金额不够用[19]）而遭到逮捕。但后来改为对他实行监外管制，并命令他在原单位工作（业务没有他就要垮台）。他渐渐把工作搞上轨道。但资金原来不够，现在依然不够——于是这时又以“资金使用不当”为名重新把他投入监狱：资金之所以不够，是因为总工程师对资金处理不当！拉德仁斯基在伐木场好歹拖了一年就死掉了。

这样，在几年内，加陵-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扎米亚金惯于描写的主角——曾为我国增光的老一辈俄罗斯工程界的脊梁就被砸断了。

不言而喻，在这股水流中，象在任何水流中一样，也会捎进其他一些人，与受害者亲近和有牵连的一些人，例如还有……我根本不想玷污哨兵的晶莹光泽的古铜色脸孔，但不得不如此……还有未收买成的情报员。我请读者永远记住这股完全秘密的，一点也不公开显露出来的水流——特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当时人们往往很高傲，许多人还不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只具有狭隘的阶级含意的东西，还敢于拒绝请他们效劳的建议，因之他们全都遭

---

⑲ 据说，奥尔忠尼启泽同旧工程师们是这样谈话的：他在写字桌的右边放上一支手枪，左边还有一支。

* 俄罗斯作家，曾著《工程师》等作品。——译者注

到了无情的惩罚。有一次，要求一个年青女人马格达林娜·艾朱波娃监视工程界人士。她不仅拒绝了，并且还告诉了自己的监护人（他正是应当监视的对象）：然而这个人很快就被抓了起来，并在侦查中招认了一切。怀孕的艾朱波娃“因泄露业务上的机密”被捕，并被判处枪决（然而，她只服了数种刑期加起来共为二十五年的徒刑）。这些年内（一九二七），在另一类人——哈尔科夫的显要共产党人中间，也有一件这样的事，纳杰日达·维塔里耶芙娜·苏罗维茨拒绝对乌克兰政府成员进行监视和告密——为此，她被抓进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且只是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半死不活地在科雷马河上挣扎钻了出来。关于没有浮出来的那些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三十年代，这股桀骜不驯者的水流已化为乌有：既然要求提供情报，那就应当提供——往哪里躲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暗探，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时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去充当暗探：又有利，又显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对饥荒组织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〇年底，进行了更加轰动的并且已经排练得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地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劳动者的眼前，象揭开了盖布的大石像，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巧妙的编结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个单独的暗害行为编成一个同米留科夫、利雅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洛*连在一

* 米留科夫为俄国立宪民主党首脑，曾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利雅

起的魔鬼结子。

一着手考察我们的审判实践，我们便已经懂得，大家看得见的审判——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层下进行的。提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诋毁自己并诬赖别人以期得到宽恕的人。对于有勇气和理智驳回侦查员的胡说八道的大多数工程师——不声不响地进行审判，但这些不认罪的人得到的照样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准备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顺着管道流着，排走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废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采取了一个走向全民参与下水道工程、全民对它分担责任的步骤：那些还没有掉进下水道口的人，那些还没有被管道输送去群岛的人，——他们应当在上面举着旗帜游行，颂扬审判，并为坏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兴（这是远见卓识！——几十年后，历史将会清醒过来——但侦查员、审判员和检察长们却不会比你我之辈普通公民们更有罪！我们之所以能长满一头体面的白发活到今日，正因为我们当初体面地投了赞成票）。

第一个这种尝试，斯大林是借饥荒组织者案件来进行的——当大家都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上挨饿的时候，当大家都在东张西望诧异我们的粮食被藏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这种尝试怎会不成功？于是，在各工厂和机关，工人和职员们赶在判决前面，愤怒地表决赞成把那些落入法网的坏蛋处死。对“工业党”就更不用

布申斯基为俄国大资本家，《俄罗斯晨报》发行人，十月革命后积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迪特丁是英国大石油垄断资本家，以反苏著称；彭加洛 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是武装干涉苏联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说了——那是普遍的群众大会，那是游行示威（捎带上中小学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几百万人的整齐步伐和吼叫："处死！处死！处死！"

在我国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曾发出过一些孤孤单单的抗议或保留之声——在那个合唱和吼叫声中说出一个"不"字是要有许多勇气的——与今天的轻易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今天敢于表示反对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都是那些腰杆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会议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纳利耶维奇·罗让斯基教授弃了权（看来他是根本反对死刑的。要知道，杀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大学生狄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也马上被关进监狱！于是，这些抗议之声刚一开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们所知，白胡子的工人阶级是赞同这些死刑的。就我们所知，从火热的共青团员到党的领袖，到传奇般的集团军司令——整个先锋队都一致赞同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灭亡前的七年内，都曾向这种群众吼声表示欢迎，而不曾想到，他们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将在这吼声中遭到唾骂——"魔鬼"，"败类"。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打击恰好到此结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出了建设的"六个条件"，我们的君主作为第五个条件指出：从打击旧技术知识界的政策——转到使用和关心它的政策。

关心它！我们正义的愤怒消散到哪里去了？所有我们的威严的指控扔到哪里去了？这时正在进行着对瓷器工业中暗害分子的审判（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干了许多坏事！）——而且全体受审人都异口同声地痛骂自己并招认了一切——突然间照样异口同声地大声叫道：我们没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在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条小回流：让一批已经被审判或侦查折磨得濒死的工程师们活着出来了。德·阿·罗让斯基就是这样回来了。是不是应当说，他顶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应当说，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们是不会为写作这一章或这本书提供根据的？）

在早就打翻在地的孟什维克身上，斯大林在这一年又踩了几蹄子（一九三一年三月对孟什维克联盟局、对格罗曼-苏汉诺夫[20]-雅库包维奇的公开审判——然后是对付某些零碎的、小的、暗中抓起来的）——这时突然犹豫起来。

白海边上的人这样说潮水——“水犹豫起来了”：这是潮水快要低落时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浑浊的心灵与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许他丝毫也没有犹豫过。也许从来也没有低落过。但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奇迹。紧接着对“工业党”的审判，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对“劳动农民党”——一支似乎（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由农村知识分子、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活动家以及发达的上层农民组成的、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的地下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在“工业党”的审判中已经提到“劳农党”，当做一并查获的、情况已弄得很清楚的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机关不间断地进行了工作：已经有**几千名**被告招认是劳农党员，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预计总共会有**二十万**“党员”。算作党的首脑的，有经济学家-土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扬诺夫、未来的总理Н·Д·康德拉节夫、Л·Н·尤罗夫斯基、马卡罗夫、季米里雅泽夫学院教

---

⑳ 正是那个苏汉诺夫，在彼得堡卡尔波夫卡他的住宅里，事先征得他同意（现在导游员撒谎说**没有**），布尔什维克中央于1917年10月10日开了会并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授阿历克塞·多雅连科（未来的“农业部长”[21]）。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他想洗刷洗刷肮脏的灵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头？——感到太单调了，太乏味了？——可是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说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这个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个农村就这样也很快将因饥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万，那干吗还去化费劳力。于是，整个劳农党的案件撤销了。要求所有“低头认罪的人”否认已经作出的供认（他们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节夫-恰扬诺夫[22]集团拉出来审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被控说，劳农党是存在过的，并且他，瓦维洛夫正是暗中领导了这个党。）

事件挤成一团，年代挤成一团——我们怎么也无法次序分明地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对付得很好！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什么也没有遗漏）。但我们将始终记住：

——教徒们不断地自然而然地被关进监狱，（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宁格勒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夕的“反宗教斗争夜”，那一次抓了许多宗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动手的，不象是圣诞节的神话。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该市一下封闭了许多教堂，同时对宗教界进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还有什么日期和地点，谁也没有传下来让我们知道）；

---

[21] 也许把后来四十年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拿来审判将会更好些。——这就是人的命运！多雅林科是原则上从来不问政治的！当他的女儿把一些似乎持有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大学生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

[22] 康德拉节夫被判处监禁，在那里得了精神病死去。尤罗夫斯基也已死去。恰扬诺夫在五年监禁以后被放逐到阿拉木图，在 1948 年重新又被关了进去。

——也不放过打击各种教派，甚至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间的公社的全体社员都统统关了起来。他们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生产也好，分配也好，而且一切都做得那么诚实，国家一百年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可惜，他们太有文化了，宗教文献读得太多了，并且他们的哲学不是无神论，而是洗礼教派、托尔斯泰主义和瑜伽论的混合物。因此，这样的**公社**是犯罪的，它不可能造福人民）。

在二十年代，相当大的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泰的山前地带，在那里，他们与洗礼派教徒一起创建了公社村。当开始建设库兹涅茨联合企业的时候，他们向它供给了农产品。后来开始抓人——起初是教师（不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孩子们叫嚷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然后是——村社的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的大牌阵不断地、自然而然地摆来摆去；

——在一九二九年，把未被及时逐出国境的历史学家（普拉东诺夫、塔尔勒、留托夫斯基、戈季埃、李哈乔夫、伊兹麦洛夫）、杰出的文学理论家M·M·巴赫亭投入监狱；

——一会儿从这个边区，一会儿从那个边区，冒出一股股民族的水流。

亚库梯人在一九二八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一九二九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据说，枪杀了将近三万五千人。我们未能核实）。哈萨克人在布琼尼的骑兵于一九三〇——三一年进行英勇镇压后被关进监狱。在一九三〇年初审判了乌克兰解放同盟（叶弗列莫夫教授、切霍夫斯基、尼科夫斯基等），如果你知道我们公开宣布的东西和秘密的东西之间的比例——那么还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背后呢？暗中逮捕的有多少呢？……

轮到执政党党员蹲监狱的时刻正在临近，缓慢地，但是正在临近。暂时（一九二七——二九年）这是“工人反对派”或者是那

些选择了不成功的首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暂时是几百人，很快将是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只要开了头就好办！正如托洛茨基分子曾无动于衷地看着异党成员进监狱一样，现在其他党员也赞同地瞧着把托洛茨基分子关进去。接着就出现了一股莫须有的“右倾”反对派水流。一张大口从尾巴开始一节一节地咬嚼，最后就要嚼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起，同资产阶级余孽——耐普曼算帐的时间来到了。往往是要他们交付越来越大的力不胜任的税款，一旦他们拒绝交付，马上就把他们以破产为理由关起来，并没收财产（对于小手工业者——理发师、裁缝，还有那些修理煤油炉子的，只是取消营业执照）。

耐普曼水流的开导有其经济利益。国家需要财产，需要黄金，可是连一个科雷马都还没有呢。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发作著名的黄金热，只是发热的不是那些找寻黄金的人，而是那些被搜刮黄金的人。新的“黄金”水流的特点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于这些家兔们，说实话，并不指控犯有什么罪行，并且不一定把他们送到古拉格之邦去，而只要按强者的权力取走他们的黄金。因此，监狱挤得满满的，侦查员们疲惫不堪，而递解站、宿泊站、劳改营得到的补充却少得不成比例。

在“黄金”水流中关起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所有在十五年前经营过“实业”、做过买卖、靠手艺挣过钱因而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想法可能会保存下黄金的人。但恰好他们往往是没有黄金的：他们有过动产、不动产，所有这些，在革命中都失掉了，被没收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当然也抱着极大希望把技师、首饰匠、钟表匠关起来。根据告密可以获知在最意料不到的手中拥有黄金的消息：一个百分之百的“机床工人”不知从哪里得到并保存着六十个尼古拉皇帝五卢布金币；著名的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来到了敖德萨，随身带来了一口袋金子；彼得堡的鞑靼

马车夫人人都藏有金子。黄金告密的暗影落在谁的身上，他就不能用任何理由——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本质也好，革命的功劳也好，来进行辩护。他们全都被抓起来，塞进国家保卫局的牢房，每间屋子里关的人数之多以前简直难以想象——那更好，他们会更快地交出来！甚至搞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彼此当着面上马桶——谁管这些小事，交出金子来，坏蛋！侦查员们不作笔录，因为谁也不需要这种文书。以后是否能判得上刑，这也很少有人关心，重要的只是：交出金子来，坏蛋！国家需要黄金，你要它干吗？侦查员嗓子已经喊哑了，进行威胁和拷打的力气也不够了，但是有一个通用的手法：光给囚犯吃咸东西，不给水喝。谁交出金子——就给谁水喝！一块金币换一杯净水！

人们为金属而死亡……

这股水流有别于以前各股和以后各股水流之点是，即使不是这股水流的一半，至少一部分，自己的命运就跳动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的没有金子，你就毫无出路，你将挨打、挨烧、受刑讯，用鞭子活活抽死。也许到了真的相信你没有金子的时候终于住手。但如果你有金子，那就由你自己来确定用刑的程度、能忍受的程度和自己未来的命运。然而，这在心理上并不轻松些，而是要更沉重些，因为一经失着，你将永远对不起自己。当然，已经熟知这个机关习性的人，会让步交出来，这样会轻松些。但也不能过分轻易就交出去：他们不会相信你已完全交出，还会把你扣留下来。但交得太迟也不行，那会把小命丢掉的，或者他们会恼羞成怒给你判上几年。一个鞑靼马车夫撑住了百般拷打：没有金子！那时就把他的老婆也关了进来，折磨她，鞑靼人还是老一套：没有金子。又把女儿关进来——鞑靼人撑不住了，交出了一万卢布。于是把家属放了，本人则被安上了个刑期。——描写强盗绑票的最粗俗的侦探小说和歌剧，却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认认

真真地变成了现实。

三十年代开端施行身份证制度，也给劳改营提供了相当大的补充。当初彼得一世为了简化国民结构铲平了夹在各等级之间的沟沟坎坎，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身份证制度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它扫清了夹缝中的虫豸，它打中了那一部分狡猾的、没有住所的、没有所属单位的居民。而且人们起初使用身份证时也常有违犯规定的情形——于是没有报户口的和没有注销户口的都被耙进了群岛，哪怕只呆一年。

各股水流就这样泛着泡沫，哗哗地流淌着——但是在一九二九——三〇年，一条冲决一切的巨流滚滚而来，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扫地出门的富农。它的流量过于巨大，尽管我们的侦查监狱十分发达，恐怕也是容纳不下的（况且已被“黄金”水流填满了）。但是它绕过了侦查监狱，直接奔向递解站，进入押解路途，进入古拉格的国土。这条水流（这个大洋！）一度的膨胀，突破了甚至大国的监狱司法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古拉格的渠道研制得这样巧妙，如果不是震撼各个城镇的三年奇怪的饥荒——无旱灾和无战争的饥荒，城市居民对此可能还一无所知呢！

这条水流和以前各股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次不必讲客套，用不着先抓一家之主，然后再瞧瞧怎样处置他的家属。相反，这次一下手就是连窝端，必须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别留意不让十四岁、十岁或六岁的子女逃掉一个：全家必须一个不剩地出发到一个地方去，一起去被消灭。（这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后来希特勒将袭用来对付犹太人，而斯大林又用来对付各个不忠实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这条水流所包括的那些用来转移视线的真正的富农是少得可怜的。俄语中富农（кулаки）这个词儿原是指那种吝啬的、不老

实的农村倒卖商贩，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别人的劳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居间富裕起来。这样的人，各个地方即使在革命前也是极少的，而革命又完全使他们失去了活动的土壤。——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富农这个词儿也用来称呼（在官方和宣传文献中，由此变成口头习惯用语）那些一般使用雇工劳动的人，哪怕是因为他家里人手暂时不够。但我们不要忽略，在革命后，使用任何这样的劳动不可能不公平地付给报酬——保护雇农的有贫农委员会和村苏维埃，谁得罪雇农试试！劳动的公平雇佣，在我国就是现在也是容许的。

但是，富农这个象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意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〇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颁布后才过了十二年。土地分期地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能不引起许多并发症。也需要使乡村摆脱掉这样的农民，他们不过是表示不愿进集体农庄，不爱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集体生活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怀疑（现在我们知道是多么有根据）这将是二流子当领导，将是强制劳动和忍饥

挨饿。还需要摆脱掉那样一些农民（有时完全是不富裕的），他们大胆、强壮、果断，集会上讲话响亮、热爱正义，因而受到同村人的喜爱，但他们的独立不羁精神对集体农庄领导却是危险的。[23]此外，在每个村里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个人挡住了这里的积极分子的道路。出于嫉妒、出于羡慕、出于积怨，现在是同他们算帐的最方便的机会。对于所有这些牺牲者，需要有一个新的名词——于是这个名词就产生了。在这个名词中已经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的东西，但它听起来却相当响亮：二富农。就是说，我认为你是敌人的帮凶。这就够了！衣服穿得最破烂的雇农也都完全可以被算作二富农！[24]

这样，用两个词就把所有构成农村的精华、构成它的活力、它的机智和勤劳、它的反抗和良心的人都概括了进去。把他们搞走了——集体化也就实现了。

但是从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中又涌出一些新的水流：

——农业暗害分子水流。到处揭露出农艺师暗害分子，在这一年以前他们毕生都是诚实地工作的，而现在却故意使俄国的田地长满莠草（当然是根据那个现在已完全被揭穿的莫斯科研究所的指示。他们正是那些当初没有关起来的二十万名劳农党员！）。一些农艺师没有执行李森科的聪明透顶的指示（在一九三一年的这股水流中，"土豆王"洛尔赫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另一些人执行得准确过分了，从而暴露出这些指示的愚蠢（一九三四年，普斯科夫的农艺师们把亚麻种在雪地里——准确地遵照李森科的指示。种子胀大了，发了霉，毁掉了。广阔的田地荒了一年。李

---

[23] 这种类型的农民及其命运，在C·扎雷金的中篇小说中以斯捷潘·察乌索夫为代表作了不朽的描述。

[24] 我记得很清楚，在少年时代，这个名词我们觉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森科不能说雪是富农，或者说自己是傻瓜。他指控这些农艺师是富农，歪曲了他的工艺学。于是农艺师们便成串地登上了去西伯利亚的路程）。还有，几乎在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里都发现了拖拉机修理上的暗害行为（这就是集体农庄最初几年失利的原因！）。

——“歉收”水流（而“歉收”了多少，是同“估产委员会”春天提出的那个任意数字比较出来的）。

——“未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水流（区委会包下的任务，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去坐牢吧！）。

——剃穗头水流。夜间在田地里用手剃穗头！——完全新的农活种类和新式的收割法！这是一股不小的水流，这是好多万农民，往往不是成年的庄稼汉和村妇，而是小伙子和大姑娘，小男孩和小姑娘，他们被大人派去搞夜间剃头，因为对自己的白天劳动不抱能从集体农庄取得报酬的希望。对这种辛酸的、得利微薄的作业（在农奴制时代农民们还没有落到这样穷困的地步！），法院量以满刑：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著名法律（在囚犯的口头语中称为八七法），作为最危险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罪，判处十年。

这个“八七法”还引出了一条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地来的、从交通运输来的、从商业、工厂来的单独大水流。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查究大盗窃案。应当注意到，这条水流往往变成了一条常流水，它在战争年代特别满溢，一连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范围扩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潺湲不息的小溪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凡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

---

* 二十——三十年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武装组织。——译者注

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不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㉕

• • •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

㉕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 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2月25日决议发布的国事罪条例第十条。——译者注

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1-甲、1-乙、1-丙、1-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1-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1-甲）——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市，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1-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何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25]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

---

[26] 参看：《从监狱到教育机关》一文，载于《刑事政策研究所文集》，维辛斯基编，苏联法律出版社1934年莫斯科版，第36页。

都在此列。须知“強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強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象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〇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们也都帮助过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〇——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〇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27]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ПШ——间谍嫌疑（或者НШ——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СВПШ——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例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了一件衣服。

㉗ 也许，间谍狂不只是斯大林的头脑狭隘的嗜好。进入特权圈内的人立刻觉得它是一种很方便的东西。它成了已经成熟的全面保密、新闻禁令、门禁森严、通行证制度、筑起围墙的别墅和内部分配的自然辩护。老百姓不能穿过间谍狂的装甲保护层往里瞧瞧，官僚们是怎样互相勾结，游手好闲，犯错误，以及他们是怎样吃喝玩乐的。

* 意思是最高刑期。——译者注

这些五十八条6、ПШ和СВПШ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格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活字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活字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来，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辩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㉘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

㉘ 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320页。

* 俄国九世纪时的瓦利亚格族公爵。——译者注

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 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日常生活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㉙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強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

㉙ 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象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 巴比仑国王法典。——译者注

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是削弱！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份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我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㉚（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 * *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

㉚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58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1917年2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Φ·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

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31]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们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和二十年。[32]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33]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三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

---

[31] 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1934年正好在基洛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

[32] 二十五年徒刑是临近十月革命三十周年时——在1947年出现的。

[33]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任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

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206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㉞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铄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象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象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干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象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

㉞ 据H·格-科所述。

来的日常生活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萨波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妙。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象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任何地方都没有特别宣布应当多抓知识分子，但是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他们，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青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秘密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㉟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

㉟ 其中五人在侦查时受尽折磨，在法院审理前就已死去。二十四人死于劳改营。第三十名伊凡·阿里斯陶洛维奇·普尼奇回来了，恢复了名誉。（要是他也死掉了，那我们就会在这里漏掉所有三十个人，正象漏掉几百万人一样）。他们一案的为数众多的“证人”，现今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安享清福：定级管理工作人员、特种退休金领取者。这正是所谓达尔文的物种天择。

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С·П·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纳吉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

* 尤登尼奇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卫军将军。——译者注

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 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娅！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〇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ПШ（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一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㊱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СОЭ（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АСА（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象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

㊱ 谁记得这些信呢?! 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

* 帕尔钦斯基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曾任俄国临时政府冬宫卫队长，1930年被枪决。 ——译者注

息、接物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问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秸，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㊲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

㊲ 参看《从监狱到教育机关》文集，第63页。

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埋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〇年的一条不肯和丈夫断绝关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谁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不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〇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

---

* 1939年苏联领导军队进入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后，俘虏了一批波兰军官。1941年德国人侵苏联后，这批波兰军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腾森林被杀害，世称卡腾事件。——译者注

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〇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里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

---

* 指苏芬战争后划归苏联的芬兰领土。——译者注

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38]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39]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进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

---

[38]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39]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俄语“火腿”之意——译者注）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不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1918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俄语“捣鬼”之意——译者注）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 当 上 俘 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象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

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227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人、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

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几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 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

* 被运到德国供德国家庭役使的俄国人。——译者注

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⑩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日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㊶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

---

⑩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1943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罗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1948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㊶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

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切禅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纠纠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象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

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指一颗子弹——译者注）——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资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嘱——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42]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 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不是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

---

[42] 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 指没有任何政治活动。——译者注

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43]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国家军的成员、米科拉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

㊸ 惊人的是，在不可能长久保持政治机密，任何机密都难免突破封锁，被公布和泄露的西方，只有这件出卖行为的机密却被英美政府保守得非常出色和细心——它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一个机密，或最后的机密之一。我同这些人在监狱和劳改营多次相遇，二十五年来总不能相信，西方社会人士对于西方政府把普通俄国人大规模交出去遭受摧残和毁灭的行为竟然一无所知。只是在1973年（1月21日俄克拉何马星期日报）尤利乌斯·艾泼施坦公布的材料才打破了沉默。对他，我在这里敢于代表大批牺牲者和少数幸存者致以谢意。他刊登了从隐瞒至今的关于对苏强迫遣返的浩繁案卷中摘出的一份零散的篇幅不大的文件。"俄国人在英国当局手中、在虚假的安全感中生活了两年以后，被搞了个措手不及，他们甚至不明白是在把他们遣返……这主要是一些对布尔什维克抱有私人怨恨的普通农民。"英国当局"象对待战犯那样处置了他们：违反他们的意愿把他们交到了那些决不可能公正审判他们的人的手里"。他们结果都被送到了群岛去消灭。

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回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 * *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象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日常生活犯和真正的刑事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刑事犯罪和日常生活犯罪的奇怪景

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奸，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刑事犯罪和日常生活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个轴线而被关进狱中[44]，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㊹ 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个轴线”。

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替死刑）。[45]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

---

[45] 死刑本身只是暂时用罩袍把脸遮盖起来，以便两年半（1950年1月）之后再呲牙咧嘴地扔掉它。

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耍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改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〇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日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Д——吹捧美国民主；

П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但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〇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迸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〇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〇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㊻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遗矢归天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

㊻ 在我国什么事情也不可能了解得完全确实，不管是现在还是长久的将来。但根据莫斯科的传闻，斯大林的意图是这样的：在三月初，应当把“医生-杀人犯”在红场上绞死。激发起来的爱国者们（在教官的指导下）自然就会纷纷去蹂躏犹太人。这时候，政府（这就看出斯大林的性格来了，对吗？）便宽大为怀地出来帮助犹太人避开人民的愤怒，当天晚上就把他们从莫斯科迁出，送往远东和西伯利亚（那里已经在准备工棚了）。

* 现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 现代法国作家，存在主义者。——译者注

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第 三 章

侦 查

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①]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②]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不光是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龙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

① 对医师C采用过，据A·П·克夫的证明。

② 对X·C·T—Э采用过。

* 1845—1876年间的沙皇。——译者注

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千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铄其词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 * *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一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会消亡。从科绥辽夫的案卷中③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辽夫案件"是一个假案④。同一年梁赞的契卡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E·多雅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全监室只有一个

---

③ 第1部第8章。

④ A·A·阿赫玛托娃曾向我表示，她绝对肯定这一点。她甚至向我指出了炮制这个案件的契卡人员的名字（好象是Я·阿格兰诺夫）。

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雅果达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意思是，自己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〇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实在找不到罪名，只好指控 И·Д·特-夫的姓是假的。（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仍由特别庭给他扣上个五十八条10，三年）。侦查员不知找什么碴儿好，便问："干什么工作的？""计划员。"——"写份说明书来：'工厂的计划和它的实现办法'。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被捕的。"（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

这同一九一二年考文要塞的情形一样：这个要塞因不再执行军事任务而失去存在的必要，决定将它撤销。于是惶惶不安的要塞长官们就搞了一个对准要塞的"夜间射击"，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用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话又说回来，在被侦查人的罪责问题上，理论观点一开始就很自由。在关于红色恐怖的指示信中М·Я·拉齐斯写道："不要在审讯中找寻被告以言论或行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材料和证据。第一个问题：他属于哪一个阶级，什么出身，文化程度（原来如此！腐泥煤委员会！），所受教育。这些问题就应当决定被告的命运。"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在契卡中"常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只能听到极少、极个别的传说。而且：这个人或者很快又被关进去，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说，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那么无罪的人怎样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秘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⑤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侦查员的主要手法就已经是：把手枪往桌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查这样进行，"日常生活罪"也如此。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一九二一年），受审人马赫罗夫斯卡娅申诉说，在审问时给她灌了可卡因。公诉人⑥驳斥道："如果她申诉说，她受到粗暴对待，用枪毙威胁她等等，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手枪吓人地放在桌上，有时对准着你，侦查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而是："说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侦查员哈依金就是这样要求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这样要求维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改变。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部奥尔忠尼启泽市侦查处长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斯克里普尼科娃说："狱医给我们的表报上说，你的血压是240/120。这太低，畜牲(她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让你这条毒蛇断气，见不到青伤，见不到外伤，见不到骨折。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就能办到！"如果斯克里普尼科娃在通宵审讯后白天在监室里闭上眼睛，看守就会冲

---

⑤ 刑事诉讼法典第93条这样说的："匿名报告可以作为提起刑事诉讼的缘由"！（对"刑事"一词不必感到奇怪，须知一切政治犯也都被认为是刑事犯。）

⑥ 参看H·B·克雷连科著：《五年内》，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401页。

进来大声吼叫：“睁开眼睛，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倒拖下来，把你站着捆到墙上！”

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节尔马赫）。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象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扬诺夫叙述说，把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抬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在密节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如今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有时读到“刑讯是从一九三八年春天起得到允许的，”⑦之类的话，令人觉得奇怪。能够制止机关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障从来也不存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周报》、《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公开讨论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按后果来判断，得到的答复

⑦ E·金兹布尔格写道，对“肉刑”的许可是38年10月作出的。B·沙拉莫夫认为：刑讯是从38年中期起得到允许的。老囚犯姆-契肯定说，有过“关于简化审讯和用肉体方法代替心理方法的命令。”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特别指出“最残酷的审讯时期是38年中期”。

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一九三八年确切些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在这年以前，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都需要取得许可（即使很容易取得），——那末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由于非常的形势（要求在规定的短期内通过个别侦查机构把规定的几百万人犯送进群岛，而以前的大规模水流，为“富农流”和“民族流”，都未曾通过这样的机构。）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无限制地、任意地采用暴力和刑讯。并且，对刑讯的种类也不作规定，容许各显其能。

在一九三九年，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然而普通的威胁、讹诈、欺骗、用不让睡眠和关禁闭来消耗体力，从来也没有禁止过）。但是从战争末期起和在战后的年代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列入这里的，有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即有一个真的或者臆想的地下联络网，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必须从抓来的人嘴里搞出全部姓名。例如，在斯基留斯·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魏耳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一九五〇年我在古比雪夫递解站遇见过一个从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来的乌克兰人，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他受到了各种刑讯，包括罚站禁闭室，这种禁闭室有一根插进来供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支撑用的小树棍。在战后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列文娜进行了残

酷折磨——由于她与阿里路耶夫一家* 有共同的熟人。

还有，把重口供、轻证据、轻事实这项“发明”归属于一九三七年，恐怕也不对。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只有维辛斯基的精采学说是赶在一九三七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当时仅下达到侦查员和检察长，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晚了二十年才知道——当它在报纸文章的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挨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那人们记忆中阴森恐怖的一年，安得烈·雅努阿里耶维奇（很想讹念为雅古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民，以及现在的电子机器，我们都不许可按这种辩证法行事，因为对他们说来，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⑧由此产生一个最实用的结

---

* 斯大林第二个妻子的娘家人。——译者注

** 俄语美洲豹之意。——译者注

⑧ 也许维辛斯基本人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从检察长席上叫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受审人是无罪的。很可能，他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都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进行辩证法的修饰：布哈林觉得，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就死掉，未免太愚蠢、太窝囊（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而对于维辛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露骨的下流坯更愉快些。

论：寻找绝对的罪证（罪证都是相对的）、无疑的证人（他们可能说得不一致）是白费时间。至于相对的、近似的有罪证据，侦查员不用罪证也无须证人，不必走出办公室，“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自己的道德力量”（即依靠睡足了、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和自己的性格”（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比拉齐斯的指示要雅致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件事上维辛斯基不够彻底，离开了辩证逻辑：不知为什么他同意**子弹**依然是**绝对的**……

这样，先进法学的结论，沿着螺旋形的发展轨道，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前的或中世纪的观点。象中世纪的刽子手那样，我们的侦查员、检察长和审判员一致同意把受侦查的人的招认看做是有罪的主要证据。⑨

然而，朴拙的中世纪为了逼出合意的供认，采用了戏剧性的壮观手段：拷问架、轮子、火盆、锯齿杆、插木楔子。在二十世纪，有了发达的医学和不少的监狱经验，认为利用这种强烈手段“加温”是多余的，在大规模应用时——是累赘的。并且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情况：斯大林从来也不把话说死，总是要下属们自己去领会，他则给自己留下后退的狼窟，好去写《胜利冲昏头脑》。对成百万人进行有计划的摧残，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不管自己的权力多大，斯大林对于成功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巨大的材料上作试验比在小材料上情形可能不同。可能发生预见不到的爆炸、地层断裂，或者哪怕是向全

⑨ 比较一下美国宪法的第5条修正案：“禁止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禁止！……（在十七世纪的《权利法案》中也是一样）。

世界的泄露。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始终应当披着天使般纯洁的法衣。因此，应当设想并没有开列过刑讯和凌辱方法的清单印发给各个侦查员，而只不过要求每个侦查处在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指定数目的全部招认了的家兔。只不过讲过（口头上，但经常地），一切旨在实现崇高目标的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谁也不会因受侦查的人的死亡而追究侦查员的责任；狱医应当尽可能少干预侦查的进行。想必曾经举行过同志式的经验交流，"学先进"；当然还宣布过"物质利益"原则——加夜班的高报酬，缩短侦查期的奖金；当然也曾警告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侦查员将要……现在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个省局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局长在斯大林面前是干净的：他没有发过用刑的直接指示。然而却保证了刑讯！

一部分普通侦查员（不是那些发疯似地热衷的）懂得上司们在给自己留后手，也力求从比较温和的方法开始，而在加温时，则避免采用留下太明显的痕迹的做法：打出了的眼珠、揪掉的耳朵、折断的脊椎骨，就连遍体青紫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的各省局以及同一省局的不同侦查员那里，除了"熬鹰"之外，看不到整齐划一的刑讯方法。⑩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以所谓轻便手段为主（我们现在就将看到这些方法）。这是一条不会出差错的路子。其实人的平衡状态真正界限是很仄的，因而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失去自制能力，完全不需要拷问架、火盆。

现在我们试着举出某些最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摧折囚犯的意志和人格，而不在他的肉体上留下痕迹。

我们先从心理方法说起，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自己去经受

⑩ 有一种传闻，说顿河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刑讯特别残酷，但没有得到证实。

监狱苦难的家兔们说来——这些方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你是有信念的，那也是不好受的。

1.从夜审开始。为什么主要的攻心战全在夜间进行呢？为什么机关从其初创起就选定了夜间呢？因为夜间从睡梦中被拖出来的（就连还没有受到“熬鹰”折磨的）囚犯，不可能象白天那么平稳和清醒，他较易受到影响。

2.用诚挚的语调进行说服。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玩猫捉老鼠呢？在其他受侦查人中间稍微呆过一阵以后，囚犯其实就已经懂得了总的形势。于是侦查员就懒洋洋地、友好地向他说：“你自己清楚，刑期是反正要得到的。如果你要抗拒，那末在这里，在监狱里，你就会拖垮，就会失去健康。而上劳改营去——就会看到空气、阳光……因此还是立即签名为妙。”很合乎逻辑。如果问题只涉及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便同意签字。但这是罕见的。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对党员则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咱们国内供应不足，甚至有饥荒，那您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决定：你是否能说这是整个党的过错，或者是苏维埃政权的过错？”“不，当然不！”——亚麻中心经理急忙回答。“那么您就拿出勇气把罪责自己承担起来！”于是他就承担起来了。

3.粗暴辱骂。方法很简单，但对于有教养的、娇生惯养的、气质柔弱的人可以发生很大效果。我知道两起神甫让步于普通辱骂的事件。其中一个（布蒂尔卡，一九四四年）由一名妇女负责审讯。起初他对这个妇女的彬彬有礼在监室里赞不绝口。但有一次他回来时郁郁不乐，好久不肯重复她那些淋漓尽致花样翻新的骂人话。（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4.心理对比的打击。出其不意的转变：整个审讯或者一部分

审讯都是极端客气的，以名与父名相称*，答应给予种种照顾。后来突然摇晃一下文件夹子："嗨，毒蛇！后脑门给你九克！"接着伸直双手，好象要抓头发，好象指甲尖上还装着针，朝你慢慢逼近（对付妇女这种方法很有效）。

另一方案：两个侦查员交替，一个拳打脚踢，另一个很可爱，几乎很亲切。受审问的人进入审讯室时每次都发抖——这次要见哪一个？对比之下情愿向第二个签署并招认一切，哪怕根本没有的事。

5.预先凌辱。在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三十三号"）的著名地下室里，在大街人行道的厚玻璃下（过去的仓库），叫等待审讯的人犯脸朝下一连几小时趴在大走廊的地上，禁止抬头，禁止出声。他们象做礼拜的穆斯林一样趴在地上，直到传带员前来碰碰他们的肩膀带去审讯。——亚历山德拉·奥娃在卢宾卡没有作出所需的供述。把她转到了列福托沃。在那里的接收站上，女看守叫她脱掉衣服，把她光着身子关在隔离室里，然而拿走了她的衣服，说是去消毒。马上来了一些男看守，从监视孔里窥看，哄笑并评论她的身体。——如果普遍询问，想必还可搜集到许多例子。而目的是一个：造成精神颓丧的状态。

6.任何足以使受审问的人心慌意乱的方法。请看对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果尔斯克市的Ф·И·В是怎样审讯的（据И·А·普耶夫所述）。女侦查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脱衣舞！），但一直继续进行审讯，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走近他的身边，力争他在供述中做出让步。也许，这是她个人的一种需要，也可能是一种冷静的计算：受审问的人头脑一发昏就会签名！而她则丝毫也受不到威胁：有手枪、电铃。

---

* 这是俄国人为表示尊重对方的称呼方式。——译者注

7. 恫吓。最易采用和非常多样化的方法。往往与诱引、许愿（当然是假的）结合起来进行。一九二四年："不承认，就得上索洛维茨去。谁承认，我们就放他。"一九四四年："把你分到什么样的劳改营，全在我决定。劳改营与劳改营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了苦役营。你要是坦白——就上轻松的地方去。要是抗拒——二十五年带上镣铐在地底下干活！"——拿另一个更坏的监狱进行恫吓："要是抗拒，就送你到列福托沃去（如果你是在卢宾卡），到苏汉诺夫卡去（如果你是在列福托沃），那里就不会象这样和你讲话了。"而你已经习惯于想：在这个监狱里管理制度好象还过得去，那里谁知道会受什么罪？还有转监……让步吧？……

恫吓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捕、而暂时是用传票传到大楼去的人有很了不起的作用。他（她）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他（她）什么都怕——怕今天不放回去，怕没收财物、住所。他情愿作出许多供述和让步，但求避免这些危险。她当然不知道刑法典，于是在审讯开始时至少要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伪造的法典摘录："我已受到警告，凡作假证者……五年监禁"（实际上——第九十五条——两年以下）……拒绝提供证词的——五年……（实际上第九十二条——三个月以下）。在这方面已经通行了并且将永远会通行一种侦查方法：

8. 谎话。我们这些羔羊们是不许撒谎的，而侦查员却经常不断地说谎话，所有这些条文对他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失去了提出"他说谎话该判什么刑？"这个问题的依据。他可以随便在我们面前放上多少份伪造我们亲人和朋友签名的笔录——而这还算是一种很雅致的侦查手法呢。

结合诱引和谎话进行的恫吓，是对传唤来作证人陈述的亲属施加影响的基本方法。"如果你不提供这样的（所需的）陈述，他将更糟糕……你将完全毁了他……（母亲听到后将作何感

想?)⑪只有在这张（塞给他的）纸上签名，你才能挽救（毁灭）他。”

9.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对受侦查人也很起作用。这甚至是最有效的一种恫吓手段，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可以摧毁无所畏惧的人（啊，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格言：“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记得那个鞑靼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〇年女侦查员黎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病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威胁把你心爱的人都关起来。有时带着音响伴奏：你的妻子已经抓进来了，她往后的命运全看你是否坦白。现在她正在隔壁房间里受审讯，听吧！果真隔墙有女人的哭声和尖叫声（其实这类声音都是相似的，何况还隔着一堵墙，而且你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度，你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有时这只不过是在放一张录有“标准妻子”声音的唱片——女高音或女低音，这是某人的合理化建议）。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不错！你的妻子！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走廊里！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有时还给你念她的信，一点不错是她的笔迹：我和你脱离关系！我听到了你干的那些卑鄙事情，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既然这样的妻子、这样的信在我们的国家里未始不可能有，那末你就只好凭心灵判断，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

⑪ 依照俄罗斯帝国的残酷法律，近亲可以完全拒绝陈述。如果在预审中作了陈述，他们可以依自己的意愿加以撤销，不使送到法院，当时甚至奇怪地认为与犯罪人有朋友关系或有亲属关系的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罪证！

侦查员戈尔德曼（一九四四年）通过威胁向B·A·科尔涅耶娃索取咬别人的供词："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把你那些老太婆扔到街上去。"信念坚定的科尔涅耶娃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她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但戈尔德曼的威胁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她为亲人们忧心如焚。一夜之间几种笔录都被拒绝了，被撕碎了，最后到天亮时，戈尔德曼开始写第四稿，这次受控的只是她一个人，科尔涅耶娃便怀着内心胜利的感觉欣然签了名。连普通的人的本能——进行辩护和甩掉莫须有的罪名——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保存下来。其实哪谈得上这个！能把全部罪责由自己承担起来，我们就很高兴了。⑫

象自然界中的任何分类没有硬性的界限一样，我们也做不到一清二楚地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区别开来。例如，象下面这样的玩意儿当列入何类：

10.声法。叫受审问的人坐在六米——八米的距离之外，强迫他一直大声说话，重复自己的话。对于已经疲乏不堪的人这是不轻松的。或者一个侦查员用硬纸壳做两个喇叭筒，和另一个进屋来的侦查员靠近囚犯身边，对准他的两个耳朵叫嚷："招认吧，坏蛋！"囚犯被震得发聋，有时便失去听觉。但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只不过是侦查员们在单调的工作中也想寻寻开心，于是就各显神通地想出一些花招。

11.呵痒。也是寻开心。把手脚绑起来或者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便天旋地转起来，他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

⑫ 现在她说："过了十一年，在恢复名誉时给我重读了这些笔录——一种恶心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当时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我在恢复名誉时，听了从我自己过去的笔录中摘录的一些话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人家把你弄弯，你就变形。现在我已认不出那就是我——我怎能签署这种东西，并且还认为是得了便宜呢？……

往脑子里钻孔。

12. 在受审问人的皮肤上掐灭烟卷（上面已经讲到）。

13. 光法。关着囚犯的监室或隔离间里昼夜不灭的刺眼的电灯光，对于墙壁刷着白粉的小屋说来亮度大得过分的灯泡（小学生们和家庭主妇们节约下来的电力）。眼皮发炎，这是很痛的。而在审讯室里又有室内聚光灯对准了他。

14. 别出心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夜，契包塔辽夫通宵十二个小时没有受审讯。不对：带去过好多次！契包塔辽夫，手背起来！带出监室，跑上楼，进了侦查员办公室。传带员退出。但是侦查员不提一个问题，有几次连坐也没有让他坐，拿起听筒就说：把一百〇七号房间里的带走！来了人，带他回监室。身子刚落铺，门锁响了：契包塔辽夫，审讯！手背起来，到了那儿：把一百〇七号房间里的带走！

而一般地说，对犯人施加影响的方法可以在侦查室以前就开始采用。

15. 监狱是从隔离室开始的，就是说从箱子或柜子开始的。一个人刚刚从外边被抓进来，正处于思绪起伏的高潮，决意要弄清问题，进行争论、斗争——一跨进监狱就被关进一个匣子，有时里面装着灯，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有时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能站着，还被门挤着，他被关在这里几小时，半昼夜，一昼夜。一切难以预料的时刻。也许他要一辈子被活砌在这里面了？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猜不出来！这种心潮翻滚的最初时刻渐渐消逝。有一些人意志消沉了——正好在这时候就给他们来个第一次审讯！另一些人憋了一肚子火——那就更好，他们马上会侮辱侦查员，做出一些失策的事——那就更容易把案子给他们套上。

16. 隔离室不够的时候还这样做。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

民委员部里，叫叶林娜·斯特鲁丁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昼夜——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象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棱上（再往前些！再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小时不许他动一下。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17.因地制宜，隔离室可以用陷阱代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戈罗霍维茨军队集中营里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抓起来的人被推进这种深三米、直径两米的陷阱，让他几昼夜呆在露天，日晒雨淋，陷阱既是他的监室，又是他的厕所。三百克的面包和水，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给他。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被捕，心里正象开锅似地翻腾着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是什么滋味？不知是因为给红军所有保卫部门下达过统一的指示，还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野营生活，这种方法曾经非常盛行。例如，一九四一年驻扎在蒙古沙漠上的哈勒欣战役参战部队第36机械化步兵师里，对一个刚被捕的人，二话不说（保卫科长萨穆辽夫），交给他一把铁锹，命令他挖掘一个有准确尺寸的坟坑（这已经是与心理方法的交织在一起）。当被捕者挖到超过腰部时，叫他停止，命令他坐在坑底，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的头。一名哨兵看守这样几个坑，四周好象是空无一人。⑬ 在一片荒漠上，受侦查的人在蒙古酷热

---

⑬ 看来这是蒙古的主题。在1914年3月15日出版的《田园》杂志第218页上，有一张蒙古监狱的速写：囚犯各关在一只有供伸头或者送饭用的小孔的囚箱里。一名看守在囚箱间巡逻。

的白天头上没有遮盖，寒冷的夜晚身上没有衣服。什么刑讯都不搞——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动刑呢？口粮标准是：一昼夜一百克面包和一杯水。楚尔平涅夫中尉是一个魁梧大汉，拳击运动员，二十一岁，这样坐了**一个月**。十天后，他满身虱子。十五天后才第一次传讯。

18．罚跪。——不是在某种假借的意义上，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下跪，屁股不许贴脚后根，腰背挺直。可以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或走廊上罚跪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侦查员自己可以回家、睡觉、娱乐），有一套规定办法：罚跪的人身边设岗，哨兵按时轮换。⑭让谁罚跪最合适呢？已经被压弯、已经准备投降的人。让妇女罚跪最合适。——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讲述了这类方法的一种变体：让年青的洛尔德基潘尼泽跪着，侦查员往他脸上撒尿！什么别的办法都攻不克的洛尔德基潘尼泽，却被这种做法摧垮了。可见，对付有傲气的人，这办法也很有作用……

19．要不就罚站。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他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

20．每回连续三、四、五昼夜的罚站，通常不给水喝。

越来越懂得要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配合起来。还明白了，所有上述的办法，都可以结合：

21．“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

---

⑭ 有人年轻时就是干这个起家的——在罚跪的人身旁站岗。而现在想必已经当上官了，子女也已长大成人了……

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诃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⑮

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地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请看一个受害者（在此以前他刚在臭虫隔离室坐过一昼夜）怎样描写受刑后的感觉：“由于大量失血直打寒颤。眼皮发干，好象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紧挨着你的眼睛。舌头干渴得肿起来，稍稍一动就象刺蝟在扎。吞咽痉挛使喉咙象刀割一样。”⑯

“熬鹰”是一种伟大的刑讯手段，并且完全不留下可以看得见的痕迹，甚至连申诉的口实也不给你，哪怕从未见过的检查团突然降临。⑰“没有让你睡觉？可是这里并不是疗养所呀！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没有睡觉。”（他们白天已经睡足了）。可以说，“熬鹰”在机关里已经成了万应药剂，它由一种刑讯手段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生活常规，因而是最省事的方法，不必设什

---

⑮ 请想象一个外国人，还是不懂俄语的，在这种神志模糊的状态中让他在什么东西上签字。一个叫尤普·阿森勃伦纳的巴伐利亚人就这样签了字，承认曾在“杀人汽车”上干过。1954年在劳改营里他才得以证明，当时他在慕尼黑的电焊工训练班学习。

⑯ Г·莫-契。

⑰ 然而检查是不可能的，并且从来未曾有过，以至1953年当一个检查团走进已是阶下囚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监室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以为是一个骗局。

么闹就能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侦查牢房里，从起床到熄灯，一分钟也不能睡觉（在苏汉诺夫卡，还在其他一些监狱里，为了这个目的，白天把床折到墙里，在另一些监狱里，根本就不许躺下，甚至不许坐着闭上眼睛）。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自动形成这种状况：谁正在受审讯，谁就在一星期内至少五昼夜没有时间睡觉（星期六夜里和星期日的夜里侦查员们自己努力争取休息）。

22. 作为上述方法的发展——侦查员的车轮战术。你不仅睡不了觉，而且接连三、四昼夜由侦查员轮流交替不断审讯。

23. 臭虫隔离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24. 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哪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苏汉诺夫卡还有热禁闭室）。例如，列福托沃的禁闭室根本就不生暖气，暖气片只给走廊供暖，而在这“供暖的”走廊里，值班的看守还需要穿着毡靴和棉衣来回走动。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因为面积狭窄）在禁闭室里呆上三、四、五昼夜（热的烂菜汤只在第三天才有）。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我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里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包塔辽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象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他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包塔辽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象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遊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楚尔平涅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象没有什么意义？——但楚尔平涅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

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包塔辽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包塔辽夫一打磕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包塔辽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颈瓶里的红酒。契包塔辽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包塔辽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布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结果被枪决了（对于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 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槌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加尔邦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21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受审讯人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加尔邦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

齿）。[18]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19]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汉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〇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根上。就这样象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20]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有许多可以列举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

⑱ 1949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Г·库普里扬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⑲ 在1918年，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前沙皇监狱看守邦达尔。告发中提出的他的残忍行为的最高例子是一次他向一名政治犯猛击一拳，致使那人耳膜破裂（参看克雷连科：《五年间》，第16页）。

⑳ 尼·科·克（Н·К·Г）

* * *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16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不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象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

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事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脸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

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稜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子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象真的。要完全象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诃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炼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象我们的亲爹。——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出汗——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象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

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УПК（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УПК和УК（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向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不论在劳改营的“文化教育”处，不论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㉑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服满劳改和流放的犯人——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УК

㉑ 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和УПК（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 136 条——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 111 条——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 139 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象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

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悔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呛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决斗中怎能不犯错误呢？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说过“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但是在三七年（还有四五年）监狱发生人满之患的时候，这个新抓来的受侦查人的理想的孤独原则无法得到遵守。囚犯几乎从最初几小时起就处在人烟稠密的集体监室中。

但这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不足。监室的拥挤不仅代替了狭小的单人隔离室，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刑讯，特别可贵的是，这种刑讯长达整整的几昼夜、几星期——并且侦查员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讯囚犯由囚犯自己来进行！监室中挤进了那么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小块的地方，人踩着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动地方，彼此坐在脚上。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希涅夫的羁押所里一个单人监室塞进了**十八个人**，一九三七年在卢干斯克——**十五人**，[22]而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员二十五人的布蒂尔卡标准监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间（厕所这样拥

---

[22] 对他们的侦查持续进行了8——10个月。同伴们说：“克里姆（指伏罗希洛夫，他曾在卢干斯克活动并坐牢。——译者注）大概是一个人蹲在这种单人监室里（蹲过没有呀？）。

挤，以至一昼夜只让解一次手，有时甚至是半夜去，放风也这样！）㉓他在卢宾卡接收站“狗窝”里曾经计算，整整几个星期内，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时要摆三个人（请合计一下，请安排一下！）。㉔在“狗窝”里，没有窗和通风装置，由于体温和呼吸，温度高达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条衬裤（冬季衣物垫在自己身下），他们的赤裸肉体挤在一起，由于别人的汗水，皮肤长上了湿疹。他们就这样几星期地蹲在那里，既不给他们空气，也不给他们水喝（除了烂菜汤和早茶）。㉕

如果再加上用马桶代替上厕所（或者相反，从一次上厕所到另一次上厕所之间，在监室里没有马桶，象在西伯利亚某些监狱里那样）；如果再加上吃饭四人合用一个钵子，并且还相互坐在膝盖上；如果时而拉出什么人去审讯，时而推进个挨过毒打、困倦不堪、浑身瘫软的什么人；如果这些瘫软的人们的样子要比侦查员的任何威胁更有说服力；一个等了几个月还没有传讯的人会觉得，任何一种死亡，任何一种劳改营似乎都比他们的扭曲的姿态轻松得多——这种种也许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独状态？并且

㉓ 这一年在布蒂尔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经过洗澡房和隔离间的处理）几昼夜坐在楼梯台阶上，等待起解的犯人腾出监室。特-夫早7年，即1931年在布蒂尔卡蹲过，他说，板铺下都塞得满满的，犯人们躺在沥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1945年蹲过——同样的情况。但不久前我从M·K·勃-契得到了一份关于1918年布蒂尔卡拥挤情况的宝贵的个人证明：在那年十月（红色恐怖的第二个月），挤得那么满，甚至在洗衣房里设置了70人的女监室！那末，布蒂尔卡什么时候空过呢？

㉔ 这也算不了什么稀奇事儿：1948年在弗拉基米尔的内监里，在3×3米的监室里经常站30人！（C·波塔波夫）

㉕ 一般说来，在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的书中，有许多肤浅的、一己之见的东西，笑话单调得令人厌倦，但对于1937-38年的牢房生活，那里写得很好。

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谁讲心里话，很不好下决心，也并不是经常能找到一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对于刑讯和毒打，当侦查员拿它作威胁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过刑讯的人们，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会亲口告诉你，怎样往喉咙里灌盐水，然后一昼夜在隔离室里受干渴的折磨（加尔邦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后再涂上松节油（卢道甫·平卓夫旅长两者都尝到了，而且还用针插进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胀破——逼他在笔录上签名，招认他想在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把坦克旅开向政府领导人）。[28] 从全苏自然科学家协会前艺术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可以获知阿巴库莫夫本人是怎样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亚历山德罗夫被打断了脊椎骨，身子向一侧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泪的机能。

是的，是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决不鄙弃这种粗活（亲临前沿的苏沃洛夫！），他喜欢有时亲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乐意打人。他是在苏汉诺夫卡的“将军”侦查办公室里干这种活的。办公室有核桃木的护墙板，门窗上挂着丝绸帘子，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波斯地毯。为了不弄坏这件漂亮东西，给准备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铺了一条肮脏的血迹斑斑的长垫子。在拷打时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抚摸着直径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气地说：“这么说来，您光荣地经受住了‘熬鹰’的考验（一个月不让睡觉，亚历山大·Д是靠耍滑头才支持下来的——他站着睡）。现在我们拿棍子试试。我们这里没有人能支持两三场的。请您褪下裤子，请趴在垫子

---

[28] 他确实在阅兵式上带领了坦克旅，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开向政府领导人。不过人家不管这些。然而，在受了五花八门的刑讯后，他得到的……是由特别法庭判处的10年。宪兵们自己也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成就。

上。"上校骑在挨打者的背上。A·Д想计算打击的次数。他还不知道，由于长期挨饿，屁股已经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经上是什么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头痛欲裂。在第一下打击后，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乱抓垫子。留明继续打，力求打到点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躯使劲压住——这正是为权力无边的留明当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颗大金星的人该干的工作！（在一场以后，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当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裤子，伤痕却几乎没有。发作了一场很厉害的腹泻，而Д坐在自己的单人监室的马桶上却哈哈大笑，他还要去挨第二场，第三场，打得皮开肉绽，留明狠劲上来，动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肠子流下造成严重的疝气，他得了腹膜炎，拉进布蒂尔卡医院，强迫他干缺德事的企图也就暂时歇手了。

你也会受到这种折磨！在这种场面以后，基希涅夫的侦查员丹尼洛夫用通条打维克多·施波华尔尼科夫神甫的后脑壳，揪住发辫拉来拉去，简直象是父亲的爱抚（对神甫这样揪方便些，对普通俗人则可以揪住胡子从办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对付李哈德·奥瀍拉——芬兰赤卫队员，追捕悉尼·雷利的参加者和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的连长——的办法是用钳子夹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来，一会儿又夹住另一端，各持续十分钟，不让脚着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

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让上帝而不是人们去责备你吧……

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的盘算：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要是你死在审讯室里，他们就向亲属宣布：“判了劳改，剥夺了通信权。”让他们去找吧。

如果你是个正统派，那末就会有另一个正统派靠过来，怀着敌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听，开始热烈地对你做工作：

“我们有义务支持苏维埃的侦查工作。我们周围充满了战斗。怪我们自己：我们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有这种腐烂东西在国内繁殖起来。正在进行着残酷的秘密战争。这里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

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舍留* 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象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

---

* 16—17世纪法国红衣主教。——译者注

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嘉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嘉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

人是有观点的！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一九三七年布蒂尔卡板铺上的邻居，一个老太婆。每夜都审讯她。两年前，一个从流放地逃跑出来的过去的大主教曾在她家借宿过。“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说！”（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你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剁成碎块也没用。其实你们害怕长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杀死（“线索断了”）。可我什么也不害怕！就是马上去见上帝也行！”

在三七年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从审讯室回到监室来取行囊。他们选择了死亡，但没有株连任何人。

不能说俄国革命者的历史给过我们坚强不屈的范例。但这里

无法比较，因为我们的革命者从来也没有见识过拥有五十二种方法的这样好的侦查工作。

舍施科夫斯基没有摧残拉季谢夫。拉季谢夫根据当时的惯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们将依然会当近卫军官，并且谁也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谁也不会去没收拉季谢夫的世袭领地。但这个卓越人物到底还是在他短短两星期的侦查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写的书——并请求宽恕。

尼古拉一世没有这份聪明——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抓来逼她们在隔壁公事房里尖叫或者对十二月党人本人用刑，——不过他也没有这种需要。甚至雷列耶夫回答问话时也是"坦白翔实，毫无隐瞒"。甚至彼斯节里都分裂出来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罗斯真理》* 的诸同志，以及埋藏地点。㉗很少一些人，象卢宁那样，显示出对侦查委员会的不屑和蔑视。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许多人低首请求宽恕！扎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П·奥鲍连斯基和C·П·特鲁别茨阔依甚至赶紧咬出格利包耶多夫来——这点，连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

在《忏悔书》里巴枯宁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卑躬屈节地向自己脸上吐口水，从而逃脱了死刑。精神的渺小？还是革命的狡计？

好象，承担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务的那些人应当是因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而被选中的吧？可是，格里涅维茨基与沙皇同归于尽，而雷萨科夫却活着并落到了侦查机关的手中。就在当天他已经败露了秘密接头住所和参与密谋的人，由于害怕断送自己的年轻生命，就急忙把比预期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更多的情报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云，他建议"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

㉗ 部分原因在这里（后来布哈林的情况也如此）：要知道在侦查中审讯他们的是阶级兄弟。因而他们自然产生了要说清楚一切的愿望。

* 十二月党人南社的纲领性文件。——译者注

切秘密”。

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侦查人如果认为所提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象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再举一个例子。从一篇现代的研究文章[28]中我们得知，宪兵们拿走了列宁的《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手稿，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它追查出作者来。

“在审讯中，不出所料（这里和以后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作者注），宪兵们从瓦涅耶夫（大学生）处了解到的东西并不多。他总共只不过告知他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手稿是搜查前几天由一个他不愿说出姓名的人放在一个包着其他东西的大包里拿来交他保存的。侦查官毫无办法（怎么？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盐水呢？留明的棍子呢？……），只能把手稿送去鉴定。”结果竟是一无所获——看来别列斯魏托夫本人是熬过了若干年监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来，如果有一个《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文稿的保存者坐在侦查员面前，侦查员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С·П·麦尔贡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29]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差距，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尺度。正如果戈里时代以前的盐粮贩子不能领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一样，不经过古拉格接收站绞肉机的人，是不能完全认识到侦查机关的广大神

㉘ 参看《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4期所载P·别列斯魏托夫的文章。

㉙ 见С·П·麦尔贡诺夫著：《回忆与日记》第1册，1964年巴黎版，第139页。

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笨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 * *

这类应当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当时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没有割断温情脉脉的尘缘的准备，连那几百支法贝尔牌的战利品铅笔在逮捕时被没收，还长久地使我耿耿于怀。后来从漫长的监狱岁月中回顾对自己的侦查阶段，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我，当然，本可表现得更坚强些。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颓丧。这些回忆所以没有使我感到内疚，只是因为，谢天谢地，我避免了株连任何人。可是已经差一点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与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带有孩子气的性质，虽然我们已经是前线的军官了。战时我与他在两个战区作战，互相之间通信，明知部队有检查信件的制度，却忍不住在信里几乎公开地表示对**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满和责骂，该写父亲的地方，我们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贼头”这个代号（后来我在监狱中讲述我的案情时，我们的幼稚只是引起了讪笑和惊奇。人们对我说，这样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这一点）。突然，我阅读关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时发现，他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网的，并且只是

这个情况才于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命。[30]

我的侦查员И·И·叶泽波夫的办公室高大、宽敞、明亮，窗户很大（“俄罗斯”保险公司不是为刑讯而建造的）——于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挂起了威力无穷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垂直全身肖像，对这个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献出了自己的仇恨。侦查员有时站到他面前，演戏似地发誓赌咒说：“为他我们情愿献出生命！我们为他决心躺到坦克下去！”在这幅祭坛似的壮严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么净化的列宁主义之类的咕咕哝哝显得实在可怜，而我这个渎神者所应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我们通信的内容，按当时情况来说，就已提供了把我们两人判刑的充分材料。因此，我的侦查员不用为我发明什么花样，只要努力把我写过的信或者给我写过信的人统统套上绳索就行了。我在书信中，对我的同龄男女大胆地、几乎是卤莽地表达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仍继续同我通信！甚至在他们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语。[31]现在叶泽波夫也象波

㉚ 暗杀小组成员安德留施金寄给哈尔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坚信（我们这里）一定会发生一次最无情的恐怖行动，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红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为我的收信人担心（他已经写过好多封同样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个**，那我也会遭到**那个**，而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将牵连许多很能干的人。”根据这封信进行了五个星期的从容不迫的搜查——经过哈尔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发信人。直到2月28日才查明了安德留施金的姓名——于是3月1日，在预定的暗杀前，已经带着炸弹到达涅瓦大街的掷弹者被抓了起来！

㉛ 还有一个我的中学朋友当时差点儿没有因我坐牢。当得知他依然自由的时候，我感到多么轻松呀！但过了22年以后，他给我写信说：“从你发表的作品中可以得出结论，你对生活的评价是片面的……你客观上成了西方例如西德和美国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一面旗帜……列宁（我相信你是依然尊敬和热爱他的）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老人家会最严厉地斥责你，想想这点吧！”我在想，啊，当时没有把你关起来多么可惜！你失掉了多少东西呀！……

尔菲利·彼得罗维奇那样，要求我对所有这些作出有头有尾的解释：如果我们在受检查的信中都能写出这类话，那么我们私下谈话时更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向他保证激烈言论完全是信里说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脑子现编一些我和朋友们见面的情形（见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编得很象真的，要和信的色调一致，要沾一点政治的边——但毕竟够不上刑法典。还要把这些解释一口气讲出来，使我的老练的侦查员相信我的单纯、技穷和彻底坦白。要使——这是最主要的——我那懒惰的侦查员不想去清理我装在自己这个该死的箱子里带来的该死的货物——许多本用黯淡的硬铅笔写成的“战时日记”，笔迹细得象针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蹭掉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们的奇妙记忆力，因此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努力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这还不算是大问题）和从人家那里听到的一切。在前沿阵地上显得这样自然的意见和故事，——在后方看起来却是叛逆的，它们对我的前线同志发散出潮湿的监狱气息。——但愿侦查员不去对我的“战时日记”花费力气，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有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看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象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溶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象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钉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冢，这个墓冢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一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卢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曲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 * *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〇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 的奸细。"

一九五〇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佛马·佛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眠、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

---

* 白卫军将军，南俄反革命首脑之一。——译者注

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包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 ——骑马去。——得到了十年，КРД！㉜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边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

㉜ КРД——反革命活动。

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觉了！——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作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千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没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 11， 就是说， 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 —— 就 是 人们。”

那末如果是一个半人呢——也算组织吗……？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

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李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象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象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〇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改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第 四 章

蓝 滚 边*

我们被拖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牵拉着，象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贱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

---

*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人员的制服制帽用天蓝色滚边，故称他们为“蓝滚边”或“蓝边帽”。——译者注

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没有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没有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①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

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列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列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②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列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宁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施纳辽夫对阿多尔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他们当中许多人这

---

① 哪一边也逃脱不掉这种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契·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者和东正教传教士。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季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季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② 这是**刑讯**的温和说法。

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侦查员尼古拉·格拉比宰科（伏尔加运河）的妻子感动地对邻居说："我们科利亚可能干了。有一个人好久不肯招认——把他交给了科利亚。科利亚同他谈了一夜——那个人就招认了。"

为什么他们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热衷地一味追求被处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数字呢？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方便，不致跟不上总的潮流。因为这些数字就是他们的安宁生活、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关本身的扩大和福利。在数字完成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偷偷懒，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里出去玩玩（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数字低，那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因为斯大林不会相信，在某个区里、城市里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因此，对于那些不肯被纳入数字的，"熬鹰"、禁闭、饥饿都治服不了的顽固不化的囚犯，他们不是产生恻隐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触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认罪，就是损害了侦查员的个人地位！他们就象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了！斗就象斗的样子！软管插进你的喉咙，请喝盐水吧！

"蓝色商店"的从业员们按其工作的种类和所作出的生活选择来说，是丧失了人类存在的高级领域的，他们全副身心贪婪地生活在低级领域里。在那里掌握和指使着他们的，是低级领域最强烈的本能（除饥饿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别是权力。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间，它要比金钱更重要）。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

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记得托尔斯泰关于权力是怎样写的吗？伊凡·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这不正是说我们那些蓝边帽！这都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他觉得对这种权力的意识（“以及使它变得温和一些的可能性”——托尔斯泰附带说明，但这对我们那些小伙子无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是担任公职的主要乐趣和令人神往之处。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还年青，说句随便的话，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前父母还为你伤脑筋，不知往哪里安置你，你又蠢又不爱念书，可是你在那个学校里混了三年以后——立见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变化呀！你的动作变了！你的眼神、脑袋转动的姿势也变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在开会——你走进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让院长坐在那里去张罗吧，你在旁边坐下，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别部门。你可以在那里坐上五分钟就走，这是你比教授们优越的地方，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把你叫去——但后来你对他们的决定可以动动眉毛（或者最好是动动嘴唇）向院长说：“不行。有一些意见……”到此为止！别无二话！——或者你是个特科人员，反间谍人员，不过是个中尉，但是身材高大的老上校，部队的指挥员，见到你进来就站起来，竭力奉承你，讨好你，如果不邀请你，他同参谋长就不敢喝酒。你只有两颗小星，这没有关系，这甚至好玩：须知你的星星具有完全另外的分量，是用不同于普通军官的完全另一种标度来衡量的（有时，在执行特别任务中，允许你戴上例如少校之类的肩章，这好似假名，好似暗号）。对这个部队或这个工厂、或这个区的

所有的人，你所拥有的权力，比之指挥员、厂长、区委书记，要深远得多。这些人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职务、工资、名誉，而你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自由。谁也不敢在会议上说到你，谁也不敢在报纸上提到你——不仅不敢说坏话！就是好话也不敢说！！你象隐秘的神灵一样，甚至提都不敢提。你存在着，大家都感觉到你！但你好象又不存在似的！因此，自从你戴上这顶天神的蓝边帽时起，你就比公开的权力高出一头。你所做的事，谁也不敢去检查，但是每个人都受你的检查。因此，在普通的所谓公民（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段段木头）面前，你最适宜于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深思远虑的表情。须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特别意见，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因此你永远是对的。

只是有一点你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是侥幸成为机关——这个象人身体里的绦虫一样寄生在国家内部的柔软的完整的生物——的一个小环节的话，那你也会是同样的一段木头。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你永远会受到袒护！随时都会有人帮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扫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要忠于机关！执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会替你考虑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会坐上侦查员的交椅，以后也许会以方志学家的身份出发去塞利格湖，③ 可能是顺便为了让你松弛一下神经。然后可能从你名声太大的城市调到国家的另一端去当教会事务特派员。④ 或者成为作家协会的责任书记⑤。什么也不要感到惊奇：人们的真正用途和给人们的真正等

③ 1931年，伊利英。

④ 凶残的雅罗斯拉夫尔的侦查员伏尔科比亚洛夫后为摩尔达维亚的教会事务特派员。

⑤ 另一个伊利英（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契），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中将。

级，只有机关知道，对于其余的人说来，这些只不过是让他们玩玩而已：什么功勋艺术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英雄——只要吹口气，就没有他了。⑥

侦查员的工作当然需要付出劳力：白天要去上班，夜里也要去上班，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但是不要为“证据”去绞脑汁（此事让受侦查人去伤脑筋吧），不要去思考什么有罪无罪——照机关所需要的去做，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进行侦查，那就已经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捞到点什么好处，不然的话即便能寻寻开心也好。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出了一种影响手段！——可找到啦！——马上给朋友打电话，到各办公室去串串门讲讲——多好玩呀！来试试，伙计们，拿谁试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这些颤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胆怯的顺从，真没意思——找个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欢强的对手！高兴去折断他们的脊梁！”⑦

要是碰到一个这样强的对手，他怎么也不屈服，你的一切办法都没有结果，那时该怎样呢？你气疯了吗？用不着克制狂怒！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翱翔！——尽情发泄你的狂怒吧，不给它任何阻挡！让肩膀发痒吧！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就会往可恶的受侦查人张开的嘴里吐痰！把他的脸往满满的痰盂里按！⑧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也就会揪住神甫的发辫拖来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脸上撒尿！在发泄了狂怒以后，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

---

⑥ 谢罗夫将军在柏林问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你是什么人？”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没有张惶失措，带着那种遗传的哥萨克的大胆精神反问：“你是什么人？”谢罗夫立即改正说：“您是学者吗？”

⑦ 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希托夫对格夫说。

⑧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书中所述瓦西里耶夫遭遇的事。

男子汉！

或者审讯一下"勾搭外国人的女郎"。⑨好吧，辱弄辱弄她。

你⑩要一个女速记员来记录审讯——给派来了一个模样好看的，你在受侦查的男孩子⑪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怀里去——他好象不是个人，不必顾忌他。

——是呀，一般说来，你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你喜欢玩女人（谁不想玩呢？）——不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个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摆布。在什么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里也跑不了。任何一个有夫之妇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为要把丈夫搞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⑫不，这应当亲身去体会——什么是蓝边帽！任何东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滚开！脚下的土地——是你的！头上的天空——是你的！它也是蓝色的呀！！

至于发财的欲望——那是他们的普遍欲望。怎能不利用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不受监督的地位去发财致富呢？除非是个圣人！

……

如果我们能够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动力，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尽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但其个别抉择，把谁关起来，个人的选定，在四分之三的场合是出于人的贪利心和报复心，而

---

⑨ 艾斯菲尔·P 1947年。

⑩ 侦查员波希尔科，克麦罗沃国家安全机关。

⑪ 中学生米沙·Б。

⑫ 我早就有了一个短篇小说《弄坏了的妻子》的题材。但看来是不打算去写了。它的梗概如下。在远东的一支空军部队里，在朝鲜战争前，有某个中校出差回来，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医生并没有对他隐瞒：她的

有半数的这种场合则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当然还有检察机关，我们将不把它们分开）的私利打算。

例如，В·Г·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岛旅行是怎样开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有一次专门给党的积极分子（不是给老百姓，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难为情）售卖布疋（这种东西现在谁也不会要），检察长的妻子却没能买到：因为她不在场，检察长自己则不好意思走到售货台旁边去，而弗拉索夫也没有想起该说一声——"我给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远不会让他这样说。）还有一次，检察长鲁索夫把一个朋友带到党员内部食堂（三十年代有这样的食堂）去吃饭，那人没有供应关系（就是说级别低了些），食堂管理员就没有允许给那个朋友供饭。检察长要求弗拉索夫惩罚管理员，而弗拉索夫却没有惩罚。还有他曾同样令人难堪地侮辱过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就给他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

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辛钦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

性器官由于遭到病态的对待而受了损伤。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里，经过一番努力使她承认了，这是他们部队的特科人员上尉干的事（然而，看来也不是没有她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卫人员的办公室里，抽出手枪，威胁要杀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弯下腰来，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胁要把他关到最可怕的劳改营里去烂掉，那时他就会央告给他一个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样接受下来（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同她一起生活，绝对不许离婚，绝对不许控告——这就是他不被关进去的代价！中校都一一照办了。（这是那个特科人员的司机对我讲的）。

这类事件应当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最能诱引人去使用权力的领域。有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曾强迫（1944年）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嫁给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亲关起来。姑娘有未婚夫，但为了拯救父亲，她嫁给了国家安全人员。在短短的婚后生活中，她写了日记，把它交给了心爱的人，然后就自杀了。

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团军的反间谍人员，对我的烟盒起了觊觎之心——其实这甚至并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德国人办公用的某种小盒子，但具有诱人的鲜红颜色。为了这个不值一钱的东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务上的迂回战术：先是不把它写入笔录（“这个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明知口袋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还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这是什么？取走！”——为了使我不能抗议：“把他关到禁闭室去！”（哪个沙皇的宪兵敢于这样对待祖国的保卫者？）——每一个侦查员都拨给一定数量的烟卷，那是为了鼓励招认者和坐探用的。有些侦查员就把烟卷全部吞没了。甚至在侦查的钟点上——在付给他们加倍工资的夜间工作的钟点上，他们也搞鬼：我们曾在夜间的笔录上发觉“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被拉长了。——侦查员费多罗夫（列舍塔站，235号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尔祖兴住所时亲自偷了手表。——侦查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契·克鲁日科夫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公然对自己的受侦查人К·И·斯特拉霍维奇的妻子叶里扎维塔·维克多罗芙娜说：“我需要一条棉被。给我带来！”她回答说：“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间已经被查封了。”那时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坏国家安全机关的铅封，把整个门把手卸了下来（侦查员快乐地对她说：“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动手从那里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顺手还把一件水晶器皿塞进口袋（叶·维·自己也尽力拿，自己的东西嘛。他制止说：“你拿的够了！”，而自己却还在拿）。⑬

---

⑬ 1954年，这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丈夫对一切，甚至对死刑判决，都原谅了，并劝阻说：别去干这事！）出庭揭发侦查员克鲁日科夫。由于克鲁日科夫干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而且违反了机关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里能呆久吗？……

这类事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系统地问问过去的被捕者和他们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千本“白皮书”（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从来不偷东西的、不侵吞什么的蓝滚边们——但我断然不能想象出一个这样的蓝滚边！我干脆不明白，既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东西，有什么能制止住他呢？还在三十年代初，当我们穿着青年突击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西方贵族式的沙龙里，如象康科尔吉娅·约塞的住宅，举办起晚会来了，他们的夫人就已经全身外国服饰打扮——这从哪里弄来的呢？

请看他们的姓名——好象他们是根据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麦罗沃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里五十年代初期有：检察长特鲁特涅夫（俄语中有“不劳而食者”的意思——此处及以下各姓的俄语含义均为译者注），侦查处长施古尔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处长巴兰京中校（“烂菜汤”的意思），他们有个侦查员叫斯科罗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这连想都想不出来！一下都凑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复提沃尔科比亚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抢劫”的意思）之类了。这类的姓名又是这样地集中，难道完全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来吗？

又要怪囚犯的记忆力：И·科尔涅耶夫忘掉了那个同他一起蹲过弗拉基米尔隔离所的国家安全机关上校的姓名，他是康科尔吉娅·约塞的朋友（科尔涅耶夫也认识她）。这个上校是追求权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宝贵的“战利品”时期，他死气白赖要求到机关中负责监督这种抢劫的单位去工作，这些单位（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带头）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拼命捞取“战利品”（并且很得手）。我们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几车厢的东西，造了好几所别墅（一所在克林）。战后，他的气派那么大，当他一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时，就命令把

餐厅里的全部顾客赶走，并让人把姑娘和女人们赶到一起，强迫她们光着身子在桌子上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即使干这种事他本来也会平安无事，但是他却违背了另一条重要的戒律，象克鲁日科夫那样，触犯了自己人。那个是欺骗了机关，而这个则是专拿引诱别人妻子打赌，他引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而是契卡行动工作同志的妻子。于是就没有得到原谅！——带着五十八条被关进了政治隔离所。他在牢里，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关起来，感到十分恼火。他毫不怀疑上头还会改变主意的（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种倒霉的命运——自己坐牢，对于监滚边们并不是那么稀有的，避免这种命运的真正包票是没有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很少吸取过去的教训。想必又是由于缺乏高级理性的缘故，而低级理性则对他们说：情形稀见，碰上的人也很少，我会躲掉的，况且自己人也不会撒手不管。

在患难中自己人确实尽力照顾，他们有一条默契：对于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马尔发特种监狱里的И·Я·沃罗比约夫上校、卢宾卡监狱里的上面已经说到过的В·И·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享受优待）。他们中因私人过失而个别坐牢的那些人，由于这种行帮内的照顾措施，通常过得并不坏，这使他们认识到平时工作中那种逍遥法外的感觉是有根据的。然而，也知道有几个把劳改营行动特派员扔到一般劳改营服刑的例子，他们甚至碰上了自己过去管辖的犯人，这时他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盗窃犯当依靠对象并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条犯人的行动人员蒙申，就被他依靠过的那些盗窃犯赶到了板铺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些事例的详情——无法细说。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险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国家安全人员。水流——这是一种自然力量，这是一种比机关本身还要强的力量，这里谁也不会来帮你的

忙，否则连自己也会被卷进这个深渊去。

在最后的时刻，如果你消息灵通，有强烈的契卡人员意识，你还可逃出这个狂澜，证明你与它无关。例如萨因科大尉（不是那个以枪杀、用军刀在身体上钻眼、打断小腿、用重锤压扁脑袋和用火刑闻名的一九一八年哈尔科夫的木匠-契卡人员[14]，——但也许是亲戚？）出于一时软弱爱上了中东铁路人员科汉斯卡娅并同她结了婚。突然，在浪潮刚一兴起时，他就打听到要抓捕中东铁路人员。他在这时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处长。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把心爱的妻子投进监狱！**——甚至不是作为中东铁路人员，而是给她炮制了一个案子。于是就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内务局长。[15]

水流是依照某种神秘的更新机关的法则而产生的——定期作点小小的牺牲，以使留下来的人们具有洗净了的样子。机关的人员更替应当比一代代人的正常生长和衰老进行得快一些：国家安全人员中一批批的鱼群应当象为给后代让位而死在河底石子上的鳇鱼那样，毫不动摇地献出脑袋来。这一条法则，具有高级理智的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蓝边帽们怎么也不想承认和预见这个法则。于是机关的骄子们，机关的要人和部长们本人，每当大限一到，就得把脑袋放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一个鱼群带走了雅果达。大概有许多我们将在本书《白海运河》一章中称颂不已的光荣名字也落入了这一群中，而他们的姓名后来就从诗篇中给涂掉了。

第二个鱼群很快就把昙花一现的叶若夫拖了进去。三七年的好汉们有的就在这股水流中牺牲了（但不应夸大，远非所有的好

---

⑭　参看古尔的长篇小说《捷尔仁斯基》。

⑮　又是一个题材，这种题材这里有多少呀！也许什么人能用上。

汉都进去了）。叶若夫本人在侦查时挨了打，样子看来很可怜。这次大逮捕中，古拉格也失去了爹娘。例如与叶若夫一起入狱的还有古拉格的财务局长、古拉格的卫生局长、古拉格的军警队⑯队长，甚至还有古拉格的契卡行动处长——所有劳改营的头头们！

后来就是贝利亚的鱼群。

那个胖大笨重、自以为是的阿巴库莫夫则在此以前单独地摔了跤。

机关历史的作者们有朝一日（如果档案不烧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叙述这个情况——有数字，也有显赫的名字。

我在这里只想稍稍说一点——说一点我偶尔得知的关于留明-阿巴库莫夫的历史情况（关于他们已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不再重复）。⑰

靠阿巴库莫夫飞黄腾达并受阿巴库莫夫宠信的留明，于一九五二年底到阿巴库莫夫那里去报告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是医生艾津格尔教授已经承认对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作了错误的诊治（抱着害死的目的）。阿巴库莫夫不相信这种事，他深知这类勾当，断定是留明走得太远了（而留明对斯大林的心意体会得更好！）。为了核对起见，就在当晚对艾津格尔举行了交叉审讯，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阿巴库莫夫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医生案件”，而留明则认为是有的。早晨本来要再一次进行核对，但由于“夜店”的神奇特点，艾津格尔于当夜死掉了！第二天早晨，留明未经阿巴库莫夫同意并背着他给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请求斯大林接见！（我想，这不是他最果断的一步。拿脑袋作赌注的最果断的一步是头天晚上不同意阿巴库莫夫的意见，说

---

⑯ BOXP——准军事警卫队，以前是共和国内部警卫队。

⑰ 参看《第一圈》（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作品。——译者注）

不定也包括夜里杀掉艾津格尔。但谁知道这些宫庭秘史呢！——也许同斯大林以前就有了接触？）斯大林接见了留明，亲自交办了医生案件，而**阿巴库莫夫则被逮捕了**。以后留明似乎是独立处理医生案件，甚至把贝利亚都撇开了！（有迹象显示，在斯大林死之前，贝利亚已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也许正是通过他把斯大林收拾掉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否定了医生案件。**留明当即被捕**（还在贝利亚掌权的时候），但**阿巴库莫夫也没有获释**！在卢宾卡实行了新的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检察长跨进了它的门槛（Д·Т·捷列霍夫），留明显得手忙脚乱，巴结讨好，连声说"我无罪，我凭白无故地坐牢，"要求得到审讯。他照老习惯嘴里吮着一块水果糖，捷列霍夫向他指出后，他把糖块吐在手掌里说："对不起。"阿巴库莫夫的表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哈哈大笑起来，认为是个"大骗局"。捷列霍夫拿出了授权检查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的证件给他看。阿巴库莫夫挥了下手说："这种东西可以做它五百份！"他，作为"本单位的热爱者"，最感到受辱的甚至不是他蹲监牢这件事，而是居然有人图谋侵害这个不受世上任何单位节制的机关的利益！在一九五三年七月，留明被判刑(在莫斯科)并被处决。而阿巴库莫夫依然坐牢。在审讯时，他对捷列霍夫说："你的眼睛太漂亮，[18]我将来会舍不得枪毙你！扔下我的案子走开吧，和和气气走开吧。"有一次捷列霍夫把他传来，让他读登载揭露贝利亚消息的报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桩轰动宇宙的事件。而阿巴库莫夫读了后，眉毛也不动一下，翻过来读起体育运动新闻来了。另一次审

---

[18] 这是真话。一般说来，Д·捷列霍夫是一个具有非凡意志和勇气的人（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对大斯大林分子进行审判需要有这种意志和勇气），大概还是个脑子灵活的人。要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搞得彻底些，捷列霍夫可能会在其中大显身手。我们这里历史人物往往生不逢时。

讯时，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大头头在场，他不久前还是阿巴库莫夫的部下，阿巴库莫夫问他："你们怎么能容许贝利亚案件的侦查不由国家安全部负责，而由检察机关负责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老一套！）——"你也相信我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会受审?!""是的，""那你就快卷铺盖走吧！机关再也不存在了！……"（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信差，当然把事情看得太阴暗了。）阿巴库莫夫在卢宾卡坐牢的时候怕的不是受审判，而是被毒死（毕竟是当之无愧的机关之子！）他开始完全拒绝吃监狱的饭食，只吃从小卖部买来的鸡蛋（在这上面他缺乏技术头脑，他以为鸡蛋里是不会放毒的）。从收藏极为丰富的卢宾卡监狱图书馆中，他只借阅斯大林（把他关起来的人……）的著作。但这多半是一种示威行动，或者是一种打算，心想斯大林的拥护者不会不取得上风的。他蹲了两年监狱。为什么不把他放出去呢？这不是个幼稚的问题。如果按反人道的罪行来衡量，他是浑身浸透在鲜血里的，但并不是他一个人哪！而那些人却都太平无事。这里也有秘密：有个隐约的传闻，说是过去某个时候他曾亲自毒打过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谢迪赫——他那个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投入惩戒营并在那里战死的大儿子的妻子。正是这个缘故，他这个被斯大林关起来的人，却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审判（在列宁格勒）并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处决。[19]

而他的忧虑是枉然的：机关并没有因此而灭亡。



[19] 他还有一个王侯将相式的古怪举动：他有时同自己的警卫队长库兹涅佐夫一起换上便服步行走在莫斯科街头，兴来时便从契卡的公事皮包里掏出钱来向路人散发。这难道不是刺鼻的旧罗斯气息——解救灵魂的施舍吗？

但是，象民间智慧所奉劝的：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

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是我们的。

为了别那么起劲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当旗子摇晃，请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吗？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

我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学三年级。我们这些男团员曾被叫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过，第二次被叫去的时候几乎不征求同意就让我们填写履历表，说你们这些物理数学系、化学系的学生够多了，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永远是这样，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国需要，祖国需要什么，总有个什么官儿代替她知道并代表她说话）。

前一年，那个区委会还曾动员我们进航空学校。我们也顶回去了（舍不得扔了大学），但不象现在这一次那么坚决。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人们可能认为，当然罗，你们当时明白，周围正在大张旗鼓地抓人，你们知道监狱里怎样虐待犯人，他们想把你们拉去干多么肮脏的勾当。不!! 要知道“乌鸦车”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撤换了省里的全部领导人——这对我们反正都一样。关进去了两三个教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过舞，而且考试起来还更容易交卷。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

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应该去，"你自己的头脑也说："应该去！"，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深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

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了）。而训练我们要象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排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乾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不顺从我的军士麦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象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象使我们人人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园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洛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不，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式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辛钦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

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在弗拉基米尔大路上的行程*。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勃洛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衣，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 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

---

* 沙俄时代发配犯人经由弗拉基米尔城去西伯利亚的大道。——译者注

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ＳＵ，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象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象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儿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天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象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象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撕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ＳＵ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

"弗拉索夫* 畜牲，落网了吧?! 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

---

* 原苏联将军，降敌后组织伪军助德作战。——译者注

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解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佼佼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要是我在叶若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 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留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

---

* （纪元前469—399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 沙皇伊凡雷帝掌管禁卫军的宠臣。——译者注

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20]谁要误入到那里——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希涅夫，施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青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弗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象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

---

[20] 战争时期，在梁赞有一个列宁格勒的飞行员从军医院出院后，到结核病防治所去央求："给我找出点病状来吧！他们要我上机关去工作！"放射科的人给他造了个有结核侵润的假证明——国家安全部门马上就放弃了他。

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人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象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弗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象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古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涅耶娃按照刑诉法典第二百〇六条的规定签名时，她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十七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侦查员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涅耶娃只是阅看材料，后来不知怎地，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这时薇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布道（她这人可不

简单。这是一个头脑灵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虽然在外面她只是个钳工、饲马员、家庭妇女）。大家凝神屏息地听她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他们都是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聚了满满一屋子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查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但总归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机关啊！我们无法复述她的独白，她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为什么要抓人？——这时戈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但大家冲着他嚷了起来："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怎样称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这是一套陈规陋习造成的难题。妇人！象基督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于是薇拉便在自己的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科尔涅耶娃在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Д·П·提列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总还有点人

心吧（而那以后被他判死刑的许多人他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记数）。㉑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的内核，内核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总还应当保留着吧？H·普-娃说，有一次带她去审讯的是一个冷漠的好象既没长嘴巴又没长眼睛的女传带员——突然炸弹在"大楼"近旁接连爆炸，好象现在就要扔到他们头上。女传带员朝自己的犯人猛跑过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寻求人的融和与同情。但轰炸过去了。于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来！走！"

当然，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正如舐犊情深未必证明其善良（人们常常以"他是为了顾家"为恶人解脱）。人们称赞最高法院院长И·T·高里亚科夫：爱种花，爱读书，常去逛旧书店，对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柯夫很有研究——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害了多少万人呀？或者，譬如说那个上校，约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尔的隔离所里还哈哈大笑地讲述他怎样把犹太老人们关进冰窖——他的行为放荡不羁，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发觉：她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他也珍惜这点。但难道我们敢把这种感情当作他心中的善的基点吗？

他们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颜色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什么

㉑ 这是捷列霍夫的一个插曲。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立正，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碘酒和双氧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蘸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个来小时：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加在别人身上……

原故呢？在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有——“你们天蓝色的制服！”，然后是蓝帽子、蓝肩章、蓝领章，后来叫他们不要那么显眼，大片的蓝色渐渐避开了人民的感恩的视线，渐渐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只剩下细滚边，仄帽箍——但毕竟还是蓝色的！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这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但是，你知道雅果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据一个目睹者（此人与高尔基过从甚密，同时和雅果达也很接近）说：在莫斯科近郊雅果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果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几下，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们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让我来唆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

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闹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

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于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

* * *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22] 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23]——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

---

[22] 甚至对《伊万·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边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

[23] 在东德——都听不到，就是说都已经改造好了，他们正在国家机关里受到重用。

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兰诺夫斯基大街3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受审人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

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青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象行李那样摞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

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青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第 五 章

最初的监室——最初的爱

这怎样理解呢——监室怎么忽然和爱连在一起了？……噢，想必是这么回事：你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被关进了“大楼”的吧？那就明白了，因为把你塞到了那里，你才拣了一条命。这是列宁格勒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对住在那里、有防炮轰的地下办公室的侦查人员而言。不是开玩笑，当时在列宁格勒人们不洗脸，脸上都结了一层嘎渣，而在“大楼”里，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热水淋浴。不错，暖气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监室不供暖，但在监室里却也有可用的自来水管，也有厕所——这在列宁格勒哪里有呢？面包和外边一样，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还有一顿死马肉熬的汤！还有一顿粥！

猫儿羡慕起狗的生活来了！那——禁闭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间一共蹲过多少间监室呀！数都数不清呀！而在每一间里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监室里是两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钟，有的——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

但所有的监室当中，在你的记忆中占第一位的永远是你蹲过的第一间，在那里你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的绝望的命运相

同的人。你一生都将怀着大约只有回忆初恋才有的那种激动心情去回忆它。当你用新的眼光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想起和你在这石头棺材里同睡一块地面、同吸一种空气的那些人们，如同回忆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他们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后**的全部生活中，绝找不出与你在第一个侦查监室中的感受相类似的东西。就算监狱在你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后还会存在多少年（但愿少些……）——但你在受侦查期间蹲过的那个监室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只有肮脏的地面。村苏维埃、民警所、车站或港口附设的叫做羁押室的匣子①（羁押室和羁押所——它们在我国地面上分布最广，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里）。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的“单身监室”，那里的窗玻璃都涂着铅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昼的光亮只有变为血红色才能进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灯泡永远在天花板下发光。或者乔巴山市的“单身监室”，那里你们十四个人一连几个月人贴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动一下蜷缩起来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其余的则与列福托沃的每间监室一样：沥青地；暖气开关在走廊里，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连好多小时的撕裂人心的啸吼声（来自邻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空气动力管，但这并不是故意安排的，尽管难以置信）它使放着水杯的钵子颤振着从桌面上滑下去，在这

① 羁押室（羁押所）——判决前的羁押室（所），就是说，不是服刑期的地方，而是通过侦查的地方。

种啸声下说话是白费劲，但可以放声歌唱，看守是听不见的——啸声一停，那真是进入了胜于自由的极乐境界。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按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达这个最初的监室以前，曾需要闯过多少关口啊！你被关押在地洞里，或者隔离室里，或者地下室里。谁也不对你说一句人话，谁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铁喙从你的脑子和心脏里往外掏东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们却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孤零零地处在敌人中间，你已经同理智与生命诀别，你已经恨不得站到暖气片上头冲下跳下来在铁铸的排水口上把脑袋碰个粉碎，② ——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被带到自己的朋友中间。于是你又恢复了理智。

这就叫做第一个监室！

你期待过这个监室，你几乎象憧憬释放那样憧憬过它，——可是那些监狱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论是列福托沃，还是传奇般的魔窟苏汉诺夫卡。

苏汉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汉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68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

② 亚历山大·多尔仁。

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 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娅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因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悬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汉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象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③两个象树墩那样的

---

* 莫斯科远郊的贵族庄园，列宁曾在那里休养和工作。——译者注

③ 更准确些是：1.56米×2.09米。怎么知道的呢？这是工程师的计算本领和没有被苏汉诺夫卡搞垮的坚强精神的胜利——是亚历山大·Д计算出来的。为了不让自己精神失常，灰心丧气，他尽力多作些计算。在列福托沃，他数步子，把步子折成公里，根据地图回忆，从莫斯科到边界有多少公里，然后穿过整个欧洲有多少公里，越过整个大西洋有多少公里。他用这个办法激励自己：在思想里返回美国的家园；在列福托沃单身监室的一年内，他已经走到了大西洋底，这时候被投入了苏汉诺夫卡。在这里，因为他明白将来很少人能讲出这个监狱的情况（我们的介绍，全是从他那里来的），他发明了一个测量监室尺寸的办法。在监狱发的饭钵底上他读到了一个分数：10/22，便猜到，10是底的直径，而22是钵口的直径。然后他从毛巾里抽出一条线来，做成米尺，便把一切都测量出来了。后来他想法子怎样用膝盖顶住小圆凳**站着**睡觉，还要使看守感觉到你的眼睛是睁开的。——全靠这个办法才没有精神失常（留明一个月没有让他睡觉）。

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熨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汉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同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根——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④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

---

④ 如果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的“大楼”里——那也许还会看到吃人者：吃人肉的人，贩卖尸体解剖室里的人肝的人。不知什么缘故在国家安全部里把他们同政治犯关在一起。

的个性（“我们全体象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　*　*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踮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象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67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⑤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

---

⑤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象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的三个人都哆嗦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象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

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林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条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坐探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光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

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日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

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头上高高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强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追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牛* 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湿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吧，不要我打仗——那就不打。

* * *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坚定性。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偶尔只给我们传来他们的气息——有时来自茨维塔耶娃，有时来自“玛

* 拟指四联火箭筒。——译者注

丽亚嬷嬷”。⑥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种。他们对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强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牢。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在按直线办事和行动的人那里，他们好似梗在喉咙里的骨头。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

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

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刈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⑦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干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

⑥ 她的《回忆勃洛克》。

⑦ 我怕说不准，但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前这些人重新又钻了出来。这太好了。本来对此几乎已经不能期望了。

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8]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象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象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青人，是在一九〇四年，但根据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

⑧ 内部监狱——即国家安全部门内部设的监狱。

了。[⑨]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⑩]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〇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

---

⑨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1945年7月7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⑩ 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不感到是非法的。

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朗柔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

——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⑪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

---

⑪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象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象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桩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现在我在普列汉诺夫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文章中找到如下的一段话：

"……最近几天的事件使我忧心忡忡，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工人阶级在俄国取得胜利，而正是因为我用全部精神力量号召

它……〔不得不〕回想起恩格斯的一个意见：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再没有比在它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刻去夺取政权这件事更大的历史的不幸了，”〔这种夺权〕“将迫使它从本年二月和三月已争得的阵地上远远地后退……”⑫

这段话使我清楚地回想起来，当时法斯坚科正是这样想的。

当他回到俄国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便只求能象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Л·期-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醉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维妙维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密探局的情报员。⑬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

⑫ 普列汉诺夫：《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载1917年10月28日《团结报》）。

⑬ 斯大林的一个惯用的理由：把每一个被捕的本党成员（以及一般的老革命者）都说成曾为沙皇的密探局服务。出于按捺不住的猜疑心？还是……根据内心的感觉？……根据类比？……

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〇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 * *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林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不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一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

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儿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Л·В·译-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青，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强壮得多，实感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眼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头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子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进科学院，但却有才能——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种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

精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入了共青团，而这种共青团员的身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出来，象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进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搞专业而是掌管生产大权的人，质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高点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高点。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顶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强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进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皮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这时候泽-夫不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配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根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马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干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样子很少使他感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

---

*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用以载运机枪作战的轻便马车。——译者注

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点、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口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出的欢乐越多。泽-夫不仅有叭儿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敏捷的办事才干。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管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涂一层保护色，给自己做了一双鞣革马靴，套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身。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眼光。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点吃的、暖和暖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象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子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种体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金* 那种男人的力气，这点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象从盘子里抓虾吃一样，嚼开，吮空，又拿起下一个。

---

* 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农民出身，传说是皇后的情夫。——译者注

他那么习惯于物体的可塑性，惯于象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乱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象一只强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头头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融、都能脱身、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道，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进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进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暗探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紧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象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头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头上滚下来了（蓝边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美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页，如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凯而特意培养的那种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进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

原来如此！——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象泽-夫那样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象他那么悽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象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样。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慰。如此美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感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子，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

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啕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子的怜悯。早就失欢的妻子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奶油、红鱼子、小牛肉、鳇鱼肉。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肉的面包，一根卷好的叶子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食物（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泪又加倍地流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子的泪水，淌了整整几年的泪水：一会儿是因为在他裤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出了他在汽车里仓猝掖

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裤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子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法斯坚科恰恰相反，在监室里是最生气勃勃的，虽然，以年龄而论，他是唯一已经不能指望熬过一切而重获自由的人。他搂住了我的肩膀说：

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么！
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

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牺牲，
在牢狱和潮湿的矿井——
我们的事业永远会得到
后代人的响应！

我相信！但愿这些篇章有助于实现他的信念！

* * *

我们监室十六小时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却是那么有意思，譬如拿我来说，等十六分钟的公共汽车要比这十六小时无聊得多。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却会长叹一声，觉得时间又是不够，一天又飞快过去了。事件是细小的，但

你第一次学会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

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是最初两个小时：一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在卢宾卡还没有“送饭口”⑭，所以喊“起床”号令也需要开门），我们毫不迟缓地跳起来，铺好床，无聊地、无望地在电灯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点钟强迫起床，这时候，脑子睡得懒洋洋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可厌，整个一生都完蛋了，监室里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特别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间受审讯刚眯糊了一会儿的人。但是别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个瞌睡试试，稍稍把身子靠在墙上，或者手托脑袋撑在桌上装做下象棋，或者脸对着放在膝上装模作样打开的书本浑身放松——那就会发出用钥匙敲门的警告声，或者更糟糕些：用有响声的锁锁上的门突然无声地打开（卢宾卡的看守受过专门训练），一个下士象无声的影子，象穿墙破壁的精灵，迅速走进监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记，你也许会进禁闭室，也许会拿走全监室的书籍或者取消放风，这是对全监室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惩罚，还有写在狱规上的一条条罚则——你读去吧！它就挂在每个监室的墙上。顺便说说，你如果看东西要戴眼镜，那你在这困乏人的两小时内，无论书籍还是神圣的狱规都读不了：因为眼镜到夜间是收走的，在这两小时内让你有眼镜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两小时内，决不会有人往监室送什么东西；谁也不会来这里，谁也不会问什么，谁也不会被传去——侦查员们正睡得香，监狱的长官们才醒——不眠的只有“维尔都海”，他时时拨开监视孔的小档板往里窥望。⑮

---

⑭ 监室门上的一块活板，翻下来是一个小桌。通过这个缺口进行谈话，分发食物，要犯人在那里在各种监狱文书上签名。

⑮ 在我坐牢时，这个词已经很流行了。据说这是从乌克兰人看守那里出来的：“站住，别动！”（乌克兰语为“塔·耐·维尔都海！”——译者注）但这里也可以想起英语的“看守 = turnkey ——转动钥匙”。也许我们的维尔都海——就是指转动钥匙的人？

但有一项程序是在这两个小时内办理的：早解手。还在起床时，看守就要作一项重要宣布：任命你们监室里的某人今天负责端马桶（在那些各自为政的不出名的监狱里，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自治权恰好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总政治监狱里，这种事件是不能听任自发的）。于是你们就迅速一个挨一个地排好队，前面是那位马桶负责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带盖的洋铁桶抱在胸前。到达目的地，又把你们锁在里面，锁门以前，你们有多少人就发给你们多少有两张火车票大小的纸片（在卢宾卡没有多大意思：白的纸。有这样一些吸引人的监狱，那里发的是书本的碎页——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阅读呀！猜测是从哪儿来的，把两面从头到尾读完，领会内容，评价风格——在断章残句中去评量吧！——与同伴交换阅读。那里有时发给一度曾是进步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的残页，而有时说起来都害怕，是经典作家的书页，那可根本不是文艺方面的啊……。上厕所成了获得知识的行动）。

但可乐的事不多。这项粗俗的需要在文学作品里是不作兴提及的，（尽管这里也只是轻巧地说出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清早出恭，其乐无穷……。"狱中一日的这种似乎是自然的开场，已经为囚犯的一整天设下了圈套——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气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监狱的不活动和食物贫乏的情况下，在虚弱的昏睡后，你怎么也不能一起床就打发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并锁起来，——直到晚上六点钟（而在有的监狱里则到第二天早晨）。现在你一想起白天审讯时间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么多事情，心里就发毛，还要往肚里填进口粮、水和烂菜汤，可是谁也不再放你上那个美好的场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轻易进入这种场所的价值。难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上产生，并且在早解手后很快产生，然后整天折磨你，压迫你，使你不能畅快谈话、阅读、思想，甚至吞不进一

点食物。

有时在监室里讨论：卢宾卡的狱规，以及一般的任何狱规是怎样产生的——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暴行或者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想——各有不同。起床——这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打算，而其他许多东西起初是完全机械地形成的（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行一样），后来上头看出有好处，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点钟，因此带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间一个个单独放出去——那就需要多余的操心和预防措施，这些活儿是拿不到报酬的）。在眼镜问题上也是这样：何必一起床就操这个心？夜班交班前还给他们就行了。

现在已经听得到在分发眼镜——门打开了。可以判断，邻室有没有戴眼镜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镜吗？当然我们不敢敲墙对话，对待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瞧，也给我们监室里的人拿眼镜来了。法斯坚科只在读东西的时候才戴眼镜，而苏济则经常戴着。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缝了。一戴上角制框眼镜——眼上的框边是直线，他的脸马上就变得严厉了，有洞察力了，象我们所能想象的本世纪有教养人的脸。还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学院学习，爱沙尼亚独立后二十年间保持了不带一点口音的纯粹俄语。后来在塔尔图学完了法律专科。除了爱沙尼亚国语外，他还通晓英语和德语，所有这些年代他经常注视着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注视着综合性的各种德国《学报》，研究各国的宪法和法典。在我们的监室里他当之无愧而又含蓄地代表着欧洲。他还是一个爱沙尼亚的知名律师，人们称他为《Kuldsuu》（金口）。

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口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

考虑在内——一切将由命运来决定⑯），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就是我们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掺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〇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送茶水来了。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泼到道上。而整个

⑯ 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当做一句逗乐的话说：“给谁？——给政治指导员！”

走廊是擦得锃亮的，象在一级旅馆里那样。[17]

这就是全部干粮。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

九点钟。早点名。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象"立正"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

---

[17]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在卢宾卡好象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次并会造成好象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博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Φ·Π·加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林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

可能读到它；在7 ×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 开头的？”“谁是Φ 开头的？”有时还说成“谁是 A 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楼最大的号子——一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 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传讯时间过去了——留在监室里的人们的漫长而愉快的一天便开始了。它因有着许多好机会而生辉，却并不因有许多义务而变得过分黯淡。属于义务之列的有每月两次用喷灯烧铁床（火柴在卢宾卡是绝对禁用的，要想点火抽烟，我们必须在门上的旋转

*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苏军俘虏的陆军元帅。——译者注

口打开时耐心地举起一根手指，请求看守给火——而喷灯却放心地委托给我们使用）。——还有一件好象是权利但又搞成很象义务的事：每星期一次单个地叫到走廊里去用钝推子推胡子，——还有一项义务，是擦亮监室里的镶木地板（泽-夫总是逃避干这种活，因为它象任何劳力活一样贬低他的身份）。我们由于饥饿很快就喘起气来，不然倒是可以把这项义务算成是一种权利——它是那么愉快而有助于健康的工作：光着一只脚踩着板刷向前——而身子则往后仰，然后相反，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别苦脑，别发愁！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波将金公爵蹲的监狱！

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挤在以前的六十七号里了。在三月中旬又给我们增加了第六个人，因为本监狱既没有紧挨着的板铺，又没有睡在地板上的习惯，所以就把我们全体成员转到五十三号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诚劝告：谁没有在那里住过——就去住一住！）这不是监室！这是给高贵的旅行家当卧室用的宫廷内室！“俄罗斯”保险公司[18]在建筑大楼的这一侧时不顾造价，把一层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就会在这里叮叮当当搭造四层的板铺，保证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还有那窗户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几乎够不到上面的通风小窗，光是这种窗户的一扇就顶得上居住房间的整个窗户。只有那挡住窗户五分之四的**笼口**的铆接钢板，才使我们想到我们不是住在宫殿里。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卢宾卡大楼内院的六层或七层楼的某一

---

⑱ 这个公司得到了莫斯科市内这一小块嗜血的土地：1812年无辜的魏列夏金经过富尔卡索夫斯基胡同，在罗斯托普青（1812——1814年莫斯科的陆军总督。——译者注）的宅邸附近遭到凌迟，而在大卢宾卡街的那一面，是母阎王萨尔蒂契哈的住宅（也是对农奴的杀人场）。（参看：《漫游莫斯科》，H·A·海尼凯等编，萨巴什尼科夫出版社，1917年莫斯科版，第231页。）

块玻璃，仍然能把一团惨淡的次生的太阳光斑反射到我们窗户口以上的部分。对我们说来，这是真正的小白兔* ——一个可爱的生物。我们温情地注视着它在墙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含义，它预告放风时间的到来，它报告到午饭时间还有几个半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它就从我们这里消失了。

总的说我们的好机会是：去放风！读书！彼此畅谈往事！倾听与学习！争论与受教育！而且作为奖励还将吃到有两个菜的午饭！真是不可思议！

卢宾卡下面三层楼的放风是不愉快的：把他们放到底下潮湿的小院子里——监狱楼房之间狭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层楼的囚犯们却被放到雄鹰栖息的高台——五层楼的屋顶。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墙，我们旁边是一个不带武器的看守，还有一个站在了望台上的持自动步枪的哨兵，——但空气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来！两人并排走！不许说话！不许停留！"——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春天给所有人以幸福的许诺，而对囚犯的许诺更是胜过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现在身陷囹圄，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不会被枪毙。然而我将在这里变得更聪明。我将在这里懂得许多事情，苍天呀！我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在他们面前，而是在你——苍天的面前！我在这里明白了这些错误——我定会加以纠正！

象从深坑里，从遥远的低层，从捷尔任斯基广场那里，向我们传来尘世的汽车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哑的鸣笛声。对于那些在鸣笛声中奔驰而过的人来说，汽车喇叭象是胜利的号角——而从我

---

* 俄文中"光斑"和小兔是同一字。——译者注

们这里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渺小。

放风总共只有二十分钟，但围绕着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赶紧做呀！

首先，利用放风的往返机会，摸清整个监狱的布局和这些屋顶小院的方位，以便将来出去以后，从下面的广场经过时，知道哪儿是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路上我们要拐好多弯，我想出了一套这样的办法：从监室起开始记数，每向右拐一个弯加一，每向左拐减一。不管带着我怎样飞快地绕圈子，脑子里不要急着去想象，只要抓紧时间算出加减的结果。如果途中你还在某个楼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着高耸在广场上空的柱塔上的卢宾卡女河神塑像背部，并且还能记住这时的数字，那以后你在监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会知道你们的窗子是往哪里开的。

再者，放风时要做的事就是呼吸——尽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但那里也是谈论最尖锐的题目最方便的地方。虽然放风时禁止谈话，没关系，只要会想办法——而且只有这儿你们的话才保险不会被“耳目”和窃听器偷听了去。

去放风时，我同苏济竭力凑成一对——我们在监室里也谈，但主要的东西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接近的，我们是慢慢接近起来的，但他已经来得及向我讲了许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一种新的特性：对于我过去从不打算了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经明确了的生活道路毫无关系的事情，能够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从童年时代起，我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目标就是要去研究俄国的革命史，其余的与我完全无关。为了理解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我早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一切缠身的东西，我一概弃之不顾。而现在命运使我同苏济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现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种种事情，

而他的自己的事情就是爱沙尼亚和民主。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关心爱沙尼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我现在却在长久地聆听着他一往情深地讲述这个安详而勤劳的小民族二十年的自由岁月，在那里有强壮的男人们，他们有着慢条斯理、脚踏实地的风习；倾听着从欧洲的最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爱沙尼亚宪法原则，一百人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怎样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但这一切开始使我喜欢起来，所有这些也开始淹留在我的经验中。⑲我乐意去了解他们的不幸历史：自古以来就被抛在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两把铁锤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爱沙尼亚砧铁。从东方和西方轮番向它打击——而且看不到这种轮番打击的尽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结。我们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间拿下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屈服。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后来尤登尼奇蔑视他们有芬兰人的血统，而我们则骂他们是白匪分子，爱沙尼亚的中学生们却志愿报名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四〇年、四一年、四四年，都曾打击过它，一批子弟被俄国军队抓走，另一批被德国军队抓走，第三批逃进了森林。上年纪的塔林知识分子议论说，但愿他们能从这可恶的轮子里挣脱出来，分立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假设：他们的总理将是吉甫，而国民教育部长将由苏济来担任）。但是，无论邱吉尔或罗斯福都不管他们的事，而“约叔叔”（约瑟夫）倒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的军队刚一开进，最初几夜就把所有这些幻想家们统统从他们的塔林寓所里抓走。现在他们有十五个人关在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

---

⑲ 苏济后来回忆我时，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当时在我身上的确存在古怪的结合。

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点东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炼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戈果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喝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管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头发的身材稍具马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搽得象是玩偶的不动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过的眉毛则是黑颜色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种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性听着，你弄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道，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高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交出的书：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刺孔或圈点（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欢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可是突然会来人说，发现了圈点。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弄不好全监室还会转入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进劳改营的深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

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时候发出一封情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子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毕力涅克、潘捷雷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管理员根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门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E 发生争论。

* * *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象一个影子，好象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

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象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象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契·E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E（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

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了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他指挥的炮兵连在卢加附近发现自己被敌人包围。他们失散了，被捉住，当了俘虏。尤里落入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爱尔菲神的环舞”，给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

以维持人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 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20] 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

---

*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人类。——译者注

⑳ 我国在1955年才承认这个公约。可是，麦尔贡诺夫在1915年的日记中写下了一些传闻，说是俄国不让把救济品送到德国去给自己的俘虏，

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进了狗窝，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

……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E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识去的。但他在兵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赛耳

所以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比各协约国战俘都坏——这是为了不致产生关于俘虏过好日子的传闻，而使俄国军人乐意去当俘虏。这里有着某种思想上的继承性。（参看：C•П•麦尔贡诺夫：《回忆与日记》，第一册，1964年巴黎版，第199、203页。）

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包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刺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21] 他们

---

[21]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

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恩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象我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契！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慄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呀！原谅？还可以回到家里去？漫步石岛大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毕竟是俄国人呀！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回去，而且还将是了不起的好人！……离开集中营后的一年半没有给尤里带来幸福。他没有后悔，但也没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的俄国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清楚地感到：脚底下没有支撑地方，反正这不是正经生活。德国人按自己的目的随意支使他们。现在，当德国人显然已经打输了战争的时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条出路：头头喜欢他，曾吐露真情说，在西班牙他有一个留做退路的庄园，帝国完蛋时两人可以一起躲到那里去。可是桌对面坐着一个

拿起德国卡宾枪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 列宁格勒街名。——译者注

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脑袋地向他进行劝诱："尤里·尼古拉耶维契！苏联指挥部重视您的经验和知识，想通过您学习德国情报机关的组织经验……"

E犹豫不决了两个星期。但当苏军在维斯拉河彼岸发动进攻时，在把学校撤退到后方的途中，他下令队伍拐进一个僻静的波兰小庄园，在那里叫全校站队集合，他宣布："我决定投到苏联方面，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这些又可怜又可笑的乳臭未干的间谍们，一小时以前还装作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样子，现在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乌拉！我们一起去！"（他们向着自己未来的苦役喊"乌拉！"……）

于是，他们的间谍学校便全体隐藏起来，直到苏军坦克的到来，然后是"死灭尔施"的到来。尤里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伙伴们。把他单独隔离，要他在十天之内把学校的全部历史、教学大纲、破坏任务都写出来，而他也真的以为是需要"他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已经讨论了回家探望亲人的问题。

只是在卢宾卡他才明白过来：甚至在萨拉芒卡*，离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现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枪决或者怎么也不会少于二十年。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治这个毛病，《奥德赛》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种莲子**……

尤里在我们的监室里总共只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同他争论。我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义的，可怕

* 西班牙地名。——译者注

** 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讲到一个居住在非洲北岸的民族以莲子为食，据说吃了就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译者注

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带着遗憾的神色瞧着我，抿了抿神经质的嘴唇说：在着手去搞革命以前，先应当在国内把臭虫弄干净！（他与法斯坚科殊途，但在某一点上却奇怪地同归了）。我说，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说——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从一开头就是（至于说斯大林是个匪徒，我与他没有分歧）。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夫·托尔斯泰——才真是我们的文学之王！

由于这些每日的争论，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争论，我同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于彼此的理解。

把他从我们监室带走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打听了多少次，也没有听说谁在布蒂尔卡同他一起坐过牢，谁在递解站看见过他。连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们也都无影无踪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进了土，有些人至今还领不到离开北方荒僻地区的许可证。尤里·E的命运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平常的。

* * *

卢宾卡吃午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老早我们就听见走廊里盘碗叮当的快乐音响，然后，象在饭馆似地用托盘端着给每人送来两个铝盘子（不是钵子）：一勺汤和一勺稀极的无油粥。

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状态中，受侦查的人什么也咽不下去，有的几昼夜不碰面包，不知该把它往哪里放。但渐渐地恢复了胃口，然后是经常的饥饿状态，甚至达到贪馋的程度。以后，如果你能克制自己，胃就缩小了，适应于少食——这里的可怜的饮食甚至成为恰到好处。为此需要进行自我教育，丢掉斜视多吃一点

的人的习惯，绝对不搞孕育着危险后果的那种狱中的精神会餐。尽可能地上升到高级领域去。在卢宾卡这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允许午饭后躺两小时——这也是极妙的疗养院规则。我们背向门上的旋转口躺着，装样子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便打起盹来。睡觉本来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动的书本，但在这两小时内通常不敲门。（这种人道态度的原因是，不该睡觉的人在这时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审讯。对于不肯在笔录上签名的顽固分子，这种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强烈的对比：受审讯回来，而这里午睡时间已经结束。）

睡眠——这是克服饥饿和忧愁的良药：机体也不消耗热量，脑子也不再反复思考你犯下的错误。

随即就来了晚饭——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于把一切赠赐在你面前摆出来。现在，熄灯前的五、六个小时，你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放进嘴里去，但这已经不可怕了，晚上易于习惯不想吃东西——军事医学上早就知道这一条，在后备团里晚上也是不开伙的。

随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时间，这个时刻你多半已经战栗地等待了一整天。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多么轻松了呀！世界上一切大问题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了——你感觉到了吗？

轻飘飘的卢宾卡的黄昏啊！（不过，只有你不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它才是轻飘的。）轻飘飘的肉体，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当然在晚上也争论，丢下同苏济的棋局，扔下书籍。冲

突最激烈的，又是我和E，因为问题都是爆炸性的，例如——关于战争的结局。瞧，看守不说话、没有表情地走了进来，放下了窗上的蓝色伪装帘子。现在，在第二层帘子的后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礼炮来。我们既看不见礼花齐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欧洲地图，但试图在脑子里绘出一幅详图并猜测哪些城市已经拿下。这些礼炮特别使尤里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唤命运来改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坚持说战争决不是正在结束，现在红军马上就要和英美军互相冲突，只有那时才开始真正的战争。监室里的人对这种预言非常感兴趣。结局是什么呢？尤里担保说，结局是红军轻而易举地被击溃（它意味着我们被解放？或被枪毙？）。我对此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特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的理由——我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失血过多、装备不良，而主要的是，对盟军作战已经不会那样坚决。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队为例坚持说，与其说军队已疲惫不堪，不如说它已积累起了经验，现在是又强大又凶猛，因而在这种场合会比打德国人还要干脆地把盟军打个落花流水。“永远不会！”尤里喊起来（但用低嗓门）。“那么阿登呢*？”我也喊起来（低嗓门）。法斯坚科插了进来并嘲笑我们，说我们两人都不理解西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迫使盟军对我们作战。

但晚上毕竟不那么想争论，倒想听点什么有趣的东西，甚至调和的东西，大家和睦地说说话。

监狱中最心爱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监狱的传统，谈论以前是怎么坐牢的。我们有法斯坚科，因此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

---

* 指1944年12月——1945年1月德军在阿登地区对英美发动的进攻行动，此役之初英美军曾遭惨败。——译者注

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去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了。现在这已经成为奇闻。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日前的捐募——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瞧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节日礼物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这只是美味的食物吗？它们使人感到温暖，感到外面在想着你，关心你。

法斯坚科告诉我们，在苏维埃时期也存在过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对这件事，我们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有点难以设想。他说，Е·П·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国去，在那里募钱（在我们这里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后在国内购买食品送给没有亲属的政治犯。给一切政治犯吗？马上说明白：不是，不给反革命分子（譬如，这意思就是不给工程师们，不给牧师们），而只给过去的政党的成员。原来如此，那就干脆直说吧！……不过，政治红十字会的成员，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个个给关进去了……

晚上不等待审讯时还有一个乐意谈的题目——关于释放。是呀，据说，竟有释放犯人这等怪事。译-夫拿着东西从我们这里给带走了——说不定是释放？侦查不可能终结得这么快。（过了十天，他又回来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来他在那里很快就签了名，于是又把他送回这里）喂，听着，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说你的案子是鸡毛蒜皮吗？——一定要上我老婆那里去一趟，见到以后，让她在送来的牢饭里头做个暗号，譬如说放上两个苹果……——现在苹果哪里也没有——那就三个面包圈吧

——说不定在莫斯科面包圈也买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个土豆（这样约定好了。后来果真叫И拿着东西走了，而M也在牢饭里头得到了四个土豆。惊人！绝妙！他被释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严重得多——那末说我也可能快了？……实际上只不过是第五个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里，而И已经被关在轮船的底舱里运往科雷马去了）。

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回忆某件可笑的事情——在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里的，完全不是你经验范围内的有意思的人中间，你感到又愉快又惬意——而与此同时，已经度过了不声不响的晚点名，眼镜也收去了——电灯眨了三次眼。这就是说——过五分钟就到睡觉时间！

赶快，赶快，钻进被子！好象在前线，不知道炮弹会不会马上、一分钟之后将狂风暴雨般地落在你身边一样——我们在这里也不能预料自己是否面临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审讯之夜。我们躺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上面，我们努力把各种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睡觉！

在四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送走了E以后不久，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门锁响了。心收缩了起来：叫谁呀？现在看守就会用嘘嘘的声音传呼："C开头的！"，"З开头的！"。可是看守没有发出嘘声。门打开了。我们抬起头。门旁站着一个新来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着一身简陋的蓝色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没有任何东西。他惘然若失地环视四周。

他不安地问："哪一号监室？"

"五十三号。"

他战栗了一下。

我们问："从外面来？"

他痛苦地摇摇头说："不——是……"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有着一张稍带傻气的、很柔和的脸孔，眉毛几乎完全是白的。

“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问题，不能期待对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这样，为了点小事……”

人人都这样回答，人人都是为了点小事坐牢。特别是受侦查人本人总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为了什么？”

“我……写了个号召书。给俄国人民的。”

“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从来还没有碰到过！)

“会枪毙吗？”——他的脸拉长了。他拿住那一直没有脱下的鸭舌帽檐揪来揪去。

我们安慰说：“大概不会吧。现在谁也不枪毙。十年是准的。”

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只手，胜利地对我感叹说：

“瞧见了吧，工人阶级的情绪！”

说完便回过身去睡了，以为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但他错了。

“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来个号召书？用谁的名义？”

“用我自己的名义。”

“你是什么人呀？”

新来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米哈伊尔皇帝。”

好象一粒火星烧穿了我们的皮肉。我们在床上坐起身来，仔

细瞧瞧。他那腼腆的瘦脸丝毫也不象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年龄也……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觉吧！”——苏济严厉地说。

我们朦胧入睡了，预感到明天早上吃干粮前的两小时是不会寂寞的。

给皇上也拿进了一张床和被褥，于是他便悄悄地在马桶近旁躺下了。

* * *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车司机别洛夫家里，进来了一个长着淡褐色胡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儿，对司机的笃信上帝的妻子说：“毕拉基娅！你有个一岁的儿子。为上帝好好保护他。时间一到，我会再来。”说完就走了。

这个老头是谁——毕拉基娅不知道，但他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威严，他的话征服了母亲的心。于是她对这个孩子疼得比保护眼睛还厉害。维克多长成了一个安静的、听话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见天使和圣母的幻影。后来少了些。老头儿再也没有出现。维克多学会了开汽车，一九三六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比罗比詹，在汽车连服役。他完全不是一个放肆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不象司机的文静性格把一个在部队里当雇员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挡了追求这个姑娘的自己排长的道。在这个时候，布留赫尔元帅前来视察他们的演习，他的司机忽然得了重病。布留赫尔命令汽车连长给他派去一个连里最好的司机，连长把排长叫来，这个排长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敌别洛夫塞给元帅（在军队里常常这样：提拔的并不是有条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况别洛夫是一个不喝酒的、干活卖力的人，不会捅漏子的。

别洛夫中了布留赫尔的意，便留在他那里了。不久，布留赫

尔被象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这个办法在逮捕前把布留赫尔和听他话的远东地区分开了），他把自己的司机也带到了那里。别洛夫失去了头头以后，进了克里姆林宫的汽车队，有时给米哈伊洛夫（共青团）开车，有时给洛佐夫斯基开车，还给什么人开过，最后是给赫鲁晓夫开车。在这里别洛夫看够了（给我们讲了好多）那些宴会、风习、警戒措施。作为普通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工会大厦旁听过对布哈林的审判。说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只对一个赫鲁晓夫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有在他家里，让司机与全家同桌吃饭，而不是在厨房里单独吃；在那些年代只有在他家里还保留了工人的朴实作风。乐观愉快的赫鲁晓夫也喜欢上了维克多·阿列克塞维奇，一九三八年调到乌克兰去的时候很想带他一起走。维克多·阿列克塞维奇说："早知这样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赫鲁晓夫。"但有点什么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来。

在一九四一年，战争快开始的时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间断，他不在政府汽车队里工作了。于是军委部马上把他这个失去后台的人征召入伍。他由于体质弱没有上前线，而分到了工人营——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里挖掘战壕，修筑道路。在最近几年无忧无虑的温饱生活后——这日子使他简直吃不消。他尝够了穷困和痛苦，他在周围看到，人民在战争发生前不仅没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穷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又找到了差事：给谢尔巴科夫开车，[22]后来给石油人民委员谢金开车。但谢金侵吞了公款（总共三千五百万）被悄悄地撤了，而别洛夫不知什么原因又失去了在领导人身边的工作。

---

[22] 他告诉我们，肥胖的谢尔巴科夫上自己的情报局去办公时，不喜欢看到人，凡是他经过的房间，工作人员一律撵走。他一边因脂肪太厚而喘着气，一边弯下身来翻起地毯的一角。如果那里发现灰尘，整个情报局就要倒霉。

于是他就上汽车场当司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与红巴赫拉之间捞点外快。

但他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别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亲那里，一天她正洗着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龙头那里接水。这时，门开了，屋里走进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他对着圣像划了十字，威严地看了别洛夫一眼说："你好，米哈伊尔，上帝祝福你。"别洛夫回答："我是维克多。"老头儿坚持说："你将成为米哈伊尔——神圣俄罗斯的皇帝！"这时母亲进来了，一见就吓软了，把桶里的水溅了一地：这就是那个二十七年前来过的老头儿，须发白了，但正是他。老头儿说："让上帝保佑你吧，毕拉基娅，你把儿子保全了。."说毕就同未来的皇帝撇开旁人去密谈，象总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样。他告诉这个惊震不已的年青人说，一九五三年将要改朝换代，他将成为全俄罗斯的皇帝㉓。（所以五十三号监狱那么使他吃惊！）为此在一九四八年应当开始积聚力量。老头子没有接着教他怎样积聚力量就走了，而维克多也没有来得及问。

现在已经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换个别人也许早就丢开了这种力不胜任的意图，但恰好维克多在那种地方，在最高层人士中间厮混过，常见到这些米哈伊洛夫们、谢尔巴科夫们、谢金们，从别的司机那里听过好多事，并且弄明白了，这里完全不需要什么不同寻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

刚行过登基涂油礼的皇帝是安祥的，有良心的，富于同情心的，象留里克朝最后一个皇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样，感到皇冠沉重地紧箍在自己头上。周围是贫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负责的——现在却压在他的双肩上，这种状况继续一日，他

㉓ 只有一点小差错：把开车的人错当成坐车的人了，除此以外这个未卜先知的老头儿几乎没有说错。

便应负其咎。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等到一九四八年，于是在那个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告俄国人民的宣言，并念给了石油人民委员部汽车队的四名工作人员听……

……我们从早上起就把维克多·阿列克塞维奇围了起来，他态度谦和地告诉了我们一切。我们过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没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轻信态度，因此——出于我们的过错！——没有来得及防备“耳目”。而且我们脑子里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对我们做的朴质的陈述，还会包含着一些侦查员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讲完以后，克拉马林科不知是要“上典狱长那里去拿菸叶”，还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总之很快就把他传去了。他到上头去把石油人民委员部的这四个人给兜了出来，这本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别洛夫提审回来，表示奇怪，侦查员是从哪里得知了这些人的。这才把我们惊醒了……）……石油人民委员部这几个人读了宣言，都表示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告发皇上！但他自己感到，这——过早了！过早了！于是就把宣言烧了。

过了一年。维克多在汽车场车库当机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写了一个宣言，给十个人——司机和钳工读了。大家都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出卖！（十个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时代——真是罕见的现象！法斯坚科关于“工人阶级的情绪”的结论没有错。）诚然，皇上同时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里有得力的靠山；答应给自己的拥护者们出差的机会，以便去团结地方上的保皇势力。

过了几个月。皇上把机密又透露给车库里的两个姑娘。这可就走了火——姑娘们原来都是有高度觉悟的！维克多的心马上象被揪住了，感到灾祸临头。在报喜节* 后的星期天，他在市场上

* 耶稣教所传，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谓将生耶稣，俄旧历8月25日。——译者注

走，身上带着宣言。一个同谋的老工人碰到他，对他说："维克多！你最好先烧了那张纸吧！怎么样？"维克多也尖锐地感到：是呀，写早了！该烧掉！"不错，现在就去烧掉。"于是他便回家去烧。但是，市场上立刻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青人叫住了他："维克多·阿列克塞维奇！跟我们坐车走一趟吧！"他们用小汽车把他带到了卢宾卡。这里是那么紧张忙乱，以至忘了按常规搜身，因而提供了一个时机——皇上差点儿没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厕所里销毁，但一想，他们会更加纠缠：藏到哪里去了？藏到哪儿去了？便作罢了。直接带他乘电梯上楼到了将军和上校那里，将军亲手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了宣言书。

然而，大卢宾卡只作了一次审讯就放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汽车场车库里抓了十个。石油人民委员部里抓了四个。接着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一个中校，这个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着号召书的内容：

"陛下：您这里写着：'我将谕令我的农业大臣开春以前解散集体农庄'——但是怎样分配农具呢？您在这里没有明确规定……然后您写道：'我要加强住宅建设，让每个人住到他工作地点附近，提高工人工资……'陛下，您哪儿来的本钱？票子全靠在机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债废除了！……还有：'把克里姆林宫全部平毁。'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顿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大卢宾卡的房子您还满意吗？想不想去瞧瞧？……"

年青的侦查员们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们除了可笑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们在监室里也不是总能克制住微笑。泽一夫向我们挤眉弄眼说："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会忘记我们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气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维克多·阿列克塞维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亲毕拉基娅送来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请

我们吃："吃吧，吃吧，同志们……"

他腼腆地微笑。他很清楚，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可笑——当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的选择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从我们的监室里带走了。[24]

* * *

快到五一的时候，从窗上取下了灯火伪装。战争眼见得要结束了。

那天傍晚，卢宾卡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正好碰上是复活节的第二天，节日交错在一起了。侦查员们都在莫斯科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我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

---

[24] 1962年我和赫鲁晓夫见面的时候，我憋不住要说："尼基塔·谢尔盖维奇，我与您可有一个共同的熟人。"但我对他说了另一句更为需要的话，是代表过去的囚犯们说的。

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象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包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篝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第六章

那个春天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个早晨，每个晚上，从不远的地方——从森林街或诺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尔卡监狱的窗里送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声音。这全是一些进行曲，一遍一遍反复演奏的进行曲。

我们站在打开了但爬不出去的监狱窗子旁边，站在暗绿色的玻璃钢筋笼口后面听着。是部队在列队行进吗？或者是劳动者们正在甘心乐意地把工休时间贡献给步伐操练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听到了传闻，说是正准备着举行胜利大检阅，预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开始四周年在红场举行。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象大洋里的鲱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E 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象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①

当我们还在分割东普鲁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员的垂头丧气的行列——周围一片欢乐声中唯一愁眉苦脸的人们——当时他们的郁郁寡欢就已经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还不明白它的原因。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这些自动排成的纵队（干吗排成纵队？他们为什么要列队？要知道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各国战俘回去的时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们的被俘人员回国的时候却想显得更加服贴一些……）。在那里我还带着大尉的肩

---

* 指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译者注

** 法西斯德国的著名集中营。——译者注

①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下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章。又带着肩章，又是在行军途中，对于他们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运也使我转过身去跟在这些被俘人员屁股后头了。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我已经和他们同路，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我听到了他们最初的一些故事，当时我还不太懂，后来尤里·E 使我明白了，而现在，在红褐色的布蒂尔卡城堡的圆顶下，我感觉到，几百万俄国战俘的经历，象大头针钉住蟑螂一样，死死地钉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经历，在我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为被撕下的肩章伤心。我没有落到我的这些同龄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义务是用肩膀在他们共同重负的一角上搭一把力，并一直扛到最后一口气，扛到被压垮。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象我和这些小伙子们在索洛维约夫渡口、在哈尔科夫的包围圈里、在刻赤的采石场上一起当了俘虏；双手背在后面，把苏维埃人的自豪感带进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在严寒中排几小时的队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还没有挨到大锅旁边就倒卧在地上变成一具僵尸；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一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 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

* 俄语中“语言”和“舌头”是同一词。——译者注

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线，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搞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② 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③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象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象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们多么轻易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帐上一笔勾掉：叛变了？

---

② 现在，过了二十七年，已经出现了有关这些事的第一部诚实的著作（П·Г·格里戈连科《致“苏共党史问题”杂志的信》，1968年，《私下出版物》），往后它们还会增多——见证人总没有都死掉——很快谁都非把斯大林的政府称作发疯和叛变的政府不可。

③ 主要战争罪犯之一，前工农红军侦察局长高里科夫上将这时期领导着诱引和吞食被遣返战俘的工作。

——可耻！——勾掉！是呀！还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亲就已经把他们注销了：他把装备着一八六六年制造的独子步枪（而且还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识界的精华投进了维亚兹玛的绞肉机*（有哪个列夫·托尔斯泰能向我们展示这个波罗丁诺的场面呢？）。而伟大的战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图上抽笨地移动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为了制造一条动人的新年新闻，就把十二万我们的小伙子——几乎是投入波罗丁诺战役的全部俄国军队——运过了刻赤海峡，不经战斗全部奉送给德国人。

不知为什么成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们多么易于受先入为主的称呼的影响，我们多么轻易地同意了把这些忠诚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布蒂尔卡的一个监室里关着一个叫列别捷夫的老头，冶金工作者，拥有教授的称号，但看外表倒象上一世纪甚至上上世纪捷米多夫工厂的强壮工匠。宽肩膀、宽脑门，长着一把普加乔夫式的大胡子，而那张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钢水包。在监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内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讲究清洁，当他没有坐下读书，脸上没有显出他惯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时候，可能被人以为是一个狱中的杂役。人们经常聚在他身边，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恶犬："拚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挥动大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五十八条第1分条一乙——都是祖国的叛徒，不能原谅他们。而周围的板铺上却挤满着"第1分条一乙"，唉，小伙子们心里多么委

* 指莫斯科城郊的保卫战。——译者注

屈呀！老头子是代表农民的和劳动的俄罗斯坚信不疑地郑重声明的——面对这一方面的责难，小伙子们难于并耻于为自己辩护。为他们辩护并和老头子评理的责任落到我以及两个“第十分条”的小家伙身上。但是千篇一律的国家谎言已经使人们的头脑昏乱到什么程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亲身体尝过的那一部分真理。④

俄国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还不如少些好……），——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我们听到过有许多叛徒吗？是不是发现过叛变是俄国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东西呢？现在，在世界上最正义的制度下发生了一场最正义的战争，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几百万叛徒。这怎样理解呢？怎样解释呢？

与我们并肩作战反对希特勒的，有一个资本主义的英国，马克思对那里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曾做过雄辩的描述。为什么这场战争中他们那里只出了一个叛徒——商业家“豪豪勋爵”？而我们这里却有几百万呢？

说这话连张口都觉得害怕，也许问题毕竟在于国家制度？

我们有一则很老的谚语就曾为俘虏辩护：“被俘有音讯，阵亡永无声”。在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皇帝的时候，为了褒奖忍受俘虏生活还授给过贵族称号！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换回自

---

④ 关于这种情形，维特科夫斯基有比较概括的叙述（关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甫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甫们应该消灭。一个坐牢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合适。侦查的教训和牢房的教训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己的俘虏，抚慰他们，温暖他们，始终是社会的一项任务。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一直进行着救济我国俘虏的募捐，我们的女护士们被准许进入德国去照看我国的俘虏，每一号报纸都提醒读者们，他们的同胞正在恶劣的俘虏营中受苦。所有西方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都这样做：邮包、书信、各种形式的资助通过中立国家不受阻挠地源源送去。西方的战俘没有低三下四从德国的锅中要饭吃，他们带着瞧不起的神气同德国警卫谈话。西方政府对本国的被俘军人，都是照算军龄，照例晋升，甚至照发薪金。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凡，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凡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青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话又说回来，这样说是天真的：因为这事。各时代的政府决不是道德家。他们把人关起来和处死人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关人和处死人是为了不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把所有这些被俘人员关起来，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因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审判。把所有

这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使他们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忆欧洲。没有看到，就不会妄想……）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虽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躯疆场，那就现在死掉吧，将来就不会受到审判了。

战士长眠。有话已说完

从此永远不受责难。

你那已绝望了的脑子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将导致你与法律发生冲突。

逃回祖国——穿过集中营的封锁圈，越过半个德国，然后经过波兰或巴尔干。这个举动会把你带到**死灭尔施**，带上被告席：别人都逃不出来，你怎么逃出来的？有问题！说吧，毒蛇，让你带了什么任务来的（米哈伊尔·布尔纳采夫、帕威尔·邦达林科及其他许许多多人）。⑤

---

⑤ 在我国的评论中有一种确定的看法，认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个人的遭遇》中说出了关于“我们生活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实”，“揭开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看法。这篇总的说来很无力的短篇小说，描写战争的篇幅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看来作者不了解最近这次战争），对德国人的描写标准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写得成功，但她纯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基督教徒），——在这篇关于一个战俘的命运的小说中**真正的俘虏问题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

1.选择了一个最无可指谪的被俘情况——失去知觉，使它成为“无可非议”的，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如果象大多数人所遭遇的那样，在有知觉的状况下当了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2.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对此肖洛霍夫只字未提），正是这样才造成没有出路的处境——而说成是那里我

逃往西方国家游击队那里，投奔抵抗运动的部队，这只能略微推迟的受军事法庭严厉惩办的时间，而且还会使你成为更大的危险人物：在和欧洲人自由相处的日子里，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胆量越狱，而且继续作战，说明你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国就是一个加倍危险的人物。

在集中营靠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来？成为营警、管理人员、德国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对此不会惩罚得比参加抵抗运动部队严厉些（可以猜到为什么：这种人危险性小些！）但无法解释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法律，禁止我们所有人，除了败类，走这条道路。

扣除了这四个力不胜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还留下了第五个：等待招募人员，等待着被什么地方叫去。

有时幸运地碰到农业区的代表前来为该区的农民招募雇工；商行派人来给自己选用工程师和工人。根据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这种场合也应当不承认你是工程师，隐瞒你是熟练工人。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电气技师，只有留在战俘营里挖土、受罪、在脏水坑里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爱国的纯洁性。这样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骄傲地抬着头去接受因纯洁地背叛祖国而获得的十

们的人中间出了叛徒（如果这算是主要的，那就请刨刨根，并说明一下，这个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叛徒是从哪里来的？）。

3.牵强附会地虚构了侦探幻想小说式的从战俘营逃跑的情节，以便不发生回来的俘虏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的一套接收手续：**死灭尔施——甄别审查营**。索科洛夫不仅没有按照条令被关进铁丝网里去，而且——简直是笑话——他还从上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是说，得到去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的任务的自由？那样的话，上校也会镣铐叮当地上那里去的！）。

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笼口*。现在你为敌人做了工作，况且是做了专业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国的罪行，你就得低着头去领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

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细活，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维埃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象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里的蝙蝠、煮吃过旧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伙房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土修筑未来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希维（hiwi）——Hilfswillige——德国国防军志愿助战队（在每个德国连里有12名希维）。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伪警，去追捕游击队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将遭到祖国的屏弃）。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毙。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训练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

---

* 指剥夺政治权利。——译者注

没有从自己的被抛弃遭遇中作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善良的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精神抖擞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请说说看，**按人之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怎能不这样呢？**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的或弗拉基米尔的口音。他们兴冲冲地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象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象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说来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五十八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十万朝鲜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去。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旅馆旁边放慢过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金门”）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对铁路线、对公路桥梁、对工厂烟囱瞧的时间过久——也被指控有间谍行为。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儿首先被指控有间谍行为。⑥对拉脱维亚的

⑥ 铁托好不容易才逃脱了这种命运。而波波夫和塔涅夫，莱比锡审判事件时季米特洛夫的战友，都得了刑期。对季米特洛夫本人，斯大林准备了另一种命运。

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卡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宁可错杀九百九十九，决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探机关手里呆过的俄国士兵呢?！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募的间谍时，国家安全部的刽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适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任何招募；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象电气工程师尼古拉·安德烈维奇·谢苗诺夫和费多尔·费多洛维奇·卡尔波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打火机，靠此增加点食物。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波夫是在布蒂尔卡，那时他们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笼口。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谢苗诺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一九四二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侦查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队）——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得到刑期。请看，这就是我们的尼密吉达* 的镜子。

---

* 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谁要破坏神所建立的制度，就由她来惩处。——译者注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象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援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化上一年、两年——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巡迴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判决书上盖戳。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象仍保持着

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年，就会把他们按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⑦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日常生活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

---

⑦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1917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1918到41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2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1953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 • •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尔洛夫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高高的草丛里。传单上宣布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建立了一个什么斯摩稜斯克“俄国委员会”——它又象是，又不象是要成为俄国政府之类的东西。看来，德国人自己也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这份口气含糊的通告看起来象是纯粹虚构。传单上有一张弗拉索夫将军的相片，有他的生平介绍。在模糊的相片上，脸看上去保养得很好，有福气、象所有我们的新型将军们一样（后来有人对我说，并非如此，弗拉索夫的外表更象一个西方的将军——又高、又瘦，带着角制框眼镜）。至于他的福气似乎在他的生平介绍中得到了证实：他当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污点。他

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震荡，是由于上级指挥的无能，使他的第二突击军陷入重围，并听任他们在那里饿死。但一般说对这个生平传记中的哪些话可以相信呢？⑧

瞧着这张相片不可能相信，在你面前是一个杰出的人，或者

---

⑧ 现在能弄清楚的是，因发生革命而未能在尼热戈罗德市宗教中学毕业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1919年应征参加红军，当普通战士。在南方战场对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作战时，他升为排长，后升为连长。在二十年代他毕业于“射击”训练班；从1930年起成为联共（布）党员，1936年，当时已经是团长，被派到中国去当军事顾问。看来他同军队和党的高级人士没有什么瓜葛，自然成为斯大林的“第二梯队”的一员，这些人被提上来顶替被宰掉的军长—师长—旅长。从1938年起他得到了一个师，1940年在第一次授予“新的”(旧的)军事职称时成了少将。从以后的经历中可以判断，在许多完全没有头脑、没有经验的新提拔的将军们当中，弗拉索夫属于最有才能的。他从1940年夏天起就着手训练做了战斗准备的第九十九步兵师，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相反，在我们全线东撤时，它却向西挺进，夺回了彼列梅舍尔，坚守了六天。弗拉索夫中将很快跨过了军长这一级，1941年在基辅城下已经担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指挥员。他从基辅大包围圈中突围出来，1941年12月在莫斯科附近指挥第二十集团军，这支部队为保卫首都而进行的胜利反攻（攻克松涅赤诺果尔斯克），在12月12日情报局的战报中得到了表扬（将军名单的排列是这样的：朱可夫、列留申科、库兹涅佐夫、弗拉索夫、罗科索夫斯基、戈沃罗夫……）。由于这几个月一切都如风驰电掣，他很快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麦列茨科夫）的副司令，接受了第二突击集团军，并率领它于1942年1月7日开始了为列宁格勒解围的战斗行动——渡过伏尔霍夫河向西北方向进攻。按照设想，这是一个几方面配合的协同战役，包括从列宁格勒方面，第五十四、第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也应在预定日期参加这次战役。但是这三个集团军或者是由于没有准备好而未及时出动，或者很快就停了下来（我们还不会计划这样复杂的行动，主要是供应）。——第二突击集团军进展顺利，1942年2月初已经深入

他早就是一个忧国之士。至于那些宣告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显然是德国的气味，甚至对它宣布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倒是粗俗地夸耀什么他们那边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德军纵深七十五公里！但是从这个时刻起，斯大林的最高冒险统帅部甚至对这支部队也拿不出人力和弹药给予支援，（只有这点后备力量就发动了攻势！）。列宁格勒不了解诺夫戈罗德方向的详细情况，也只好在围困中继续僵持。在3月，冬季的道路尚可通行，从4月起，第二突击集团军推进时所通过的整个沼泽地带就变成一片泥泞，供应线全部断绝，也没有空投支援。军队处于**断粮**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仍不准许**弗拉索夫**撤退**！在军队经受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以后（那里出来的士兵后来在布蒂尔卡监室中告诉我说，他们从倒毙腐烂了的马身上把马蹄刨成屑末煮了吃），5月14日德军开始对被围军队的集中攻势（空中当然只有德国飞机！）。只是在这时候（拿人开心）才接到准许撤回伏尔霍夫河东岸的命令……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无望的突围尝试！——直到7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集团军就这样（好似重蹈了那个也是同样被昏头昏脑地扔进大包围圈中的俄国萨姆松诺夫第二集团军的覆辙）复灭了。

这里当然发生了对祖国的背叛！这里当然有残酷自私的叛变行为！但这是斯大林的背叛。叛变——不一定是为金钱而卖身。战争准备上的无知与疏忽大意，战争开始时的惊惶失措与懦怯，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元帅服，而毫无意义地拿许多军和集团军去做牺牲——对于最高统帅说来还有什么比之更沉重的叛变?

与萨姆松诺夫不同的是，弗拉索夫没有自杀。全军覆没后，他还在森林和沼泽地东奔西窜，7月6日才在西维尔区就俘。他被转送到辽岑（东普鲁士）附近的德国大本营，那里已经集中了几个被俘的将军和一个旅政委Г·Н·日林科夫（过去是个一帆风顺的党的工作者，莫斯科的一个区委书记）。他们已经声明不同意斯大林政府的政策。但还缺一个真正的人物。弗拉索夫就成了这样的人物。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⑨

真的是有俄国人打我们，而且他们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

---

⑨ 真的，差不多直到战争结束，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什么“俄国解放军”。这个名称和袖徽都是一个在东方宣传部工作的俄裔德国人施特里克-施特里克菲尔德大尉制造出来的（他官不大，却有影响，他竭力说服希特勒的上层必须建立德俄联盟，而对俄国人则竭力吸引他们同德国人合作。双方都是徒劳的举动！双方寻求的都是利用和欺骗对方。但在这件事上德国人的阵地是在高山上，他们有权，而弗拉索夫的军官们只有峡谷底下的幻想）。不存在这样一支军队，但从战争最初几个月起由不久以前的苏联公民编成的反苏部队就开始建立了。立陶宛人最初起来支持德国人（在一年之内我们把他们搞得太惨了！）；然后建立了乌克兰人的加里西亚SS志愿师；然后是爱沙尼亚支队；1941年秋天在白俄罗斯出现了警备连，而在克里米亚——则有鞑靼营（凡此种种都是我们自己撒下的种子！在克里米亚——是由于我们二十年来愚蠢地迫害清真寺，把它们封闭和破坏所造成的后果，而有远见的征服者叶卡德琳娜女皇却曾拨给官费去修建和扩大克里米亚的清真寺。希特勒分子来了以后也采取了保护清真寺的精明策略）。稍后，在德国方面又出现了高加索支队和哥萨克部队（超过一个骑兵军）。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就开始把俄国志愿兵编成一些排和连，但德国的指挥部很不相信这些俄国人编成的队伍，司务长和尉官都安排了德国人（只有军士才能是俄国人），还规定了德语口令（“achtung！”〔注意！〕，“halt！”〔站住！〕等等）。完全由俄国人编成的比较大的部队有：驻在勃良斯克省洛克特的一个旅——1941年11月建立（当地机械制造教师К·П·伏斯科鲍依尼科夫创立了一个“俄国国家劳动党”，发表了告国民宣言，制定了带有格奥尔基胜利者徽志的国旗）；从1942年初驻在奥尔沙附近奥辛托尔福镇上的一支由俄国流亡分子领导的队伍（只有一小股俄国流亡分子来参加了这个运动，而且就是这一小股也公开显示反德情绪，听任发生了多起逃到苏联方面的事件，甚至有整营投诚的，在此以后，流亡分子被德国人召回去了）；还有从1942年夏天起在卢布林附近编成的吉尔的队伍（В·В·吉尔，联共（布）党员，甚至好象是个犹太人，不仅在俘虏营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其他俘虏支持下成了苏瓦尔卡俘虏营的俘虏头，他建议德国人建立“俄国民族主义者战斗同盟”）。然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俄国解放军”和任何弗拉索夫。某些连在德国人指挥下作为试验被拉到俄国前线，而一些俄国人编成的大部队则被调去对付勃良斯克、奥尔沙和波兰的游击队。

凶，这点，我们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奥勒尔附近有一个穿德军制服的俄国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们打得那么不要命，好象这新村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我们往里面扔了一颗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里面还有一个坑，可以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他是在多么难以想象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气浪的冲击和无希望的处境下继续进行战斗的。

例如，他们还防守过图尔斯克以南打不掉的德聂伯河登陆点，在那里为争夺几百米的地面进行了两星期毫无结果的战斗，战斗是凶恶的，严寒也同样凶恶（四三年十二月）。在这场讨厌的连续多日的冬季战斗中，我方和他们都穿着遮住军大衣和帽子的伪装罩衣。我听说在小科兹洛维赤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两个人在松林中跃进时迷失了方向，并排匍匐下来，他们已经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么人、什么方向射击着。两个人的自动步枪都是苏式的。两人共用子弹，互相打气，因为自动步枪润滑油开始冻结而一起骂娘。最后，他们决定抽根烟，把白斗篷从头上拉下来——这时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鹰和红星。马上跳了起来！自动步枪已经不能射击！抓起来当棍子使，开始互相追赶：这已经与政治无关，与俄罗斯母亲无关，而只不过是洞穴时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怜悯了他，他就会把我杀死。

在东普鲁士，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象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闪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压了。被压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宁愿象士兵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他们不能有别的打法。打起仗

来没有给他们留下稍许爱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单纯地”当俘虏我们这里就已经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祖国行为，那对于拿起了敌人武器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宣传机构的板斧对这些人的行为用下述原因来解释：1.叛变的天性（生物学上的？在血液里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讲不通！怯懦的人寻找的是宽容、照顾。而他们去参加隶属国防军的“弗拉索夫”队伍，只能是出于铤而走险，出于超过限度的绝望，出于对苏维埃制度的难消的仇恨，出于对个人安危的轻蔑。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必希望得到一丝一毫的宽恕！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们嘴里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就要被枪毙。这次战争一般地向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扫（就是说抢劫）波勃鲁依斯克大包围圈的战场时，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坏和翻倒的德国汽车中间，走在撒落一地的贵重战利品中间——一些大车和汽车陷在路旁的洼地里，德国的比曲格马在那里失神地踯躅，战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烟，我突然从那里听到呼救的号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这是一个穿着德国军裤，光着上身，脸上、胸上、肩上、背上鲜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纯粹的俄语向我叫喊，请求保护——一个中士特科人员骑在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马身的逼近驱赶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不让他回过身来，不让他求助。边赶边打，在皮肤上引起一条条新的鲜红的伤痕。

这不是布匿战争*，不是希腊波斯战争**！地球上任何一个军队的任何一个有权的军官都有义务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个军队——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军队呢？……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

---

* 公元前三——二世纪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 指公元前五世纪的战争。——译者注

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这样，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员面前保护一个弗拉索夫分子，**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装作没有听见似地走了过去**——免得我自己沾惹上这个公认的瘟疫（说不定这个弗拉索夫分子是个超级坏蛋……？说不定这个特科人员会对我有想法……？说不定……？）其实了解我军当时情况的人看这件事更简单，——一个特科人员还会听一个陆军大尉的话？

于是，面孔象野兽似的特别科人员象对待牲口一样继续抽打和驱赶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眼前。这几乎就是群岛的象征，可以把它印在书的封面上。

所有这些，他们早已预感到，早已预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国制服的左袖口缝上了带着白蓝红三色镶边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俄国解放军的缩写——译者注）三个字母的盾徽。⑩占

---

⑩ 这几个字母越来越闻名，虽然依旧没有这么一个军，部队分散在各地，各有不同隶属关系，弗拉索夫的将军们在柏林近郊的达列姆多夫玩朴烈费兰斯牌。原来在伏斯科鲍依尼科夫手下的、他死后是卡明斯基手下的那个旅，到1942年年中拥有5个步兵团，每团有2500——3000人、配属若干炮班，还有由两打苏制坦克组成的坦克营和拥有三十门大炮的炮兵营（指挥人员由被俘的军官充任，士兵大多是勃良斯克本地的志愿兵）。这个旅担负的任务是保护该区不受游击队的侵扰……为同样目的，吉尔-勃拉日维奇的旅也于1942年夏天从波兰（在那里它以残酷对待波兰人和犹太人而著称）调到莫吉廖夫附近。1943年初，它的指挥部拒绝服从弗拉索夫，责难他宣布的纲领中没有写入“同世界犹太主义和犹太政委作斗争”，而正是这个旅（“罗吉昂诺夫分子”，吉尔已改名为罗吉昂诺夫）于1943年8月当希特勒的败局已定的时候，把自己的带有银色骷髅头的黑旗换成了红旗，并在白俄罗斯的东北角宣布成立一个幅员广大的“游击边区”和苏维埃政权（关于这个游

领区的居民因他们是德国的雇佣军而蔑视他们，德国人则因他们的俄国血统而蔑视他们。他们的可怜的小报纸是经过德国检查机关的斧子加了工的：大德意志加元首。因此弗拉索夫分子只能拚死拚活地去打仗，而在空闲的时候便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酒。**命中注定**——这就是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和他乡异国的全部存在，任何出路都没有。

希特勒及其周围的人已经到处在退却，已经处于灭亡前夕，但仍不能克服对俄国人独立建制所抱的顽固的不信任，不敢组成

击边区，我们当时开始在报纸上作报导，而不说明它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把所有幸存的罗吉昂诺夫分子都关进监狱)。德国人当即调谁去对付“罗吉昂诺夫分子”呢?调去了卡明斯基的旅!(1944年5月——还派了自己的13个师去消灭“游击边区”)德国人就是这样理解所有这些三色徽、格奥尔基胜利者和安德烈底色。俄语和德语是相互不能翻译、不能表达、不能对应的。更坏的是，在1944年10月，德国人把卡明斯基的旅派去(与穆斯林部队一起)镇压起义的华沙。

当一边的俄国人背叛性地在维斯拉河那边打瞌睡，从望远镜里瞧着华沙的毁灭时，另一边的俄国人正在扼杀起义。波兰人在19世纪吃俄国人的苦头还太少——还要用20世纪的弯刀子往同样的地方扎下去(已经结束了吗？是最后一次吗？)——被调到普斯科夫附近的奥辛托尔福营的经历好象是比较直线的。那里共有600名士兵和200名军官，指挥人员——是流亡分子(И·К·萨哈罗夫，拉姆斯多甫)，俄式的制服，白蓝红三色旗帜。该营扩充为一个团的兵力以后，曾准备用降落伞空投到沃洛格达-阿尔罕格尔斯克一线，打算利用那些地方的劳改营老窝。整个1943年，伊戈尔·萨哈罗夫坚持不让派他的部队去打游击队。他因而被撤职，全营被解除了武装并关进集中营，后来被派往西方战场。德国人丢掉了、忘记了最初的意图，这时也无需再去想它，于1943年秋天采取了把俄国炮灰派到大西洋壁障去对付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决定。弗拉索夫分子中那些还抱着某种政治打算或希望的人——现在彻底绝望了。

完整的俄国师，不敢让一个独立的、不服从于他们的俄国的影子出现。只是在最后覆灭的崩裂声中，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才允许（在布拉格）演出一场为时已晚的戏：召开联合所有民族集团的“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发布宣言（照旧是个四不象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宣言中也不允许把俄国想象为在德国之外、在纳粹主义之外的实体）。弗拉索夫成了委员会的主席。只是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才开始形成真正弗拉索夫的一些师。⑪想必是，英明的德国政治家们推测，在这个关头，俄国工人（给德国人干活的俄国人）势必纷纷拿起武器。红军已经打到了维斯拉河和多瑙河……但真象是故意开玩笑，象是为了证实最无远见的德国人的远见，这些弗拉索夫的师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独立行动是对……德国人实行了一次打击！在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和军司令部联系，弗拉索夫在四月底以前把自己的两个半师集结在布拉格郊区。这里得到消息说，党卫军施坦涅尔将军准备毁灭捷克的首都，不愿把它完整地放弃。于是弗拉索夫便指挥自己的两个师投入起义的捷克人方面。在这三年残酷的、糊里糊涂的岁月里，不自由的俄国人胸中积聚起来的对德国人的全部怨气、深仇和愤恨，现在全发泄在对德国人的攻击中了：从出乎意料的方向把他们赶出了布拉格。（是否所有的捷克人后来都弄清楚了是什么样的俄国人拯救了他们的城市？我们的历史是被歪曲了的，说布拉格是苏联军队救出来的，虽然他们不可能来得及）。

然后，弗拉索夫的军队便开始朝美军方向、向巴伐利亚撤退：他们的全部希望只寄托在盟军身上——他们对盟军会有用处，那时他们长期吊在德国绞索上的生活将变得有意义。但是美

⑪ 第1师（在“卡明斯基旅”的基础上）——师长C·K·布涅钦科，第2师——师长兹维列夫（前哈尔科夫城防司令员），半个第3师，第4师的萌芽，以及一个马尔采夫率领的空军支队。整个建制不许超过4个师。

军象一堵墙一样把他们迎头顶住，强迫他们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规定向苏军投降。在同年五月，邱吉尔在奥地利也采取了忠于盟友义务的步骤（出于通常的谦虚，我们没有加以公布）：他把四万人的哥萨克兵团也引渡给苏联指挥部，[12]外加许多辎重——不愿回到故乡哥萨克河畔的老人、小孩和妇女。（这位其纪念像日后将

---

⑫ 这次引渡本身就具有英国传统外交精神的阴险性质。事情的经过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外去，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投降。因此，英国人首先以统一武器为借口，建议哥萨克们交出武器。然后把军官单独叫到英占区的尤登堡，似乎是去开会协商军队的命运问题——但在开会前夜，英国人秘密地把这个城市让给了苏联军队。四十辆大轿车装满从连长到克拉斯诺夫将军本人的军官们，越过高架桥，直接开到"乌鸦车"的半包围圈中，押解队已经带着名单站在旁边。而脱身的道路已经被苏联的坦克阻断。连开枪或用刀自杀也办不到——一切武器都给收走了。有一些人便从高架桥上跳下去碰死在人行道的石头上。——后来英国人用同样的欺骗方式把士兵装上火车引渡给苏方（假意说是送他们到自己的指挥官那里去领取武器）。

罗斯福和邱吉尔在自己国家里被当作英明的国家领袖的典范而受到尊敬。但是，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他们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41年一直拖到45年，他们怎么竟能使东欧的独立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把萨克森和图林格的广大地区交出去来换取四方占领柏林这个滑稽可笑的玩偶（这里成了他们自己的致命弱点）？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他们有什么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理由呢？据说他们是以此来换取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诺言。手中已经掌握着原子弹，他们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求他不要拒绝去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的地位，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难道这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拉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利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燃起熊熊烈火后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中间记性最好的人也没有想起譬如这件对待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遍布英国的大人物还下令把这些人也交出去送死。）

除了仓促建立的弗拉索夫的几个师以外，还有不少俄国人的分队穿着无特殊标志的德军制服继续在德军内部混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区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我被捕前几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击。被我军围在东普鲁士大包围圈中的也有俄国人。在一月底的一个夜里，他们的一支部队，不做炮火准备，不声不响地通过我们的防地向西突围。当时没有连续的防线，他们很快插入纵深，对我的一个凸出在前沿的听音炮兵连实行夹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从最后留下的一条路拉出来。但后来我又回去抢救打坏了的汽车，在黎明前看到，他们穿着伪装服在雪地里集结，突然一跃而起，喊着“乌啦”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营（火炮的口径为152毫米)的火力阵地猛扑过去，向十二门重炮扔出手榴弹，不让它们发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后一小股人在他们的曳光弹追逐下，在积雪的野地里一口气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萨格河桥头。他们在那里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现在，在胜利大检阅前夕，我们一起坐在布蒂尔卡的板舖上，我抽完他们的半截烟，他们抽完我的半截烟，我还跟他们之中的什么人两人一起往外抬过六提桶容量的洋铁马桶。

许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时的间谍”一样，都是年青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脚乱的卢那察尔斯基用普希金的名义急于表示欢迎的“生疏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大多数是被偶然性的浪头带进新编的军队，正如邻旁集中营里的他们的同伴偶然当上了间谍一样——这就看招募人员是从哪里派来的。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

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玩物。

但是命运对他们开了一个更残酷的玩笑，他们成了更悲惨的卒子。那些见识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德国人只允许他们为自己的第三帝国而死，却不让他们考虑独立的俄国的命运。

而盟军则远在千里之外——而且还不知他们是怎样的盟友呢？……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象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青人⑬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

---

⑬ 苏联公民在德国武装力量中——在弗拉索夫以前和弗拉索夫的新编部队中，在哥萨克的、穆斯林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和乌克兰的部队和队伍中共计正是那么多。

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象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一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 * *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象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脈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瘾和可卡因瘾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曼尼诺夫、夏里亚平、贝奴阿、嘉吉列夫、巴甫洛娃，有热洛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包科夫-西林，布宁还活着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侨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即生

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潘涅维茨的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青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象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

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象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十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卖的B·B·舒尔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维恩。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青的流亡分子。

我同鲍尔施骑兵大尉和马利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滚蛋吧！垮台吧！"）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利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鲍尔施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1、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14]。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

[14] 大概任何一个非洲总统都不能保险。说不定过十年以后我们将颁布一项法律，并且以它为根据对他今天的行为进行审判。中国人要是能拖到那时候，也会颁布的。

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利尤什金对过去的事情总算还记得清楚，关于从诺沃罗西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形还能说得出来。但鲍尔施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囔着说，他怎样在卢宾卡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粮，把另一半留下来，逐渐用新鲜的倒换发硬的。就这样为了开斋他积蓄了七份口粮，于是复活节他就大吃了三天。

我不知道他们两人在国内战争中是怎样的白卫军人，是不经审判就在每十名工人中吊死一名和鞭笞农民的那些极个别的人物，或者不是这样的人，而是象大多数士兵那样的人。至于今天在这里侦查和审判他们——这并不是证据也不是理由。从那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他们过的不是光荣的退休者而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的生活，这一事实大概也不能作为审判他们的道义上的理由吧。我们怎么也学不会安纳托里·法朗士所掌握的那种辩证法。照法朗士说来，昨天的受难者，今天，从他穿上大红衬衣的头一分钟起，就已经是非正义的。反之亦然。而我们革命时代的人物传记是这样写法的：当我还是一只刚成熟的马驹时被人骑过一年，那我一生就要被称为一匹马，尽管我早已干着马车夫的活儿。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雅谢维奇上校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无策的木乃伊。对于他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显然并没有结束。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在何处和如何进行——他没有讲给我们听。但是好象在监室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概念混乱，视线模糊而歪曲，而他对周围事物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点，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壮健、弹性、活力。他的

年纪已在六十以上，脑袋完全秃了，不剩下一根头发，他熬过了侦查（象我们大家一样正等待着判决），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却保持着年青的、甚至红润的皮肤，在全监室中只他一个人做早操，在水龙头下冲冷水（我们大家则舍不得浪费监狱配给口粮提供的热量）。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他就抓紧时间——在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来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青的眼光好象透过墙壁望着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雅谢维奇的一些年青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雅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于是他的小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白卫分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

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自觉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悬在他们头上。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更为甜密。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非预决派”。他们宣称，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　　*　　*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蒂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在监室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盛行关于阿尔泰的传说。极少数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过的人，把同监难友引入一场美梦：阿尔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又有温和的气候。小麦堆满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岭，羊群、野物、鱼虾。人烟茂盛的富裕的农村……⑮

啊，往这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吧！听听雄鸡在清新空气中的清脆响亮的歌声！抚摸抚摸善良严肃的马脸！一切伟大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让别的什么人，傻一点的人去为你们伤脑筋吧。躲开侦查员的骂娘和对你全部生活的厌人的盘诘，躲开监狱门锁的响声，躲开监室里令人窒息的闷热，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们却作孽地把它塞到别人的机枪下面去，或者带着它，带着这纯洁无瑕的生命钻到政治的肮脏垃圾堆里去。那里，在阿尔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边上最低

---

⑮ 囚犯们关于阿尔泰的憧憬——是否是旧时农民对它的憧憬的继续？在阿尔泰曾经有过所谓中书省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它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移民在长时间内是比较不开放的。——但农民们最向往的正是上那里去（并且不断地向那里移居）这种持久的传说是否由此而来的呢？

矮最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是为了捡树枝，不是为了摘蘑菇，而是随便往森林里走走，搂住两根树干：我的亲爱的！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这对我们的全部历史是如此，而且还将长久如此。

我们中间少数头脑清醒的人说什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从未对政治犯实行过大赦——而且永远不会，我们听不进去这类丧气话。一个熟知监牢掌故的坐探还跳出来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监狱都空了，在上面挂起了白旗！"这种监狱上挂白旗的惊人景象——为什么是白旗？——特别使人动心。⑯我们没有理会我们中间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释：正是

⑯ 《从监狱到教育机关》文集（第396页）提供这样一个数字：在1927年的大赦中赦免了7.3%的犯人。这是可以相信的。对十周年纪念来说稍嫌单薄一点。政治犯中释放了携带子女的妇女以及只剩下了几个月刑期的人。例如，在上乌拉尔的隔离所里，二百名在押犯中释放了一打。即使这样可怜的大赦，实行中又后悔了，于是采取抵销的办法：有的不放，有的不是"彻底"释放，而是带着"减号"（即剥夺在某些城市的居住权——译者注）。

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几百万人才去蹲在这里——前线再也不需要我们，对于后方，我们是危险分子，而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没有我们连一块砖也放不上去（我们心里还有个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领会斯大林的纵然不是恶毒的，至少也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打算！现在有谁在复员以后还愿意抛弃家庭、房子，到那还没有道路，还没有房屋的科雷马去，到沃尔库塔去，到西伯利亚去？这已经几乎是国家计委的一项任务：给内务部下达抓人的控制数字）。大赦！我们等待和渴望着的宽大、广泛的大赦！据说，在英国甚至在加冕周年纪念都有大赦，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得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⑰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

---

⑰ 如果相信一些说法的话，也许只是在二十世纪，他们的停滞的饱暖生活才导致了道德上的胃灼热。

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得到了巩固的皇位才能粉碎十二月党人（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俄日战争、对德战争*——都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和革命。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迹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

*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⑱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发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青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

---

⑱ 这些小子们只弄错了一竖!关于1945年7月7日伟大的斯大林大赦的详细情形,请看本书第三部第6章。

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象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19]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象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一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唧唧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20]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

⑲ 过了许多年后，我已经作为一个参观者，在彼得保罗监狱的特鲁别茨五角棱堡里还看到过类似的一个小花园，只是更小些，然而却更隐秘。参观者们感叹走廊和监室的阴暗，我则想，特鲁别茨五角棱堡的囚徒们有这样一个放风的小花园，就不应叫苦了。我们是被带进一个毫无生气的石砌口袋里去放风的。

⑳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特别庭。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象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象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

第 七 章

在 机 器 间

在布蒂尔卡"车站"旁边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来的犯人，面积相当宽敞，足够五、六名看守一次处理二十个犯人）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着，只是在旁边，在一盏小电灯下，有一个衣着整洁的黑头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旁边。耐心忍受的无聊——就是他脸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这样把犯人一个个地带进带出是白白浪费时间。凑齐犯人的签字本来有快得多的办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对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问了问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两面，各放着一叠只占半张打字纸的一式一样的文书，——和房管所发的燃料证或机关开的购买办公用品介绍信同样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叠，找到了与我有关的那张文书。他把纸抽了出来，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给我的是八年），马上就在背面用自来水笔写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读。

我的心没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经过太平常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判决书——我一生的决定性的转折？我想要激动一下，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时刻——但怎么也办不到。而少校已经把那张文书反面朝上向我推过来。一根插着劣质笔尖、带着从墨水瓶里挂出来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学生用沾水钢笔已经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应当自己读一下。”

“难道我会骗你吗？”少校懒洋洋地反对说。“好吧，拿去读吧。”

这才勉强地松开拿着文书的手。我把它翻了过来，故意慢慢地、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细看起来。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摘　　录

自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1]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庭决议，第……号

以下各行都用虚线打了着重点，并用垂直点线把以下内容隔成两半：

听审了：	决　定
对某某人（姓名、出生年、出生地）的起诉	对某某人（姓名）因进行反苏鼓动并企图建立反苏组织判定8（八）年劳动改造营监禁。

副本核对无误　　书记员……

难道我就应当这样简简单单地签上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会不会向我说点什么，会不会作些说明？不，他没有这种打算。他已经向站在门口的看守点头示意准备带下一个。

为了使这个时刻哪怕稍有一点重要色彩，我悲剧性地问他：

“但这是多么可怕！八年！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这些话听起来是虚假的：无论我无论他都

---

① 正是在大赦日开庭，可见工作不容延缓。

没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这里。"少校再一次指给我在什么地方签名。

我签了名。因为我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那就请允许我在您这里写份申诉吧。因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按规定程序办。"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面就把我的那张文书放在左面的一叠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走了。

（看来，我脑子太慢。格奥尔吉·登诺得到的诚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不等于无期吗！先前宣判无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众人。你们这里倒好，象领肥皂一样——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拿起笔来在背面写上："坚决抗议恐怖主义的非法判决，要求立即释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着他写，读了以后勃然大怒，把这张判决摘录撕个粉碎。没有关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副本。

薇拉·科尔涅耶娃一直预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书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来，赶紧签了字，生怕被收回。军官有点疑惑："你明白了我给你念的什么吗？""明白，明白，非常感谢，五年劳动改造营！"

对匈牙利人罗札什·亚诺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语宣读的，并且没有翻译。他签了名，却不明白这就是判决，过后好长时间一直等待开庭审判，最后在劳改营里模糊地想起这件事来，才猜到了。）

我面带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感到愉快和轻松。大家回来都带着"十元券"，瓦连金也是。我们今天这伙人中，那个发了神经的会计（他直到现在还不

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园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七月的微风中，窗外的那根树枝仍在愉快地晃动。我们热闹地闲聊着。隔离室各个角落愈来愈多地爆发出笑声。我们笑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当；笑那个惊魂不定的会计；笑我们早上抱的希望；笑监室里怎样送别我们，怎样约定在送牢饭时做暗号——四个土豆！两个环形小面包！

某些人断定说：“大赦是会有的！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吓唬一下，让我们记得牢些。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过……”

“记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这时叫我们拿起东西，排成双行，再次把我们带过这个充满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园。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这使我们哄堂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象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年青，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工作——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　　*　　*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象统治者和臣民都开始养成对社会的类似法律观的东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罗连科还观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审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两个大学生一起，不经审判和侦查而依国家财产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别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经审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罗连科给我们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有费多尔·包格丹——一个上告到沙皇的农民请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扬科夫，他经法院宣告无罪但奉谕令被流放；还有其他几个人。扎苏里奇从国外侨居地写来的一封信里解释说，她不是逃避法院审判，而是逃避不经审判的行政制裁。

这样，传统象一条虚线似的在延续着，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着的而不是向前跃进的亚洲国家。再者，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现象：谁是特别庭呢？一会儿是沙皇，一会儿是总督，一会儿又是副大臣。还有，对不起，如果连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一列举的话，它的气魄还实在太小。

气魄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具备的，那时为了经常地绕过法庭建立了各级常设的三人小组。起初甚至骄傲地加以标榜——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审理人员的名字不仅不隐瞒，而且还大肆宣扬！在索洛维茨谁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组——格列勃·波

基、伍里和瓦西里耶夫？！何况ТРОЙКА又是个多么响亮的字眼*！在这个字眼里，马车轭下的小铃铛响声隐约可闻，谢肉节**纵情疾驰的景象依稀可见，同时又夹杂着一种神秘感：为什么叫“三人小组”？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组成的呀！但三人小组却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们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到过，只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文书：签字吧。实际上三人小组比革命法庭还可怕。而且后来它还与世隔离了，裹得紧紧的，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姓名也瞒起来。于是，我们就习惯于认为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不吃、不喝、不在人们中间走动的。他们一旦进入了评议室——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只是经过打字员给我们送来判决（而且——阅后退回：这样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头的）。

这些三人小组（为牢靠起见，我们用的是多数，好象讲到群神众仙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绝对需要：一旦抓进去就不能放出来（它类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检验科：不许出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而且实在没有法子审判他，那就叫他通过三人小组得到自己的“减三十二”（省会）***或者流放两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经被剪光了，他已经永远打上了记号，从今以后就是“累犯”了。

（请读者原谅，我们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用了“罪”的概念、什么有罪、无罪之类。不是向我们解释过了吗，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会危险性；如果是社会异己分子，无罪也可关进监牢，如果是社会亲近分子，有罪也可释

---

* 俄语中ТРОЙКА一词既可作三人小组解，又可作三套马车解。——译者注

** 大斋前的一星期。——译者注

*** 即剥夺在三十二个省会居住的权利。——译者注

放。但是，如果我们二十五年来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充分”、“依行为轻重程度量刑的资产阶级态度”而受到了批判。）② 那末，我们这些法律的门外汉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不是我们能去撰写这个机关的引人入胜的历史：三人小组怎样变为特别庭；什么时候改的名称；各省城里是否有特别庭——或者只有白石城*里这一个；我们那些衮衮诸公中谁参加过这个组织；是否经常开庭，开多长时间；供应不供应茶水，有什么喝茶时吃的点心；这种评议本身怎样进行——评议时进行交谈还是根本不用交谈？这不是我们所能撰写——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风闻过，特别庭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虽然现在说不出它那些勤恳的审理人员的姓名，却知道那里派有常任代表的三个机关：一名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名是国家安全部的代表，一名是检察署的代表。然而，如果将来的哪一天我们忽然得知，根本没有开过什么庭，只有一批善于从不存在的笔录中编造摘录的有经验的打字员，和一名领导打字员的办公室主任，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打字员——这是确确实实有的，这点我们可以担保！

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三人小组有权判三年以内徒刑；从一九二四年起扩展到五年劳改营监禁；从一九三七年起特别庭可以颁给“十元券”；从一九四八年起卓有成效地发行过“二十五元券”。有一些知情人（察夫达罗夫）说，在战争年代特别庭还判过枪决。没有什么不平常的。

特别庭无论在宪法上、无论在法典里都没有提到，然而却是一台最方便的绞肉机——它没有己见、要求不高，而且不需添加

---

② 参看《从监狱到教育机关》文集。

* 指莫斯科。——译者注

法律的润滑油。法典是一回事，特别庭是另一回事，它很容易运转，而不需要法典的全部二百零五个条文，不使用它们，也不提及它们。

正如劳改营里开玩笑说的：无法〔庭〕无法，有〔特别〕庭就行。

当然，为了方便起见，它也需要有某种输入密码，因此它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很便于应用的（不必伤脑筋去适应法典提法）而在数目上连小娃娃也记得住的大写字母条文（其中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АСА——反苏宣传

——КРД——反革命活动

——КРТД——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

加上了“Т”（托）这个小小的字母犯人在劳改营中的日子难过百倍。

——ПШ——间谍嫌疑（超出嫌疑范围的间谍行为移交给军事法庭处理）

——СВПШ——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КРМ——反革命思想

——ВАС——怀有反苏情绪

——СОЭ——社会危险分子

——СВЭ——社会有害分子

——ПД——犯罪性活动（对于过去的劳改犯，如果再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他们很喜欢给他们扣上这一条）

最后，还有一个容量很大的条文

——ЧС——家属（依上述大写字母中任何一条被判刑的人的家属）

不要忘记，这些大写字母代表的罪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种人物，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是同法典条文和法令项目所规定

的犯罪一样，象流行病似的一阵阵突然发作的。

还要附带声明：特别庭根本不认为自己有权给人判决！——它给的不是判决！——它科以行政处分，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处分虽然不认为自己具备司法判决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达二十五年，并包括：

——剥夺称号和奖励；

——没收全部财产；

——秘密监禁；

——剥夺通讯权。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决定使一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

办案迅速也是特别庭的一大优点：它只受打字技术的限制。

最后，特别庭不仅不需要亲眼看到被告本人（从而减轻了监狱之间运输的负担），甚至也不要求看到被告的照片。在监狱人满之患的时期，它还能提供一条方便，那就是，一终结侦查，犯人就不再占用监狱的一块地面，不再吃白给的面包，而是立即送往劳改营去诚实劳动。他可以很晚以后再读到摘录的副本。

在优待的情况下，有时这样办，犯人在目的地车站下车；叫他们马上跪在路基旁边（这是防止逃跑，结果成了向特别庭祷告），当即向他们宣读判决。也有另外的做法：在一九三八年，一批递解到别列波尔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文，也不知道刑期，而前来接收他们的文书却已经知道了，并且当即在名单中找到：СВЭ（社会有害分子）——五年（这是紧急需要输送许多人去修建“莫斯科”运河的时期）。

另一些人在劳改营已经劳动了许多个月，却还不知道判决。在此以后（据И·多勃里亚克所述）让他们隆重地列队——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日子，而是在悬挂起红旗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宣读了斯大林省三人小组的判决（特别庭在忙不过来的时期毕竟还是分散了）：每人各得十年到二十年。我的劳改营小队长辛涅勃留霍夫就在那个一九三八年随着一整列车的未决犯从切利亚宾斯克被送往契列波维茨。几个月过去了，犯人已经在那里工作。突然，在冬天的一个休息日（请注意利用哪些日子！看出特别庭的好处了吗？）在酷寒中把他们赶到院子里，排好队，走出一个外地来的中尉，自我介绍说，是被派来向他们宣读特别庭的决定的。他这个年青人倒并不狠毒，斜眼瞧了瞧他们的开口鞋子，瞧了瞧冰柱上的阳光说：

“其实，伙计们，干吗你们要在这里挨冻呢？你们知道，特别庭给你们大家的都是十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给八年。明白了吗？解散！……”

• • •

但是，有了特别庭的这种露骨的机器处理——还要法院干吗？已经有了使你无法跳下来的不发噪声的现代电车，还要铁轨马车干吗？是为了养活审判人员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法院有点不成体统而已。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纲领中写道：力求做到使全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行使审判员的职责。“人人参加”没有做到，当审判员是个细活儿，可是完全不要法院也不行啊！

其实，我们的政治法庭——各省法院的专门庭、军事法庭（说实话，在和平时期为什么还要军事法庭？），以及所有的最高法院——都一致地在向特别庭看齐，它们也没有受到公开诉讼

程序和两造辩论之类的麻烦事的拖累。

它们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点是不公开审理。它们为了自己方便，首先是不公开的。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不公开的庭上被判刑，我们已经那么安于这种情况，以至有的被判刑人的糊涂儿子、兄弟或侄子还自以为满有道理地对你嗤之以鼻："照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案情一定有关……会让敌人知道！绝不能……"

因为怕让"敌人知道"，我们就把自己的头夹在自己的两腿中间。现时在我们祖国，除了书蛀虫以外，有谁记得，那个向沙皇开过枪的卡拉科佐夫，还被给予了一名辩护人？对日里亚波夫和所有的民意党人都是公开审判的，一点也不怕"土耳其人知道"？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射击了那个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莫斯科内务局长的人（虽然子弹从头旁飞了过去没有射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在刑讯室里，不仅没有不公开地加以审判，而是由陪审员（不是三人小组）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判无罪**——而她便坐上轿式马车凯旋而归了。

我并不想用这些比较来说明，俄国某时曾经有过完善的法院。大概，当之无愧的法院应是最成熟的社会最晚期的产物，或者至少需要有一个所罗门皇帝出来。弗拉基米尔·达里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国，"未曾有过一则称赞法院的谚语"！这多少说明点问题吧！好象，称赞地方行政长官的谚语也一个都没有来得及形成。但是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毕竟至少使我们社会的城市部分走上了通向赫尔岑那么赞赏的英国典范的道路。

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未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陪审法院的责难（《作家日记》）：滥用律师的雄辩术（"陪审员先生们！一个女人如果不杀死自己的情敌，那还算个什么女人？……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中间谁不会把婴儿扔到窗外去呢？……"），

陪审员一时的冲动可以压倒公民的责任。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上远远跑在我们生活前面去了，他所担心的**不是那种**他应当担心的东西。他认为公开的审判是已经永远争取到手的东西！……（是呀，他的同代人中谁能相信会有特别庭呢？……）在另一个地方他也写道："与其错杀人，宁可错放人。"啊，说得对，说得对！

滥用雄辩术不仅是正在形成中的法院的一种弊病，而且还要更广泛些——它是已经确立的民主制（已经确立，但还没有弄清自己的道义目标）的一种弊病。仍是英国给我们提供例子：反对派的首领为了使自己党占上风，可以毫不难为情地把言过其实的国内不良状况归咎于政府。

滥用雄辩术——这是坏事。但对于滥用不公开审理又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法院，在那里，检察官应当说出为了替被告进行**辩护**所需要说的一切。这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世纪呢？暂时，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着数不清的这样一类律师，他们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控诉**（"作为一个正直的苏联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在分析这些罪恶行为时不能不感到厌恶……"）。

在不公开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长袍，还可以把袖子卷起来。工作起来多么轻松呀！——没有麦克风，没有记者，也没有听众（不，为什么没有，有是有的，但那是**侦查员们**）。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们白天去听审案，看看他们的**侦**查对象的表现，然后在夜里到监狱里去拜访那些应当**教训一下**的人。[3]

我们的政治法院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

---

③ 契恩集团。

是说它的判决是预先决定的④。就是说，你永远知道领导上需要你做什么，（须知还装着电话呀！）有时甚至照特别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个斯特拉霍维奇在审判庭上惊叫起来："我怎么能被伊格纳托夫斯基收买呀，那时我才刚满十岁！"——那时审判长（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声："不准诽谤苏联的侦察机关！"一切早都决定好了：整个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统统枪决。只是有一个和这个集团沾一点边的李波夫：集团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他也谁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给李波夫十年算了。

预先决定判决——它使审判员的艰难生活变得多么轻松呀！甚至与其说是脑子的轻松——不用思考，不如说是道义上的轻松：它使你解除了担心在判决上出错而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孤儿的苦恼。甚至象乌尔里赫那样穷凶极恶的审判员——哪一项大规模枪决的判决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也使他变温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军事审判庭审理"爱沙尼亚分立主义者"的案件。当审判长的是矮小结实、和和气气的乌尔里赫。他不仅不放过与同事开玩笑的机会，而且不放过同犯人开玩笑的机会（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点。哪里见过？）。他得知苏济是个律师，便微笑着对他说："瞧，你的职业对您有用了！"是呀，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论的？干吗要发火？审判依照

④ 还是那本《从监狱到……》文集硬塞给我们的资料：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1924至1929年，法院的判决就已受着统一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的调节。从1924年起，由于国内存在失业现象，法院减少了居家劳改的判决数量，而增加了短期监禁的判决（指的当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发生了监狱挤满短期服刑犯（6个月以下的）和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情形。1929年初，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以第6号通令指责了判处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9年11月6日的决定干脆禁止判处一年以下的刑期！

令人惬意的程序进行：坐在审判员席上可以抽烟，有愉快的时间——美好的午间休息。到傍晚——该去评议了。谁在夜里评议呀？让犯人们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来上班，一个个神清气爽，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午九时正："起立，现在开庭！"——犯人各得一张"十元券"。

如果有人责备说，特别庭至少不虚伪，而这里却假仁假义——装样子在评议，——不，我们将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最后，第三个特点——是辩证法（从前粗俗的说法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法典不应当是审判员路上固定不变的石头。法典的条文都已经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迅速流逝的生命，并且，正如浮士德所说：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一切都在飞奔向前，而我却不敢违背诺言？"

所有的条文都附生了一大堆的解释、指示、细则。如果被告的行为不在法典范围之内，那还可以采用下述办法判刑：

——类推（多方便！）

——干脆根据出身（刑法典第七、三十五条，属于社会危险阶层）⑤

——因同危险人物有联系⑥（天网恢恢！什么样的人是危险人物以及有什么联系

——这只有审判员明白）。

---

⑤ 在南非共和国，最近几年恐怖统治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对每个有嫌疑的（"社会危险分子"）黑人可以不经侦查和审判就拘捕三个月！……马上就看出了弱点：为什么不是从三年到十年呢？

⑥ 这点我们不知道。这是1957年7月份的《消息报》告诉我们的。

对于颁布的各项法律，用不着在明确性上去挑毛病。例如，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颁布了一项关于恢复死刑的法令（恐怕它从来也没有在贝利亚的地下室里废除过）。写着：可以对破坏和暗害分子处以死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这样做：不把话说清楚，只做暗示。这里是否只指那些用梯恩梯去破坏铁轨的？没有写明。什么叫"暗害分子"我们早就知道：谁生产了劣质产品——谁就是暗害分子。那末，谁是破坏分子呢？譬如说，如果在电车上谈话破坏了政府的威信，算不算？或者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难道这不是破坏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吗？……

实际上不是审判员在判案——审判员只领工资，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枪决。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剥夺权利五年（三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力）。⑦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⑧

毫无例外。一个人一旦被捕，在国家安全机关门口被割掉钮扣，他的一切权利从此就被剥夺了，刑期是逃不了的。法律工作者们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情况，以至在一九五八年闹了个大笑话：在报纸上发表了新的《苏联刑事诉讼纲要》草案，却忘了在里面写进关于可能做出无罪判决的内容。政府报纸⑨温和地责备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我们的法院只能作出有罪判决。"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

---

⑦ 正如巴巴耶夫（虽然是个日常生活犯）对他们叫嚷的："给我戴上三百年的笼口也可以，戴吧！到死也不会举起手来投你们的票，恩人们！"

⑧ 因此，真正的间谍（舒尔茨，柏林，1948年）可能得到10年，而那个从来没有当过间谍的根特·瓦施考却得到25年。因为他赶上了浪头，1949年。

⑨ 参看1958年9月10日《消息报》。

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秘密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这里讲一件简单而典型的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一九四一年，在我们驻扎于蒙古的无事可为的军队里，契卡行动处需要表现出一点积极性和警惕性。正和帕维尔·丘尔佩涅夫中尉争风吃醋的军医洛佐夫斯基摸准了这个气候。他私下向丘尔佩涅夫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我们在德国人面前退却？（丘尔佩涅夫：他们的技术装备多，而且动员得早。洛佐夫斯基：不，这是一种策略，我们是诱敌深入。）2.你相信盟国的援助吗？（丘尔佩涅夫：相信他们会援助，但不是无私的。洛佐夫斯基：他们将欺骗我们，一点也不会援助。）3.为什么派了伏罗希洛夫去指挥西北前线？

丘尔佩涅夫回答了也就忘掉了。而洛佐夫斯基却写了个小报告。丘尔佩涅夫被叫到师政治部，开除出共青团；罪名是抱有失败情绪，吹捧德国技术装备，贬低我国指挥部的战略。发言最激昂慷慨的是团小组长卡里亚金（丘尔佩涅夫见过他在哈勒欣战斗中的胆小鬼表现，他现在有了方便机会一劳永逸地收拾掉见证人）。

逮捕。只同洛佐夫斯基作了唯一的一次当面对质。侦查员没有盘问他们上次的谈话。只提出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证人，你可以走了（侦查员怕控告被驳倒）。⑩

在地坑里蹲了一个月弄得精神沮丧的丘尔佩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师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审。出庭的有师政委列别捷夫、政

⑩ 洛佐夫斯基现在是医学副博士，住在莫斯科，他一切都很顺利。丘尔佩涅夫现在是无轨电车司机。

治部主任斯列萨列夫。甚至没有传证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为了办好伪证手续，审判以后将会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谢廖金的签名）。法庭提的问题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吗？他问了你什么？你是怎样回答的？丘尔佩涅夫老实地作了报告，他还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来："可是许多人也都在议论呀！"法庭反应很快："是谁？说出姓名来。"但丘尔佩涅夫不是他们那一路货！让他作最后陈述。"我请求法庭再一次考验我的爱国感情，给我一项赴死的任务！"淳朴的勇士还说："让我，还有那个诽谤我的人，两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这种骑士式的作风正是我们的责任。洛佐夫斯基应当发药面，谢廖金应当教育战士。[11]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难道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在坚决捍卫。审判员们退庭，抽了抽烟后重新入席：十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战争期间这样的案子在每个师里何止十起（否则供养军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师——请读者算一算。

……军事法庭一次次的开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厌烦。一个个橡皮手套似地无个性无感情的审判员使人厌烦。判决都是从传送带里输出来的。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当军事法庭工作紧张的时候，"评议"只占一分钟——出去

---

⑪ 谢廖金·维克多·安德烈维契现在住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市苏维埃所属生活服务联合公司工作。日子过得很好。

又进来。当军事法庭一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从评议室的门里可以看见白色的桌布，放满食品的桌子，盛着水果的高脚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欢"利用心理学"去宣读判决："……判处极刑！……"停顿。审判员直望着被判刑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但是，考虑到……真心悔悟……"

军事法庭候审室的所有墙壁上都用钉子和铅笔划满这类字样："得了枪决"、"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这类题词：它能起教训作用。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察夫达罗夫讲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们突然推翻了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这又怎样呢？如果为了交换眼色也算发生了一点停顿，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检察长不说明理由就要求休庭。侦查员们带着打手从侦查监狱飞奔而来。把被告分散到各个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顿，还许下诺言在第二次休庭时再打个彻底。休庭结束了。审判员把所有的被告再询问了一遍——现在大家都招认了。

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现了出色的随机应变本领。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的

*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政治家，善辞令。——译者注

前一刻，他通过警卫声言愿意作一些补充供述。这当然是令人发生兴趣的。检察长接见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开衣服，让他看被侦查员用凳子打断的已经在腐烂的锁骨，并声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讯下逼出来的。"检察长只好诅咒自己贪求"补充"供述，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总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这样，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检察长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过去。军事审判庭开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军事法庭这次可真地去评议了！现在它只能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那就是说，应当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释放。因此……它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若无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监狱，稍稍给他治疗了一下，羁留了三个月。来了个新的侦查员，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签发了一个新的逮捕证（如果军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这三个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遥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个侦查员提过的问题。卡列特尼科夫预感到自由即将来临，表现得很坚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结果怎样呢？……根据特别庭的决定他得到了八年。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一个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别庭能做些什么。捷尔查文是这样写的：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恶听尊命。"

但最高法院军事庭上是很少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而且一般说来，它很少擦擦自己的迷糊眼睛去瞧一下单个的“锡囚犯”*。电气工程师A·Д·P在一九三七年由两名押解员架着跑步拖上四楼（电梯大概是开着的，但囚犯上下得那么频繁，如果让他们用，工作人员就上不了楼）。他们和迎面下楼的已判犯互相错开，一路跑进了审判厅。军事庭忙得实在不可开交，连坐也没坐下，三个人一齐站在那里。P艰难地喘过一口气（要知道他已经被长久的侦查弄得精疲力尽），报了自己的姓氏、本名与父名。审判员们咕噜了几句，互相使了个眼色，于是乌尔里赫——老是他！——便宣告：“二十年！”又马上跑步把P押走，跑步拖进了下一个。

真象做梦一样，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也沿着同一座楼梯走上楼去，但却是在一名上校党小组长的彬彬有礼的陪同下。在周围有一排圆柱的，据说是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开会的大厅里，放着一张巨大的马蹄形长桌，马蹄形的中间还放着一张圆桌和七把古老的椅子，在这里，曾审判过卡列特尼科夫和P以及其他各色人物的军事庭的七十名工作人员听我讲话。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作为一个起初被判劳改后来被永久流放的人，却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一个审判员。现在我看到了你们大家聚集在一堂！”（他们也以擦亮了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犯人。）

但是，原来他们并不是过去的那些审判员！是的。他们现在说，他们不是那些人。他们向我保证，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一些光荣退休了，有的被撤职了（乌尔里赫这个出类拔萃的刽子手

---

* 意指在审判员眼中囚犯并非活人。可能出自安徒生童话中的“锡小兵”。——译者注

原来在斯大林时期的一九五〇年就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了），某些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在赫鲁晓夫时期甚至受到了审判，而他们还从受审席上威胁说："今天你审判我们，明天我们要审判你，瞧着吧！"但是，象赫鲁晓夫所有的创举一样，这个开头很起劲的运动不久就被他忘掉了，抛弃了，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程度，那就是说，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有几个司法战线的老兵说了点往事，无意中给我提供了写这一章的资料（如果他们自己动手公布内情，写回忆文章，情况会怎样呢？但岁月流逝，又过了五个年头，并没有变得光明一些）。他们回忆，审判员们在司法会议的讲坛上如何自吹自擂，介绍他们是怎样避免了适用刑法典中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第五十一条，从而做到用二十五年代替十年的判决！他们还回想起，法院怎样屈辱地从属于"机关"！有一个审判员受理送交法院的一个案子：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公民诽谤性地断言那里有良好的公路。除此没有别的事。案卷里也再没有别的材料！审判员鼓起勇气把案件退回，要求补充侦查，目的是取得"有充分价值的反苏材料"——就是说对这个犯人再用点刑，再打一顿。但是审判员的这个高贵目的没有得到理解，他得到了一个充满愤怒的答复："你不信任我们的机关？"——于是审判员被贬谪到萨哈林岛去当军事法庭的书记员（赫鲁晓夫时期处理得轻些，"犯了错误的"审判员被派去……你们猜派到哪里去？……当律师）⑫检察机关也一样俯首听命于机关。一九四二年留明在北海反间谍机关中滥用职权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泄露了出去，检察机关不敢行使自己的职权加以干预，而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阿巴库莫夫报告说他的孩子

---

⑫ （1964年6月9日《消息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司法辩护的看法！……而在1918年，对于那些作出过轻判决的审判员，弗·伊·列宁曾要求开除出党。

们在淘气。阿巴库莫夫完全有理由认为机关是大地之盐！（正是这次他把留明调回来提拔的，结果给自己招来一颗丧门星。）

可惜时间不够，他们本来可以给我讲十倍之多的东西。但已经讲的这些，也足以深思了。如果法院和检察机关只不过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小卒子——那也许并不需要专辟一章来论述它们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我一边望着他们，一边觉得惊奇：是呀，他们是人呀！完全是人呀！瞧，他们在微笑！瞧，他们真诚地表明心迹说他们如何地只想着做好事。好吧，如果再来一次反复，他们又必须来审判我——就在这个大厅里审判我（给我看的是主要的大厅），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又有什么，还是会审判的。

什么在先呢？——是鸡还是鸡蛋？是人还是制度？

我国有一则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谚语：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经超过了人，人在残酷性上落后了。应当把这则谚语倒过来：不怕法官——只怕法律。

当然是阿巴库莫夫的法律。

瞧，他们一个个走上讲坛，讨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瞧，他们高兴地说，这本书减轻了他们良心上的负担（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承认，我所描写的情景还是大大冲淡了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条件更恶劣的劳改营（那么说，他们经管过？……）。坐在马蹄形桌旁的七十个人中，有几个发言的人原来是熟悉文学的，甚至是《新世界》杂志的读者，他们渴望进行改革，活跃地抨击我们社会的症结，谈论农村的荒废景象。

我坐着，想着，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象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象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第　八　章

襁褓中的法律

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千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儿——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青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按当时的想法，它们是在为一种无所畏惧的法制闯开一道路子。它们的详

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会由什么人去写，我们自量没有能力把它列入我们的研究。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当时有一个正式术语，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为当时还没有法院，而是因为存在着契卡。① 因为这样做效果更好些。法院也存在着，也在进行审判，也在判处死刑，但是应当记住，与它们平行地并且脱离它们而独立地，还在进行着非司法制裁。怎样设想这种制裁的规模呢？ M·拉齐斯在他的一本对契卡活动的通俗介绍中，② 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时间内（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罗斯中部二十个省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数字远不是完全的，③ 部分地也许是出于谦虚）：被契卡枪决的（即不经审判，越过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④ 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四百一十二个（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有史以

---

① 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曾受到托洛茨基的卵翼："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到自己末日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地说过："ГПУ（国家政治保卫局）这几个字母，正如ВЧК（全俄肃反委员会）这几个字母一样，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② 见M·H·拉齐斯（苏德拉勃斯）著：《内部战线的两年斗争》，国家出版社1920年莫斯科版。

③ 同上，第74页。

④ 同上，第75页。

来一贯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为政和精神颓丧，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总共逮捕八万七千人⑤（这个数字令人觉得有点缩小）。

为了进行评价，可以拿什么来比较一下呢？在一九〇七年，一群左派活动家出版了一本《反对死刑》的论文集，⑥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〇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开列了一个名单。⑦编者附带声明，它不是最后定稿，这个名单也是不完全的（但总不会比拉齐斯在国内战争时期汇编的资料更残缺不全）。它统计了一千三百九十七个人名，其中应当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没有缉捕归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这个八十年的数字同拉齐斯的一年半的而且还不是所有省份的数字是没法比较的。诚然，文集的编者同时引用了一个推测性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料，仅在一九〇六年一年内被判死刑的——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许并没有处决），而从一千八百二十六年算起总共为三千四百一十九人。这正是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反动的猖獗时期，关于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数字⑧：六个月内执行了九百五十起死刑（它们是由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判处的）。听起来是可怕的，但对于我们过硬了的神经来说，它也不会引起紧张：把我们的数字换算成半年，还是要比它多出两倍——而且这还是二十个省份的，而且这还是不经法院的，不经审判的。

各种法院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就单独进行活动。不管怎么不得空闲，还是在一九一九年为它们颁布了《苏俄刑法指导原

⑤ 拉齐斯，第76页。

⑥ 盖尔涅特编，第2版。

⑦ 第385—423页。

⑧ 《往事》杂志，第2/14期，1907年2月。

则》（我们没有读到这些原则，我们没有弄到这份东西，只知道那里有一条“不定期剥夺自由”的规定，就是说一直关到有特别命令为止）。

法院有三种：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革命法庭。

人民法院审理日常生活上的案件和刑事案件。它们不能判处枪决。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前，在司法领域还背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遗产：人民法院，说来可笑，不能判处两年以上的刑期。只是由于政府的特别干涉，个别一些轻得不可容许的判决才提高到二十年。⑨从一九一八年七月起，给了人民法院判五年的权利。当一切战争风暴平息下来的时候，一九二二年人民法院获得了判处十年的权利而失掉了判处少于六个月的权利。

地方法院和革命法庭一贯有权枪决犯人，但是在一个短期内曾经失去过这种权利：地方法院在一九二〇年，革命法庭在一九二一年。这里有许多小的曲折，只有细密地研究那些年代的历史学家才能够详加考据。

这个历史学家也许会找到当时的文件，把革命法庭判决的案卷给我们摊开，还能摆出统计资料。（不过未必能做到。没有被时间和事件毁掉的，也被有利害关系的人们毁掉了。）我们只知道，革命法庭并没有在打瞌睡，审判搞得热火朝天。在国内战争中每拿下一个城市，作为庆祝的标志不仅有契卡大院里的阵阵枪烟，还有革命法庭的通宵不眠的开庭。当时要吃一颗它的子弹，不一定非是白军军官、枢密官、地主、僧侣、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可。只要长着一双白白嫩嫩的没有老茧的手，在那些年代就完全可以被判枪决。但是，可以猜想到，在伊热夫斯克或沃特金斯克，在雅罗斯拉夫尔或穆罗姆，在科兹洛夫或唐波夫等地发生的暴乱使粗糙的手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轻。

---

⑨ 参看本书第三部第1章。

如果有一天非司法制裁和革命法庭判决的案卷竟能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必将是普通农民的数字。因为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发生的农民骚乱和暴动是无数的，尽管它们并没有反映在《国内战争史》的彩色插页上，没有人给那些手拿粗棍、干草叉和斧头冲向机枪，然后被绑起双手——十条命顶一条——排成横队站在刑场上的暴动群众照相或拍电影。萨波日科夫暴动只在萨波日科夫有人记得，彼杰林暴动只在彼杰林有人记得。我们从拉齐斯的这篇关于当时一年半期间内的二十个省份的综合介绍里，也看到被镇压下去的暴动的数字——共三百四十四起。⑩（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把农民暴动称为"富农暴动"，因为农民怎能起来暴动反对工农政权！但怎能解释，每次起来暴动的并不是村中的三两家，而是整个村子？为什么贫农群众不是用同样的干草叉和斧头去杀死起来暴动的"富农"，而是同他们一起冲向机枪呢？拉齐斯说："富农用许愿、诽谤和威胁等手段强迫其余农民参加这些暴动"。⑪但是，有什么比贫农委员会的口号许的愿更多呢！有什么比特务队⑫的机枪的威胁更大呢！

还有多少完全偶然的人被牵扯进这个磨盘中去，消灭这些完全偶然的人——这构成任何一次开枪的革命实质的不可避免的一半。

以下就是一个目击者讲述的梁赞革命法庭一九一九年审理托尔斯泰主义者 И·叶-夫一案开庭的情况。

参加红军的总动员令发布以后（"打倒战争！把刺刀插进地里！各回各家！"等口号提出后的一年），光是在一个梁赞省里，迄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就有五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逃兵被

---

⑩ 拉齐斯，第75页。

⑪ 同上，第70页。

⑫ 特种任务部队。

抓住并送往前线。”⑬（还有多少就地枪决示众的）叶-夫根本不是逃兵，而是因宗教信仰公开拒绝服兵役。他是被强迫动员去的，但在兵营里他不拿武器，不去操练。部队政委一怒之下把他交给了契卡，附带写了一张条子：“该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审讯。桌后坐着三个人，每人面前放着一支手枪。“你这类英雄我们见过，现在你就会下跪！马上同意去打仗，否则当场毙了你！”但叶-夫是坚定的：他不能去打仗，他是自由基督教的信奉者。他的案子移交革命法庭处理。

开庭审理，大厅里有一百来人。

有客客气气的老律师。有学问的公诉人（“检察长”一词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禁用的）尼科尔斯基，他也是一位老法学家。一个陪审员试图弄清楚受审人的观点（“您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怎么能和贵族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一致？”）革命法庭庭长中途打断询问，不让弄清观点。争吵。

陪审员：“你说你不愿意杀人并且劝阻别人去杀人。但是白军发动了战争，而你却妨碍我们进行防卫。现在我们把你打发到高尔察克那里，你在那里去宣传你的不抵抗主义吧！”

叶-夫：“你们送到哪里，我就上哪里去。”

公诉人：“革命法庭应当管辖的不是任何刑事行为，而只是反革命行为。根据犯罪构成，我要求把本案移交人民法院处理。”

庭长：“哈！行为！真有你的，好个法律专家！我们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我们的革命良心！”

公诉人：“我坚决请你把我的要求写入笔录。”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此案应该在普通法院审理。”

庭长：“真是个老傻瓜！从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的？”

⑬ 拉齐斯，第74页。

辩护人："我当了四十年的律师，第一次听到这种侮辱的话。请写入笔录。"

庭长（哈哈大笑）："写入！写入！"

场内哄笑。退庭评议。从合议庭里传出争执声。最后出庭宣判：枪决！

场内一片愤慨的喧嚷声。

公诉人："我对判决提出抗诉，我将向司法人民委员部上告！"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

庭长："全体退场！！！"

押解人员把叶-夫带到了监狱，对他说："兄弟，如果大家都象你这样，那就好了！什么战争都没了，没有白军，也没有红军！"押解人员回到了自己的兵营里，召集了红军士兵会议。会议谴责了判决。往莫斯科写了抗议书。

叶-夫每天等待死神来临，从窗中亲眼看到枪杀，这样蹲了三十七天。改判决定下来了：十五年严格隔离。

这是颇有教益的一个例子。虽然革命法制也算局部地取得了胜利，但这需要法庭庭长作出多少努力呀！思想还多么混乱，纪律性、觉悟性还多么差劲！公诉与辩护一鼻孔出气，押解人员多管闲事，把决议捅了出去。啊，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的审判机关的形成真是来之不易呀！当然，不是所有的开庭都如此稀松，但这样的开庭也不是一次！又花了多少年头，才使一条合乎需要的路线得到明确、完善和固定，才做到使辩护与检察长和法院步调一致，使受审人同他们三者步调一致，使所有群众性决议同他们全体步调一致啊！

彻底考察这个多年的历程，是史学家的一项高尚任务。而我们在那一片玫瑰色的迷雾中怎样才能摸出头绪？询问谁呀？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也不会讲。无论受审人，无论律

师，无论押解人员，无论旁听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不会允许我们去寻找。

因此，很明显，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公诉。

几位好事者惠赐我们一本没有销毁掉的书，这是激烈的革命家、第一任工农军事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司法人民委员部非常法院司的创始人（还曾给他准备了一个“保民官”的专有职位，但列宁取消了这个名词）⑭、历次重大案件的光荣公诉人、而后来是被揭穿了的凶恶的人民公敌 H·B·克雷连科的公诉词集。⑮如果我们还是想对历次公开审判做一次简略的考察，如果我们还是想去吸一口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司法空气——我们应当读读这本书。别的办法没有。凡是没有提到的，凡是外地的情况，只能靠思想去补足。

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审判的速记记录，听到那些最初的受审人和最初的律师的凄厉悲怆的声音，那时谁也还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一切将依着怎样的铁面无情的顺序，连同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员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连科解释说，“由于若干技术上的考虑”⑯不便发表这些速记记录，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诉词以及那些当时已经同公诉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决书。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档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说是“远非那么井井有序……若干案件的速记记录写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页整页地抹掉，或者凭记忆来恢复原

---

⑭ 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10页。

⑮ H·B·克雷连科著：《五年间（1918——1922）》。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审理的各次最重大案件的公诉词。国家出版社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印数7000册。

⑯ 同上，第4页。

文”。（！）而“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案、海军上将夏斯特内案）审判时根本没有作速记记录”。[17]

奇怪。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区区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起点——向治国的一党制的过渡。而且枪毙了不少人。可是却没有作速记记录。

还有一九一九年的“军事阴谋”，这个阴谋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灭的”[18]，这就更加“证明了它的存在”。[19]（此案总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20]——难道能对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审判吗？）

这样，谁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审判有条有理地讲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2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要全俄中执会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22]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象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

⑰ 同上，第4—5页。

⑱ 同上，第7页。

⑲ 同上，第44页。

⑳ 见拉齐斯：《国内战线斗争的两年》，第46页。

㉑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13页。

㉒ 同上，第14页。

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时是法的创造者（着重点是克雷连科加的）……又是政治的工具"㉓（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出来。"我不要听那种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进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㉔"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规范㉕——不管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使我们付出过多昂贵的代价。"㉖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弄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㉗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庭——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庭——这一般说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它的活动应当"从革命利益的观点出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㉘（各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作

㉓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页。

㉔ 同上，第408页。

㉕ 同上，第22页。着重点系我所加。

㉖ 同上，第505页。

㉗ 同上，第318页。

㉘ 同上，第73页。

者）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㉙“不管〔受审人〕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㉚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受审人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㉛（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㉜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受审人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㉝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合盘托出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许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阅那些旧案了？到处都是坚决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办事的。

只请大家眯缝起眼睛想象出一间还不是金碧辉煌的狭小审判厅，一批身穿俭朴的弗列奇式* 上装、体格消瘦、脸蛋上还没有

㉙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83页

㉚ 同上，第79页。

㉛ 同上，第81页。

㉜ 同上，第524页。

㉝ 同上，第82页。

* 类似我国的中山装。——译者注。

长褶子的热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干部。公诉当局（克雷连科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装敞开着，领子的开口处露出水兵衬衫的一角。

最高公诉人用这样的俄语表达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事实问题！""请把趋向的契机具体化一下！""我们是在作客观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时，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个拉丁文谚语（诚然，从一个案子到另一个案子老用同一个谚语，经过几年再出现另一个谚语）。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两个系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引起别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受审人骂个痛快："职业恶棍！"并且他毫不假仁假义。一个女受审人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以前便威严地对她吆喝："对你，伊凡诺娃女公民，连同您的讥笑，我们会定出价钱，我们会找到办法，做到使您永远也不会再笑！"[34]

那末我们就着手来分析吧？……

1）《俄罗斯新闻》案。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П·В·叶戈洛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做？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洛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管编辑部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唐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交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

[34]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296页。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道报纸敢于抱这种目的吗？！）。

萨文科夫的下面这句话也没有当作报纸的一项罪名："只有疯子罪犯才能认真断言国际无产阶级会支持我们。"——因为它反正还会支持我们的……

因企图影响思想得到的判决是：这份一八六四年创办、熬过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动时期——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还有什么人的——的报纸，从今永远封闭！而编辑者叶戈洛夫……说起来都难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样……得到三个月的单独监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难为情：须知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头儿活下来——那又会给关进去的，而且还会好多次被关进去）。

行贿和受贿在俄罗斯自古已然，在苏联将永世长存，但在这些风雷激荡的年代，也照样亲热地行贿和受贿，实在有点奇怪。向司法机关送礼之风竟然盛极一时。还要战战兢兢地补充一句——礼物也送到了契卡门上。烫金精装的大部头历史对此缄默不语，但老人们，目击者们回忆说，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时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取决于贿赂：毫不拘束地收受贿赂并在受贿后诚实地放人。克雷连科只挑选了五年内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诉了我们两起这样的审判。呜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经过歪门斜道才挤入完美的境地，它们都曾陷进过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的三名侦查员案件（一九一八年四月）

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卖金条的投机商贝利泽。他的妻子，按当时的惯例，开始寻找赎买丈夫的途径，她通过辗转介绍打通了和一个侦查员的关系，这个人又拉进了另外两个。在秘密会晤时，他们向她索取二十五万卢布，经过讨价还价减少到

六万，讲定先付一半，通过格林律师接头。如果那个女的不是在钱上抠门，如果她如数交给格林三万预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妇道人家的慌乱一夜间改变了主意，认为这个律师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师雅库洛夫，那末，一切本来会象几百宗同类交易那样顺顺当当过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案子也不会写进克雷连科的编年史，也不会写进我们的编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桌上）。究竟是谁决定让侦查员们吃吃苦头，书里没讲，但看来就是那个雅库洛夫。

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有趣的是，全部证人，从那个倒霉的妻子起，都竭力作出有利于受审人的陈述，并为他们洗刷罪状。（这在政治案件上是不可能的！）克雷连科这样解释：这是出于庸人的考虑，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革命法庭当做自己的法庭。（我们也斗胆做一个庸人的设想：是不是经过了半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证人们还没有学会害怕？须知要断送革命法庭的侦查员，可得有包天的胆量。以后你会有什么下场……）

公诉人的论据也很有趣。要知道一个月以前受审人还是他的战友、助手，这是一些无限忠于革命利益的人，其中一个叫列斯特的，甚至是“能够对任何侵犯原则的人给予无情打击的严峻的公诉人”——现在该怎么说他们呢？往哪里去找定罪材料呢？（因为纳贿本身还不足以定罪）。很清楚该往哪儿去找：历史！履历！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列斯特，“那就会发现极有趣的材料”。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一个老野心家吗？不是，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儿子！并且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而是一个由于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在二十年内经过了历次反动时期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是克雷连科本人被接受为校外学生也是在反动时期……）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是一个两面派还值得奇怪吗？

波德盖斯基是一个司法官吏的儿子，父亲无疑是个黑帮分

子，不然怎能为沙皇服务了二十年呢？儿子也准备从事司法工作。但是发生了革命——于是就钻进了革命法庭。昨天这还是高尚的，现在却成了丑恶的！

比他们两人更卑鄙的当然是古格里。他过去是个出版商——他曾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了些什么精神食粮呢？——他"供给广大读者质量低劣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资产阶级教授的书（我们很快就将在受审人席上看到这些教授）。

克雷连科既愤慨又奇怪，革命法庭里竟混进了些什么样的人呀？（我们也莫名其妙，工农革命法庭都是由谁组成的呀？为什么无产阶级委托这样一批人去打击自己的敌人呀？）至于曾俨然以"自己人"身份出入于有权随意放人的侦查委员会的格林律师，这是"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吸血虫的那一类人的典型代表者"，这类人中除了所有的律师外，还包括全部宪兵、神甫以及……公证人……㉟

好象，克雷连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要求不考虑"罪责的个人差别"而作出无情的判决——但永远朝气蓬勃的革命法庭这次却有点发蔫、有点发呆，它有气无力地宣布：侦查员们各处六个月的监禁，而律师——罚款（只是利用了全俄中执委的"无限处决权"，克雷连科才在大都会饭店* 争取到了判给侦查员各十年徒刑，吸血虫-律师——五年徒刑附加没收全部财产。克雷连科以高度警惕性而名噪一时，并且差点儿没有得到"保民官"的称号）。

我们意识到，无论在当时的革命群众中，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这个不幸的案子，不能不破坏对革命法庭神圣性的信念。我们现在怀着更加惶恐的心情转入下一个案件，有关更崇高

㉟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500页。

* 当时全俄中执委办公地点。——译者注

的机关的案件。

3)科绥列夫案（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Ф·М·科绥列夫及其伙伴们李伯特、罗登贝格和索洛维约夫以前在东线供应委员会工作（还是和立宪会议军队打仗的时候，在高尔察克以前）。业已查明，他们在那里找到一次获利七万至一百万卢布的生财门路，骑上高头大马东遊西逛，同护士小姐们吃喝玩乐。他们的委员会给自己搞到了房屋、汽车，他们的合伙人在“雅拉”饭店大吃大喝。（我们不习惯把一九一八年设想成这个样子，但革命法庭是这样证明的。）

然而，案情并不在这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因在东线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甚至一切都得到了谅解。但是真奇怪！他们的供应委员会刚一解散，所有他们四个人，还加上一个过去的西伯利亚流浪汉、科绥列夫服刑事苦役时的伙伴纳扎林科，被邀请去组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监督检查委员会！

请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它有权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其余机关的行动是否合法，有权在任何诉讼阶段上调阅任何案卷，撤销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外其余一切机关的决定！！！[36]权力不算小吧！——它是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仅次于主席团的第二掌权者！——是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彼得斯-拉齐斯-明任斯基-雅果达的后一排！

然而这伙小兄弟的生活方式还是以前的一套，他们一点也没有显傲气、摆架子，照样跟那些与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的马克西梅契、廖尼卡、拉法伊尔斯基和马利乌波尔斯基之流混在一起，在私人住宅里、在萨沃依饭店里大搞“豪华的排场……在那里打牌（一注就是上千卢布）喝酒、玩女人”。科绥列夫还给自己置办了昂贵的陈设（价值七万卢布），而且不择手段地从全

---

[36]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507页。

俄肃反委员会里偷走食堂的银匙、银碗（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连普通的玻璃杯也拿。“瞧，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思想方面，而是跑到这种地方去了……，他从革命运动中为自己取得的就是这种东西。”（那位高级契卡人员现在矢口否认曾经收受贿赂，瞪着眼睛撒了个谎，说他在……芝加哥银行里存着二十万卢布的遗产！……看来，他觉得这个情节和世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想象为真事的！）

怎样正确利用自己这种可以随便逮捕和随便释放的超人的权利呢？显然，应当预先选好肚里有黄金鱼子的那种鱼，而在一九一八年网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鱼（因为革命搞得太仓促，未能面面俱到，因此有多少宝石、项链、手镯、戒指、耳环被资产阶级太太们藏起来了）。然后再通过一个假冒名义的人出面同被捕者的亲属接触。审讯过程中，这类人物也出场了。例如二十二岁的乌斯宾斯卡娅，她在彼得堡的中学毕了业，但没有能进入高等学校，这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春天，乌斯宾斯卡娅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自荐充当情报人员。她外表合格，被录用了。

坐探工作（当时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工作事实本身不会玷污他；既然一个人承认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应当去做。”[37] 但是，乌斯宾斯卡娅并没有政治信条！——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应的条件是，每破获一个案子给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还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让说出姓名来的那个人“对半分帐”。克雷连科用自己的话这样表达：“乌斯宾斯卡娅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编内人员，她是做计件工作的。”[38]

---

[37]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513页，着重点系我所加。

[38] 同上，第507页。

不过，公诉人又以人之常情，对她的行为向我们做了如下的解释：她大手大脚花惯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的可怜的五百卢布工资在她眼里算什么，因为一次敲诈（为撤除商店的铅封替一个商人出一把力）就能给她五千卢布，另一次从一个被捕者的妻子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手里得了一万七。顺便提一句，乌斯宾斯卡娅充当普通秘密人员的时间并不久，依靠契卡中大人物的帮助，她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了共产党员和侦查员了。

然而，我们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实质。乌斯宾斯卡娅为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在私人住宅里安排了同科绥列夫的密友戈德留克会晤，以便商定赎买她丈夫的价钱（她向那女人要的价是……六十万卢布！）。但不幸的是，这次秘密的会晤又被律师雅库洛夫——就是那个已经搞垮了几个受贿侦查员并且看来对整个无产阶级司法和非司法诉讼制度抱有阶级仇恨的人，——通过法庭上没有说明的途径得知了。雅库洛夫向莫斯科革命法庭告发了这件事，㊴而革命法庭庭长（是否因为记住了人民委员会在侦查员问题上表现的愤怒？）也犯了一个阶级错误：他本来可以给捷尔任斯基同志通个气，按家庭方式处理一下就算了——谁知道他却在帷幕后面安排了一个速记员。这样一来，戈德留克提到科绥列夫、索洛维约夫及其他委员的那些话，提到全俄肃反委员会里谁捞到几千等等事情，统统被记录下来，戈德留克收下一万二千预付款，交给麦谢尔斯卡娅几张由监察委员会，李伯特和罗登贝格签发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通行证（今后还要在那里继续谈交易），这些情节也全写进了速记记录。于是他就落入了法网，并且因一

㊴ 请读者息怒：这个吸血蛇雅库洛夫在科绥列夫一案开庭前已被看押起来，给他立了一个案。他出庭作证是押解来的，大约可以估计，很快就被枪决了（现在我们还在表示奇怪：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呀？为什么谁也不进行斗争呀？）

时心慌，如实招供了！（而麦谢尔斯卡娅已经到过监察委员会，并且她丈夫的案卷已经调到那里去进行审核。）

但是，对不起！要知道这样揭发问题明明会给肃反委员会的圣洁外衣沾上污点！这个莫斯科革命法庭庭长精神正常吗？他干的是份内的事吗？

我们冠冕堂皇的历史隐瞒了曾一度出现的一个机缘。原来，肃反委员会开始活动的第一年造成的印象，连当时还没有习惯这一套的无产阶级政党都觉得吃不消。总共才一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自己光辉的道路上才迈出了第一步，就已经发生了克雷连科用晦涩的语言写出的那个“法院及其职能与肃反委员会的非司法职能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当时把党和工人划分成了两个阵营”。[40]科绥列夫一案之所以能够产生（而在此以前这类事情都没有出过问题），而且甚至闹成一件全国的大事，完全是这个原故。

必须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索洛维约夫请求革命法庭允许他到塔干卡监狱去和关在那儿的（哎呀，不在卢宾卡）戈德留克——谈谈话。革命法庭拒绝了。那时索洛维约夫便不管什么革命法庭私自潜入了戈德留克的监室。说来也巧：戈德留克正好从此得了重病，一点不错。（克雷连科奉承说：“未必能够说索洛维约夫怀有恶意。”）戈德留克感觉到死期已近，万分悔恨自己不该诬陷契卡，请求给他纸笔，写了一个书面的翻供声明：他对科绥列夫和契卡其他委员的诬陷，一概不是事实！在帷幕后面速记下来的东西也不是事实！[41]

克雷连科坚持问：“是谁给他签发的通行证？”给麦谢尔斯

---

[40]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14页。

[41] 啊，多少题材呀！噢，莎士比亚在哪里呀？索洛维约夫穿墙而入，模糊的监室暗影，戈德留克用渐渐无力的手写翻供——而在戏院里、在电影院里，人家只用“仇恨的旋风”这类街头歌曲向我们描述革命年代。

卡娅的那些通行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不，公诉人“并不想说索洛维约夫与这案子有牵连，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但是他推测，索洛维约夫可能是被目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鸡嘴上还留着鸡毛”的公民派到塔干卡去的。

这时理应传讯李伯特和罗登贝格，他们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没有出庭！就那么简单，没有出庭，规避了。那对不起，麦谢尔斯卡娅总可以传讯吧！真难以想象，连这个朽烂的贵族女人也胆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并且没有力量去强制她出庭！戈德留克翻了供——并且危在旦夕。科绥列夫则什么也不承认！而索洛维约夫是清白无辜的！没有什么人可以审讯……

可是，却有一些什么样的证人自愿来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惊动了的费里克斯·艾德蒙多维奇（即捷尔任斯基——译者注）甚至也亲自来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长脸向着目瞪口呆的法庭，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证言，为清白无辜的科绥列夫辩护，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质、革命品质和办事才干辩护。这些陈述的原文可惜没有引用，但克雷连科转述说：“索洛维约夫和捷尔任斯基都详细描述了科绥列夫的优良品质。”㊷（哎哟，好一个冒失的准尉！〔指克雷连科——译者注〕——过二十年后在卢宾卡会让你记起这个案子的！）很容易猜出捷尔任斯基能讲些什么：科绥列夫是一个钢铁般的契卡人员，对敌人毫不留情；他是个好同志。心是热烈的，头脑是冷静的，手是干净的。

于是从诽谤中伤的垃圾堆里钻出来一个青铜骑士科绥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他的历史也显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经有几次前科——多半是因杀人罪：因（在科斯特罗马市）以斯骗方式、怀着抢劫的目的，闯入老太婆

㊷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522页。

斯米尔诺娃家中，并亲手把她掐死。然后——因谋杀自己的父亲和因杀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证。其余几次科绥列夫是因诈骗吃官司，总的说，服了许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这时，契卡的最高层人物的严厉而公正的声音打断了公诉人的发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因而他们的判决，我们新社会根本不能考虑。但是，出了什么事？胆大妄为的准尉从革命法庭的公诉席上说了一大段这样的思想上错误的话来回敬了他们，甚至我们在这里、在对革命法庭审判的严整论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协调：

"如果说在沙俄的旧法院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的好东西的话，那只有陪审法庭……对于陪审法庭的裁决，我们始终可以信任，那里司法错误最少。"

从克雷连科同志口中听到这种说法特别令人遗憾，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三个月，在审理那个曾经是党领导的宠儿、尽管过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为杜马代表的奸细P·马林诺夫斯基的案件时，"公诉当局"曾站在无可非议的阶级立场上：

"在我们的眼里，每一个犯罪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和沙皇时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种一经沾上便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们知道许多例子，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过去有过这类事实，但我们从来也不由此作出结论，认为必须把这种人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解我们的原则的人不会担心过去有前科会使他遭受被排除于革命队伍之外的威胁……"㊸

你瞧克雷连科同志多么善于按党的原则说话！而这一次，由

㊸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37页。

于他的错误论断，科绥列夫的骑士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至捷尔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说："我一刹那间（只是一刹那！——作者）产生了一个想法，科绥列夫莫非是最近时期围绕肃反委员会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绪的牺牲品？"㊹

克雷连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想而且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使本案的审判成为不是对科绥列夫和乌斯宾斯卡娅的审判，而是对契卡的审判。我不仅不能想这样做，而且我应当全力去反对这样做！""领导着肃反委员会的是最负责任的、最忠诚和久经考验的同志，他们承担起打击敌人的艰巨任务，虽然也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对此，革命应当表示自己的谢意……我着重指出这个方面，是为了关于我……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㊺（会这样说的！……）

瞧最高公诉人是踩在怎样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来他有一些过去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关系，他从那里得知明天的风向。这在几起案件的审判上可以察觉出来，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过一股风——够了！该到约束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时候了！不错，有过这样的机缘，并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里表达得非常好，他说，应当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㊻

到处是辩证法！克雷连科开口也是辩证法："革命法庭负有代替肃反委员会的使命"（代替？？……）不过"……在实现恫吓、恐怖和威胁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决不应小于以前的肃反委员会。"

以前的？……它已经把它埋葬了吗？……对不起，你们——是来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员往哪里去呢？充满危险的日子！你走

㊹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509页。

㊺ 同上，第509－51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㊻ 同上，第511页。

得太快了，你把一个身穿拖到脚后根的长军大衣的人（指契卡人员——译者注）拉到法庭上作证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过，克雷连科同志，你所依据的材料也许不可靠吧？

不错，在那些日子，卢宾卡的房顶上曾经一度乌云遮天。而这本书本来也可能写不成这个样子。但据我推测，钢铁般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译者注）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谈了谈，解释清楚了。于是——天空重新明朗起来。尽管两天以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执委做出一项特别决议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权，——“但为时并不长久”！㊼

由于乌斯宾斯卡娅这个捣蛋家伙在法庭上表现极为恶劣，给我们这次为期一天的审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烦。在受审人席上她还“血口喷人”，把与本案无涉的其他契卡领导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进去了！（原来，她曾经利用他的清白名声来干自己的讹诈勾当；在彼得斯同其他情报员谈话时，她已经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经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请看她在八个月内变成了一条多凶的毒蛇，虽然这八个月她是在契卡人员中间度过的！拿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时克雷连科与契卡人员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在巩固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以前，而达到这一点为时尚远（??难道？）……为了保卫革命……对于女公民乌斯宾斯卡娅除了消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决。”不是枪决，正是说的：消灭！可是这丫头还年纪轻轻的，克雷连科同志！得啦，给她个十年，给她个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时候制度总该巩固了吧？惜哉：“为了社会与革命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而且问题也不能有别的提法。在这种场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会产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说，知道的太多了……

㊼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14页。

科绥列夫也不得不被当作牺牲品。他被枪决了。其他的人将更安稳。

难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读到卢宾卡的旧档案？不会的，会烧掉的。已经烧掉了。

读者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请看

4）**“东正教徒”案**（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绥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受审人如下：А·Д·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48]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总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

[48] 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好，拉斯普金也好——有什么区别？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49]——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受审人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枝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受审人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雷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

[49]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61页。

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清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㊿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士"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翁，[51]命令他（"动作快些！"）交出所

㊿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81页。

[51] 过去的近卫重骑兵军人菲尔古甫，他"后来精神上突然转变，把全部财产舍散给要饭的，自己进了修道院——不过，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把财产舍散了"。但是只要承认了有精神转变的可能性——那末阶级理论还剩下些什么呢？

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⑫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⑬（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士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

---

⑫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

⑬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61页。

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士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〇年特洛伊茨-谢尔吉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兹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54]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

---

[54] 总主教援引了克留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塌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留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塌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日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豸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就是说：让它活着还是不活着？——作者注）……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⑮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竟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其中显然有本案的一部分受审人），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⑯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

⑮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4页。

⑯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48页。

的子弹。”⑰（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在这种感觉下，他提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总是用不信任的、敌意的语言：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⑱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工人的事业——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信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是的-是的，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象在军队里那样，是吗？），并且对它恶语中伤。”⑲

是呀，我们怎能不后悔莫及呢？是呀，我们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

---

⑰ 见《列宁与高尔基》，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63页。

⑱ 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北京中文版，第386页。

⑲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54页。

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〇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二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⑩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丁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显然是：不恢复过去的压制），民族联邦问题（这是已经清楚的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

⑩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8页。

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凡·伊凡内契，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M·M·基施金（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甚至从受审人席上狂妄地辩解说："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B·И·斯吉姆善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H·H·维诺格拉德斯基——关于经济问题。而（伟大的）生物学家И·K·科里佐夫（他在祖国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许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在他的研究所里聚会谈话（H·Д·康德拉节夫也陷了进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终因劳农党案件受到审判）。

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受审人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嚼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

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替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61]

那末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啰？……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象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62]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

---

[61]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17页。

[62] 同上，第39页。

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话又说回来，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也没有战死）

还有这样一些受审人，他们知道情况，但——没有告发（照咱们的说法是“知情不报”）。

下面要说的已经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Л·Н·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另一些受审人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象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63]

我不知道。他们也许是做了自我鞭笞。也许没有。也许已经屈服于但求保存生命的渴望。也许还保持了知识阶层的昔日尊严。我不知道。

---

[63]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8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青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令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第 九 章

法律在壮大

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案件**（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①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

---

①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81页。

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②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〇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杠。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曾格外活跃过一阵。这里是否有最简单的规律性呢？）

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一年年初的

7）奥尔登包格尔工程师自杀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经谁也不记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次审判。说没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经完结的。如果这条生命没有完结，那末这个工程师，还有十来个人与他一起，便会组成中心而出现在“高庭”面前，那

②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82——383页。

时审判就会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现在坐在受审人席上的是一个知名的党务工作者谢捷尔尼科夫，两名工农检查院干部，还有两名工会工作者。

可是，在这一次对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早期先驱者的审判中，有着某种象契诃夫所描写的远方传来的断弦声那样一种令人惆怅的东西。

B·B·奥尔登包格尔在莫斯科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来从本世纪初就成了它的总工程师。他经历了艺术的白银时代、四届国家杜马、三次战争、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来派、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贵族士官生和红军战士、人民委员会、契卡和工农检查院——喝的都是奥尔登包格尔的洁净冰凉的水。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一辈子只有自来水。在一九〇五年，他不放警备队进驻自来水公司——“因为士兵们笨手笨脚可能会把水管或机器弄坏”。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对自己的工人们说，革命已经结束，够了，各就各位，水应当照常供应。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战斗中，他只关心一件事：保全自来水公司。他的从业人员举行罢工来回答布尔什维克政变，邀请他一起参加。他回答说：“从技术方面，我，对不起，不罢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罢工。”他从罢工委员会接受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钱，写了收据，但自己却跑出去寻找管子接头来修理坏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他对一个工人说过这种话：“苏维埃政权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下来了一个新精神，因此克雷连科允许自己对“高庭”稍微说点真话。）“当时不仅专家们这样想——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③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象列宁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监视资产

③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439页，着重点系我所加。

阶级专家们，我们需要有工农检查院这条警犬。

在奥尔登包格尔身边安排了两只这样的警犬（其中一只原是自来水公司的滑头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雇，进了工农检查院，“因为那里待遇好”，后来上升到中央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那里待遇更好”——从那里被派来监督自己的旧上司，一心要对惹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还有工会地方委员会这个工人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也没有睡大觉。共产党员当了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我们这里一切都应该以工人为首，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掌权，——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案所证实，”[4] 还有莫斯科党组织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来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契卡）“当时我们正在建设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是以阶级对立这种健康的感情为出发点的。凡是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都要给他们配搭上一个……政委，否则任何一个负责岗位都不能交给他们。”[5] 各方面一下子都来纠正、支使、教训总工程师，不经他的同意，随便调动技术人员（“拆散了这些生意人的老窝”）。

但是，自来水公司并没有得救。情况没有好转，而是变得更坏——这准是有一个工程师的匪帮暗中捣鬼。更甚于此：奥尔登包格尔由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中间状态的天性，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厉害话，现在却一反常态，胆敢把自来水公司新首长泽纽克（一个“因自己的内在气质”使克雷连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物）的行为称作瞎胡闹。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奥尔登包格尔工程师有意识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阶级专政直接的公开的敌人。”于是请各方面派检查团到自来水公司来——然而各检查团都认为一切没有问

---

④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433页。

⑤ 同上，第434页。

题，水流得也正常。工农监察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送到工农监察院去。奥尔登包格尔干脆是“抱着政治目的想要摧毁、破坏、打烂自来水公司”，但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我们也尽力阻碍他，阻碍他铺张浪费地去修理锅炉或用混凝土水箱来替换木制水箱。工人领袖们开始在自来水公司的大会上公开地说，他们的总工程师是“有组织的技术怠工的灵魂”，号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样没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别使工农监察员和工会工作者的“血统无产阶级心理”感到难受的是——“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给水塔上的大多数工人站在奥尔登包格尔一边，看不到他的怠工。而这时正好赶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选举，工人们推出奥尔登包格尔作自来水公司的候选人，党支部当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的候选人。然而由于总工程师在工人中的虚假威信，党的候选人看来没有当选的希望。但是党支部向区委会，向各级机关送去了一份决议，并在全体大会上宣布：“奥尔登包格尔是怠工的中心和灵魂，在莫斯科市苏维埃里他将是我们的政敌！”工人们则报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声“不对！”“撒谎！”那时党委书记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就面对面地向上千名无产阶级宣布：“我不想同你们这一群黑帮分子说话！”他表示，我们到别的地方说话去。

采取了这样一些党的措施：把总工程师开除出……自来水公司管理委员会，同时给他造成经常受审查的处境，不断把他传到为数众多的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里去进行讯问并交给他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他的每次不到都写入笔录，“以备未来进行司法审判”。通过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同志）争取到任命一个“非常三人小组”（工农监察院、工会委员会和古比雪夫同志）来领导自来水公司。

四年来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么也没有察

觉……

在这种情况下，谢捷尔尼科夫便在《经济生活》上写了一篇文章："鉴于流传着一些激动社会舆论的关于自来水公司灾难性状况的传闻"，他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传闻，甚至有："自来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识地冲蚀着整个莫斯科的地基"（那还是伊凡·卡利达*奠定的）。请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个检查团。它认为："自来水公司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技术领导是合理的"。奥尔登包格尔驳倒了所有的指控。这么一来，谢捷尔尼科夫便宽容地说："我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问题引起议论，至于弄清这个问题，那是专家们的事。"

工人领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最后的、但万无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告密！谢捷尔尼科夫就这么办了！他"看到奥尔登包格尔有意识破坏自来水公司的迹象"，他毫不怀疑"在自来水公司、在红色莫斯科的心脏存在着一个反革命组织"。

而且还有：鲁勃辽夫水塔的灾难性状况！

但是这时候奥尔登包格尔犯了一个很失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懦弱的、中间状态知识阶层的举动：他购置国外新锅炉的定货被"砍掉了"（而旧锅炉现时在俄国不能修理）——于是他便自杀了（对一个人来说，碰的钉子太多了，况且当时人们还没有经过锻炼）。

事情没有放过去，没有这个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组织。工农监察员们担负起全面揭露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两个月间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这样的："对两边都要给点教训"。于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审起这个案子来了。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严厉，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铁面无私，他理

* 1328——40年的莫斯科大公。——译者注

解："俄国工人把每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宁可看成是敌人，而不认为是朋友，这当然是对的，"⑥但是："在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实际政策和总政策时，我们还不得不作些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退却和迂回；也许党将被迫选择一条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将遭到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们的天真逻辑的反对。"⑦

不过，革命法庭根本没有把那些出庭作证反对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和工农监察员的工人们"当作一回事"。被告谢捷尔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诉人的威胁："克雷连科同志！我知道这些条文；但要知道，这里审判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这些条文是对待阶级敌人的。"

然而，克雷连科也起劲地制造紧张气氛：你们向国家机关有意递送诬告……同时具有加重罪责的情节（私怨、个人报复）……利用职务地位……政治上不负责任……滥用权力、滥用苏维埃干部和联共（布）党员的威信……搅乱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给莫斯科苏维埃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很少……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已经不必去说具体的人的损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构成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习惯于很少考虑这些不可挽回的损失……⑧最高革命法庭应当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刑事惩罚应当是十分严厉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我的天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提示：**全都枪**……

完全正确。全都给——逗乐了：鉴于受审人真心悔悟，判处他们……公开训诫！

---

⑥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435页。

⑦ 同上，第438页。

⑧ 同上，第458页。

两个真理……

而谢捷尔尼科夫好象是——一年监禁。

请允许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绘成一片欢腾的光明景象的歌手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过一点边，哪怕当时只是童年，也是不会忘记的。陷害工程师的牛头马面们——正是在二十年代养肥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经……

*　　*　　*

下面的两次审判，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我们顶喜欢的最高公诉人：他正忙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的准备工作。⑨这起规模浩大的审判在欧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动，这时司法人民委员部突然想起：我们搞了四年审判，可是没有刑法典，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克雷连科也一定免不了要为法典操点心：需要各方面预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

⑨　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地审判，以前就有了，如1919年的萨拉托夫审判。

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В·Г·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10]（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

[10] 巴黎1922年版和私下出版物，1967年版。

1. 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 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 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皇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象当年在立宪会议问题上有人主张的那样，象在欧洲各国所有的清淡馆里所做的那样。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

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左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兰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入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涅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象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涅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但他这么一来，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会主席卡纳特契科夫担保说，这会引起苏维埃政权对教会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过心房，大家都站立起来。大主教说："最主要的重负是不和与仇视。但俄国人汇合为一体的时候将会到来。我将亲自带领善男信女从喀山圣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泪把它们贡献出来。"他祝福救

委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而他们也光着脑袋把他送到大门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⑪证实了谈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结局，赞扬了大主教。“在斯莫尔尼宫里商定，教会的樽爵、金袍将在教徒们面前重铸成金锭。”

又涂抹成了某种妥协！基督教的毒气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们不需要这种团结一致和这种自动捐献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会的立场不稳的班子被撤换了，报纸开始冲着“坏神甫”、“教会公侯”狂吠，对教会代表们说明：不需要你们的什么捐献！不需要同你们搞什么谈判！一切都属于当局——它认为需要什么就取走什么。

于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样，开始了伴随着冲突的强制收取。

现在就有了合法理由来开始教会案的审判。⑫

8）**莫斯科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点在综合技术博物馆，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长别克，检察长卢宁和朗庚诺夫。十七名被控告散发总主教文告的受审人，包括大司祭们和俗人。这个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贵重物品还重大。A·H·扎奥泽尔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贵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则上坚持总主教文告的看法，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于是就成了审判的中心人物——马上就要被枪决（这也就证明：重要的不是给饥民们饭吃，而是在方便时刻把教会摧毁）。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为证人被传到法庭。虽然厅里的听众是挑选好的，专门安排的（在这方面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区别不大），但罗斯的老底子是那么深厚，而苏维埃的

---

⑪ 《教会与饥荒》、《教会贵重物品将怎样收取》等文。

⑫ 材料来自安纳托里·列维京的《教会骚乱史纲》第一部，私下出版物1962年版和《吉洪总主教审讯笔录》，审判档案第五卷。

底子还那么浅薄，所以总主教一进来，半数以上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发文告的全部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审判长竭力追根刨底：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自己亲手写的——全部都是自己写的？你想必只是签个名吧？是谁写的呢？谁是出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你在文告里要提到报纸对你们的围攻呢？（人家围攻的是你们，干吗要我们听到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么？

总主教："这应当去问那些掀起这一场围攻的人，问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

审判长："但你写的这个东西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

总主教："它具有历史的性质。"

审判长："你使用了一种说法，说当你们同救委会进行谈判时——在背后发布了法令？"

吉洪："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认为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

毁灭性的论据！在侦查员的夜间办公室里还将千百万次向我们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永远也不敢那么简单地回答，象

总主教："是的。"

审判长："你是否认为国家现行法律对你有约束力？"

总主教："是的，我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与笃信教规相抵触。"

（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该多好呀！我们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复询问教规。总主教解释说：如果教会自己交出贵重物品——这不是渎神行为。如果违背它的意愿而取走——这就是渎神行为。在文告中没有说根本不交东西，而只是谴责违反意愿的交法。

（这话使我们更感兴趣——违反意愿！）

审判长别克同志感到惊异："归根结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些——教会的戒律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

（可以预料的回答："苏维埃政府的……"）

公诉人大声疾呼："好，就算按教规是渎神行为，——但从仁慈的观点来看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想起这个内容贫乏的仁慈两个字……）

还进行了语文学上的分析。"渎神行为"（Святотатство）这个字是从圣物-盗贼（Свято-тать）这两个字来的。

公诉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是盗窃圣物的贼了？"

（厅内长时间的喧闹声。休息。法庭管理人员忙乱了一番。）

公诉人："这样说，你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执委都叫作贼了？"

总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规。"

往下讨论了"亵渎行为"这个术语。从瓦西里·凯萨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时，圣像的金袍装不进箱子去，于是就用脚踩扁了，但总主教本人没有在现场吧？

公诉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请把讲给你听的神甫的姓名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他关起来！）

总主教没有说出姓名。

那就等于——撒谎！

公诉人得意洋洋地追问："不，是谁散布了这个卑鄙的诽谤？"

审判长："说出那些用脚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来！（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则法庭不能相信你所

说的！”

总主教不能说出姓名来。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是凭空诬告！”

剩下的是要证明总主教想颠覆苏维埃政权。请看这是怎样证明的：“进行鼓动就是企图准备情绪，以便将来准备实行颠覆。”

法庭决定对总主教提起刑事诉讼。

五月七日宣告判决：十七名受审人中——十一名判处枪决（实际枪毙了五人）。

正如克雷连科所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再过一个星期，总主教被停职并被逮捕。（但这还不是最后结局。暂时把他押送到顿斯柯依修道院，严加看管，直到教徒们开始习惯于他的不在。记得吧，不久前克雷连科还表示过惊讶：有什么样的危险威胁着总主教呢？……不错，当偷偷地扑上来的时候，敲钟和打电话都无济于事。）

再过两个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会的高级官员，甚至不是任命的，象所有大主教那样。一九一七年春天——从古诺夫戈罗德时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选举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温和的人，是工厂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层神职人员中颇有声望，正是他们的票数使文涅明当了选。他不理解时代，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教会脱离政治，“因为教会在过去吃了它的许多苦头”。正是这一点把大主教牵入了

9）**彼得格勒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会贵重物品）有几十人，其中包括——神学教授、教会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审判长谢苗诺夫——年方二十五岁（据传闻是个面包铺掌柜）。主要公诉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П·А·克拉西科夫——列宁的同龄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时期的朋友，后来是流亡国外时期的

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从涅瓦大街拐弯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过大主教时，人们跪下来唱“上帝拯救众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象在法庭大楼里一样，一些过分热心的教徒当时就遭到逮捕。）在审判厅里大部分听众是红军战士，但是每当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进来的时候连这些人都站起来。而公诉人和法庭却称他为人民公敌（这个词儿我们已经见到过了）。

审判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律师受压制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方面克雷连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目睹者介绍了情况。法庭大声威胁要把首席辩护人包勃里舍夫-普希金本人关押起来，而这已经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以至包勃里舍夫-普希金赶紧把金表、钱包交给律师古罗维奇……证人叶戈洛夫教授因说了有利于大主教的话，被法庭裁决当场羁押。但是，没想到叶戈洛夫对此早有准备：他随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着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涅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象呀，越来越象了……）

公诉人斯米尔诺夫要求“十六颗首级”。公诉人克拉西科夫

大声疾呼："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说实话本应把整个教会都关进监牢里去！"

（纲领是很现实的，它几乎很快就办到了。它是双方**对话**的良好基础。）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C·Я·古洛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受审人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革命法庭判处十个人死刑。他们等死等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结束（好象是准备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枪毙）。在此以后全俄中执委赦免了六个人，四个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国家杜马成员谢尔吉；法学教授Ю·П·诺维茨基及律师科夫沙罗夫）于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里执行枪决。

我们务请读者不要忘记"地方多数"这个原则。这里有两起教会案件，那里就有二十二起。

* * *

社会革命党人案开庭之前，十分抓紧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该铺好法律的花岗石块的时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

程，全俄中执委应届例会开幕，但法典草案还是没有来得及搞好，它刚送到戈尔基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定。法典中有六条的最高刑规定为枪决。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页边上又补充了也必须实行枪决的另外六条，（其中有第六十九条：宣传与鼓动……特别是——号召消极反抗政府、号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⑬还有一种应判枪决的情节：不经允许而从国外返回（就象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来回乱窜那样）。还有一个与枪决相等的惩罚：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那个不远的将来，那时人们将从欧洲难以招架地涌向我国，但却没法强迫任何人自愿地离开我国到西方去）。主要的结论伊里奇是这样向司法人民委员说明的：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当把枪决扩大适用于……（可代之以驱逐出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各种活动；拟定一个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表述方法。"（着重点是列宁加的。）⑭

扩大枪决的适用！——这还不明白吗？（驱逐出境的有几个？）**恐怖手段**——**这是一种说服手段**，⑮好象清楚了吧！

而库尔斯基还是没有彻底清楚。他大约感到才尽技穷，实在不知道这个表述方法怎么拟定，这个**联系**怎么编造。于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员会主席那里去请求指点。这次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紧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宁从戈尔基发出了第二封信：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

---

⑬ 就是说象《维堡号召书》那样的文件，沙皇政府对其参与者各判了三个月的监禁。

⑭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189页。

⑮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404—405页。

我们谈话的补充。……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⑯

对这个重要文件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对它适宜于静静地思考。

这个文件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还没有完全病倒的列宁在尘世上所作的最后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部分。发出这封信后过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风。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局部地恢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许给库尔斯基的两封信，就是在二层楼角上那个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厅兼办公室里写的，那里已经放着将成为领袖临终卧榻的那张床，在等待着。

随后附着那个草案、补充条款的两种方案。这个条款过了几年后就成长为五十八条4以及我们的老妈妈——整个的五十八条，你一面读着一面感到钦佩，“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原来是

⑯ 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北京中文版，第320页。按：译文中“镇压”一词在俄文中原为“恐怖”或“恐怖手段”（террор）。——译者注

这个意思！实施得比较广泛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一面读着一面就会回忆起来，下面这段如此亲热的条文是多么法力无边：

"……宣传或鼓动，或参加组织，或协助（客观上协助或者有能力协助）其活动具有……性质的……组织或人……"

把奥古斯丁* 带到这里交给我，我马上就给他套上这个条文！

该做的都做了，做了补充，重新打印，扩大了枪决的适用范围——于是全俄中执委五月下旬的会议通过了刑法典并决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现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据开始为期两个月的

10）**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办事灵活的格奥尔吉·皮达可夫代替通常的审判长卡尔克林同志（审判员的好姓！**）来审理这个为全世界社会党人注目的重大案件（善于记帐的命运之神是喜欢嘲弄的！——但它也给我们留下思考的时间！给皮达可夫留下了十五年……）。没有律师——受审人——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为自己辩护。皮达可夫态度很生硬，常常阻止受审人发言。

如果我们与读者对于任何审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状，不是所谓"罪"而是适宜性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解，——也许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次审判心里会有点疙疙瘩瘩。但适宜性势如破竹地发挥着作用：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还被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还没有溃散、还没有彻底打垮的——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适宜于把他们彻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这个原则，那就可能把整个审判错误地理解为党

---

* 公元四—五世纪希波城（北非）主教。为"教会之父"之一，宗教黑暗势力的疯狂宣传者。——译者注

** 此姓俄语中有"乌鸦叫"的意思。——译者注

派报复。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荫庇，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⑰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贵族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⑱但是曾请求赦免他们，曾请求解散，请

---

⑰ 所作的试图很无力，很快就动摇，很快就放弃——那是另一回事。但他们的罪过并不因此而减轻。

⑱ 破产当然是已经破产，虽然没有马上认清。

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⑲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

⑲ 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留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文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⑳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

* 德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兴登堡的参谋长。——译者注

⑳ 这时恢复了这个称呼。

——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

我们手头没有受审人的回答。他们中间是否有什么人指出了十月革命的特殊性质：向所有的政党一起宣战并当即禁止它们彼此联合，（“不会抓你的——你不要匆忙签名”）？但是不知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某些受审人低下头去了，某些人的心真的活动了：的确，他们怎能堕落到这个地步呢？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审判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黑暗的牢房里押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必然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只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illegible]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九年的；

——从那时起，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专为社会革命党人颁布了一项大赦令，饶恕了他们过去的全部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如果他们今后不再进行这种斗争；

——从那时起他们没有进行斗争！

——而现在是一九二二年！

怎样摆脱困境呢？

这问题考虑过。当社会党国际请求苏维埃政府住手，不要审

判自己的社会主义同道者时——就考虑过。

的确，在一九一九年初，鉴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威胁，社会革命党人撤销了暴动的任务，从那时起就没有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萨马拉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给共产党兄弟们开放了一段高尔察克的战线，大赦也正是因此而颁布的）。这里，在审判厅里，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受审人亨德尔曼甚至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的机会，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要"全系列"！瞧这些饶舌家！……）

他们不但不进行斗争——他们还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而且也放弃了立宪会议）而只是请求实行允许各党派自由宣传的苏维埃改选。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崽子？！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㉑那就是：对社会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以及他们的和平建议的回答是——**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这才是我们的做法！

既然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有三年了吧？）——好象总该审一下似的。但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

㉑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183页。

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受审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或者硬不接受高尔察克战线上被开放的缺口。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揭露的事实一定不少！一定不少！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最初一些日子里就说了些什么？㉒切尔诺夫（在社会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党将如已往在沙皇制度下所做的那样，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抵抗对人民权利的侵害”（大家都记得它已往是怎样做的)。戈茨说：“如果斯莫尔尼宫的专制者们还要侵犯〔立宪会议〕……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的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也许是想起来了，但没有下决心。但审判他们好象是已经可以了。

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

㉒ 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有说过呀！……

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就是说调查恐怖行为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㉓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并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自己在欺骗自己。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说：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先下手。在一九二〇年还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㉔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怎么竟敢有拿起武器的想法！“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克雷连科同志，也许恐怖行为——是他们的“第二天性”？）

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受审人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凡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依曾警告Ф·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他们的全部恐怖行为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其实这些战斗队员也

㉓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236页。（听听这语言！）

㉔ 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什么都没有干。其中两人，康诺帕辽娃和谢苗诺夫抱着很可怀疑的积极性在一九二二年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供述，但是他们的供述粘不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身上去——并且突然间同样不可解释地把这两个积重难返的恐怖分子完全释放了。

所有的证言都要撑上几根拉杆才能站得住的。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㉕（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依）：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康诺帕辽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康诺帕辽娃捏造出来的……那末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作者注），揭发归揭发"㉖——但你们看她还没有揭发彻底呢。还有这种说法："无缘无故使康诺帕辽娃挨枪毙——这未必是叶菲莫夫所需要的吧。"㉗又是正确的，又是有力的。或者更有力些："会不会有这次会晤？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不排斥？那就是说，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

㉕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251页。

㉖ 同上，第253页。

㉗ 同上，第258页。

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象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没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28]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受审人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象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

---

[28]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05页。

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㉙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划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但是——不，还不一样！**受审人的行为**还不一样。他们还不是一些教熟了的绵羊，他们还是——人！告诉我们的情况很少很少，但已经可以明白。例如，受审人贝尔格“指控布尔什维克是一月五日惨案的罪魁祸首”（枪杀保卫立宪会议的游行示威群众）。再如李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㉚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尔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上的行为。”

㉙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185页。

㉚ 同上，第103页。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受审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㉛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善于修补），“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㉜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

㉛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25页。

㉜ 同上，第238页。

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受审人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㉝——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㉞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㉟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㊱“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㊲各地还要搞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使用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批准宣告枪决的判决，但暂缓执行。被判刑人往后的命运将取决于留在外面的（显然——还有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行为。如果他们将反对我们——就把这些人干掉。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

㉝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322页。

㉞ 同上，第326页。

㉟ 同上，第319页。

㊱ 同上，第407页。

㊲ 同上，第409页。

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永久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雷连科脱口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 * *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包利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文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㊳

㊳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勃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1967年第11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文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文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译者注）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他不能不再作一次搏斗的尝试，不能不亲自回到俄国来送死。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文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文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

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

萨文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他以诗意的情怀看待这次审判：这是他同俄罗斯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他最后一次表明心迹的机会。他要忏悔（不是对强加于他的罪过——而是对另一些事）。

（以下的曲调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受审人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

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明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文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文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这样，继归国之谜以后，这个非死刑判决本来会成为第二个谜，如果它不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被第三个谜压倒了的话：萨文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这个大块头，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文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文科夫的气质和笔法，甚至死者的儿子列夫·包利索维契都深信不疑，并在巴黎向所有人证实说，除了他父亲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说父亲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㊴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仍然都在前面……

㊴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井孔上的铁网是从萨文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1937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文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象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

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1967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包维奇，他还保留着年青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包维奇，所谓萨文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文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文科夫"散散心"（萨文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文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棒。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1918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象他曾想保护科经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杀人——译者注）。有一次，在三十年代初，他曾到巴黎去暗杀巴仁诺夫（斯大林秘书处的逃亡工作人员）——并且在夜里成功地把他从火车上扔了下来。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此岛属土耳其——译者注）：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坐探，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第 十 章

法律成熟了

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文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①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

①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265—266页。（《列宁文稿》第十卷第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Н·О·洛斯基、С·Н·布尔加科夫、Н·А·别尔嘉耶夫、Ф·А·斯捷朋、Б·П·维舍斯拉夫采夫、Л·П·卡尔萨文、С·Л·弗兰克、И·А·伊里申；有历史学家С·П·麦尔贡诺夫、В·Л·米亚科金、А·А·基则维特尔、И·И·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Ю·И·艾亨瓦尔德、А·С·伊兹戈耶夫、М·А·奥索尔金、А·В·别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В·Ф·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Д·Ф·谢利万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

---

* 沙俄将军，临时政府参谋总长，1917年被枪决。——译者注

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包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象样的小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〇——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②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象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A·Я·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递法律接力棒），③五十三名受审人，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受审人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

---

② 见克雷连科的前书，第437页。

③ 审判员是老革命家瓦西里耶夫-尤仁和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他们的质朴的姓氏听着都顺耳，容易记住。1962年忽然在《消息报》上读到一些悼念镇压受害者的文章——谁署的名呢？长寿人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

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④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受审人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終于有了实现**无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受审人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英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果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契·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〇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

① 见1928年5月24日《真理报》第3版。

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受审人。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帮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H·K·冯-梅凯和A·Φ·魏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受审人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果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⑤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⑥。只是在

⑤ 见1929年5月4日《消息报》。

⑥ 很可能，他的这次失利给领袖留下恶感并决定了这位前检察长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死亡——死在断头台上。

一九三〇年夏天，不知道谁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案件**（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辛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完整的速记记录⑦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契·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⑧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

⑦ 《工业党案件》，苏联法律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版。

⑧ 同上，第453页。

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受审人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象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受审人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受审人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象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象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象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違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⑨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

⑨ 《工业党案件》，苏联法律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版，第488页。

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请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〇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

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六十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准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于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受审人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⑩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

---

⑩ 《工业党案件》，苏联法律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版，第325页。

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象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不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象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⑪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受审人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

⑪ 《工业党案件》，苏联法律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版，第365页。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塌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害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一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⑫（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⑬（同前）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受审人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

---

⑫ 《工业党案件》，苏联法律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版，第204页。

⑬ 同上，第202页。

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但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说，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⑭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象大体上……是。"⑮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

⑭ 《工业党案件》，苏联法律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版，第425页。

⑮ 同上，第356页。

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塌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〇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英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

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青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⑯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受审人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外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⑰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指莫斯科——译者注〕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

---

⑯ 这个箭头是谁在卷烟纸上给克雷连科画出来的呢？是不是那个在1941年前考虑了我们整个国防的人？……

⑰ 见《工业党案件》，第356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

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示，受审人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子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⑱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⑲

---

⑱ 见《工业党案件》，第409页。

⑲ 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见《工业党案件》，第437页。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象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受审人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

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受审人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

---

* 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凡尔第的歌剧。——译者注

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受审人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受审人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

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〇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受审人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

——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他们怎么能够**不想要**一个民主共和国呢？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

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包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20]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包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象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

---

[20] 见《工业党案件》，第228页。

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撒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〇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

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

证人基尔波津科："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

这正合需要！克雷连科（勉励地）："往下说吧！"

基尔波津科（停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㉑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

"那就应当想办法做到使你们的回答互相一致！"㉒

但是，在剧场休息时间，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标准。所有的受审人又重新系上线，每一个都等待着扯动。克雷连科同时把八个一下子牵动起来：瞧，流亡国外的工业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没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进行过任何谈判，也不知道什么"工业党"，说受审人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讯逼出来的。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老天爷！受审人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受审人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

㉑ 见《工业党案件》，第354页。

㉒ 同上，第354页。

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 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㉓

多么有力的思想呀！——几十年来公诉人都没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有罪！如果受审人无罪——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逮捕呢？如果已经逮捕了——那就说明有罪！

还有，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招认呢？**

"刑讯的问题我们要排除！……但是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认罪？然而我要问：他们除了认罪还有什么办法？”㉔

说得多么确切！多么符合心理学！凡在这类机关里蹲过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写道，㉕一九三八年，在布蒂尔卡，他曾经与克雷连科同关在一个监室里，克雷连科的位置是在板铺下面。那里的情景如今我仍历历在目〔自己爬过〕：那里板铺是那么低，只有全身趴在肮脏的沥青地上才能爬进铺下去，但新来的人一开始不懂这个窍门，他们跪在地上爬。脑袋倒是可以

㉓ 见《工业党案件》，第452页。

㉔ 同上，第454页。

㉕ 见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著：《监狱与流放》，契诃夫出版社。

塞进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检察长准是特别难以掌握这个窍门，他那还没有瘦下去的屁股准是长久地撅在那里为苏维埃司法增光。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这个搁浅了的屁股，实在罪该万死，但当我长久地描述这些案子时，它好似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不但如此，检察长还继续发挥说，即便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一概属实——那仍不明白，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众口一致地、彼此没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认？……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大规模的串供？——要知道他们在侦查期间彼此是没有往来的！？！

（过几页有一个幸存的证人会给我们说出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是我向读者，而是请读者向我说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之谜”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起先是对“工业党”觉得惊讶，后来又觉得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审判是一个谜）？

要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并没有两千，提交法庭公审的也并没有两三百人，而只有八个人。指挥八个人组成的合唱团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难题。而且克雷连科可以从成千人里选择，并且选择了两年。帕尔钦斯基不屈服——枪毙了（而且死后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在供述中也是这样提到他，虽然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后来希望从赫连尼科夫那里逼出所需要的东西——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个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那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那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突然有了一个难得的发现——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强干！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

他是夏末在开庭审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仅已经进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他掌握了一大堆边缘材料，现编现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实，要啥有啥。有时还象功勋演员那样懒洋洋地卖弄几句词藻：“工业党的活动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十一天的开庭审理都不可能把它详尽无遗地揭示出来。”（意思是，找吧！继续找吧！）“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不大的反苏阶层还保留在工程界里。”（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这是一个谜，而解释谜语是需要有一点艺术性的。于是这个无感觉的棍棒似的东西，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俄国式的犯罪特征，这样的犯罪只有通过面向全民的悔过才能清洗”。[26]

如此说来，克雷连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部困难只在人选上不要犯错误。但风险是不大的：侦查期间的废品随时可以送进坟墓。粗筛细箩都通过了的，可以治治病，养养肥，然后押送出庭！

那末这个谜在什么地方呢？对他们事先怎样加工？就这样：你想活吗？（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该为子女、为孙子孙女着想呀）不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枪毙，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吗？（这毫无疑问。谁还不明白，谁就去上一学期卢宾卡的磨练课）。如果你们去演一出戏，对你我双方都有利，你们是专家，台词由你们自己写，我们这些检察长会把它背熟，还要使劲记住技术名词（在法庭上，克雷连科有时背错了词，把机车轴说成车厢轴）。出台表演对你们是不愉快的，耻辱的——应当忍耐过去！因为活着更可贵！——你们以什么保证以后不枪毙

㉖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国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那种既无耻透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叛徒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叛卖行为的精彩表演！在这个时代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显眼的。

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们？你们是很好的专家，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重视你们。瞧，已经审过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现好的，我们都让活着（饶恕前次审判中听话的受审人——是未来的审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象沿着一根链条似的，这个希望一直传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们的一切条件！审判应当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于是受审人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受审人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27]应当突击占领……”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连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

---

[27] 见《工业党案件》，第504页。请看，我们在1930年是怎样说的，那时毛（指毛泽东——译者注）还年青着哩。

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㉘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匮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西方的左翼人士得到了关于他们政府的阴谋诡计的警告；

4.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㉙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㉚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㉛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吗要枪毙掉呢？……

我国知识界的历史，从一九二〇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记得：

㉘ 见《工业党案件》，第510页。

㉙ 同上，第49页。

㉚ 同上，第508页。

㉛ 同上，第509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经过鼻孔的。

“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〇年的革出教门的历史，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写的。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培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那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受审人。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包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㉜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〇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

㉜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M·П·雅库包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得到了自己的刑期）。[33]拉姆津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过讨好、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希望寄托在主要受审人弗拉基米尔·古斯塔伏维奇·格罗曼（指望他帮助制造这个案件，报酬是他将得到赦免）和奸细彼图宁身上。（据雅库包维奇所述。）

现在来介绍一下 M·П·雅库包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稜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左右着任命军队政委的事务，[34]最后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战线当了集团军政委，并在文尼察亲自逮捕了邓尼金（在科尔尼洛夫判乱后），很后悔没有当场把他枪毙（在审判中仍是这样说）。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永远诚挚，永远被自己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维克党内是个晚辈，他当时也的确年

---

[33] 库兹马·A·格伏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下工人小组主席。沙皇政府在 1916 年愚蠢透顶地把他投入监狱，二月革命使他成为劳动总长。格伏兹捷夫成了古拉格的长期囚犯。我不知道他在1930年以前蹲过多少年监牢，从1930年起则是不断地坐牢。1952年我的朋友们在斯巴斯克劳改营（哈萨克斯坦）还见过他。

[34] 请不要与总参谋部的雅库包维奇上校混为一人，那人在同一时期在同一些会议上代表军事部。

青。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热心地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议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有，一九一九年建议孟什维克加入共产国际（唐恩等人一贯地、甚至态度傲慢地拒绝他提出的办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召来军队反对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已经拿起武器出动了）一事深感痛心，并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十月革命刚一发生，雅库包维奇就建议自己的党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以自己的参与和影响来改善他们正在建立的国家制度。他终于遭到了马尔托夫的诅咒，到了一九二〇年，由于确信已无力使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来，他最终地退出了孟什维克。

我所以要详细地讲这些是为了说明：雅库包维奇不是个孟什维克，而在整个革命期间都是布尔什维克，最真诚的和完全无私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〇年他还当过斯摩稜斯克省粮食委员（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甚至粮食人民委员部曾通报表扬他为优秀的粮食委员（他现在保证说，当时没有使用过惩罚队；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经布置过阻截队）。在二十年代他主编过《商业报》，还担任过其他显要职务。在一九三〇年依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需要凑集一批象这样一类“混进来的孟什维克”的时候——他也就被捕了。

克雷连科当即把他传去审讯，读者已经知道，他一向善于在乱糟糟的调查的基础上组织严整的侦查。这时发现，他们彼此很熟识，因为当年（在办理最初的若干案件的空隙）克雷连科曾到斯摩稜斯克省去加强粮食工作。请看现在克雷连科是怎么说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坦率对他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使雅库包维奇精神大为振作并挺起腰来）我不怀疑你是无辜的。但是，搞好这次审判是我们共同负担的党的义务

（克雷连科是受命于斯大林，而雅库包维奇的心则是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动，象一匹干活卖力的马一样，自己急于把头伸进轭里去）。我请求你尽一切可能协助和配合侦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发生了没有预见到的困难，在最复杂的时刻，我将请求审判长让你发言。

！！！

雅库包维奇答应了。怀着自觉的责任感答应了。也许苏维埃政权还从没有给过他这样责任重大的任务！

本来在侦查中可以一根手指头也不碰一下雅库包维奇！但这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说来是太细致了。象大家一样，雅库包维奇也被交给了一群屠夫-侦查员，他们对他采用了全套办法——有冷禁闭室、有不透风的热禁闭室。还有打生殖器官。把他们折磨到这样程度，以至雅库包维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勃拉姆·金兹堡在绝望中割开了静脉。在复原以后不给他们上刑了，也不打他们了，只是两个星期不让睡觉，（雅库包维奇说："只要能睡一下！什么良心、什么名誉，都已不要了……"）同时还要同已经投降了的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也撺掇你认罪，撺掇你胡说八道。连侦查员自己（阿历克赛·阿历克塞耶维奇·纳谢德金）也说："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事！但是他们要求我们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库包维奇被侦查员叫去，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受尽折磨的囚犯。侦查员冷笑一下说："这位摩西·伊萨也维奇·捷吉里巴乌姆请你接受他参加你们的反苏组织。你们两个人随便谈谈，我暂时走开。"说完就走了。捷吉里巴乌姆果真央告说："雅库包维奇同志！我请求你，请你接受我加入你们的孟什维克联盟局。他们控告我'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威胁说要枪毙我。但是我宁可当一个反革命，也不愿当个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应他当了反革命就不杀吧？他没有上当：结果得到了一个幼儿园

的刑期——五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手头多么缺少孟什维克呀，只得从自愿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乌姆去扮演！——同国外孟什维克和同第二国际有联系！但约定好——只判五年，说话算话。）在侦查员的赞同下，雅库包维奇接受了捷吉里巴乌姆加入联盟局。

审判前几天，在侦查组长德米特里·马特魏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孟什维克联盟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目的是进行协调，使每个人更好地领会自己的角色。（“工业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这样开会的！这也就是克雷连科表示过不能理解的受审人“能够见面”的地点。）但是不容易装进脑子的谎话堆积得太多太杂，与会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习不了，所以又召开了第二次。

雅库包维奇是怀着什么感情出庭受审的呢？是为了所受的痛苦，为了被塞进胸腔的全部谎话——在法庭上闹出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丑剧？但是：

1.这将是从背后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这将是对雅库包维奇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目标的否定，对他从错误的孟什维克主义挣脱出来转到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这样的大丑剧之后，不会让你死去，不会简单地枪毙了事，而是将重新进行刑讯，这一次已经是为了报复，会把你搞得神经失常，而身体本来就已经被刑讯折磨垮了。要应付新的折磨——哪里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从哪里可以去汲取勇气呢？

（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包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所谓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实质上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最高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登了自己与受审人划清界线的声明。他们写道，这是一出最可耻的审判喜剧，它是建立在奸细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绝大多数被告早已脱党十年以上，并且从来也没有恢复过关系；在审判中令人发笑地提到巨大的经费数额——全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

克雷连科宣读了文章后，请什维尔尼克让受审人发表意见（也是象审理“工业党”一案时那样一下子牵动所有的线）。于是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大家都维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而反对孟什维克的中央……

现在雅库包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象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包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

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象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结果非常奇怪：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日期和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的雅库包维奇的脑子，这一回却不灵了：他明明在审判时说过，外国代表团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他们下达进行暗害活动的指示——现在却说不记得有这回事。国外的孟什维克写的声明并不是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他们正是对审判的不幸牺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维克——这也是实话。雅库包维奇固执而真心地发了那么大的火，究竟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孟什维克怎么才能不使受审人听任他们的命运播弄呢？

我们喜欢对那些弱一些的人，不能回答的人发脾气。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这种时候，证明我们有理的论据自己就会灵活地凑上来。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包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包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狂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包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了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呀，这对于检察机关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发现吗？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审判难道还没有得到说明吗？

斯大林难道不是通过这次审判终于明白并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敌人圈进牛栏里，他完全可以照样把他们组织进这样的一出戏里吗？

*　　*　　*

请宽大为怀的读者们饶恕我！写到目前为止我的笔头没有发颤，心也没有紧缩，我们满不在乎地滑行着，因为这十五年内我们一直处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护之下。但往后我们要感到痛心了：读者记得，从赫鲁晓夫开始，已经几十次地向我们说明："列宁的法制准则遭到破坏大体上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

现在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法制荡然的深渊呢？我们怎样度过这个痛苦的深水区呢？

不过，由于受审人姓名的显赫，后来的这些审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进行的。人们对这些案件的注意经久不衰，有过许多著述，做过许多分析，将来还会分析。而我们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们的谜。

预先说明，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出版的速记报告与审判中说的话并不完全相符。有一个作为经过挑选的听众之一旁听过审判的作家，当场做过飞快的记录，后来他确认存在着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记者还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发生的卡壳，当时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纳入规定好的供述的轨道（我这样想：审判前拟制了一种事故表报：第一栏——受审人的姓名，第二栏——如果在法庭上离开了台词，休息时采取什么手段，第三栏——负责采取手段的契卡人员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经明确，谁该向他跑过去以及该怎么办）。

但速记记录的不准确并不能改变整个画面，也不使之减色。

全世界接连地看了三出戏，三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的戏，在这些戏里，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共产党的大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贴贴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咩咩地叫什么，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这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象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虽然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做得特别成功的是亚瑟·凯斯勒）——关于它们的谜仍然在广泛地流传着。

有人写到过能够使人丧失意志的西藏迷药，有人写到过采用催眠术。在说明问题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因素。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有这样的手段，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妨碍他们采用这些手段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削弱、不去迷乱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弃了巡回表演活动，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面有过一所催眠术学校，这是确凿的事实。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审判前得到允许同丈夫会见，发现他处于精神呆滞、不由自主的状态（她来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说出了这件事）。

但为什么帕尔钦斯基或赫连尼科夫既没有被西藏迷药也没有被催眠术摧毁呢？

不，对于这一点，必须从较高的、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

人们感到特别困惑莫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讯室里没有发过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经过锻炼、熬煎、摔打的战士。

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错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老革命家，这个名声他们是靠继承得来的，是由于与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为邻而得来的。那些人——扔炸弹和搞密谋的人们见识过苦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们一生未见识过真正无情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侦查在俄国根本不曾有过）。而这一帮人则既未尝过侦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么叫刑期。什么特别“刑讯室”、什么库页岛、什么特殊的亚库梯苦役，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经历过。都说捷尔任斯基受的罪比谁都大，说他一生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而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他不过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张普通的“十元券”，这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可能得到的；诚然，在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监狱，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审判中牵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些党的领袖，在他们的革命经历中只有过短期的轻松的监禁，为时不长的流放，连苦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开玩笑差不多；看来他在哪里也没有连续蹲过一年，只在奥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过一阵。㉟加米涅夫从事过长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曾奔走于俄国各城市之间，但也只坐了两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们现在给十六岁的孩子一下还判**五年**呢。季诺维也夫，说来可笑，连三个月都没有蹲过！一次刑事判决都未曾有过！与我们“群岛”的一般土著相比，他们是一些小娃娃，他们等于没有见过监狱，李可夫和И·Н·斯米尔诺夫曾几次被捕，各坐过五年牢，但不知怎么地他们的监牢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们能够从所有的流放地毫无困难地逃跑，或者正好赶上大赦。在关进卢宾卡之前，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真正的监狱和不公正

㉟ 这里所有的材料都引自《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41卷，那里收集了俄国共产党（布）活动家的自传材料或确凿可信的传略。

的侦查的铁钳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根据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托洛茨基落进这只铁钳——他会表现得不那么低三下四，他的骨头会比别人硬：他没有理由会如此。他也只经历过几次轻松的监禁，没有受过任何严重的侦查，此外就是乌斯特-库特两年的流放。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声是廉价得来的，他本人并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坚强性：下令枪毙别人时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临头时却会比谁都软弱！这两方面的坚强性完全是两码事。）拉迪克是当局的奸细（在这三次审判中充当这个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果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刑事犯。

（这个杀害几百万人的凶手不能想象他头上的那个最高杀人犯在最后时刻不会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责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这个大厅里，雅果达就会满怀信心地坚决地直接向他请求宽恕："我向您请求！我为您修建了两条大运河！……"据在场者说，这个时刻，在大厅二层楼的一个小窗口后面的屋里，好象是隔着一层薄纱，光线昏暗，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当点烟的时候，显出了烟斗的影子——有谁到过巴赫奇萨莱并记得这种东方式的花招吗？——在国务会议大厅里，在二层楼高的地方有一排钉着带有小孔的白铁片的窗户，而在窗户后面是一条没有照明的走廊。从大厅里永远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里。汗是不可见的，而国务会议却好象永远是在他亲临之下举行的。根据斯大林的彻头彻尾的东方性格来判断，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观察着十月革命大厅里演出的喜剧。我不能设想他会放弃观看这个场面，放弃得到这种享受。）

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当我们读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审判笔录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和对别人说了那么多诬陷不实之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

达可夫、И·Н·斯米尔诺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诚然，这一次，戏的导演们挑选登场演员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师案子困难些：那时可以从四十只大桶中挑选，而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小的戏班子，主要演员大家都熟悉，观众们希望一定由他们来扮演。

但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无可幸免的人们中间那些最有远见和最果断的人——他们没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杀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侦查时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们清醒了，顶住了，在无声中死去了，但总算没有蒙受耻辱。没有把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叶努基泽、楚巴尔、科西奥尔还有那个克雷连科拉出来公开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给那些审判生色增光。

带上法庭的是最顺从的！毕竟还是有过选择。

选择是在小范围里进行的，可是胡子导演却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们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单独的弱点。这也正是他那阴森森的不凡之处，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趋向和成就：看透人们底子里的弱点。

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Н·И·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象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

* 即斯大林。——译者注

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第一次审判他们的时候，布哈林曾对接近的人说过："那又怎么啦？这类人很难说。也许是有点什么事……"（那些年代庸人们的经典公式："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这就是党的第一号理论家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话！……）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审判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时候，他正在天山打猎，什么也不知道。下山后来到了伏龙芝——便读到了判处他们两人枪决的判决书和报纸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布哈林作了多么毁灭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这种迫害了吗？他对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向党提出呼吁了吗？没有，只是给科巴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暂缓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够去作当面对质并进行辩白。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象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象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 会把自己的

* 布哈林的昵称。——译者注

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36]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对于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当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来了。他既没有大声也没有低声表示愤慨。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担任未来角色的试验呀！

还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胁要把他（在不同时期他曾威胁过他们大家！）开除出党——布哈林（以及他们大家！）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留在党内！这也是对角色的试验呀！如果他们还是自由的时候，还处在尊荣和权势的高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现——那末当他们的身体、饮食和睡眠都攥在卢宾卡提词人的手心里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准确无误地照本宣读台词的。

在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确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开除出党！失去党！活下来，但在党外！亲爱的科巴自从把自己变成了党的时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们大家的！）这个特点。布哈林（他们大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作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分派给布哈林的实质上是一个领头的角色——因此导演对他的指导、排练时间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应有丝毫草率和疏忽。连去年冬天派他到欧洲去商购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属于

---

[36] 只保了一个叶菲姆·蔡特林，但也为时不久。

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为了罗织他里通外国的罪状需要这样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且让他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自由地乱跑，就更明确地预示着他该回来在主要舞台上登场。现在，凶险罪名的乌云压在头顶——长时间的、看不到头的不逮捕，憋在家里受煎熬——这比卢宾卡的直接压力更能摧毁牺牲者的意志（当然卢宾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里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冈诺维奇叫去，当着一些高级契卡人员的面，让他同索科尔尼科夫进行对质。索科尔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与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卡冈诺维奇口气强硬地进行了审讯，然后让人把索科尔尼科夫带走，亲热地对布哈林说：“尽是瞎扯淡，妈的……！”

然而，报纸上继续刊登群众的愤怒呼声。布哈林给中央打电话。布哈林写信：“亲爱的科巴！……”——他请求公开撤销对他的指控。于是登出来检察机关的一项含混的声明：“没有找到客观的证据足以对布哈林提出控诉。”

拉迪克秋天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布哈林推托了：我们两人都是被点名的，为什么要招来新的嫌疑呢？但他们的《消息报》别墅紧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来说：“不管我以后说些什么，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罪。不过——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没有什么联系。”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会保住，不会把他开除出党——否则太不象话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他确实始终是抱恶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于党之外——结果怎样呢！应当抱在一起，要犯错误——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

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果达的人。须知雅果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泽把手掌放到耳朵旁（他没有完全听明白）："请你说，所有这些供述都是你自愿作出的吗？”（记下来了！奥尔忠尼启泽也得到了一颗子弹）皮达可夫摇晃着身子说："完全自愿。”李可夫在休息时跟布哈林说："瞧托姆斯基多有勇气，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杀了。而你我这些傻瓜，还活下来。”

这时，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愿意相信布哈尔奇克没有问题！——但在事实面前……）、莫洛托夫起来发言，怒气冲冲，充满咒骂。而斯大林！——多么宽大的胸怀！多么不忘旧情！——“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布哈林的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李可夫也许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这是别人背着他加给布哈林的罪名。）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意志就这样软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这样练熟了。

这时，开始不断地把审讯笔录送上门来：审讯红色教授学院先前的青年们的笔录，审讯拉迪克的笔录，以及审讯所有其他人的笔录，——所有这些笔录都对布哈林的凶恶背叛提供了最严重的证据。给他往家里送材料并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为中央委员，仅供他了解情况……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对这年春天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二十二岁的妻子说："你读吧，我读不下去！”——自己就把脑

袋埋到了枕头里。他家里有两支手枪（斯大林也给了他时间！）——但他没有自杀。

难道他没有练熟分派给他的角色？……

又过了一次公开的审判——又枪毙了一批人……而对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没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决定宣布家中绝食——要求中央澄清问题并撤销对他的指控。绝食是他在写给亲爱的科巴的信中宣布的——并且诚实地坚持着。那时便通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日程是：1.关于"右派中心"的罪行。2.关于布哈林同志表现在绝食上的反党行为。

布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37]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38]的震惊。因为这

---

[37] 为了保证莫洛托夫安逸地度过高贵的晚年，使我们失去了多么丰富的供述呀！

[38] 以及"未来的中央"。

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士（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包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包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但是可能吧？——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是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可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

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搞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象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受审人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象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一九六七年！

*　　*　　*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起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

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里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凡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凡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尼热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象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

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凡诺沃内监里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运是怎样决定的。他不久前曾号召把新的区执委会主席清除出党。我们已经写过（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区检察长鲁索夫。他曾坚持不让把自己手下两个善于经营的有才识的但社会出身有污点的合作社干部

（弗拉索夫总是任用各种“过去的人”——他们熟悉业务，并且工作努力；而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新提拔起来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干，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动罪名逮捕入狱，因而得罪了区内务科长Н·И·克雷洛夫。尽管如此，内务机关还是愿意同合作社和解！区内务科副科长索罗金亲自来到区消费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议：免费给内务机关（“以后随便想个办法注销掉”）价值七百卢布的布匹（贪小便宜的人！但对于弗拉索夫来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非法的东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给——你要后悔的”。弗拉索夫赶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个共产党员，建议干这种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经作为区委的代表出现在区消费合作社（这种假面舞会及所有这类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灵魂！）并吩咐召开党员大会，议程是：“关于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在消费合作社的暗害活动”，报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绝妙的高招！暂时谁也没有点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说上两句关于前区委书记在他弗拉索夫这个部门里的暗害活动的话，内务机关就可以插话：“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你没有及时到我们这里来报告？”在这种情势下许多人就会不知所措而掉进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我不作报告！让克雷洛夫当报告人吧——因为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是他逮捕的，他们的案子是他处理的！”克雷洛夫拒绝说：“我不了解情况。”弗拉索夫说：“如果连你都不了解情况——那就是说他们被捕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大会干脆就没有开成。但人们是否经常敢于进行自卫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区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进弗拉索夫的办公室，拿给他一万卢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今天夜里逃走吧，必须在今天夜里，否则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认为，逃跑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我们如果不提一下这件事，三七年的情势将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会忽略掉还有一些坚

强的人和坚强的决心。）次日早晨，区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措词严厉的小评论（应当说，在三七年报刊总是同内务机关携手合作的），傍晚时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区委报告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全苏联的型式！）。

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 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第二个年头，现在有时可以读到一些记者和作家的回忆，说那时就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已经写入了历史，并且大有冒险在那里永远留下去之势。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废除粮食配给制后两年，在伊凡诺沃省（以及其他省）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面粉贸易的内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里，特别是乡镇和农村里，许多家庭主妇还是自己烤面包。禁止面粉贸易就是意味着：没有面包吃！在区中心卡德镇形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不象话的购买面包的队伍（不过，对他们也给予了打击：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区中心烤黑面包，而只许烤昂贵的白面包）。在卡德区除了区办的面包房外没有其他的面包房，现在从各村里纷纷到那里去卖黑面包。区消费合作社仓库里面粉是有的，但两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给人们的一切途径！！然而弗拉索夫却找到了办法，尽管有国家的狡猾规定，在这一年他仍然喂饱了全区：他下去到各集体农庄跑了跑，和八个农庄商定，在空闲的"富农"房舍里建立公共面包房（就是说只要供给劈柴，派几个农妇，利用现成的俄国炉子，就能办起来，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面包房），区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它们面粉。解决办法一旦找到，它永远是简单的！弗拉索夫并不修建面包房（他没有资金），同时却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建成了。他不进行面粉贸易，同时却不断地从仓库里批发并要求省里继续供应。他不在区中心出售黑面包，却供给全区黑面包。他字面上没有违反规定，但违反了规定的精神——节约面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区委会对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受了这次批评之后他还挨过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象只厉害的小公鸡（他个子矮小，老是昂着头，总显得有些傲慢的样子），他不肯交出党证（昨天区委会没有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和苏维埃代表证（他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没有区执委会关于剥夺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决定）。但民警不懂这一套手续，他们扑了上去，强力夺走了。从区消费合作社押着他大白天走过卡德镇的街道，送往内务机关时，他手下的一个青年商品鉴定员，共青团员，从区委会的窗里看到了。当时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学会了言不由衷（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性格纯朴）。商品鉴定员叫了起来："瞧这些畜牲！把我的头儿也抓走了！"他还没有走出房间，当时就被开除出了区委会和共青团，并且沿着一条熟知的小道掉进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还没有进去，案子差不多已经办好了，现在正为公开审判做些具体安排。他被带进了伊凡诺沃内监，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对他已经没有搞逼供，只简短地审讯了两次，一个证人也没有讯问，侦查案卷夹子里装满了区消费合作社的各种表报材料和区报的剪报。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是：1.造成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2.货物品种不全（好象货物就在什么地方放着，并且有什么人主动要供给卡德镇）；3.食盐进货过剩（而这是必须的"战备"贮备——因为照俄国的老规矩，总怕遇到战争时没有盐吃）。

在九月底，被告们被押回卡德去公开审判。这条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别庭和不公开审判之类的省钱办法！）：从伊凡诺沃到基涅什马乘斯托雷平车厢，从基涅什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车。汽车有十辆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经行荒凉古道，它们在农村中引起惊奇、恐惧和战争的预感。克留根（省内务局处理反革命组织的特密处处长）负责整个审判的组织工作，要求做到既无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吓作用。骑警后备队派

出四十人担任警卫，从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枪出套地把一千人犯从区内务科带到还没有修建完工的俱乐部去，往返经过卡德镇的街道——经过这个他们不久前还是它的政府的镇子。俱乐部已经装上了窗子，但舞台还没有建成，也没有电（在卡镇德根本没有电），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灯下开庭。从各集体农庄按摊派原则运来听众。整个卡德镇的居民全来了。不仅坐在长凳上和窗台上，过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样每次都装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罗斯毕竟是喜欢看这种场面的）。前排的长凳固定给党员坐，以便法庭始终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长舒平、审判员比切和扎奥焦洛夫组成了专门庭。德尔普大学的毕业生省检察长卡拉西克负责起诉（虽然被告们都放弃辩护，但强加给他们一个官方律师，为了使审判不致没有检察长参加）。庄重、严厉和冗长的起诉书归结如下：在卡德区有一个由伊凡诺沃来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那里也等着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团在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暗害活动推翻卡德镇的苏维埃政权。（右派为了发难找不到比这更大一点的偏僻角落了！）

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一个申请：斯塔夫罗夫虽然已在狱中身死，但他临死前的供述应在这里宣读，并应认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团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罗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却有一个优越性，受审人谁也不能同他争议了）。

但是，卡德镇的愚昧的群众并没有察觉出这些学问高深的奥妙，他们等待着的是往下怎么进行。在侦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当众宣读了一遍并重新作了笔录。开始讯问受审人，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局面！——他们**全体拒绝承认**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供认！

不知道在工会大厦的十月革命厅里遇到这种情形会怎样处理——而在这里则毫不害臊地决定继续进行！审判员责备说：在侦

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那么说？已经衰弱无力的乌尼魏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公开的法庭上讲出内务机关里使用的审讯方法。”（这是布哈林审判的模式。正是这点束缚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不要使人民对党产生坏的想法。他们的审判员们却早已不去操这个心了。）

在休息时，克留根巡视了受审人的监室，对弗拉索夫说：“听到了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怎样拆烂污吗？你应当承认自己有罪，应当把实话都说出来！”还没有变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对，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跟德国法西斯分子毫无区别！”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妈的……你会付出血的代价的！”[39]从这时候起，弗拉索夫在审判中便作为集团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转为第一位的角色。

当出现了以下场面的时候，在塞满过道的群众眼里，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气壮地谈论排队买面包的现象，谈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事（尽管在审判开始之前当然大量地出售了面包，所以今天没有排队的现象）。向受审人斯米尔诺夫提出问题：“你知道区里排队买面包的现象吗？”“是，当然知道，队伍从商店一直排到区委会门前。”“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斯米尔诺夫尽管备受摧残，但还保持了响亮的嗓音和对正义的沉着的信心。这是一个长着一张质朴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头发的人，他讲得从容不迫，大厅里听得见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向省级机关的一切呼吁都无济于事，我委托弗拉索夫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同志。”“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写出来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马虎过去了！）“我们写了，我通过信使越过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区委的档案里。”

---

[39] 很快很快你自己的血就要流出来了！——克留根将被卷进叶若夫一伙国家安全人员的鱼群，将在劳改营里被坐探古巴依杜林砍死。

整个大厅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阵慌乱。本来可以不再往下问了，但有个人还是问道：

"结果呢？"

对呀，这是挂在大厅里每个人嘴边的问题：

"结果呢？"

斯米尔诺夫没有因理想的破灭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受审者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他响亮地，镇静地回答：

"没有结果，没有答复。"

在他的疲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说实话，我也是这样预料的。

没有答复！父亲和导师没有答复！公开审判到此已经达到顶峰！它已经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肠拿出来示众了！审判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不，他们哪有这种分寸感和头脑，他们还硬要在这块尿湿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检察长破口大骂起来：两面派！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只手搞暗害，另一只手却胆敢向斯大林同志写信！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答复？？让受审人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样想出停止售卖面粉、停止在区中心烤黑麦面包这类残无人道的暗害行为的？

小公鸡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来冲着全厅尖声叫道：

"如果你，检察长卡拉西克，离开公诉席坐到我旁边来，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对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简直莫名其妙。喧嚷、叫声。快维持秩序！你说什么……

用这种方式抢到了发言权以后，弗拉索夫现在原原本本地把话说清楚：

"禁止出售面粉，禁止烤黑面包，有省执委主席团发下来的决定。省检察长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团常委。如果这是暗害行为

——为什么你不以检察长的名义禁止呢？可见——你当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检察长喘不过气来了，打击来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哝哝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审判检察长的。今天我们审判的是你。”

（两种是非标准——以等级高低为转移）

逞勇好斗、不肯罢休的弗拉索夫继续追击：

“那我要求把他从检察长席上撤下来！”

休息……

咳，这样的审判对群众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审讯被告后开始讯问证人。会计H。

“关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过证人室，那里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

“不需要听见！许多文件都经过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没有问题。”

“你瞧，这是一叠区报，甚至这里都说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而你却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请去讯问那些写文章的人吧！”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 是受审人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象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㊵

---

* 俄国人称本名和父名是表示尊敬。——译者注

㊵ 总地说来——他只在这一点上说错了。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青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凡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受审人和群众（群众真象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发出来……[41]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

[41] 让这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第十一章

极　　刑*

死刑在俄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在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 的刑律中规定有五十种情节最高可适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军事条令中已经有二百个这样的条款了。叶丽莎白女皇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据说她在登基时曾许下不杀一人的誓愿。因此她在位的整个二十年间就没有处死过一个人。尽管进行了七年战争！仍是避免了死刑。对于雅各宾共和国出现以前半个世纪的十八世纪中叶说来，这确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例。诚然，我们已经惯于嘲笑自己过去的一切；从来也不承认过去有什么善良的行为，善良的意图。所以也完全可以给叶丽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贼”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亚。但我们要为女皇说句辩护的话：她怎能违背社会观念去作更激进的改革呢？也许今天的死刑犯为了能在阳光下活下去甘愿选择上述全套的刑罚，而我们却出于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这个办法？也许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读者还会倾向于以下

---

* 直译应为“最高方法”。苏联十月革命后一度废弃了一些旧名词而代之以新名词。如监狱改称隔离所，刑罚改称社会保卫方法。后又陆续恢复旧称。这里的最高方法即指死刑而言。——译者注

** 十七世纪的俄国沙皇。——译者注

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国劳改营生活要比叶丽莎白女皇的刑罚更难受。

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叶丽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类的观点，而叶卡德琳娜二世则是——阶级观点（因而比较正确）。她觉得完全不处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皇位和制度，在遇到发生政治叛乱的情况下（米罗维奇、莫斯科鼠疫暴乱、普加乔夫），她认为采用死刑是完全适宜的。而对于刑事罪犯，对于日常生活罪犯——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已经废除了死刑呢？

在保罗皇帝的时候，废除死刑得到了确认（有过多次战争，但团队里却没有军事法庭）。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长年代，只对战争中犯下的军职罪实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马上会有人对我们说：列队鞭打致死呢？没有话说，不宣布的杀人当然是有过的，一次工会会员大会也可以置人于死地！但由司法人员表决决定你的死活的事情——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这半个世纪内，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国事罪犯都没有遇到过。）

五名十二月党人的鲜血激起了我们国家的嗅觉。从那时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没有废除过，也没有忘掉过，它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〇四年的刑法典所确认，还得到了陆军刑律和海军刑律的补充。

这个时期内在俄国有多少人被处死刑呢？我们已经援引过（第八章）一九〇五——九〇七年一些自由主义活动家的统计。现在再补充以俄国刑法专家 H·C·塔干采夫①的经过核实的一些材料。一九〇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国是一种非常手段。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〇五年这三十年内（这正是民意党人和恐怖行动——而不是在公用厨房里谈论出来的意图——的时期，大规模罢工和

① 参看H.C.塔干采夫著：《死刑》，1913年圣彼得堡报。

农民骚动的时期；未来革命的各政党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共处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十七人（这是与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②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一九〇五——一九〇八年共处死将近二千二百人（一个月四十五人！）。塔干采夫的书里把这称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断了）。

临时政府在其就职时完全废除了死刑。一九一七年七月，它在作战军队和前线各省里恢复了死刑——以惩罚军职罪、杀人、强奸、抢劫（当时在这些地区甚为猖獗）。这是断送了临时政府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布尔什维克号召起来革命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被克伦斯基恢复的死刑！"

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间，在斯莫尔尼宫发生了一次争论：是否以最初的一个法令宣布永远废除死刑？——列宁当时公正地嘲笑了自己那些同志的空想主义，他知道，不采用死刑是不能朝新的社会方面移动一步的。然而，在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对他们的错误观念作了让步，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还是废除了死刑。这个"慈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产生出什么好结果。（而且是怎样废除的呀？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审判新晋升的海军上将阿历克赛·夏斯特内，因为他拒绝凿沉波罗的海舰队。"高庭"审判长卡尔克林用恶劣的俄语飞快地说了一句："二十四小时内枪决。"审判厅内激动起来：已经废除了！检察长克雷连科解释说："你们激动什么？废除的是死刑。而夏斯特内我们不是处死刑——是枪决。"于是就枪决了。）

---

② 在施吕塞堡从1884到1906年共处死……13人。这对……瑞士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如果拿官方文件来判断，从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复了——不，不是“恢复”，而是——作为死刑的一个新纪元确立下来了。如果确认拉齐斯③不是有意缩小而只是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如果确认革命法庭完成的审判工作量至少与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俄国的二十个中心省份里，十六个月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枪决了一万六千多人，就是说**一个月超过一千人**。④顺便说一句，被枪决的人中包括俄国第一个（一九〇五年彼得堡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辽夫-诺萨利和那个设计了红军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军服的美术家。

然而，一九一八年来临的死刑新纪元使俄国忽而浑身冰凉，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许还不是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后来加起来有成千上万的个别的枪决。

我们觉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战双方采用的而后来变为胜利者一方采用的时髦做法——凿沉驳船，每次都装着未计数的、没有登录的、甚至没有点名的几百个人（把海军军官沉没在芬兰湾、白海、里海和黑海，到了一九二〇年还把人质沉没在贝加尔湖里）。这不包括在我们的这部狭义司法史的范围内，但这是风习史，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从第一个留里克起，我们的各个时代有过象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中那么残酷和杀过那么多人的时期吗？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错，在一九二〇年一月曾废除过死

③ 参看已引用过的拉齐斯的著作：《内部战线斗争的两年》，1920年版，第75页。

④ 既然已经作了比较，那就再作一个比较，宗教裁判高峰时期的八十年（1420—1498），在全西班牙被判处火焚的共有一万人，就是说每月将近十人。

刑，那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有代表性的曲折。当库班还有邓尼金、克里米亚还有弗兰格尔、而波兰的骑兵正在备鞍出征的时候，专政却丢掉了手中的惩罚之剑！有的研究者在专政的这种轻信态度和放弃防御的做法面前甚至会不知所措。但是，第一，这个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的非司法的行动和后方法庭）。第二，已经用预先清理监狱的方法为它做了准备（把以后可能“合乎法令规定”的犯人大批枪杀）。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的效力是短期的——四个月（直到在监狱里重新积累起犯人为止）。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法令把枪决权交还给了全俄肃反委员会。

革命急于把一切都改名换姓，以便使每个事物看起来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为——最高方法，并且不叫做“刑罚”的最高方法，而是所谓“社会保卫”的最高方法。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纲要》向我们解释说：这种最高方法只是未经中执委宣布完全废除以前的一项临时规定。

一九二七年的确开始废除这项最高方法了：只留下它用来惩治反对国家和军队的犯罪（五十八条和军职罪），以及惩治武装伙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对“武装伙匪”的政治上的广义解释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巴斯马赤匪徒到立陶宛的森林游击队，任何一个不赞成中央政权的武装民族主义分子都是“武装匪徒”，没有这一条怎么行呢？还有劳改营的暴动分子和城市骚乱的参加者——也是“武装匪徒”）。至于那些有关保护私人的条文，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废除了其中的枪决规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前，颁布了八七法，* 这一项社会主义即将到来时期的重要法律许诺给每一个拿了国家一星半点东西的公民一颗子弹。根据这项法律，死刑的适用范围又增加

---

* 即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法律，见前文。——译者注

了一个内容。

和历来一样，特别是在起初的时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这条法律的人成群结队，那时枪也开得特别勤奋。在这个和平时期（基洛夫还在世的时候……），光是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时就有二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处决⑤——只拿克列斯特监狱一地来说，一整年内就能超过一千名了吧？

这是些什么样的坏人呀？从哪里搜罗起那么多的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举一个例子，那里关着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犯下的罪过是：在集体农庄（用他们自己的手）割草完毕后，他们又去割过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来喂自己养的牛。**这六个庄稼人全没有得到全俄中执委的赦免，判决付诸执行！**

多么凶恶的萨尔蒂契哈！*最卑鄙丑恶的农奴主恐怕也不能为割点倒霉的草而**杀死**六个庄稼人！……只要他用树条把他们打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并在学校里诅咒开他的名字。⑥而现在，好象石头掉进水里，扑通一声就无影无踪了。我只是还暗存着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证人的叙述会得到文件的证实。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没有杀死过什么人——光为这六个沙皇村的庄稼人我也会认为他是值得五马分尸的！然而竟还有人敢于向我们尖声叫喊（从北京，从地拉那，从梯比里斯，也不乏莫斯科郊区的肥猪们）："你们怎么胆敢去揭露他？""怎敢去惊扰伟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属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而在我

---

⑤ 给死刑犯监室送饭的Б作证。

⑥ 在学校里唯独不知道的是，萨尔蒂契哈因为自己的暴行依（本阶级的）法院的判决，曾在莫斯科伊凡诺夫修道院的地下监狱里蹲了11年（参看普鲁加文著：《修道院监狱》，"中间人"出版社出版，第39页。）

* 杀人成性的女农奴主，见前。——译者注

看来只是属于刑法典的。“全世界人民深切怀念着他……”——但决不是那些曾被他骑在头上的人们，决不是那些他用鞭子抽打过的人们。

不过，还是恢复冷静和公正吧。当然，全俄中执会既然已经许下了诺言，本来一定会“完全废除”最高方法的，——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亲和导师“完全废除”了全俄中执委本身。至于最高苏维埃，听起来更接近安娜·伊凡诺夫娜女皇下面那个“最高枢密院”。这时枪毙已经名正言顺地称为“极刑”，而不再是什么不明不白的“保卫”方法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枪声甚至斯大林的耳朵听起来也已经不能容纳在“保卫”里了。

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只敢重复一下那些小道数字，一九三九——四〇年在布蒂尔卡的拱形屋顶下这些数字还当做新闻传来传去，它们来自前不久住过这些监室的垮了台的高中级叶若夫分子（他们是知道的！）。叶若夫分子说，在这两年里全苏联共枪决了五十万“政治犯”和四十八万盗窃犯（五十九条3，他们是作为“雅果达的基础”被枪决的，这样一来，“老一代的高尚的盗贼世界”便被拦腰斩断了）。

这些数字是否那么难以置信呢？枪决人犯前后用的时间没有两年，而只有一年半，这样计算，每月平均就应当枪决（只就五十八条而言）二万八千人。这是在全苏联范围。那末刑场有多少处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处（实际上当然比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许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里都设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和枪决场所。到一九五三年这些教堂还不让参观：有“档案”；十年没有打扫的蛛网尘封的“档案”。在修复工程开始前，用卡车从那里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说一天中押

到同一地点枪决的有六人。难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吗？这甚至是缩小了的！（根据另一些资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枪决了一百七十万人。）

在卫国战争时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时而扩大了范围（如铁路的军事化），时而丰富了形式（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关于绞刑的法令）。

所有这些事件稍稍推迟了原来许下的完全彻底和永远废除死刑的诺言，然而，我国人民以忍耐和忠诚终于赢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着镜子试用浆得笔挺的衬衣硬领时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二十五年。发行“二十五元券”的一个好借口）。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犯罪成性的、不识好歹的。因此当权者勉勉强强两年半没有用死刑，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就颁布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法令：“鉴于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工会（这些可爱的工会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各农民团体（这是在梦中口授的，所有的农民团体还在大转变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践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叛国分子，间谍和颠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这样留下了。）

我们所习惯的杀头既然已经开始恢复，接着就毫不费力地蔓延开来了，陆续规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对故意杀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对盗窃国家财产、伪造货币、监禁场所的恐怖行为（指杀死坐探和恐吓劳改营管理人员）；一九六一年七月对违反金融业务规则；一九六二年二月——对企图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纠察队员的生命；同年——对强奸；对贿赂行为。

但所有这些——都是未经完全废止之前的临时性规定。⑦

今天还是这样写的。

结果是，在我国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叶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时期。

* * *

在我们的称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们把死囚想象成为命中注定的，为数不多的个体。我们本能地确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落入死牢的。进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经历过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脑子需要翻很多个儿才能设想：有许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进了死牢的，并且看谁的运气如何——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头”（囚犯们这样称呼“极刑”，他们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话，总是把一切说得粗鲁些，简短些）。

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错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死刑！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场里锅驼机进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虽然后来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值得判处死刑！*

这样，伊凡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

---

⑦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1959年第1期——苏联刑事立法纲要，第22条。

* 从姓氏判断，法吉列维奇是犹太人，故云。——译者注

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拉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凡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

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减、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即便瞧瞧他们吧。

波克罗夫斯基·维克多·彼得罗维奇——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施特罗宾德尔·亚历山大，大学生——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安尼奇科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一九二七年枪决于卢宾卡。

斯魏钦·亚历山大·安德烈维奇，总参谋部教授——枪决于一九三五年。

列福尔马茨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勒尔。

安尼奇科娃·叶丽莎白·叶夫根尼耶芙娜——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

* 列宁格勒的一个市区。——译者注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钦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⑧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牢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监室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二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

⑧ 契诃夫出版社出版。

样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凡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判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象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H·И·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4.死刑犯受无医疗救助之苦。奥赫拉明科因长时间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仅没有被送入医院，而且医生好长时间都不来，来了也不进监室，不看也不问，就把药粉从栅栏

门里递进去。斯特拉霍维奇的脚开始出现水肿，他向看守说明了这个情况——却派来了……一名牙医。

就算医生来过问病情，他是否应当治疗死囚呢，就是说是否应当延长他等待死亡的时间呢？或许医生的人道精神应当表现为坚决要求尽早处决？请看斯特拉霍维奇描述的又一个场景：医生走进监室，一边同值班员谈话，一边用手指头点着死囚说："死人！……死人！……死人！……"（他这是挑出营养不良症患者指给值班员看，坚决反对继续这样折磨人，该到枪决的时候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得那么久呢？刽子手不够吗？这个问题要和下述情况一并考虑：监狱当局向许多死囚提出建议甚至请求他们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如果他们过于执拗，不愿再作交易，则往往代替他们签名。而公文旅行起来起码得几个月。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 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囚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

* 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译者注

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⑨

对于数学副教授A·H·Π·，侦查员克鲁日科夫（不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Π·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所以世界文学对临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契-夫的叙述），死牢可以利用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作为施加影响的方法。突然把两个不肯招认的犯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去"审判"，"判处了"死刑，转入死囚监室（契-夫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是做戏。"但是，在任何审判都是做戏的情况下，该用什么词儿称呼这种假审判？舞台上之舞台？戏中之戏？）。让他们在这儿饱尝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个耳目，假装也是死囚，放进牢里。这些人忽然纷纷表示悔悟，说自己不该在侦查时顽固不化，请求看守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囚，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⑨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搞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使用的“最高方法”。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 * *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

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听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凡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无论批准死刑还是赦免的通知都没有收到，只好把四个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马去。用四辆中型卡车来运他们，每辆车上装着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马把他们关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摆脱了僧侣思想的修道院建筑术对我们大有用处！）。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车辆运到了伊凡诺沃。

在伊凡诺沃监狱的大院里单独挑出了三名犯人：萨布罗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个，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说，押去枪决，免得增加监狱的负担。弗拉索夫就这样同斯米尔诺夫诀别了。

留下来的三个人，在十月的阴冷潮湿的第一监狱院子里关了

四个小时，这时间，一批批犯人被带走、送来和搜查。实质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不会枪毙他们。萨布罗夫有一刻以为是来带去枪决（实际上是带到监室去）。他没有叫喊，但把旁边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劲，使那人痛得叫了起来。警卫拉着萨布罗夫在地上拖着走，用刺刀在后面推着。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守和监楼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象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窸窣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有时夜里门锁响了，人们的心吓得要蹦出来。带我吗？不是我！！而看守打开木门却是为了一件屁事：“把东西从窗台上拿掉！”这一开门不打紧，可能使所有十四个人都早死一年；也

许，再这样开上五十次门——那就不需浪费子弹了！——但是多么感谢他呀，原来平安无事："马上就拿走，首长公民！"

早晨上厕所回来，解除了恐惧后，他们开始入睡。然后，看守送来一桶烂菜汤，说了声"早上好！"按照狱规，第二道门，即铁栅栏门，只有在监狱值班员在场下才能打开，但谁都知道，人们总是要比自己的规定和条令好一些，也懒一些——值班员不出面，看守总是单独走进早晨的监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贵！——向犯人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向死囚们打这样一声招呼比向人世间任何人打这样的招呼更加善良！怀着对这个声音的温暖和对这桶稀汤的温暖的谢意，他们现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们才吃得下东西！白天睡醒后，许多人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来的食物——死刑判决亲属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这些食物就成了监室里的公有物，但却放着没人碰，在恶浊潮湿的空气中腐烂）。

白天，监室中还有一次小小的活跃。监楼长进来——或者是阴沉的塔拉干诺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马卡罗夫——供给写请求书用的纸张，问有钱的人要不要委托从小卖部代买烟抽。这些问题显得或者太野蛮，或者过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死囚的样子？

犯人们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画上点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对别人讲述合作社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是带着喜剧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渐松驰下来。⑩有一个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的犯人，是苏多格区执委会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线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他蹲在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

⑩ 他关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单独叙述。

变姿势，两手抱紧脑袋，肘靠在膝盖上，老是盯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他回忆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轻松愉快的！……）。弗拉索夫的爱说话使他生气："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备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讥，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话里也还保持着北俄人的浓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个主意——我要对刽子手说：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个！不是审判员，不是检察长，——就你一个，现在你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吧！——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自愿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判决！让他杀吧，坏蛋！"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象不能相信他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当这样旷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时候——头发也长起来了，于是全监室就被带去理发，带去洗澡。监狱生活遵守着它的常规，不管有什么判决。

有的人已经语无伦次，神智混乱，但他们照样还得留在这里

等待自己的命运。有谁在死囚监室里发了疯，就疯疯颠颠地被枪决。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来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的，它们代替了许多枪决。也有改判为十年的。甚至有减为五年的。在奇迹的国度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昨天夜里还是罪该处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园的刑期，轻罪犯人，而且在劳改营里还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会。

在他们的监室里，有一个六十岁的库班人、前哥萨克大尉B·H·霍明科，他是"监室的灵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灵魂的话：他时常说笑话，胡子里露出微笑，不让人看出心里有痛苦。——早在俄日战争以后，他已经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养马业的专家，在省自治局任职，到了三十年代，在伊凡诺沃地政局下头担任"工农红军马匹补给督察员"，责任是注意使军队保证得到良好的马匹。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枪决，是因为他曾暗害性地建议阉割不满三岁的马驹，从而"损害了红军的战斗力"。——霍明科提出了上诉。过了五十五天，监楼长进来向他指出，他在上诉书上写的机关不对口。霍明科当下就把纸贴着墙用监楼长的铅笔涂去了原来的机关，改写成另一个机关，好象这是一张申请买一盒香烟的条子。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明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来的不少，许多人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为与别人对照，认

为自己的情节比较严重。同时，总得枪毙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数的死囚总该处决吧？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枪毙。只想即使如此也决不低头。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顾死活的气质重新聚积起来，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决心。

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伊凡诺沃国家安全局侦查处长钦古利巡视监狱时，不知为什么（多半是为了刺激刺激神经）让人打开他们监室的门，自己站到门槛上。他说起什么事情，问道：

“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

他穿着一件短袖绸衬衫，这种衬衫当时刚刚出现，人们还觉得它象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这种衬衫上散发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冲到监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声大叫：

“这是个什么殖民军官?!滚蛋，杀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浓浓地往钦古利脸上啐了口吐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个人——擦了下脸，后退了。因为他只有和六个警卫人员一起才有权进入这个监室，而且也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应当这样做的。如果现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决于他，那怎么办呢？须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地问：“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这时候家兔们的脑子亮堂了，他们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给肉和皮毛，因此顶多只能赢得延缓死期，而不会赢得生存。这时候忍不住要呐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枪毙就赶快！”

在等待枪决的四十一天中，正是这种愤恨感越来越强烈地控

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凡诺沃的监狱里曾经两次建议他写赦免请求书——他都拒绝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免处极刑，改判为二十年劳动改造营监禁，刑满后剥夺权利五年。

脸色苍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这种场合也还有说的：

“奇怪。我被判刑是因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胜利。但是，难道加里宁相信吗？如果他认为，经过二十年在我们国家里还需要有劳改营……”

经过二十年——这在当时看起来是远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过了三十年劳改营也还是需要的。

第十二章

监　　禁

啊，俄文中ОСТРОГ* 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象活现在其中。什么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冻木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营区围墙的尖桩的锋锐，当然还有铁丝网上的铁蒺藜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

如果对整个俄国的牢狱习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纵的观察，就拿这个机构的最近九十年来说——明显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个犄角，而是先后长出的两个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个用来触人的地方，就是连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象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这是

---

* ОСТРОГ“奥斯特勒奥格”牢狱——这个字的原意是用尖桩紧排成的围墙，与“严厉”（СТРОГОСТЬ），“鱼叉”（ОСТРОГА），“锋锐”（ОСТРОТА），“谨慎”（ОСТОРОЖНОСТЬ），“犄角”（РОГ）等字有字源、字意或音节上的共同点。——译者注

二十世纪初）——但是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儿。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喝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① 并且，马上发出哨……（TOH）的一声，②象远方传来的深夜的警钟——它每年都发出一次轰鸣。

如果只根据施吕塞堡监狱（沙皇时代监狱）某一个犯人的经历来考察这条抛物线，③ 那末一开始是有点可怕的：一个囚犯只有号数，谁也不称他姓名；宪兵们——象是在卢宾卡训练出来的：私下不对你说一句话。你结结巴巴说出个“我们……”——“请您只说自己！”死一般的寂静。牢房永远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沥青的。通风小窗每天只打开四十分钟。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不让从图书馆借学术书籍。两年看不到一个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后——才给一些编上号码的纸张。④

后来，慢慢地——增加了活动余地，变得圆通起来了：白面包也有了，带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钱还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禁止；玻璃装上了透明的，气窗经常开着，墙壁改刷成浅一些的颜色；也可以凭借书证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了；菜园子之间装的是栅栏，可以谈话，甚至可以彼此讲演。囚犯们已经向狱方进逼了：再给我们一些土地！再给一些！已经有两个监狱院子装饰上树木花草。种的花卉和蔬菜已经有四百五十个品种！瞧，还有了科学搜集工作、木工房、锻工场，可以挣钱，可以购买书籍，

---

① 监狱禁锢（官方用语）。

② TOH——特种监狱的俄文缩写字。

③ 参看B·费格涅尔著《铭记不忘的劳动》。

④ 根据M·诺沃鲁斯基的统计，从1884到1906年在施吕塞堡监狱有三人自杀和五人发疯。

甚至购买俄国的政治书籍，⑤可以从国外订购杂志。还可以同亲属通信。放风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费格涅尔回忆，逐渐地“已经不是狱吏在叫喊，而是我们冲着他叫喊了”。在一九〇二年，狱吏拒绝送出她的申诉书，为此她撕下了狱吏的肩章！后果是这样的：来了一个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种种的放松和放宽是怎样发生的呢？费格涅尔认为有的事情与个别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另外的原因是“宪兵们和被看管者”混熟了、习惯了。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毕竟认为：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要是没有这种空气，大约只能和宪兵们一起每星期一学习一次简明教程*，再就是勒的更紧，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也芙娜撕掉狱吏的肩章后所得到的也不会是“铭记不忘的劳动”，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这时，一九一七年降临俄国，骑在它肩头的便是一九一八年。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

⑤ П·А·克拉西科夫（就是那个后来判处文涅明大主教死刑的人）在彼得保罗监狱读《资本论》（只关了一年就把他放了）。

* 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译者注

不容许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从二月起，所有的政治犯监狱、服刑监狱和侦查监狱，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变空了——那些监狱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们是怎样度过这一年的——颇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园子、靠种土豆勉强餬口（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们就好过多了，在施巴列尔监狱，直到一九二八年，他们还在为新政府服务，日子满过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明白，没有监狱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关在铁窗后面没有地方可放（参看第二章）——说得干脆些，就是因为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两个犄角之间的那块平地就这样摸索着走过了，开始摸到了前头的第二个犄角。

当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监狱的各种惨状再也不会重复：再不会搞什么讨厌的感化、什么狱中禁止交谈、单人牢房、隔离放风和排成单行的齐步走，甚至监室也不会上锁！⑥——亲爱的来宾们，请你们互相见面吧，尽情畅谈吧，彼此对布尔什维克发发牢骚吧。而新监狱当局注意的方向是执行外部警戒职务和接收沙皇监狱的财产（它恰恰不是那种应当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监狱或牢狱在国内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是这些弄脏了的旧字眼免不了要改换。现在把它们称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连在一起构成的名称表明：承认过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员是政治上的敌人，并指明铁窗并不具有惩罚性质，而只是必须把这些过了时的革命者同新社会的前进过程隔离开来（而且，显然是临时的）。各个老中心监狱（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好象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拱顶监室就在上述条件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全都意识到自己的囚犯的权利，并带

---

⑥ 参看《从监狱到教育机关》文集。

着早已经过考验的传统——如何坚持这些权利。他们把以下的待遇视为法定的权利（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认了的）：领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粮（包括一天半包香烟）；从市场购买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许多小时的自由放风；监管人员对他们以"您"相称（而他们自己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可以不站起来）；夫妻住在一个监室里；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脸刀和剪刀——都放在监室里；一月三次收发信件；一月会见一次；窗户当然是不用任何东西挡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笼口"这个概念）；监室间走来走去不受阻碍；放风院子要有树木花草、丁香；自由选择放风同伴，并且可以把装有信件的口袋从一个放风院子扔到另一个放风院子；怀孕女犯⑦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

---

⑦ 从1918年起就满不在乎地把怀孕的女社会革命党人抓进监狱。

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塞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

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啊！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嗞嗞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季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象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种营长官艾赫曼斯⑧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点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出去。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出去散步。但是萨瓦季隔离区的长官诺格捷夫想摸枪的手早就痒痒

⑧ 多象艾赫曼（德国法西斯头目，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译者注），如何？……

了，还在规定的晚上六点以前（也许是钟表没有走准？当时还不能根据无线电广播对表）看押人员就带着枪进入区内，并向着合法散步的人开起火来。放了三排枪。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

次日，艾赫曼斯前来说：这是个可悲的误会，诺格捷夫将被撤职（调走高升了）。为死者们举行了葬礼。合唱队的歌声在索洛维茨的荒野上空响起。

"你们在……殊死斗争中光荣牺牲"。（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为悼念新牺牲者唱这支缓慢的曲调吧？）推来一块巨大的圆石压在他们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⑨

不能说报界隐瞒了这一事件。在《真理报》上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犯人们袭击了看押人员，六人被击毙。诚实的《红旗报》* 描述了索洛维茨的暴动。⑩

然而管理制度毕竟是被他们维护住了。整整一年谁也没有说起改变的事。

不错，整个一九二四年都没有说起。但到这年年底，一种顽固的流言又爬到耳边来了，说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饿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岛上的三个修道院——萨瓦季、三位一体和穆克萨姆——里的社会党人们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这三个修道院里的各党团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维茨行政当局提出带有最后

---

⑨ 在1925年，石头被翻转了，上面刻的字被盖在下头。现在去索洛维茨列岛游览的人们——请找一找，瞧一瞧吧！

⑩ 在萨瓦季修道院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个叫尤里·波德别尔斯基的。他搜集了关于索洛维茨枪杀事件的医疗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过了一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进行搜查时，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双层底，把暗藏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俄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栽跟头的……

*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译者注

通牒的声明：或者在航运断绝前把他们全体从这里运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变，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两个星期，否则，各修道院将宣布绝食。

这样的一致行动是能迫使当局认真考虑的。这种最后通牒是不能当作耳旁风的。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个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绝了。于是，在预定的日子，三个修道院里（现在彼此已经失掉了联系）都开始了绝食（不是干绝食，水是喝的）。在萨瓦季绝食的约有两百人。他们主动不让病号参加绝食。囚犯中间的医生每天巡视绝食者，集体绝食总是要比个人绝食难坚持：因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强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坚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食才有意义。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党团，由于有几百个人参加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会因他人而产生精神上的苦恼。绝食了十五个昼夜以后，在萨瓦季不得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票箱在各房间传送）：继续坚持或者停止绝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静观态度，因为他们是吃得饱饱的，首都各报也不忙于发表关于绝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旁也没有举行大学生群众大会。密不透风的封闭性坚定不移地改变着我国历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绝食。他们没有打赢，但是从结果看，也没有打输：管理制度照原样保持了一个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劳动，但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给人以相反的感觉——似乎绝食赢了：举行过绝食的三个修道院里的囚犯都从索洛维茨运走！回大陆！再也不会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绝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队和路途的口粮配给是很严峻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很快就阴险地把他们骗了：借口说组长们住在“指挥部”车厢里与管理部门在一起比较方便，使犯人们失去了

领导。组长们乘坐的车厢在维亚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尔斯克隔离所。这时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绝食输掉了：把坚强的、有影响的组长们弄走是为了便于对其余人施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雅果达和卡塔年亲自领导了把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安置到早已盖好但迄今还没有住人的上乌拉尔隔离所的牢房，这个监狱就这样由他们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狱长是杜波尔），并将在好几十年内成为吓人的庞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们立即被剥夺了自由行走的权利：监室都上了锁。总算又选出了组长，但他们没有权利巡视各监室。禁止在各监室间象从前那样无限制地转移钱物和书籍。他们通过窗口互相喊话——哨兵便从了望塔上往监室里开枪。犯人们回敬以故意捣乱——打碎玻璃，弄坏监狱的器具（在我们的监狱里事先还得好好考虑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说不定一冬天都不给装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象在沙皇的时候镶玻璃工一眨眼间就跑来了）。斗争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怀着绝望的心情并且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宾的叙述）一个什么原因引起了整个上乌拉尔隔离所又一次全体绝食。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他们那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友爱的鼓励、自己的医生。在绝食的某一天，狱吏们以占优势的人数闯进各监室去——毫不客气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体变衰弱了的人们。毒打完了——绝食也就结束了。

* * *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

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狱吏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一个囚犯绝食了，他们就惶惶不安、唉声叹气、服侍照顾，送医院。例子多不胜举，但这本著作不是专门讲这种事的。说来可笑，瓦连廷诺夫* 只绝食了十二天——便争取到撤销侦查，完全释放（随后便到瑞士去见列宁），而不是什么管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奥尔洛夫的中心苦役监狱里绝食者也总是取得胜利的。他们在一九一二年争得了放宽管理制度；在一九一三年争得了进一步的放宽，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风——这种放风显然是不受什么管束的，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自己的“告俄国人民书”，并把它送到了外面（这是来自中心监狱的苦役犯！）它也就发表在（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中间有人疯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流放通报》上⑪（通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否也试试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四个同志总共只经过五昼夜的绝食，诚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为数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⑫

在那些年代，绝食除了饥饿的煎熬外，对囚犯是没有任何其他危险或困难的。他不会因绝食而受到毒打、不会第二次判刑、不会增加刑期，不会被枪杀或者押解到别处（凡此种种都是后来的发明）。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们感到自己简直是监狱的主人，所以已经无须费力去宣布绝食了，他们或者是

---

* 沃尔斯基的笔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译者注

⑪ 参看盖尔涅特著：《沙皇监狱史》，1963年莫斯科版，第五卷，第八章。

⑫ 同上。

捣毁公物（捣乱），或者是异想天开地宣布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〇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口的窗户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叶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食是怎样进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淡起来了（当然这要看从谁的观点来说……）。采用这个众所周知并且曾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的人，当然不仅有被承认的“政治犯”而且还有不被承认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条），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这些曾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点变钝了，或许是它们一发射出去就被一只铁手截获了。诚然，还接受关于绝食的书面声明，并且暂时也还不认为它们有什么颠覆性质。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规则：绝食者应当被隔离在专门的单人监室里（在布蒂尔卡是关在普加乔夫塔楼里）：不仅外面的集会群众、不仅邻近的监室不应当知道绝食情形，甚至绝食者在今天以前蹲过的监室也不应当知道——因为这儿也是舆论界呀，也应当同它脱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监狱当局必须确知，绝食是做得诚实的——监室里其余的人没有暗中给绝食

者东西吃。（以前是怎样检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年代还是可以通过绝食来争得至少满足一些个人的要求。

从三十年代起，国家对待绝食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即使象这样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杀得半死不活的绝食——说实话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囚犯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监狱当局替他们思考和决定——这种状况不是更理想吗？大概只有这样的囚犯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于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关于绝食的合法化的声明。“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绝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叶卡德琳娜·奥利茨卡娅这样宣布，还向许多人这样宣布过。当局已经取消了你们的绝食——别无二话。但是奥利茨卡娅没有听从，仍然开始了绝食。让她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绝食了十五昼夜，然后把她送进了医院，为了诱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坚持下来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风时间延长了，领到了报纸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头！）总的说来，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奥利茨卡娅记得其他人也搞过这种荒唐的绝食：为了要求发给寄来的包裹或更换放风同伴而绝食了二十天。值得这样做吗？要知道在新型监狱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来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绝了食——在第二十五昼夜上死掉了。一般说在新型监狱里能不能允许自己绝食呢？因为在封闭性和保密性条件下，新的狱吏们拥有了下列一些对付绝食的强大手段：

1.行政当局的忍耐（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

2.欺骗。这也是由于封闭性才有可能。当每一个步骤都会被记者们张扬出去的时候，欺骗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们这里干吗不搞欺骗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里C·A·切包塔辽

夫绝食了十七昼夜，要求通知家属他在什么地方（他从中东铁路回国，突然“失踪”，妻子在家惦念，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扎帕德内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来到他那里（从官衔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绝食是不那么常见的），向他出示了一张电报收据（瞧，已经通知了你妻子！）——靠这东西说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汤。可收据是假的！（为什么大官们毕竟沉不住气了呢？决不是担心切包塔辽夫这条命。显然在三十年代前期他们对于旷日持久的绝食还得承担一点个人责任）。

3.强制人工灌食。这个方法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它也只有在封闭性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人工灌食显然已经很为流行了。例如，社会党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举行集体绝食时，在第十五天对他们全体实行了人工灌食。

在这个行动中很多是从强奸吸取来的——正是如此：四个壮汉扑到一个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个禁区——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会怎么样——无关紧要。这里从强奸学来的还有——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乖乖躺着服从吧。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受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学没有停滞，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过肛门灌肠，通过鼻孔点滴。

4.对绝食的新观点。绝食是反革命活动在监狱内的继续，应当用新的刑期加以惩罚。这种观点本来可以在新型监狱的实践中创立一条极丰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胁的范围。当然并不是幽默感妨碍它的实行，大概只不过是由于懒惰：既能忍

耐，何必找那些麻烦？饱汉在饿汉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中，来了一道新的指示：监狱行政当局今后对因绝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负责任！狱吏的最后的个人责任也消失了！（现在边疆区检察长已经不会再到切包塔辽夫那里去了！……）不但如此，为了使侦查员也不必担心，提出这个办法：受侦查人绝食的日子不计入侦查期限内，就是说，不仅认为绝食不存在，甚至认为犯人在这些日子里似乎是呆在外面！让囚犯的体力衰竭成为绝食的唯一可感觉的后果吧！

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不幸正好在这个指示到达时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内监宣布了绝食。他所坚持的是特别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觉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绝食——十三昼夜的“干绝食”（和捷尔任斯基的五昼夜的同样的绝食比较一下吧。捷尔任斯基是否在单独的监室里？——他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他禁闭的单人监室里的十三昼夜，只有一个医士有时来看他一下，医生没有来过，行政方面也没有任何人即便去关心一下：他实行绝食要求的是什么？就这样始终没有问过一句……看管人员对他唯一的关注是仔细搜查了单人监室，把藏起来的马合烟和几合火柴抖落了出来——拉波波尔特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侦查员对他的侮辱。他对自己的绝食作了科学的准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来的食物，他只吃黄油和小面包圈，绝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面包。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脸上经常带着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玛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单人监室去轻声说：“停止绝食吧，不顶事，这样会把命送掉的！应该早一星期……”他听从了，停止了绝食，结果一无所得。但毕竟还是给了他一杯热的红酒和一个小白面包。然后几名看守把他送抬进了普通监室。过了几天后又开始了审讯（然而，绝食并没有完全白费：侦查员已经懂得，拉波波尔特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于是侦查就变缓和些了。侦查员向

他说："想不到你原来是只狼！""是狼，"拉波波尔特承认，"而且永远不当他们的狗"）。

后来，在科特拉斯递解站上，他还宣布过一次绝食，但这次绝食的经过多半已带点喜剧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侦查，拒绝起解。第三天来人通知他："准备起解！"——"你们没有权利！我是绝食者。"那时四个壮汉又把他举起，抬出去扔进了洗澡房。洗澡后同样抬着他送到门岗。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社会革命党人叶·奥利茨卡娅认为，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随他们之后来到监狱的共产党人大大贬低了作用：他们过分轻易地宣布绝食，又过分轻易地停止绝食。她说，甚至И·Н·斯米尔诺夫，他们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前绝食了四昼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绝食。据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则上摒斥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并且从来也不支持绝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⑬

让历史去评价这项指责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谁也没有比托洛茨基分子为绝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关于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绝食和罢工我们还将在第三部中讲到）。

在宣布和停止绝食方面的轻率态度，一般地说，大概是那种

---

⑬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却总是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支持。1936年在由卡拉干达到科雷马的解送途中，他们把那些拒绝在他们打给加里宁的"反对把革命的先锋队（＝他们）送往科雷马"的抗议电报上签名的人称为"叛徒和奸细"。（马科丁斯基的叙述）

感情表露迅速的易冲动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俄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过，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有过——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俄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国也好，都没有能象在苏联这样，使我们厌弃了绝食这种手段。很可能，在绝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牺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丝毫也不少于第一个四分之一。然而，在国内没有社会舆论！——因此，**新型监狱**就巩固起来了，囚犯们不再能轻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艰难地争得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

一九六〇年，一个日常生活犯根纳吉·斯密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密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密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 * *

过去的中心监狱，现在的特别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着螺旋形的犄角，已经上升到了它的细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软地方，空气和光线的最后的残余，都渐渐地被排挤净尽。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罗斯拉夫尔惩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惫的社会革命党

人举行的绝食就是属于最后的绝望尝试之列。

他们还是提出从前那些要求——组长制度，监室间的自由交往，他们尽管要求，但自己已经未必抱着希望。十五天的绝食，虽然以软管灌食而告终，不过好象也维护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时的放风、省报、笔记本。这些他们是维护住了，但却马上收走了他们的私人衣物，扔给他们一套特别隔离所的统一的囚服。过了不久——放风时间削减了半小时，以后又减掉了十五分钟。

这还是那些依照**大牌阵**的规则在一连串的监狱和流放地中间被拉来拖去的人们。其中有的已经十年，有的已经十五年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们知道的只是恶劣的监狱伙食与绝食。那些在革命前习惯于战胜狱吏的人并没有都死光。然而，当时他们是与**时代**结成盟友去反对日益衰微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时代**与日益强大的敌人结成盟友来反对他们。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人（现在这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当这些党派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他们才觉悟到自己应当做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监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无望的社会党人的狱中斗争，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现在不象在沙皇时期：只要监狱的门一打开，社会各界就会扔来鲜花。他们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对他们的谩骂，甚至泼脏水（因为斯大林觉得，正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最危险）——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据什么可以大胆设想，人民对于他们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选入立宪会议的人们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现在报纸连骂也不骂了——俄国的社会党人已经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没有什么价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使用过去时态和久远过去时态。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活的

孟什维克。遍历了奇姆肯特和切尔登流放地、上乌拉尔和弗拉基米尔隔离所——在窗子已经戴上笼口的黑暗的单身监室里，怎能不因发生怀疑而猛然颤抖，也许他们的纲领和领袖们全都错了，策略和实践也都是错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无所作为。专为承受苦难而献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误。

他们在狱中的孤军奋战，其实是为了我们所有这些未来的囚犯（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这样想，并没有理解这一点），是为了我们将来坐牢应当受到怎样的待遇。如果他们取得了胜利，也许后来我遇到的一切，这本分七部分的著作里所讲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但是他们被打垮了，既没有维护了自己，也没有维护了我们。

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的孤立的阴影得以扩展，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们视为当然地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政治犯的荣誉称号，也视为当然地同意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观点，即一切站在他们“右”边的，⑭从立宪民主党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历史的狗屎堆。结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没有沾过边的（这是指将来——就是我们，我们大家！）——也将成为反革命。这样，由于半自愿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和别人疏远，他们就给未来的第五十八条洒上了圣水，而他们自己后来也没有逃脱掉进它的火坑的命运。

事物和行为总是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章里我们从社会党人的角度描写他们的狱中处境——因而它是被一束凄惨洁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维茨的政治犯们所不

---

⑭ 我不喜欢这些“左”和“右”：它们是假定的，可以任意颠倒，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屑一顾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却这样回忆："政治犯？这些家伙讨厌极了：谁也瞧不起，自己结成一伙躲在一边，老是要求特殊口粮和优待。彼此间也吵个没完。"——你能不觉得这里讲的也是实话吗？这些徒劳无益、无休无止、已经令人感到可笑的争论。这种当着饥饿困苦的人群只顾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给口粮的要求。在苏维埃时代，政治犯的光荣称号原来只是有毒的赠赐。忽然还听到这样的责备：在沙皇时期经常满不在乎地越狱的社会党人为什么在苏维埃监狱里却发了蔫呢！哪里见到他们越狱呀？一般说，越狱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谁记得有社会党人呢？

那些比社会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又把社会党人当作反革命而疏远他们——因此就用一道环形的壕沟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各自把自己这一派看得纯于、高于其余的派别，轻视甚至仇视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铁窗里、在同一些监狱院子里放风的社会党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样）。叶·奥利茨卡娅回忆，三七年在瓦宁诺港的递解站上，男隔离区和女隔离区的社会党人隔着围墙互相喊话，寻找自己人，互通消息。这时，女共产党员莉莎·科吉克和玛丽亚·克鲁吉科娃深表愤慨，认为社会党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给大家招来行政当局的惩罚，她们这样说："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这些社会主义坏蛋招来的——（深刻的说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辩证法呀！）。——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关在卢宾卡的那两个姑娘所以唱了香花的歌曲，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分子，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说来反对派分子甚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

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赏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 * *

虽然巨大的“群岛”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群岛”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和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个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群岛”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

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15]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囚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岁的瞎老头科别金。他的歌曲和诙谐话按反革命活动罪给他招来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监禁来代替劳改营。

从罗曼诺夫皇朝继承下来的全部老的监狱遗产按照不同的任务得到保护、更新、加强和改进。某些中心监狱，如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装备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钉上铁皮的门，每个监室里有拧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笼口，把放风院子隔成监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监狱里所有的树木都锯掉了，菜园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浇上了沥青）。其他一些，如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则需要对修道院房屋进行改装，但按教义把身体禁锢在修道院里和依国家法律把它禁锢在监狱里，在实体上要完成的任务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总是容易适应的。苏汉诺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装成为服刑监狱——要知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塞堡改成供参观的地方了，这些损失总需要另辟场所来补偿吧。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扩充并增建了（在叶若夫时

⑮ 真有这样的字眼！……天空般的和泥沼般的颜色。

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楼），它在这几十年内有很高的使用率，吞人量很大。前面已经说过，托波尔斯克中心监狱一直在使用，从一九二五年起，上乌拉尔中心监狱也开始经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还健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它们都正在工作）。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长诗《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断，在斯大林时期，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心监狱也没有空着。关于奥尔洛夫中心监狱我们得到的消息较少：它在卫国战争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远的德米特罗夫斯克市（奥尔洛夫省）有一座设备完善的服刑监狱随时可以作为补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们还把它们称为政治封闭所）伙食相当不错：午饭总有肉食，有新鲜蔬菜，小卖部里可以买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显著地变坏了，但当时在外面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时期，坏血病和饿晕在政治封闭所里都不稀罕。后来又有吃的了，但比原来差远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И·科尔涅耶夫天天感到饥饿：四百五十克面包，两块糖，两次吃不饱的热食——只有开水"管饱"（又会有人说，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当时外面也在挨饿。可是这一年却宽宏大量地允许从外面来喂养犯人；送吃的进来不受限制）。监室里的光线始终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笼口和加了钢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监室里造成经常的昏暗状态（黑暗是使精神受压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笼口上面还经常绷上网，冬天网上盖着雪，从而断绝了光线进入的最后通路。阅读只会使眼睛酸痛并损坏视力。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白天光线的不足在夜间得到补偿：整夜开着明亮的电灯，妨碍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H·A·科缓逗夫）昼夜的光亮都是来自放在天花板下吊着的一块小板子上的油灯，它耗尽了最后的空气；在三九年，出现了灯丝发红的电灯。空气也有定额规定，通风窗上了锁，只在上厕所时打开，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和

雅洛斯拉夫尔监狱里的人都这样回忆(F·金兹布尔格说：面包从早晨放到吃午饭就长霉，被褥是潮的，墙发绿)。一九四八年在弗拉基米尔监狱里空气不受限制，气窗经常开着。放风时间的长短在不同监狱里和在不同年代都在十五分钟到四十五分钟之间。象在施吕塞堡和索洛维茨那样与土地打交道的事情已经一点也没有了，一切植物都已拔尽、踩光、浇上了混凝土和沥青。在放风时甚至禁止抬头看天——"只许瞧着脚下！"——科绥辽夫和阿达莫娃（喀山监狱）都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禁止与亲属会见后再也没有恢复。差不多历年都允许每月两次寄信给亲属并领取他们的回信，(但是，喀山监狱的做法是：读后一昼夜将信交还监管人员。)还可以用寄来的有限的钱在小卖部购买东西。家具也是管理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阿达莫娃生动地描写出经历过白天折起的铁床和拧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后，在监室里（苏兹达尔）看到和摸到铺着干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时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И·科尔涅耶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种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从监室里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着，看守很少在监视孔里窥望。另一种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监室门上两道锁（一把钥匙在看守那里，一把在值班人员那里），禁止躺着，禁止大声说话（在喀山监狱只许低声说话！），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发给一套用有条纹的褥垫布料做的囚服；通信——一年两次，而且只能在典狱长突然指定的日子（错过了日子就不能写了）；而且只能写在比普通信纸小一半的纸上；全体带出去脱光衣服进行凶暴的突击搜查的次数增多了。对监室间的联系追究得如此之严，以至每次解手后，看守们总是拿着提灯到厕所里去照每一个便坑。在墙上写字，全监室都要受关禁闭室的处分。禁闭室是特种监狱里的一大祸害。咳嗽（"把被子蒙住头再咳嗽！"）；在监室里走来走去（科绥辽夫说：这被认为是"不老实"）；鞋子发出响声（在喀山监狱，发给

女犯四十四号的男鞋)都可能成为关禁闭的理由。不过,金兹布尔格推论得不错,关禁闭并不是为处罚你的过错,而是按表格轮流,所有的人都应当挨个儿在那里蹲蹲,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狱规里还有这样一项适用面很广的条款:“遇有在禁闭室中不守纪律(?)的表现时,典狱长有权延长禁闭期限至二十昼夜。”什么叫“不守纪律”呢?……请看科绥辽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对于禁闭室和管理制度上许多东西的描述都是不谋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盖着一个统一的烙印)。他因为在监室里走来走去被罚关五昼夜的禁闭。秋天,禁闭室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很冷。人家剥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衬衣,鞋也被脱下,脚下是泥地和尘土(有时还是烂泥,在喀山监狱,地下是一层水)。科绥辽夫有一只小凳子(金兹布尔格连这也没有),他马上断定这下完了,要冻死。但是渐渐地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热气开始冒出来,救了命。学会了坐在凳子上睡觉。每天给三次开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值班人员在三百克定量的面包里掖进了一块非法的方糖。根据发给口粮的次数,同时注意从那个曲溜拐弯的小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的变化,科绥辽夫计算着时间,现在他的五昼夜已经到头了——但还没有把他放出去。他那变得特别敏锐的耳朵听到走廊里有人低声说话,话里带出来又象是“第六昼夜”,又象是“六昼夜”的词句。奸计就在于此:等着他提出来五昼夜已经到头,该放出去了——这样就能够以不守纪律为名给他延长禁闭期限。但是他顺从地不声不响地又蹲了一昼夜——于是就只好若无其事地把他放了出去(也许典狱长就是这样轮流考验每个人的驯服程度?禁闭室专用来制服那些还没有俯首从命的人)。——过了禁闭室的关之后,监室简直就象宫殿。科绥辽夫耳聋了半年,喉咙里长起脓包,和科绥辽夫同监室的那个人因为经常蹲禁闭室而发了疯,科绥辽夫同疯子两人在一起关了一年多。(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记得政治隔离所里的许

多发疯的事例，她一人所知道的不少于诺沃鲁斯基根据施吕塞堡编年史所计算出来的数字。）

现在读者是否感到，我们已经逐渐地登上了第二个犄角的顶点——它比第一个也许更高吧？也许更尖吧？

但是意见有分歧。老劳改犯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五十年代的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是疗养区。从阿贝兹站被送到那里去的弗拉基米尔·包里索维奇·泽尔多维奇和从克麦罗沃劳改营转到那里（一九五六年）去的安娜·彼得罗芙娜·斯克里普尼科娃都这样认为。使斯克里普尼科娃特别感到惊异的是，每十天定期送出一次申诉书（她开始向联合国写……），有很象样的图书馆，还有外文书，它把全套目录送进监室来，你可以开列一整年的预约书单。

可是再次请诸位不要忘记我们法律的灵活性：有几千名妇女（“反革命家属”）被判处了监禁。突然一声令下——一律改为劳改（科雷马还有未淘净的金砂）！就这样改了。用不着什么法院。

这一切还是不是从前所说的监禁呢？或许它已经变成了劳改营的门房？

* * *

我们这一章本来应当从这里写起，只应当从这里写起！它的任务应当是细致地观察被单独监禁的囚犯的心灵中将会发出的如圣者头上的光轮般的闪烁的光辉。他被迫绝对地脱离了繁锁的生活，以至当他计算光阴的流逝时，他的心也能与整个宇宙密切地联系。一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应能涤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达到澄清透彻的境界的一切污浊。他多么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松和翻动菜园中的土块。（不错，可惜铺了沥青！……）他的头是

怎样自动地后仰着，想要凝视永恒的上苍（不错，可惜这是禁止的！……）。窗台上跳跃的小鸟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绪（不错，可惜有笼口、铁网、上了锁的通风窗……）。他在发给他的纸上记述着多么清晰的思想，有时是多么惊人的结论。（不错，如果能从小卖部买到纸。况且填写完毕之后，交到监狱办公室，就永不复返了……）

上面这一系列唠唠叨叨的假设，使我们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一章的计划面临着破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在新型监狱里，在特种（哪一种？）监狱里，人的灵魂是在净化？或者是在彻底地毁灭？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你那发疯了的同监难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临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断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科缓辽夫求得解救的办法是，专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恒与无限的问题：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内部状况；什么是时间和时间的运行。

这样，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就开始向他揭开了，他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全是赖此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遗忘的数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继续构思——他需要许多数字。在这间夜里点着油灯的单人监室里从哪里去取得这些数字呢？连鸟儿都飞不进来呀！科学家祈祷起来：上帝呀！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帮助我吧！帮助我继续下去吧！

在这个时期，他十天只能借阅一次书（监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这个不丰富的监狱图书馆里，有杰米扬·别德内依的《红色音乐会》的几个版本，它们反复地送到监室里来。他祈祷后过了半小时——换书的人来了，照例不问一声就扔下了一本——《天文物理学教程》！它是从哪儿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图书馆里会有这样的书！预感到这次相逢的好景不长，科缓辽夫如

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努力记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总共只过了两天，离还书日期还差八天——突然，典狱长巡视监狱。他的锐利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你的专业是天文学，对吗？”——“对。”——“把这本书收走。”——但是，这本书的神秘光临已经为将来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继续进行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那末，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去写关于精神与铁窗对抗的一章了。

但这是怎么回事？……看守的钥匙在门扇里无声地震响。阴沉沉的监楼长带着一张长长的名单进来：“姓什么？本名与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条？刑期？刑期终止时间？……收拾东西！快！”

喂，弟兄们，起解！起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们的尸骨会有人收吗？……

就这么办：能活着——就下次再说吧。在第四部里，我们将把一切说完。如果能活着……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你看那车轮，车轮！
滚滚向前永不停，不停！……
你看磨石多沉重，沉重！
隆隆旋转又跳动，跳
　动！……

W·谬勒

第一章

群岛之舟

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千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人们还利用同样不可见的方式，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间断地运送着具有血肉、体积和重量的不可见的囚徒。

通过哪里运送？用什么交通工具？

有专设的大型港口——递解监狱；也有简易港口——劳改营递解点；有特制的闭封式钢壳船只——“囚犯车厢”。在碇泊场上接送它们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样封闭式的钢壳的运转灵便的“乌鸦车”。“囚犯车厢”是按照铁路行车时刻表运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时候，还发出长串的运输车队——用运牲畜的红色闷罐车皮编组的列车——从一个港口拉到另一个港口，从群岛的一端沿对角线直达另一端。

这是一套多么有条不紊的体系！这是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不慌不忙地建立起来的，是一群吃得饱饱的、制服笔挺、从容不迫的人们缔造起来的。每逢单日十七时正，基涅什马押解队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尔卡、普列斯尼亚及塔干卡各监狱的“乌鸦车”运来的解犯。每逢双日早六时前，伊万诺沃押解队到达车站，从车厢里带出并负责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别热茨克、博洛戈耶的中

转解犯。

这一切就发生在你们身边，紧挨着你们，可是你们都是看不见的（当然也可以闭眼不看）。这些贱民们上下车，在大站上是在离客运月台很远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见。在较小的站上，也是专找两座仓库之间的僻静夹道。“乌鸦车”屁股朝着“犯车”倒开过去，踏板对准踏板。囚犯没工夫扭脸看站房、看你们，看其他车厢。他只来得及看踏板（有时最低一级的踏板都有他腰那么高，连爬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从“乌鸦车”到“犯车”车厢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站满了押解队员。他们一个劲儿地吼叫着：“快！快！……上！上！……”，有的还挥舞着刺刀。

你们领着孩子，提着箱子、网兜，在月台上匆匆走过，自然无暇留意：这趟列车为什么多挂了一节行李车？这一节没有标记的车厢的确很象是行李车。它的窗口也是斜钉着铁栅栏。里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车里乘坐着当兵的——祖国的卫士们。而且每次停车总有两个军人吹着口哨在车厢两边巡逻，同时斜眼瞧着车底下。

列车开动了。你们可知道，沿着同一条蜿蜒曲折的轨道，跟随着同一股煤烟，穿越过同一片田野，飞掠过同一排电线杆、草垛、百来个囚徒的苦厄困顿的命运，百来颗受尽熬煎的心正与你们同行。他们甚至比你们早几秒钟通过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们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闪而过的苦难，比之划过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迹。在熟悉而单调的列车生活中（开着口的卧具包，放在托盘上送来的茶水），你们难道能够领悟到有一幅多么阴郁可怖的情景仅仅在三秒钟之前通过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你们的车厢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们嫌挤，你们颇不满意。可是难道你们能够相信，难道你们能够相信下面这几行字吗？一瞬间之前驶过这个空间的同样大小的一间包

房里坐着十四个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个人呢？如果竟是三十个呢？

“犯车”——多么令人厌恶的简称！刽子手们发明的简称无不如是。他们想说明这是运送犯人的车厢。但是这个字眼，除了在监狱的文书上，在哪里也没有站得住脚。囚犯们习惯于称它为“斯托雷平”车厢，或者简单地叫做“斯托雷平”。

随着我国铁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配西伯利亚的犯人还是步行或者骑马。一八九六年列宁流放西伯利亚已经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车（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还曾向列车乘务员叫嚷说车里挤得受不了呢。亚罗申柯的名画《到处是生活》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象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这样的车厢在俄国的铁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记得，一九二七年发配时，就是乘坐这样的车厢，只是男女分开了。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特鲁申回忆说，早在沙皇时代，他就曾经乘坐“斯托雷平”发配过，不过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时代的老规矩，六人一间包房。

这种车厢第一次在铁路上行驶也许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时期，即一九一一年以前。人们给这种车厢冠以内阁首相的名讳可能是出于当时盛行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的革命政见。然而，只是到了二十年代这种车厢才真正受到偏爱。至于它成为普遍的和标准的运输工具，那是始于一九三〇年。从那一年起，我国的一切方面都变得整齐划一了。因之，如果把它称为“斯大林”，而不称为“斯托雷平”，倒是更公平些。不过我们不必在字眼上进行争论了。

所谓“斯托雷平”者，就是一节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车。只不过全车厢九间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间（这里如同群岛各处，一半设施是供看管人员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栅栏与走

廊隔开。这是为了便于监视，栅栏的铁条是斜向交叉的，象车站小花园的篱笆。它的高度直达车顶，因而取消了走廊顶棚上向包房里面开门的行李橱。走廊一侧的车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栅栏。囚犯乘坐的包房一侧没有车窗，只是在二层铺的高度有一个用固定的百叶窗遮住的气孔，上面也钉了栅栏（我们觉得这节车皮象是行李车，正是因为它没有车窗）。包房的门向侧面推开，是铁栅栏门。

这一切加在一起，从走廊里看去很象动物园：在一长排栅栏后面，一些略似人类的可怜巴巴的动物在地板上和铺板上蜷缩着，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动物园里从来不会把动物们这样紧地挤在一起。

据外面的工程人员计算，斯托雷平的一间包房，下铺可以坐六人，中铺（它整个连成一个统铺，仅仅在靠门的地方留下一个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两个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现在，除了这十一个之外，再捅进十一个（最后几个是看守员关门时用脚蹬进去的）——瞧！这才是囚犯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员。上层，每个行李架上各有两人龇牙咧嘴地半躺半坐着，中层统铺躺着五个（这是最有福气的，这位子要动武才能抢到。如果包房里有盗窃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们），底下还剩十三名：下铺一边各坐五名，他们的腿之间的夹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缝里，人身上，人底下——放他们的东西。就这样蜷着腿紧挤在一起，一昼夜一昼夜地坐着。

不，这样干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决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战士，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设上的。但是，你们也会同意，他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总不能招待得叫外头的人都眼红吧。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有困难：他们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

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托雷平"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干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头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干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托雷平"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五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①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出去的（诚然，不是马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②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头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子"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B·A·科尔涅耶娃从莫斯科出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

---

① 那些做惊讶状并责怪说"他们为什么不斗争呀？"的先生们见到此句可以满足了吧！

② 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出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处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部都躺进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道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进……禁闭室。在“斯托雷平”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体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象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不，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子里，从来不供给一顿热食，只发给咸鲱鱼和干鲳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种事情连例子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物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热食不合规定（诚然，“斯托雷平”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鳕鱼吧？给他们肉罐头——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鲱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咸鱼你不要马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递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给的是湿漉漉的洒了粗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干鲳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

配。[3]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沙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口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口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子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出一点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鲱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咸鲱鱼，不给开水（从来没有给过），连生水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洞没有。另一部分在擦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点时间。还有一部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水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象骡子似地驮水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斯托雷平"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水都没处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头的煤水车里舀那又浑又黄飘着机油的水，就这

③ Л·Ф·雅库包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1964，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食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做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子颇为好过，"他写道。然而伊尔库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肉，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水，犯人们也会挺爱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户，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点亮）。还有，发水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子，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子饮水。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核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象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头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灌饱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水，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怜他们，给两次水，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水为佳。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口，一个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进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出去的。条令只准许一次放出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出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点！快点！"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口地朝他吆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象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古比雪夫的"斯托雷平"车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吆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

笑。）④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有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是不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池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象"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象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

④ 所谓"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看来就是指的这个吧？

* 盗窃犯们的黑话，有"傻瓜"、"外行"、"老憨"等含意，专指流氓盗窃犯以外的其他犯人，尤指政治犯。——译者注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咸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象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日常生活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决没有（偶而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 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 * *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

---

* 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译者注

**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译者注

是吗？

以上是П·Ф·雅库鲍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复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雅库鲍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粗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⑤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监楼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带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特琳娜随即降下谕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带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

---

⑤ 诚然，这类举动使得刑事犯们把职业革命家们称做“奥贵族”。（雅库鲍维奇）

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他们表示尊重，意味着承认人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照这样行事，连被捕的政治犯也会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象你我这样一类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类社会主义者又未能保住他们政治犯的地位，从此你如果再提抗议，再反对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们的哄笑和看守员的困惑。“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员们会诚恳地回答你。

这种混合，这种惊心动魄的相遇，或者发生在“乌鸦车”里，或者发生在斯托雷平车厢里。在此以前，不论在侦查中受到怎样的压迫、拷打、摧残，这全是来自蓝边帽，而你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视同人类。在你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蛮横的机关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监难友，哪怕他们的素养与经历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他们打了你的小报告，他们终归是同属于你在其间度过了一生的那个习惯的、罪过的、琐碎的人类。

当你被推进一间“斯托雷平”的包房的时候，你同样以为在这里只会遇到共患难的伙伴。你的一切敌人和压迫者都留在铁栅栏的那一边，你是不会在这一边遇到的。忽然，你抬起头来，朝中铺的正方形缺口处——也就是你头顶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见那里有三、四张……不，不是人脸！不，也不是猴脸，猴脸要端正得多！你看见的是一些带着贪婪和讥讽表情的残忍邪恶的兽面。一个个象蜘蛛望着触网的苍蝇似地望着你。铁栅栏就是他们的网，这下你落网了！他们咧着嘴，好象要从旁边咬你一口。他们说话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声音。他们觉得发出这种咝咝的声音比用有元音和辅音的语言说话更舒服。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

语。

这些奇异的大猩猩类上身几乎只穿一件背心："斯托雷平"里面闷热难忍。他们的青筋绷起的赤红色的脖颈，他们的滚圆的肩肌，他们刺了花纹的黑胸脯从来没有受到狱中恶劣生活的影响。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忽然从一个这样的脖颈下面耷拉下来一样东西——小十字架！不错，一个用细绳吊着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稍感到宽慰：他们当中有教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看来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正是这个"教徒"忽然张口大骂十字架和信仰（他们骂人的时候多少说得象俄语），他伸出两根手指头，绷得挺直，分成两股叉，对准你的眼睛戳来——不是恫吓，而是真地要抠眼珠子。"你这个喂老鸹的死尸，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他们的全部哲学和信仰统统表现在这个抠眼珠的姿势里了。既然他们能象捏死一条粘虫一样捏烂你的眼珠子，那么你身上的和随身的东西还有什么他们能饶过的？十字架在晃动着，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着这一场野蛮已极的假面舞会，心里感到迷惑难解：你和他们之间，究竟谁已经发了疯？谁马上会发疯？

你一生养成的与人们交往的全部习惯顷刻之间被摧毁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后，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侦查阶段，你用言语对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言语回答你。这些言语能产生作用，或者说服，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你还记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请求、命令、感谢。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这些言语及关系毫不沾边的。瞧，现在这些兽面的东西派下来一名特使，这种脚色多半是一个瘪三模样的少年犯，这家伙的蛮横放肆的派头格外令人厌恶。这个小无常解开你的背囊，用手伸进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从这一分钟起，你的一切已经不是属于你的，而你本人不过是裹着一些随时可以取下来的多余衣物的橡皮假人。

对这条凶恶的黄鼬崽子，对上面那些兽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解释什么，拒绝什么，禁止什么，央求什么。他们不是人类，这点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这个小把戏狠狠地剋一顿，或者狠揍一顿上头的那几个大块头的野物。

可是从下面对付上头的三个，怎么打法？尽管那个小把戏鼠头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总不大合适？只能轻轻地推开？……但是也推不得，因为他立刻就会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头的立刻会让你的脑袋开瓢（他们自然也有刀子，不过不会拽出来，他们不想在你身上脏了刀刃）。

你瞧着四邻，瞧着难友——咱们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议吧！但是所有你的难友们，你的“五十八条”们，在你之前已经逐个被洗劫过了，他们窝着腰乖乖地坐在那里。要是他们的目光避开你，那还算好，有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瞅着你，似乎这并不是暴行，不是抢劫，而是自然现象：天要下雨，地要长草。

原因是——你们错过了时机，先生们，同志们，兄弟们！当斯特鲁仁斯基在维亚特卡监狱里自焚的时候，或者哪怕在你们被宣布为“反革命”以前，你本当猛然省悟，记起自己的身分。

而现在，你让人家剥掉你的大衣。一张缝在上衣里的二十卢布的票子被摸到了，连布片一起被扯下来。你的行囊被扔到上头去“检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后为你出远门准备的一切全都留在那里了。他们把一支装在小口袋里的牙刷丢下来还给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说每一个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样服服贴贴地任人宰割。⑥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男子汉们！

---

⑥ 我听到过少量这样的事例：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抱成一团，顶住了盗窃犯的袭击。但是他们并不维护普遍的正义，不保护身边被抢劫的人，只保护自己。他们保持着武装的中立。

军官们！前方的勇士们！

一个人要想勇敢战斗，必须对这场战斗有所准备，要预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这个地方，一切条件都不具备：这个人从来没有和盗窃犯打过交道，他没有预料到这场战斗，而主要的是——他原来的概念中（错误地）认为他唯一的敌人是蓝边帽，所以完全不懂得这场战斗的必要性。他还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纹的前胸就是蓝边帽的屁股。他们体现着带肩章的人们从来不说出声的“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的这句启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政治犯，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而国家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这时出乎他的预料地有一群手脚麻利的鬼怪从后面、从侧面向他袭来。结果一切界线都混淆了，明确的概念变得粉碎了。（这个囚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来这群鬼怪跟狱吏们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一个“五十八条”犯人丧失了这一切条件。经过政治侦查的绞肉机以后，人的肉体被摧毁了：他忍受过饥饿和困乏，在禁闭室挨过冻，被毒打得瘫卧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毁了。人们一再向他解说并且证明给他看：他的观点，他一生的作为，他与人们的关系，一概都是错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他的毁灭。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彻底摧毁和彻底隔绝——这就是对五十八条案件侦查的任务。必须使被判罪人懂得，他们在外面最大的罪过就是企图绕过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以某种方式擅自联系或结合。在监狱里这发展成为对任何集体行动的恐惧：两人提出同一内容的申诉或者两人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这些从此永远打消了搞任何联合行动的念头的假政治犯们，现在是不准备联合

一致对抗盗窃犯的。他们也根本想不到在车厢和递解站里要携带武器——小刀或短錨。第一，要它干什么？对付谁？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头上的凶险的五十八条的大帽子是一个加重情节，再审时你可能得到死刑判决。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惩罚将不同于盗窃犯：他携带刀子，那是淘气、传统、觉悟低。你带刀子，就是恐怖行动。

最后，根据五十八条坐牢的人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温顺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辈子动口不动手，现在仍和以往一样是不适宜动拳头的。

可是盗窃犯们却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侦查。对他们的全部侦查只包括两次讯问，再就是一次马马虎虎的审判，一个短暂的刑期。就连这样的刑期他们也无需服满。他们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⑦即使在侦查期间也没有人剥夺一个盗贼享用外面送进来的牢饭的权利——这是仍逍遥法外的同伙们送来的丰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没有掉膘，一天也没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诈“福来儿”⑧补充点油水。盗窃和抢劫的刑事条款对于他不仅仅毫无压力，相反，他以犯这种罪为骄傲——他的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蓝肩章、蓝滚边的首长们的支持：“没有什么。虽然你是强盗、杀人犯，但你不是叛国分子，你是我们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盗窃罪的律条里没有第十一项——“组织”。盗贼的组织是不遭禁止的。干吗要禁止？让它帮助促

---

⑦ В·И·伊万诺夫（现在乌赫塔）根据162条（偷窃）判过九次，根据82条（越狱）判过五次，共计判了三十七年。而他只用了五、六年就“服满”了这些刑期。

⑧ “福来儿”（Фраер）——这是盗贼们的黑话，意思是“不是贼”，换句话说，就是“不是人”（大写的“人”）。说得干脆些：“福来儿”就是“不是贼的人类”。

进我们社会如此需要的集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他们非这样不行”）。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在上一世纪的著作里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批评无非是说它有点缺乏纪律性和情绪变幻无常。而斯大林则一向偏爱盗贼——是谁替他抢劫银行的？早在一九〇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⑨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动”）。另外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抢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

⑨ 马卡连柯：《塔上的旗帜》。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乌鸦车”里对政治犯的抢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士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已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⑩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

⑩ “海狸”——带着破烂（好衣裳）和杆菌（油、糖等好食物）的阔气的犯人。

们脱得精光，叫他们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И·A·柯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斯托雷平”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递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士）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

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麦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麦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瑕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

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还有谁不满意？还有谁要过秤的？”

（还以为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还以为只要告到上头，说只发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会相信你说的而不相信中尉说的发足了五百克吗？）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这种惩戒性的定量就成为这趟漫长旅程的固定口粮标准。沙糖也从此停发——押解队留下了。

（这件事发生在辉映我国史册并将供后人长期研究的取得对德、日的两大胜利的那个夏天。）

饿了一天、两天，人变得稍微聪明了。萨宁对本包房的人说：“伙计们，听我说，咱们这样下去都得完蛋。谁有好东西，拿出来吧，我去换吃的给你填饱肚子。”他满有把握地收下一些东西，回绝一些东西。（有人不愿意拿出来——那就随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麦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队竟放他们出去了。他们带着东西朝押解队的包房走去，从那儿带回来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马合烟。这是从每间包房一天的口粮中克扣下来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过现在不是均分给全体，而是只分给交出东西的那些人。

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们不是全都表示过对减少的口粮没有意见吗？从另一方面说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沙糖（这种好东西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麦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

人们在昏暗中拥挤地坐着，一些人嚼着属于身旁的人们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着他们。押解员不让犯人单个地借火，两个小时只给点一次烟——那时整个车厢里烟雾腾腾，好象着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东西的人现在后悔没有交给萨宁，这时求他收下他们的东西，但是萨宁表示——等下回再说吧！

如果不是战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车，拖拖拉拉的斯托雷平，不是一会儿换挂，一会儿被甩在车站上，这次行动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如此彻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一段战后时期，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惹人眼馋的东西。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古比雪夫——整整一个星期国家每天只发给二百五十克面包（不过这已经相当于双倍的围困时期的口粮），再加上一条风干鲻鱼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赎买。很快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押解队已经很不愿意收受东西，他们开始挑三拣四了。

他们被押进了古比雪夫递解站，洗了个澡，按原来的编队带回原来的车厢。一支新派来的押解队接收了他们。但是办理交接的时候，显然已经把搞东西的妙诀传授给下一班。于是那条赎买自己口粮的规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亚城。（不难设想，这

条感染力极强的经验一定在各押解大队得到迅速的推广。）

在新西伯利亚城下车以后，叫他们在两条线路中间的地面坐下，来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军官。他问："对押解队有申诉没有？"大家茫然，没有人答话。

那头一个押解队队长的算盘打准了。——唉，我们的俄罗斯啊！……

* * *

"斯托雷平"的乘客还有一点不同于列车里的其他乘客：他们不知道列车的去向，不知道他们该在哪一站下车。因为他们没有车票，也看不见车厢外挂着的那块站名牌。在莫斯科，让他们上车的地方有时离月台老远，连他们当中的本市人也认不出这是八个火车站中的哪一个。囚犯们在恶臭和拥挤的车厢里等待调车头，一等就是几小时。瞧，它来了。它把"犯车"拉去挂在已经编组好的列车上。如果是夏天，会传来车站广播室的喇叭声："由莫斯科开往乌发方面的列车在第三股道发车……由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车在第一站台上车……"。这说明是喀山车站。熟悉"群岛"地理及其线路的行家们开始向同伴们讲解：沃尔库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两个地方要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发；基洛夫、高尔基劳改营⑪也排除了。莫斯科从来不往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连自己的犯人也盛

---

⑪ 荣誉的麦捆里也会掺杂进莠草。但这仅仅是莠草吗？毕竟没有什么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劳改营——却有高尔基劳改营，而且是怎样的魔窟啊！此外还专门有一座"以马克辛·高尔基命名的"苦役金矿（距离艾尔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义……"。假如敌人不投降，就……，你说出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经不再是文学界中的人了……。

不下了。我们再听听。乌发方面巳经发车，我们的没有动。塔什干的走了，我们还停着。“由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方面的列车离开车时间还有……，请送旅客的同志们下车……旅客们，请把车票准备好……”。开动了。是我们的！这能证明什么呢？暂时不清楚。伏尔加中游为我们准备着，南乌拉尔也为我们准备着。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甘铜矿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还有泰谢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说那里的杂酚油会浸入皮肤和骨头，它的蒸气会充满肺叶——这就是死亡）。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苏维埃港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科雷马是我们的。诺里尔斯克也是我们的。

如果是冬天，车厢封死了，听不见广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严守条令的——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谈论解送的路线。那么，就这样出发吧。让我们在人体的夹缝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将出现的是森林还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侧的窗外）。睡在中铺上的人，通过栅栏、走廊、双层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栅栏，总算还能看到站内的几股侧线和在列车外飞逝的一小块空间。如果玻璃上没有结冰，有时还能认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诺或者翁多尔之类。这些车站在哪儿？……包房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根据太阳可以判断我们这是往北还是往东。或者，在一个叫做什么图番诺沃的小站上，一个衣着破烂的日常生活犯被推进你们的包房。他会告诉你，他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审。他担心会给判上一两年。据此你们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同时这表明途中第一个递解站将是沃洛格达。这时候包房里必然会出现一些百事通，他们将板起面孔拿腔拿调地学说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语：沃洛格达的押解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学着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个“O”字都念成重读。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无所知：你们前面的那根细线上结着

许许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递解站，在任何一个站上都可能让你们拐弯。无论乌赫塔，无论因塔，无论沃尔库塔你都不喜欢，可是你以为五〇一工程——穿过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土带铁路——比别处甜一点吗？告诉你，它比哪儿都糟。

战争结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条水流终归流进了河床（或许仅仅是因为内务部扩大了编制？）。部里对数以百万计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从此每个犯人随附一包装在密封纸袋里的监狱档案，纸袋上专门为押解队做了一个切口，把押解路线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线，让押解人员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档案内容对他们可能起腐蚀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铺上，又会倒着认字，当中士正好在你旁边停留的时候，也许你能碰巧窥认出谁谁将押往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而你则是去卡尔戈波尔的。

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绉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打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

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绉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 * *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斯托雷平”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

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抚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沙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线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咸鲱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沙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象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

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⑫（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象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左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象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

---

⑫ 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1957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

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搂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象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象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

---

* 以挥霍和残忍著称的罗马皇帝凯尤斯的绰号，意为“小军靴”，因为他小时喜欢穿一双军靴大模大样地到处走动。——译者注

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柯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匪帮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凡，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

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懵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主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揍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斯托雷平”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〇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象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服。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斯托雷平"的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象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到，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1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托雷平”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 * *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13] 诚然，

---

[13] В·Г·柯罗连科，《我的一个同代人的故事》，莫斯科，1955。第8卷，第166页。

我们见到蓝边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斯托雷平”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斯托雷平”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盪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边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斯托雷平”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象

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锃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踢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象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象所有的人一样，象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象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

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马雅可夫斯基："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象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

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象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象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〇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

“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斯托雷平”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 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 * *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下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象“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

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象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象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吧！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斯托雷平”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

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里，好象带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象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象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进行侦查，即便侦查，他们也不会吃亏：顶多让他在递解站里暂时刹车，不再往远地劳改营遣送就是了。你们也会同意：社会亲近分子和社会异己分子之间发生格斗，国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边的。）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官员退休上校鲁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尔卡监室里说了一件事：三月八号，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监狱的途中，一群盗窃犯在“乌鸦车”里当着他的面轮奸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姑娘（车里面的其他人对这件事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这个姑娘是当天早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来的，还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受到审判，其实这是她的上司为了报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乌鸦车”开动前半小时，按照有关法令给姑娘判处了五年。她被推进了“乌鸦车”，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约在经过花园环行路的时候（“请饮苏联香槟”），被变成了一名营妓。怎么说才对？仅仅是盗窃犯干的？不是狱吏吗？不是她的那个上司吗？

还有盗贼式的温存：姑娘被强奸后还遭到洗劫。他们扒掉了她今天穿来想让审判员们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转手就给了押解员。押解人员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伏特加送回车里，因而盗窃犯们又用姑娘的钱痛饮了一场。

进了塔干卡监狱，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向当局告状。军官听完了以后打了个哈欠说：

“国家不能为你们每一个人提供单独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错，“乌鸦车”的确是“群岛”的“瓶颈”。如果说“斯托雷平”里不具备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开的条件，那么“乌鸦车”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开。而且怎么能要求盗贼们不利用两个监狱之间的空隙过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盗窃犯的话，那么应该感谢“乌鸦车”给予我们和女人们相遇的短暂的机会。在监狱生活中，除了这里，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听到和接触到她们？

一九五〇年有一次把我们从布蒂尔卡运往火车站。坐得很松快，一辆有长凳的“乌鸦车”总共才装了十四个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进一个女的。她紧挨车门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为和十四个男人同坐在一个黑匣子里面，在这里她是得不到一点保护的。但是说过几句话以后，她明白了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条的。

她自报了姓名：列宾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紧随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个根据年纪和瘦小的外貌看起来顶多是个中尉的沉默寡言的军人开口问她：“请告诉我，你跟安东尼娜·伊在一块坐过牢吗？”“怎么，你是她的爱人奥列格？”“是。”“是伊中校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是。”

这一声“是”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啊！它发自哽噎的喉头，它流露的更多是对音訊的恐惧而不是快乐。他移过去坐在她

的身边。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过两扇后车门上的两个窄小的栅孔射进车斗，随着汽车的行进在车内闪动，在这个妇女和中校的脸上闪动。“侦查期间的四个月我同她蹲在一个监室里。”“现在她在哪儿？”“那时候她一心惦记着您！她对自己的案子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为您担心。起先怕您也被他们抓进来。后来盼望您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怨恨自己连累了您。她太难过了。”“现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别害怕，”列宾娜已经象对待亲人一样用手贴在他胸前，“她经不起这样的紧张。他们把她送到别处去了。她有点……您明白了吗？精神失常……”

在六条行车线的大马路上，一团用钢板紧紧包裹着的小小的风暴如此平静地向前行驶着。它遇到红灯就停下来，要拐弯的时候就给信号……

我和这位奥列格·伊是刚刚在布蒂尔卡相识的。经过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关进了监狱交接处的隔离室，正在把我们的东西从保管室里取到这里来。他和我同时被叫到隔离室的门口去。在开着的门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员在翻他箱子里的东西。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金黄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没有在意地一脚踩在那上面的两颗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践踏着它，好象专门为了拍摄特写镜头。

我指给他看：“请注意，中校同志！”

伊的脸色阴沉下来。要知道，他当时还保留着“公安机关是清白无瑕的”这个观念。

现在又听到了关于妻子的事情。

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装进脑子里去的！

第 二 章

群 岛 之 港

请在一张大桌上铺开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请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铁路枢纽，所有铁路线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联结处的转运站打上粗大的黑点。这象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张地图都落满了传播病菌的苍蝇？告诉你吧，你们得到了一张宏伟的“群岛港口分布图”。

诚然，这不是亚历山大·格林招引我们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们在小酒馆里喝罗木酒，向漂亮的娘儿们献殷勤。这里也没有温暖的蓝色海洋（这里洗澡水规定一人一公升。为了方便，四个人的四公升合倒进一个盆里，请一块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罗曼蒂克——肮脏、臭虫、粗话、胡闹、语言混杂、斗殴——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没有经历过三五个递解站的犯人是少见的；很多人能记起十来个，而古拉格之子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数出半百。只不过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混成了一团，因为它们彼此雷同：毫无知识的押解队；昏头昏脑的根据案情的点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严寒中的长久的等待；更长久的脱光衣服的搜身；不讲卫生的推头；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厕所；散发霉味的走廊；永远拥挤憋闷并且几乎永远黑暗潮湿的监室；地上或板铺上贴在你两边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钉成的枕头的稜脊；夹生的、几乎是流质的面包；

好象用青贮饲料煮成的菜汤。

如果谁有准确的记性，能够分别回想得起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必在国内旅行了，因为根据递解站他已经熟悉了全国的地理。新西伯利亚城？知道，去过。棚屋很结实，是用粗圆木搭的。伊尔库茨克？那儿的窗户是分几次用砖头砌严了的，还能看出沙皇时代的老样子。每次砌的砖都不连接，中间留下了细缝。沃洛格达？对了，是一座有塔楼的古老建筑。厕所是上下间。楼板朽了，楼上厕所往下漏水。乌斯满吗？那还用说！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满了，是圆拱屋顶的古式结构。监室里头填的可实在啦：每当犯人起解的时候，队伍能拉半个市区长，你简直想象不出是怎么装在里面的。

最好不要对这样一个行家说你们知道还有一些城市是没有递解站的，不要去惹恼他。他会向你确切地证明，这样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说得对。萨里斯克？解犯在那里是关在暂羁室，和受侦查人关在一起。每个区中心都是这样办。这跟递解站有什么不同？在索里-伊列茨克吗？有递解站！在雷宾斯克？设在修道院的第二监狱是干什么的？哦，那里可安静啦。院子是石板铺的，空荡荡的，古老的石板长满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头的，挺干净。赤塔吗？第一监狱。在纳乌施基？那儿不是监狱，是个递解劳改营，都一样。在托尔日卡？也设在修道院里。

你要明白，亲爱的先生，没有递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处都有法院在开庭。怎么样把犯人送到劳改营去？坐飞机吗？

当然，递解站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要说哪个好点，哪个坏点——那是争不出结果的。三、四个犯人凑在一堆，每人必定夸奖他“自己的”那一个。

“虽说伊万诺沃递解站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可是你去问问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个冬天在那儿蹲过的人。狱里不生火——可是

非但冻不着，而且上层铺的人连衣裳也穿不住。为了不憋死，窗户上的玻璃全给打掉了。二十一号监室定员是二十人，实际关了三百二十三！板铺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块板子睡人。破窗户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气。板铺下面那一层完全象北极之夜：没有一点亮光。板铺上的和站在过道里的人把光线全挡住了。通往便桶的过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须踩着板铺的边缘爬过去。吃的东西不发给个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个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铺板下面，直到它发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额。这一切还可以忍受过去，但是牢头们却好象是抹了松节油一样，没完没了地把犯人们从一个监室赶到另一个。刚刚安顿下来，——“起——来——！换监室！”又得去抢地盘。造成超员的原因是这样的：三个月没让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溃疡和伤寒病。为了防止伤寒病蔓延，递解站被宣布隔离，四个月没有发送解犯。

“伙计们，问题不在伊万诺沃监狱本身，关键在年份。一九三七年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说犯人，就连递解站的石头也挤得哎哟叫唤了。伊尔库茨克的也一样，它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递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狱医们连往监室里伸伸头都不敢，只在走廊里转悠。牢头朝监室里喊：“昏迷过去的——快出来！”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象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

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也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马的运输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一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出来！"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食具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口子让它自己流。谁能把嘴凑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们在水箱前头干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模一样。乌斯维特勒①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胸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开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②

① 乌斯维特勒（УСВИТЛ）——东北（即科雷马）劳改管理局的缩写。

② 喂，伯特兰·罗素的"战争罪行法庭"！你们为什么不用这点小材料?！也许对你们不合适？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头用皮靴硬把人蹬进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热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根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头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道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花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我本来也想插进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色普列斯尼亚。③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腿，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强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热得光着身子，汗水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身汗，吃完饭身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户被铁皮“笼口”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阳晒得滚烫，朝监室里散热气。

正象递解站本身是没头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头说点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头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

③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紧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公路。

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处。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种担架运送；冒热气的菜汤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进孔眼里抬着走。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紧张，更加开诚布公。更紧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部的门户，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处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锁。尽管一九三〇年流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口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头顶上是没有房顶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钉成的……帆布顶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湿润的雪花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露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挺挺地冻僵，不断地点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身的办法给他们提精神。后来在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高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象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

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④

克尼亚日-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棍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杈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棍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汤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

---

④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着喝吧。⑤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土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做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嗅，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

---

⑤ 加丽娜·谢列勃里亚柯娃！鲍里斯·季亚柯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你们没有十人一批从澡盆里喝过汤吗？当然罗，即使在那个时刻你们也不会降低到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动物的需要”的水平吧？即使挤在澡盆前面的人堆里，你们也一定只想着亲爱的党吧？

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追逝记》*！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读它。我不是说笑话，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告诉你，在这样的监室里呆几个月就能永远毁掉一个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叶若夫时代也没有被枪毙并且在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名誉。）

你看，我们还幻想过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斯托雷平"包房里挤成一团的那几天几夜里，我们是怎样地幻想着递解站啊！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足足地喝到凉水和打到开水。想的是在这里不会再强迫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押解队去赎买自己的口粮。想的是在这里会供给我们热食。最后还想着会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热水里浸一浸，那时浑身就不会这么痒了。"乌鸦车"里我们的腰

---

* 二十世纪法国颓废派作家普鲁斯特的代表作。——译者注

撞得生痛，从一侧摔到另一侧；押解队朝我们吼叫："挽臂！"、"抓脚跟！"我们暗暗鼓励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快到递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即使我们一部分梦想能够变为现实，也总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扫兴。

洗澡房里会遇到什么？你永远说不准。忽然他们动手剃光女人的头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或者让清一色的女理发员给我们一长串光屁股的男人剃头。在沃洛格达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婶莫吉亚吆喝着："男人们，排好队！"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们身上放气。伊尔库茨克递解站的见解不同，认为洗澡房服务人员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汉在女人们的两腿之间涂抹焦油软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象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那样，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没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炉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强迫洗完澡的犯人们赤身光脚在雪地里跑到另一处去取衣物（罗德尼查，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一九四五年），我们已经说腻了。

一跨进递解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掌握你命运的不是看守员，也不是带肩章穿制服的，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得遵从一点成文的法律。这里掌握你命运的是递解站的**杂役**。是那个前来招呼你们这批新到解犯的，脸色阴沉的洗澡房服务员："喂，法西斯老爷们，去洗澡！"；是那个手拿一块写字用的三合板垫板，两眼在你们的行列里搜索，催你们快去干活的派工员；是那个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撮长毛、攥着一卷报纸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却瞟着你们行囊的**教育员**；还有另外一些你们认不出来的杂役，他们正用X光般的视线透射着你们的皮箱。他们彼此多么相象啊！

在你们短短的递解途中你们好象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一帮家伙，虽不象他们这样干净整齐，但同样是露着残忍的獠牙的畜类。

是了，又是那些盗窃犯！又是那些乌焦索夫*歌颂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兽谢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亚……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蹲在铁窗里面，他们已经洗干净、穿整齐，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现地维护着纪律——只要我们遵守的纪律。如果有人带着一点想象力仔细端详这一些嘴脸，他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也是从我们俄罗斯的根上生出来的，一度曾是一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父辈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罗霍尔、古里之类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们的都有点相似：两个鼻孔、两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绯红色的舌头是用来吞入食物和说出一些俄罗斯话音的，只不过用词和我们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个递解站的首长都会找这个窍门：所有编制内职务的工资都可以付给呆在家里不上班的亲属或者由监狱头头们私分。监狱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声口哨，社会亲近分子中自报奋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只图一点，就是可以在递解站系缆，从此不下矿井，不上矿山，不进泰加森林。这些派工员、文书、会计、教育员、浴室服务员、理发员、保管员、炊事员、洗碗工、洗衣工、缝补匠——全都是递解站的永久居民。他们领的是犯人口粮，算在监室的名额里，但是他们不用首长关照也自有办法从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捞到额外的食物和油水。这些递解站的杂役们认准了，随便哪个劳改营里也不会比他们现在舒服。我们落进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搜刮干净的，所以他们要美美地敲我们一杠子。在这里他们甚至代替看守员对我们进行搜查。搜查

* 乌焦索夫是苏联曲艺团负责人和歌手。——译者注

之前劝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保管并且象煞有介事地开列一个什么清单，可是清单和钱一起马上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把钱交上去了！”“交给谁了？”走来的军官惊奇地问。“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具体是谁？”在场的杂役们都说没有见到……“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我们以为……”“以为个屁！少以为点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们劝我们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脱衣间里。“没人拿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带进浴室去。回来：毛衣不见了，毛皮手套不见了。“什么样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进洗衣房了！”他们有时也很讲信义地收取我们的东西：作为替我们把箱子送进贮藏室保存、把我们关进没有盗窃犯的监室、尽快地起解、尽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务的酬劳。他们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当地抢劫。

“这些人可不是盗窃犯！”我们当中的内行们解释给我们听。“这些人是‘母狗’，是给监狱当差的。他们是正经扒手们的敌人。正经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这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家兔们的脑子是太难懂了。他们的派头都一样，他们身上刺的花纹也都一样。也许这一帮是那一帮的敌人，可全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这时候，他们叫我们在院子里紧挨监室窗户的地面坐下。窗户都有“笼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哑而善意的声音忠告我们：“乡亲们！这儿有规矩：凡是茶叶、烟末之类散装的东西，搜身的时候都要没收。谁有，快撂到这儿来，撂进我们窗户里来。我们以后还给你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福来儿”，是家兔。说不定真地要没收茶叶和烟末。我们在伟大的文学著作里面谈到过囚犯之间普遍的团结精神，囚徒是不会欺骗囚徒的！称呼得那么亲热——“乡亲们！”。我们把烟荷包撂给他们。纯种的扒手们在里面接住，然后传出哄堂大笑：“哎，法西

斯小傻瓜们！”

“别想在这儿讲理！”“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这就是递解站迎接我们的标语，尽管并没有挂在墙上。“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看守员、押解员、盗窃犯全都向你重复这句话。你已经被沉重的刑期压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样松一口气，而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设法对本来已经精神颓丧和孤立无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层压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尔基递解站的一个看守员无能为力地摇着头说。安斯·伯恩施坦象解除负担似地把自己那件军官大衣交给了他——不是白给的，是交换两颗葱头。去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你没有看见红色普列斯尼亚所有的看守员都穿着公家从来没有发过的铬鞣革的大皮靴吗？这全是盗窃犯在监室里弄来然后转手给他们的。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如果连文教科的教育员都是盗窃犯并且由他们给政治犯写鉴定（克麦罗沃递解站）？在罗斯托夫递解站能够要求管束盗窃犯吗，如果那地方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老窝？

据说一九四二年在高尔基递解站几个被捕的军官（加甫里洛夫、军事技术员谢别金等人）竟然奋起反抗，痛打盗贼，硬把他们整服贴了。但是对这种事一般都当做传奇看待：只在一个监室里整服贴了？服贴了很长时间？蓝边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让异己分子打亲近分子？至于有人说，四〇年科特拉斯递解站小卖部旁边盗窃犯从政治犯手里抢钱，政治犯动手狠揍他们，别人制止不住，这时候警卫队带着机关枪开进隔离区来保护盗窃犯——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完全象真的。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

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哦，关于骆驼和针眼的睿智的寓言啊！这些身外之物不允许你走进精神解脱的天国。你在“乌鸦车”里看到，别人也带着和你一样的口袋。盗窃犯们朝我们猖猖狂吠：“带烂包袱的畜牲们！”。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有五十来个，他们暂时没有动我们。现在我们在普列斯尼亚监狱交接处已经被关押了一天多。因为拥挤，两腿只得盘在身子底下，坐在肮脏的地面上。但是我们谁也无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都放在怎样寄存箱子上。虽然寄存东西被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仅仅是因为这儿是莫斯科的监狱，又看到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员们才勉勉强强地答应替我们办这件事。

一块石头落地！——东西收下了（这表示我们将不在这一个递解站把它们贡献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还在我们手里晃荡着。由于我们这一批“海狸”过分集中，他们把我们分散到各个监室。我和瓦连金被关进同一个监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别庭决定上签名的那个人。当时他曾经激动地提议要在劳改营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个监室还没有填满：过道空着，板铺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传统，二层铺果然是由盗窃犯占据的：头头们靠窗口，小哥儿们稍远点。下铺躺着中立的灰色人群。没有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害的窸窣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象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

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陷阱：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沙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象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绯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 吧 。 不 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象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

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嗐，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曲了。我愤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子。（嗯，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一个军官，这不是个很自然的要求吗？）

结果呢？贼头同意了。要知道我这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咸肉，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观点相似——他也会赶走最弱者。他命令两个灰色的中立人物离开靠窗口的下铺，把位子让给我们。那两个人顺从地离开了。我们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对于我们的损失我们还难过了一阵子（我的马裤没有引起盗贼们的兴趣，这不是他们的制服。可是一个扒手已经在摸瓦连金的毛料裤子。他看中了这东西）。只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邻人的悄悄的责难：我们怎么能央求盗贼们的庇护，把两个自己人赶到铺底下去？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象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1-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我们就是这样象一窝小猪一样用腰，用鼻头冲撞着、冲撞着，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们会变成人……为了变成人。

* * *

但是，即使对于一个新犯人，尽管他在递解站被剥一层皮，去一层壳，递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够逐步地向劳改营过渡。因为一步完成这样的过渡是人的心脏经受不起的。他的意识不可能马上在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过渡。

还有，递解站给予他一个和家庭联系的表面机会。他在这里写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时候是告诉家里他没有被处决，有时候是通知发配的方向。总之，是一个被侦查的，用犁头反复翻耕过的人初次写家信的时候使用的那些不习惯的字眼。在家人的记忆中，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成为原来的那个人了——这一切会象电光一闪似地通过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迹呈现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这是因为递解站虽然准许写信，院子里也挂着个邮箱，但是纸和笔均不可得，更谈不到削铅笔的工具。不过总能搞到一张展平了的马合烟包装纸，或者一张包沙糖的纸。另外，监室里面总归会有人藏着铅笔。于是几行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便写成了。这几行字将成为家庭今后是合是分的契机。

丧失理智的女人们有时候还会凭着这封信冒冒失失地长途跋涉到递解站来，想见到丈夫一面，尽管这里永远不会准许他们会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东西给她的丈夫添累赘。这样的妇女当中有一个，据我看，提供了为所有这些妻子们树立一座纪念像的标本，并且连建立这座塑像的地点也指定了。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〇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

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未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高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象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象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⑥

不知道为什么好久没有人上去赶开她，可能是警卫队懒得爬山。后来终于有一个当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挥手，——把她赶走了。

递解站还能打开囚犯的眼界，让他看到广阔的事物。俗话

---

⑥ 我们“群岛”的如此隐秘的、几乎被忘却了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用纪念碑的形式反映出来吧。例如，我的眼前老是呈现出另一座纪念碑的形象：在科雷马某地的一块高地上，一座巨大无比的斯大林雕像。它的尺寸要象斯大林梦想变成的那么大，——好几公尺长的胡子，劳改营警卫队长式的獠牙，一只手紧拽缰绳，另一只扬起鞭子抽打给他拉车的牲口——五人一具的几百个拉套绳的活人。这在靠近白令海峡的楚克奇角上将一定成为十分壮观的名胜。（以上的话写在我读到《摩崖浅浮雕》这本书以前，说明我那个想法不是没来由的！……据说，在高耸于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莫吉托夫山的岩壁上也曾用油彩画出过一幅巨大的斯大林肖像，供过往的轮船观赏。）

说，虽然忍饥挨饿，但是过得快乐。在这里的永不休止的流动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叙述和交谈中（在劳改营里是不敢这么说话的，那里到处都害怕碰上行动人员的触须）——你渐渐耳目清新、豁然开朗，心明眼亮，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人民甚至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开始能够更好地理解。有时候，被推进监室里来的一个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诉你一些在书本里永远读不到的新鲜事。

监室里忽然关进来一个奇迹般的人物：一个有着罗马人脸型的高个子的年轻军人，头上仍然保留着淡黄色的卷发，穿着一身英军制服，好象是一个直接来自诺曼底海岸的登陆部队的军官。他走进来的时候态度非常高傲，似乎预料着所有的人都会在他面前肃然起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走进了朋友们之中：他已经被关了两年，但是一次也没有进过监室。他被秘密地装进"斯托雷平"的单独的包房里，直接运到这个递解站。现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于疏忽还是故意地，关进了我们这间集体马厩。他在监室里走了一圈，见到一个穿德国军服的国防军军官，便用德语和他攀谈起来。可是没说几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看样子如果带着枪，他们马上就会动武。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西线的战争是装样子的，所以看到他们之间这么仇恨，我们甚感奇怪：这个德国人在我们当中躺了那么久，我们这些俄国佬并没有跟他发生过冲突，相反却经常在一道说笑。

如果不是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幸免剃光的头发（这是全古拉格的奇迹），如果不是他那洋里洋气的派头，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瑞典语，他讲出来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据他说，他是瑞典的一个不止是百万富翁而是亿万富翁（好吧，就当他吹了一点牛）的儿子，是德国英占区司令官罗伯特将军的外甥。作为一个瑞典公民，战争期间他以一名志愿者的

身份在英军中服役，真的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后，他成为瑞典军队的一名职业军官。然而他一直对考察社会制度怀着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超过了对父亲的资本的留恋。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着深厚的同情，而且当他作为瑞典军事代表团成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还通过亲眼所见确信了它的繁荣昌盛。主人为他们举行宴会，邀请他们到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和普通苏联公民——漂亮的女演员们——接触。她们都不忙着去工作，都很乐意陪他们消磨时间，甚至私下在一起。这样最终地确信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胜利之后，艾里克回到西方就开始发表一些捍卫和盛赞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终于成了他毁灭的祸根。在这几年，即一九四七-四八年，苏联正从各个缝隙里搜罗愿意公开和西方决裂的西方国家进步青年（似乎如果能凑足十来二十个这样的人物，西方就会发抖和崩溃）。根据艾里克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被内定为一个合适的对象。他当时在西柏林服务，妻子留在瑞典。由于可以谅解的男性的弱点，艾里克时常去东柏林和一个未婚的德国女人幽会。在一个夜间，就在她那里被人捆绑起来（"去找大娘，进了牢房"这句俄国谚语说的就是这种事儿吧？大约早已经是如此办理的，他并不是头一个）。他被带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曾经在他父亲家里吃过饭，和艾里克相识。现在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这个年轻人公开咒骂整个资本主义和他父亲。作为代价，他答应这位公子在我国立即得到终生的资本主义式的物质享受。但是令葛罗米柯吃惊的是，虽然艾里克在物质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但他却勃然大怒，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他们仍不相信他能够死硬到底，便把他软禁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面，供养得象童话中的王子（有的时候对他也实行"残酷迫害"：拒绝接受他预定的第二天的菜单，他原来点的是笋鸡，却忽然给他端上一盘煎牛排），在他周围摆满了马、恩、列、斯的著作。这样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过

来。奇怪的是连这也没有奏效。这时候弄来一个在诺里尔斯克服过两年刑的前中将，和他软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将用劳改营里的可怕情形促使艾里克就范。但是中将执行这项任务极不得力，也许是并不想执行。在一起蹲了十个月，全部成绩只是教会了艾里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再就是加强了艾里克本来已经产生的对蓝边帽的厌恶。一九五〇年夏天，再次由维辛斯基出面召见，艾里克再次表示拒绝（他竟以意识践踏了存在，这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规律的举动）。于是阿巴库莫夫亲自向艾里克宣读了决定：二十年监禁（？？为什么？）。他们自己已经后悔跟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决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这时候他被装进一间单独的包房，押往劳改营服刑。在车上他听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叙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过车窗看到了朽烂的草屋顶的梁赞地方的俄罗斯。

这两个年头使他牢固地确立了对西方的忠诚。他对西方的信任达到盲目的程度。他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弱点。他认为西方的军队是不可摧毁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告诉他，在他关押期间斯大林下了封锁柏林的决心并且相当顺利地实现了，他不肯相信；当我们嘲笑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时候，艾里克的乳白色的脖颈和奶酪色的面颊气得绯红。他同样坚信西方决不会容忍对他——艾里克——的监禁，西方情报机关马上就会根据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得到的情报查明艾里克并没有淹死在施普累河*里，而是正在苏联坐牢，一定会把他赎买或者交换出去。（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很象我们的思想纯正的正统派。）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舌战，他还是邀请我的朋友们和我有机会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着疲倦的微笑说："人人都知道我们。瑞典王室差不多全

* 流过柏林市内的河流。——译者注

靠我父亲维持”）。而眼下这位亿万富翁的公子却没有擦脸的东西，我把一条多余的破脸巾赠送给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⑦

人们不断地流动——带进来，带出去，单个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出发。表面上如此有条理、有计划，实际上其中充满了胡闹荒唐，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种劳改营。遵照某人的最高决定，大批女犯从苏联欧洲部分的极北地区和外伏尔加地区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迁往西伯利亚泰谢特市的奥泽尔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〇年，某人又认为把女犯拉到奥泽尔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尔多维亚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罗夫拉格。于是这同一批女犯又经过同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迤逦西行，一路享受着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适条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麦罗沃省建立了几座新的特种营（卡梅施拉格）——闹了半天，原来需要妇女劳动力的还是这个地方！于是这一批时运不济的女犯们现在通过

---

⑦ 从那以后我问过一些偶然结识的瑞典人或者前往瑞典的人，有什么办法能找到这家人？听说过这个失踪的人吗？他们仅以微笑作为回答：安德森这个姓氏在瑞典犹如伊万诺夫在俄国。亿万富翁中并没有这个姓氏。只是到了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当我最后一次重阅本书的文稿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应当知道，他们当然是禁止他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的！阿巴库莫夫当然警告过他，如果他说了，就会把他消灭！因此他就以一个瑞典伊万诺夫的化名进人了递解站。他只能够拿出一些他的经历中未遭禁止的次要情节，在偶然相遇的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被毁灭了的生命的一些痕迹。更可信的是，他仍然抱着得救的希望——这是人之常情，就象本书里的几百万只家兔一样：暂时坐一段牢，愤慨的西方将会把他解救出去。他是不了解东方的坚强性的。他不懂得，一个象他这样的见证人是永远不会被释放的，因为他曾表现出在脆弱的西方罕见的这样的强硬性。

他很可能今天还活着（1972年作者附记）

* “拉格”是俄文“营”或“特种劳改营”的缩写。——译者注

同一个可诅咒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麦罗沃特别营的苦难历程。释放犯人的时代来临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松动的赫鲁晓夫时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们又从西伯利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被装运到莫尔多维亚：上面认为把她们全集中在一起比较牢靠。

反正这全是我们内部的业务，各岛屿全是我们自己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也并不那么遥远。

个别倒霉的男犯有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沈德里克——面容憨厚、乐呵呵的大块头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劳改营里从事着所谓诚实的劳动，他没有料到会有什么灾祸。但是祸从天降。营里接到一项紧急指示——不是来自一般人物，而是来自内务部长本人（部长从哪里知道沈德里克这个人？）：立即把这个沈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监狱。他被提出来，拽到古比雪夫递解站，从那里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并没有把他投进什么第十八监狱，而是和别人一起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红色普列斯尼亚。（沈德里克本人压根不知道十八号监狱的事，因为没有向他宣布过。）可是他的劫数未尽：没过两天，他又被拉出来解送。这次是去伯朝拉。车窗外的景色愈来愈贫瘠阴郁。小伙子吓懵了：他知道有部长的指示。现在这样一个劲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长手里有沈德里克的过硬材料。路途的疲劳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粮，沈德里克到达伯朝拉的时候已经东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气，饿着肚子，不让住下，就押着他们顶风冒雪去上工。一连两天连衬衣也没有机会晾干，连床垫还没有用松枝填上。一声命令又要他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往更远处遣送——去沃尔库塔。根据这一切迹象看，部长是决定把沈德里克在劳改营里熬死。诚然，不是专门对付他一个，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搞掉。在沃尔库塔整一个月没有人过问沈德里克。他参加了一般作业。虽然还没有从旅途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已经开始顺从北极圈内的命运了。

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从矿井里叫出来，叫他赶紧回营里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一小时以后就上了往南边开的火车。这次可有点象专门惩罚他一个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进了第十八监狱。在监房里关了一个月。后来一个什么中尉叫了他去问："您跑到哪里去了？您真的是机械制造工程人员吗？"沈德里克说是。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岛！（是的，群岛里也有这类岛屿！）

这一类人物的隐现，这一类的遭遇，这一类的故事，使递解站大为生色。老劳改犯传授经验说："躺着，别管闲事！在这儿能吃最低保证的口粮，⑧也不需要卖牛劲。人不挤的时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饱可是能睡足。"只有尝过劳改营一般作业滋味的人才懂得递解站是休养所，是我们途中的幸福。还有一样便宜事：白天睡过去——刑期就过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见的。

诚然，递解监狱的主人们由于念念不忘劳动创造了人以及只有劳动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论，有时由于有一些辅助性的活茬，有时由于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点额外财政收入，他们也驱使手头这些整日挺尸的递解劳力去干活。

在上面说过的那个科特拉斯递解站里，战前时期这种性质的劳动一点不比劳改营轻。六、七名身体衰弱的囚犯套着搭缚，拉一辆拖拉机的（！）挂斗雪橇。一个冬季的白天要沿着德维纳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维切格达河口去。一会儿人陷进雪里，摔倒在地，一会儿雪橇又卡住动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累人的活儿了。可是这还不算真干活，这不过是活动活动筋骨。在维切格达河口还要把十立方木柴装上雪橇，原班人马用原样的鞔具，（列宾不在了。这对于我们新时代的画家已经算不了可以发

---

⑧ 古拉格保证供给的不劳动期间的口粮。

挥创造性的主题；这不过是实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递解站的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必再谈你的什么劳改营了——到不了劳改营你已经完蛋。（干这些活时的作业班长是柯鲁巴耶夫，当过拉车牲口的有电气工程师德米特里耶夫、后勤部中校别利亚耶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现在已经说不全了。）

阿尔扎马斯递解站在战争期间给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让他们干的劳动却是长期性的，它附设了缝纫厂、擀毡制靴车间（在滚烫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自报奋勇地从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闷热窒息的监室里出去干活；这是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气的权利，为了取得在安静的板条钉的厕所里不慌不忙、不受阻挠地蹲一会儿的权利（这可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鼓励手段！）。八月的阳光（这正是波兹坦和广岛的日子）把厕所晒得暖洋洋，可以听到一只孤单的蜜蜂的安详的嗡嗡声。我们也是为了取得晚上多领一百克面包的权利。我们被带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码头。我们的任务是把原木垛倒到别处，重新码起来。我们花的力气远远超过得到的报偿，可是我们仍然高兴到那儿去劳动。

青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的回忆常常逼得我脸红。但是凡使你沮丧者必给予你以教训。我发觉，在我肩头总共才摇颤了两个年头的那一副军官肩章，竟在我肋间那块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运码头上——它也是一个小型的劳改营，也划出了一个四周设有了望塔的隔离区——我们是外来人，是临时工。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能把我们留在这个小型劳改营里服刑。但是，当我们第一次排好队，派工员在队前走过用眼睛物色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毛料的军便服下面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我！

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我做出更加

可耻的错事。

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必须懂得的。

*　　*　　*

红色普列斯尼亚曾经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论到哪里去都不能绕过它，正如不能绕过莫斯科。那个时期在国内旅行，无论从塔什干到索契，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处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头的人，就连古拉格的头头们，事先也说不出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象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经路线和目的地。顶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严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乱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道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子一摞一摞地抱进监狱办公室的木头房子，胡乱地摔在书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过道的地板上（就象它们的本主儿横七竖八地躺在监牢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乱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子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肥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热得汗流浃背，成天扇着扇子跟监狱里的及押解

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乱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出几次红色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出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出。这件伤脑筋的麻烦事谁来干？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配递解的批次呢？

这种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头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混种。⑨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进入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进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出你的档案以便塞进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进来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恶劣透顶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好的”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取。）囚徒们的整个前途依赖着另一个跟他们身份一样的囚徒的态度。人们盘算着是不是该找机会跟这个人谈谈呢（哪怕是通过浴室服务员拉拉关系）？是不是该给他塞点东西呢（哪怕是通过财物保管员的后门）？——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着这样一种捉摸不定的机会——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诺里尔斯克改换成纳尔契克，一公斤咸肉可能把泰谢特改换成银松林（皮外套和咸肉也可能白丢）——它徒然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许有人真的得到好处，也许有人真的换来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还是那些无可奉献或不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认识到预测吉凶非但无用而且很容易导致你走出将使你遗恨终生的一步。

---

⑨ 混种（ПОЛУЦВЕТ）——精神上依附了窃贼的世界，行动上努力效仿他们，但是尚未精通窃贼的条规的人物。

＊ 为监狱当局效劳的盗窃犯。——译者注

这可以使一个囚犯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使得他比较安详，甚至比较高尚。

这样，当囚犯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里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高如山积地堆放在监狱办公室的各个房间里，而派工员们则是从容易下脚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这个可诅咒的普列斯尼亚恭候两三个月，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以流星的速度从这里一闪而过。由于犯人的密集、办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乱，在普列斯尼亚（在其他递解站亦如是）有时竟然发生刑期替换的情形。五十八条的犯人们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的刑期，用高尔基的说法，是大写的**刑期**，天生是漫长无际的，即使看起来好象快到头了，实际上永远到不了头。但是，惯偷、杀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个傻头傻脑的日常生活犯替换一下，倒是有一点意义。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帮手出面向这样的人凑近乎，关心地问东问西。那个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递解站决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细，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说，是瓦西里·巴尔非内奇·叶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谢米杜比耶，是当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〇九条，“玩忽职守”罪。过后，这个叶甫拉施金睡着了；也许没有睡着，是因为监室里太嘈杂，牢门上的送饭孔旁边太拥挤，无法靠近，听不见门外走廊里宣读本批解犯名单的人嘀里嘟噜些什么。站在门口的犯人们向监室里传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没有叫到叶甫拉施金，因为走廊里刚刚念到这个姓氏便有一个贼骨头立时巴巴结结地（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会这一手啦！）朝门外探出他那嘴脸，用又快又低的声音回话：“瓦西里·巴尔非内奇，一九一三年生，谢米杜比耶村，一〇九条，一年”——接着就跑去取东西。真叶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铺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号。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这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打扰一下监楼长：为什么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时各个监室每天都呼唤着一个姓兹维亚嘎的

人。）又过了一个月或者半年，当有了空闲时间用逐案点名的办法对全体解犯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后，只剩下一个兹维亚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两次杀人，抢劫商店，十年；另有一个自称为叶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凭照片根本看不清，那么就暂且把他当作兹维亚嘎好了，那么就该把他关进伊甫查里惩戒劳改营去。不然的话，就得承认是递解站搞错了。（已经解出去的那一个叶甫拉施金现在已经查不到下落，名单没有留底。况且他是一年刑期，现在已经被派到营外去干免除看管的农业劳动，正享受着一天算三天的折减。也许他已经逃亡，早就在家里呆着。更大的可能是又进了监狱，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这样一类怪家伙，他们为了换取一两公斤咸肉，甘愿把自己的短暂的刑期**卖给**别人。他们估计反正以后会弄清楚的，会查明他的身份。这个主意也不完全错。⑩

有一个时期，囚犯的案卷上不注明递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递解站变成了奴隶市场。递解站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是买主，这个名词在走廊上和监室里是经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并不带任何讥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厂不能坐等中央统配物资而要派出自己的催办人员一样，古拉格也有类似情况：各岛屿的土著在渐渐绝灭，他们虽然不值一文钱，但却是有统计数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设法弄进些人口来补充，以免完不成计划指标。买主须是一些精明干练、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带走的犯人都必须仔细过目，免得让人家塞进一些老弱病残充头数。不中用的买主才凭档案挑选犯人，正经八百的商人要求货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们眼前走过。货物这个词儿不是当笑话说的。“喂，这回运来的是什么货？”布蒂尔卡交接站上，一个买主发现了十七岁的伊拉·卡林

---

⑩ 顺便说一句，根据П·雅库鲍维奇关于所谓“小贩”们的描写，上一世纪就有出卖刑期的事情。这是监狱里古已有之的把戏。

娜，一边上下打量一边问。

人类的天性即便能够变化，也不会比地球的地质面貌变得更快。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奴隶贩子在女奴市场上体验过的那种好奇、玩味、品评的心理当然也支配着一九四七年乌斯满监狱中的古拉格官员们。他们——身穿内务部制服的二十来个男人——分别坐在几张铺着床单的（这是为了显示隆重，不然总归有点不好意思）桌子后面，女犯们在旁边的隔离室脱光衣服。她们必须赤身露体、光着脚在他们面前通过，朝他们转过身，停下来，回答他们的问话。“把手放下来！”这是对那些采取古希腊雕像的遮羞姿态的女犯们发出的命令（要知道，军官们正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地挑选姘妇）。

新囚犯到达递解站时精神上感到的一些天真无邪的快慰也会被明日劳改营中那一场苦战的浓重阴影所笼罩。

普列斯尼亚监室里关进了一个专用犯人，他在我身边睡了两夜。“专用通知单”是总局开具的一张随犯人转送到各地的通知单。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通知单的规定解送的，那上面写明他是建筑技术人员，各地必须按他的专业使用他。专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斯托雷平”，拘押在递解站的集体监室，但是他心里有底：他受到通知单的保护，不会分派他进森林里去伐木。

这个业已服完大半刑期劳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征是残忍和果断。（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样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岛民的民族特征。有着温良柔顺的表情的人们在岛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观望着我们手足无措的挣扎，好象人们在看着一窝刚生下两周的狗崽子。

我们在劳改营里将遇到什么？他出于怜悯之心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你们一跨进劳改营的大门，所有的人都会使劲地哄骗你们，抢劫你们。除了自己，对谁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顾后：提防

有人偷偷过来咬你们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时候也是这样天真。下了列车，押解队正要带我们上路：离劳改营还有十公里，全是松软深厚的雪地。这时来了三辆雪橇。一个身材虎实的大叔招呼我们说：‘弟兄们，快把东西放在雪橇上，我们替你们拉去！’押解队也不干涉。我们回想起文学书里说过囚犯的东西是用大车拉的。我们寻思，劳改营也并非那么不人道，对人还是挺关心的！我们把东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东西，连个包袱皮也没剩下。”

“这怎么可能？那儿没有法律？”

“别问这些傻瓜问题。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义——古拉格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这个卡尔戈波尔事件差不多是劳改营的象征。你们还必需习惯于这一条：劳改营里谁也不会白做什么事，谁也不会出于善心做什么事。一切都必须付给代价。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什么大公无私的建议，你们必须知道这是圈套，这是引你上当。最主要的：必须逃避一般作业！从头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头一天掉进去了，你们就完蛋了，永远完蛋了。”

“一般作业？”

“一般作业——这就是一个劳改营的主要作业。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这个。他们全都得象牲口一样倒毙。全部。然后又会运来新的人去干‘一般’作业。干这种劳动，你周身力气都会使尽。永远吃不饱。永远湿淋淋。鞋也没有穿的。什么都克扣少给。住最坏的工棚。有病不给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来。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掉进一般劳动的火坑！从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吗？……

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犯人的这些丝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事：代价的尺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第 三 章

囚 徒 运 输 队

“斯托雷平”使人受罪，“乌鸦车”里苦不堪言，递解站也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顶好还是躲过这几关，乘红色闷罐车厢直达劳改营吧。

在这方面也象在一切方面一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达列车遣送罪犯去劳改营可以减轻市内铁路线、汽车运输和递解站人员的负担，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编组红色列车（用运牲畜的红色车皮）运输队和驳船运输队，在既无轨道又无水道的地区组织步行的囚犯大队（不许可犯人使用马匹和骆驼）。

每当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递解站挤得难以招架的时候，便显示出红色列车的极大优越性——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三一年曾用这个办法遣送过几百万农民。用同样的办法把列宁格勒迁出了列宁格勒。* 三十年代的科雷马殖民也是靠这个办法实现的：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红色列车开往苏维埃港、瓦尼诺港。每个省府也发出这种列车，不过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尔加河畔的日尔曼族共和国迁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对其他各民族也是如

* 指1934——35年列宁格勒的大清洗。——译者注

法炮制。一九四五年这种列车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接回俄罗斯的浪子和浪女们，或者把自行回归的人们从西部边界上运回来。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条的犯人们集中到特别劳改营也是用这种交通工具。

“斯托雷平”的运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车时刻表，红色列车则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将军签署的神气的指令运行。“斯托雷平”不能停在一片旷野里，它的终点总得有一个站房，有一个尽管很不象样的小镇，有一个有房顶的羁押室。但是红色列车却可以开进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边立刻就会从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岛的一座新的岛屿。

并不是随便一节红色车厢都可以马上用来运犯人——首先要对它进行整备。整备的意思并不是如读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扫一下，清除装人以前用于货运时剩下的煤屑和石灰，——这类事情不是每次必须做的。整备的含意也不是把车皮的缝隙填塞好，安上炉子。（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至罗普恰之间的线路刚一建成就立即投入运输犯人的工作，那时它还没有并入全国的铁路网。在这条线上使用的是既没有安炉子又没有支铺位的车皮。大冬天犯人们躺在结冰积雪的车厢底板上，而且还吃不到热食，因为列车跑完这一段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昼夜。有谁哪怕在想象中能够躺在那里熬过这十八——二十个小时而且还能活下来！）整备工作指的是以下这些事：要检查底板、壁板、顶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装好牢靠的铁栅栏；要在底板上打一个下水口，四周用铁皮和密钉特别加固；整个列车要均匀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设置带机关枪的押解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临时加造；要装置登上车厢顶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设置探照灯的地点并保证电源的畅通；要制造长柄木槌；要加挂一节指挥部用的客车，如果没有，则准备几节设备齐全并能取暖的宿营车供警卫队长、行动特派员、押解队员乘用；要设置给押解队和给

犯人做饭的厨房。待一切准备停当，便可以沿着列车首尾走一趟，用粉笔在车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专用设备”或者什么“易腐品”之类的字样。（叶·金兹布尔格的《第七节车厢》对红色列车的押解有很生动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列车准备工作结束之后，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囚犯装进车厢，这是一场复杂的战斗行动。进行这件事必须达到两个重要的目标：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车，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车必须瞒过当地居民，因为一趟列车一次要装进一千来人（至少挂了二十五节车皮），这不同于“斯托雷平”里运的那一小股，那一点人当众押送也是不碍事的。当然尽人皆知每日每时都在抓人，但是不应当让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聚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奥勒尔，没有一家没有人被抓，奥勒尔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农村来的大车，旁边站着哭哭啼啼的农村妇女，活象苏里柯夫的《射手刑场》的画面。（啊，什么时候还会有人给我们画一幅呢！不用指望了：这已经不时髦，很不时髦……）当时当地这类事情是没有法子掩盖的。但是何必在我们苏维埃人眼前显示出一天就抓来一列车之多呢（当年的奥勒尔被抓的人一天就能凑足一列车），况且更不应该让青年们看到这些——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事只能夜间干——每天晚上从监狱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队伍步行去车站（“乌鸦车”正用于新的逮捕），这样连续几个月。诚然，女人们是警觉的，女人们有法子打听出来，她们深更半夜从全城偷偷地溜到车站，紧盯着停在待避线上的列车，她们沿着列车奔跑，在枕木和轨道上磕磕绊绊，她们朝一节车厢里喊：某人在这里吗？……某某和某某在这里吗？……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

“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这类有损于我们现时代荣誉的场面之所以能发生，是上车的组织工作不完善所致。当局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于是从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乱叫的狼狗组成了一个警戒圈，远远地把列车包围起来。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递解站（这地方现在连囚犯们也不记得了）还是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把犯人装上红色列车只准许在夜间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尽管白日的光辉对于押解队是多余的，可是他们却使用夜间的小太阳——探照灯。这东西用起来方便，因为它们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点——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们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个人——起立！目标——车厢，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们东张西望，免得他们心里打主意，要使他们觉得象被一群狗追赶着，只顾往前跑，千万别摔倒）；探照灯射向他们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们攀登的车厢踏板。探照灯的阴森凄惨的光束不单是为了照明：它是恐吓囚犯的重要的戏剧性手段。此外还有对落后者的厉声恫吓与枪托的猛击；还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时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讲过的奥勒尔的车站广场上就曾如此，一千个人象现代的朝圣者一样纷纷跪倒在地上。）；还有本身毫无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慑作用的向车厢的跑步前进；还有警犬的嗥叫；还有对准犯人的枪口（早年是步枪，后来是自动步枪）；这一切都属于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

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囚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除了常规的点数、核对、剃头、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总搜查。搜查不由狱方主持，而由前来接收的押解队负责。遵照红色列车押解条例并出于押解队本身的战斗行动的考虑，搜查时要做到不给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没收一切带尖的有刃的东西；为了防止犯人们洒眯押解人员的眼睛，必须没收各种粉末状的东西（诸如牙粉、沙糖、盐粒、烟末、茶叶之类）；任何绳索，不管是粗绳、细绳、腰带，要一律没收，因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独腿人系义肢的小皮带也被剪掉了，这个残废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边的人扶着往前跳。）其他东西，包括贵重物品和提箱，按条例应一律送进专门的寄存车厢，到押解终点再归还原主。

但是对于沃洛格达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队，莫斯科定的条例的权威是疲软而松弛的，而对于囚犯们，押解队的权威可是具体而实在的，这一因素便决定了登车行动的第三个目的：

——为了维护正义，必须没收人民之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供给人民之子享用。

“就地坐下！”“跪下！”“脱光！”——这几句条例中规定的押解口令体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根本权威。要知道，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发虚的，他不能骄傲地挺起胸膛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平等地谈话。搜查开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条条的人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和脱下的衣服一个个地走过来，四面站着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装士兵。气氛不象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煤气室烧死。人在这时候已经不再关心身

外之物。押解队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鲁，没有一个字是用普通人类的声音说出来的，因为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箱子全被抖空（把东西抖在地下），然后扔进一个大堆里。囚犯们的烟盒、皮夹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贵重物品”全被挑拣出来，不标姓名，一概丢进旁边的大木桶。（不用保险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这种做法对于赤身露体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具有特殊的压力，使他们觉得反抗是无益的。）光着身子的人们只得赶紧从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烂，塞进小包袱或者打进行李卷里。毡靴吗？可以寄存，扔在这一堆里，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吧！（不是发给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签字证明你往这一堆里扔了东西！）最后一辆装运囚犯的卡车开出监狱大院的时候天已昏黑了，囚犯们看见，押解人员们一拥而上，从大堆里抢光最好的皮箱，从大木箱里挑拣最好的烟盒。接着是看守员们跑来拣点便宜，随后是递解站的杂役们。

这就是为了登上闷罐车在一天之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爬进来了，身子挨上了扎人的铺板。但是这里哪有什么松快，这算什么取暖宿营车?！囚犯们又陷入了寒冷和饥饿、干渴和恐惧、盗窃犯和押解队的两面夹攻。

如果闷罐车厢里有盗窃犯（在红色列车里面当然也不会单独把他们隔开的），他们便会占据着靠窗孔的上层铺的传统的好位置。这是夏天。我们可以猜出冬天他们在什么位置。当然是靠着炉子，紧紧围成一圈。当过小偷的米纳耶夫①回忆，一九四九年的严冬，从沃罗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昼夜），他们那一节“取暖宿营车”统共领到三提桶煤块！这时候盗窃犯们不单是占据了炉边的位置，不单抢光“福来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

① 见他给我的信，《文学报》1962年11月29日。

甚至连他们的包脚布也不嫌弃，把这东西从他们的鞋里抖出来，缠到自己的贼脚上。“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饭问题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车厢的口粮全由盗窃犯负责领取，他们留下最好的或者他们需要的。洛希林回忆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尔的三天三夜的递解。因为只有短短的三昼夜，不值得在列车里面煮热食，所以只发给干粮。盗窃犯们把全部夹心糖给自己留下，面包和鲱鱼允许别人均分；这表明他们当时肚里不饿。当供给热食的时候，盗窃犯近水楼台，菜汤是由他们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为期三周的递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盗窃犯们在途中也不嫌弃普普通通的小抢小劫：他们发现一个爱沙尼亚人镶着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钩子把金牙敲下来。

犯人们认为红色列车的最大优点是供给热食。在一个荒僻的车站上（仍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看见）把列车停下，把菜汤和稀粥送到各个车厢。但是发放的时候总要搞一些歪门斜道。他们可能（例如上面说的那趟由基什涅夫发出的列车）把菜汤倒在领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没有水呀！因为列车里饮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汤还缺。就请你一边喝汤，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们给一节车厢送来了菜汤和稀粥，却不给够钵子，四十个人只给二十五个，同时又命令：“快吃！快吃！我们还要往别的车厢送，不是你们一节！”请问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钵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凭眼力掌握，手紧一些，免得发过头。（先喝的人叫唤：“你搅合搅合呀！”后头的人不吭声：就让它底下稠一点吧！）头一拨喝着，第二拨等着。快点喝吧！肚子饿得发慌，桶里的粥也要凉了。外头已经在催促：“喂，完了吗？快了吗？”然后才轮到给第二拨舀粥。必须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发完以后，还需要估量出每个人还能添多少，这一次至少可以把两份合舀在一个钵子里分给全体了。从头到尾这四十个人简

直不是吃饭，而是眼睛盯着分粥，心里受罪。

不给取暖，不管束盗窃犯，水不给喝够，饭不给吃饱——再加上连觉也不让睡。白天押解员能看清楚整个列车和车后面的线路，知道有没有人跳车，有没有人卧轨。到了夜间，警惕性害得他们不得安生。夜间每到一站他们就用长柄木槌（全古拉格标准）咚咚地敲打每一块车板：可别被那些家伙锯断了吧？在某些车站上，车门猛然大开，电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灯的光束，直射进来："检查！"这意思是要你们立即跳起来，站好，准备听喝——全体朝左跑还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员蹿进车厢（另一些手持自动步枪的在车门外面排列成半圆形），他们指示：向左！这意思是：左边的人原地不动，右边的人必须立即象跳蚤一样一个从一个头上蹦到那边去，见缝插针，能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谁的腿脚不灵便，谁在那发呆，——腰间、背上就要吃木槌，这是给他提精神。同时，押解员的皮靴已经在乱踩你的叫花子窝铺，乱扔你的破衣烂裳。到处用灯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没有锯缝。没有！这时候押解人员就叫你们一个个从左边走到右边，他们站在车厢当中点数："一！二！三！……"本来只要简单地数一数，简单地用手指头点一点也就够了。可是那么办不吓人，所以还是用那个木槌在你腰间、肩膀上、头顶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点"数才更直观，更精确，更提神，更迅速。点完了，共计四十名。现在轮到在左边乱扔、探照、敲打了。最后完事了，走了，车厢上锁。你们可以睡到下次停车。（不能说押解队是没事自找麻烦——有本事的人确有从红色列车里逃跑的。例如，他们敲打车板的时候，有时就发现一块已经有了锯缝，或者某天清早发菜汤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一群胡子拉碴的面孔中间有几个刚刮过胡子的人。押解队端着自动步枪把车厢包围起来："把刀子交出来！"这都是那些盗窃犯和靠近他们的人的臭讲究：他们"当腻了"大胡子。现在只得把刮胡刀

交出去了。

红色列车与其他长途直达列车不同的地方是，上了这种列车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车。由列宁格勒监狱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车在索里卡姆卸车的时候，整个路基上摆满了死尸，活着到达的只有少数。一九四四-四五年和一九四五-四六年的两个冬天，从被解放的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德国）开来的囚犯列车抵达铁路村（克尼亚日-波戈斯特）的时候，也和开到极北地带所有主要枢纽站的时候一样，都挂着一两节装死尸的车皮。这表示在途中他们认真地从活人车厢里把死人捡出来，放进了死人车厢。实际上并不是经常这样做。在苏合别兹沃德那亚火车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这样分清谁死谁活的：列车进站后，打开车厢的门，凡是爬不出来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这种列车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押解队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实在无力为二十五个炉子拉煤炭。可是大热天乘这种车也不是那么甜蜜：四个小窗孔两个被封死，车厢顶棚晒得滚烫；至于饮水的问题，如果连一节"斯托雷平"的饮用水都供不上，却硬要押解队为一千口子去提水，岂不会把他们忙坏了？因此，囚犯们认为递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车需要在路上走**三个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连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够用的。预定要长期运行的列车，对于途中押解队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灵魂的精神关注都会有周密的安排：为这趟列车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动特派员，他乘坐一节单独的车厢。这位行动特派员在监狱里就对这次押解做好了准备，犯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认可的名单安排进各个车厢。他批准每节车厢的室长，训练和安插每节车厢的坐探。每次较长时间的停车，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车厢里叫出来，询问人们在里面谈些什么。这类特派员要是在旅途终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现成的结果，是没脸见人的。他

保证在路上就会给什么人立案侦查，你瞧着吧，一到目的地那个人又会被套上一个新的刑期。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象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象那儿的坐探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象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象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象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可是使用没有遮栏的平台车怎么运送犯人呢？怎么看守呢？——这确是押解队的一项难题。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命令我们挤成一团躺倒，用一整块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将金”号巡洋舰上被枪决以前的水手们一样。为了苫上这张帆布，还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奥列涅夫和他的伙伴们在北方的十月间坐在露天的平台车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经装上了车，可是火车头没有调来。先是下了一场雨，后来上了冻，犯人们的破衣烂衫全结了冰）。小型列车开动起来猛烈颠簸，平台车的槽帮子常会裂缝和折断，一次震盪就能把什么人甩到车轮子下面去。那么烦请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发车，在北极的严寒中乘露天平台车沿窄轨铁路行驶一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犯坐在什么位置？答案是：在每一节平台车的正中，以便让他们四周的牲畜们捂暖他们，也护着他们免得掉到火车底下去。答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条窄轨铁路的终点，犯人们将会见到什么（一九三九年）？那儿会有房子吗？不，没有一间。地屋？有，可是已经挤满了，那不是给他们住的。这么说，他们首先得给自己挖地屋吗？不，因为在北极的冬天怎么能挖呢？他们不是去干这个，而

是被带去开采金矿。“可是他们在哪儿住呢?”“什么?——住?……哦，对了，住……住……——住帐篷嘛。”

但是不会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轨火车吧? 不，当然不。有乘大火车直接抵达的：叶尔佐沃车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里车厢门打开了。沿着列车的全长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们从车里下来，站在雪地里。点数，站队，又点数。气温是零下三十二度。这批犯人是从顿巴斯来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着短腰皮靴、便鞋，还有穿凉鞋的。谁想在火堆旁边取暖，押解队马上把他赶开：篝火不是为这个预备的，而是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头就冻木了，雪填进单薄的鞋子里连化也不化。没有一丝宽容，只听见口令声：“站队！看齐！谁离开队列左右一步，我们不打招呼就开枪……齐步走！”系在铁链上的警犬被它们心爱的口令和这个兴奋的时刻激动得嗥叫起来。穿着羊皮大衣的押解队员们开步走了，穿着夏季衣服的注定灭亡的人们也沿着积雪很深的完全没有踩出来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个地方。前方看不到一点灯火。北极光在闪耀。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后一次见到北极光……云杉在酷寒中发出干裂声。没有鞋穿的人们用冻僵的脚掌和小腿测量着积雪的深度，把积雪踩实。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军攻占华沙！……我军切断东普鲁士！”)到达伯朝拉的情形为例。荒凉的雪原，把人们从车厢里轰出来，叫他们坐在雪地里，排成六路横队，接着就没完没了地点起数来。一次数错了，再数一次。然后叫犯人们站起来，押着他们在没有人迹的雪原里步行六公里。这批犯人也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

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人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②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

……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

② 独劳点——独立劳动点。

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③

* * *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运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一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

③ П·雅库包维奇，同书。

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极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象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象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象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年还没有停止。A·Я·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④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凫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三八年，一九四四-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

---

④ 弗·伊·列宁在1897年流放途中是和自由人一样在客船码头登上“圣尼古拉号”的。

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汤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⑤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〇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

⑤ B·沙拉莫夫在《罪恶世界特写集》里对这类事件有详细的描写。

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〇”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是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掏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摔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甲·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对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涅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

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货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杆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咸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船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⑥

＊ 即宗谷海峡。——译者注

⑥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象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

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 * *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复活》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不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斯托雷平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不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

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子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象。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途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〇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日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

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朝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五〇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

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斯托雷平”在向前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第四章

从岛屿到岛屿

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斯托雷平”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

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象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

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是通过专门递解：两名看守和我。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象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

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疾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

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但是押解人员正抚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的黑色枪柄。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三个不喝酒的规规矩矩的哥儿们，三个文文静静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额头，我合上眼睛，我又睁开眼睛——看见的仍是原来的梦境：一大片没有押解队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监室里，明天又会回到监室。可是，几个拿着小钳子的检票员出现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个同志拿着。"

车厢里人很满（嗯，当然是按自由人的标准说"很满"——长椅下面，过道的地板上都还没有坐人呢）。既然他们告诉我路上要放随便点，那我就尽量随便了；我看见隔排有一个靠窗口的空位子，就坐了过去。而这个分隔里却没有押解人员坐的地方。他们只好留在原位上，从那儿象望情郎似地盯着我。在佩列波尔车站，我的小桌对面空出一个位子，可是一个脸庞粗大的青年人赶在我的押解员之前占据了这个阵地。他穿着羊皮大氅，皮帽，提着一只简陋但结实的木箱，我一眼就认出箱子是劳改营的产品，"made in 群岛"。

"啃！……"年轻人出了一口粗气。光线虽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满脸通红，说明他上车的时候经历过一番厮打。他拿出一个行军壶："同志，来点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员在隔排坐位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规定了不许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决不能喝的。可是——举止要随便。因而我就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行，来点。"（啤酒？？啤酒！！三年来我一小口也没有喝过！明天在监室里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轻人倒酒，我喝着，浑身

因幸福而颤栗。已经黑了。车厢里没有电灯。这是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在车厢的隔门上挂着的一盏旧罩灯里燃着一截蜡烛头，一共四个分隔统共只有这一盏灯。我和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摸着黑象朋友似地聊着天。我的押解员不管怎么伸长脖子，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的谈话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我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给家里的明信片。我马上就要向我的这位朴质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求他替我投进信箱。根据箱子判断，这个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什么差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

---

* 古希伯来经卷中描写的鬼王，这里指内务部军官。——译者注

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象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群岛”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忘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6”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象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象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际流浪者”！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布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布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两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所”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决无例外的。

* * *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①（一些人陆续地入土，

① 据社会民主党人尼古拉也夫斯基和达林提供的资料，在劳改营中的犯人总数约计为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

“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Д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我知道您！”“在哪儿？”Д君迴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Д，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恩，可别让我再进去了）——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太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

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杜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带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

通向坟墓的道路如此漫长……”

“查拉普金，谢尔盖·罗曼诺维奇。”

“噢，慢点，我很熟悉您。生物学家？拒绝回国者？从柏林来？”

“您怎么知道的？”

“那有什么，世界是狭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经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一起……”

……哦，那曾经是一间怎样的监室啊！那也许是我整个监狱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间监室了。那是在七月。他们奉了那个神秘的

“内务部长指令”把我从劳改营送进了布蒂尔卡。我们午饭后就到达了，可是监狱里忙得不可开交，交接手续办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半夜三点才把在隔离室里饿得半死的我带进了七十五号监室。两个拱形屋顶下安着两盏强光灯泡，把监室照得通明。监室里人挨人地睡着，憋闷使他们不得安生：罩着“笼口”的窗户透不进七月的灼热的气流。彻夜不眠的苍蝇嗡嗡地叫着，停在睡觉的人们身上，引起他们的抽动。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挡刺目的光亮。便桶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在这样的高温下，分解的过程进行得特别迅速。监室原定容纳二十五人，现在填塞得还不算过分，总共才八十来个人。两边的板铺上躺满了，两排板铺中间的过道又搭上板子当作加铺。板铺底下东伸出一双脚，西伸出一双脚。传统的布蒂尔卡橱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还剩下一小块空地，于是我就在那儿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须从我身上跨过。

从牢门的送饭口传来一声“起床！”的命令，全体立时动弹起来：拆掉临时搭的铺板，把橱桌推回窗口。犯人们走过来对我进行访问：是新入狱的还是劳改营来的？原来，这个监室里汇合了两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劳改营的新决犯的常规的水流，另一股是从劳改营来的回流，这些人是各类的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设计工程师，他们正陆续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科研单位（这下我放心了，部长不是要给我套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口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带着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

穿冬装）。我的手指头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擦伤。我能做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从外面带进劳改营一本《史密斯报告》——美国国防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强迫我按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口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会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子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部分。一个空香烟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做插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象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蝇。他是一个生物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热布拉斯因为不知道（或许明明知道）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写出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物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物学——这是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物学的时候，热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头）。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尽管他那时候早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囊括知识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身体，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感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出身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

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坚韧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点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强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拒绝回国者，虽然依旧是爱国者。

一九四五年苏军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欢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费耶夫吓了一跳：“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费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还是祖国背叛了他们？），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坚信自己没有做

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精神抖擞。

在布蒂尔卡的监室里面，支板铺用的拱形的金属架子非常非常之矮：连监狱当局也没有考虑过铺底下还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军大衣扔给你的邻居，让他替你在铺底下铺好，然后你才能脸朝下在过道里趴下，一点点爬进去。过道里人来人往，板铺下的地面也许一个月能打扫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厕所以后洗一次手，而且没有肥皂。因此决不能说，你感觉自己的躯体是一个“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这块铺下的沥青地面上，在这个不断从铺板上往我们眼睛里落下尘土和碎屑的狗洞里，我绝对地、无条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鸠鲁说得对：在经历过多样的不满足以后，多样的缺乏会被感觉为一种满足。经历过好象已经永远熬不到头的劳改营、十小时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后，哦，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着、睡觉，而且照样领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面包和两顿热食（用配合饲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话——“布监疗养院”。

睡觉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卧着，用自己的脊背当被窝，只管睡你的吧！在睡梦中你不消耗体力，不焦心，而刑期却一点点地过去，过去！当我们的生命象火炬一样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时候，我们诅咒无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时的必要性。而当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被剥夺了希望以后，——祝福你呀，十四小时的睡眠！

但是他们把我在那个监室里一连关了两个月，我把前后两年的觉都睡足了。在这期间我从板铺下面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边，不过这次已经上升到板铺上面。上了铺以后又挪动到靠拱门的地方。我已经睡得很少，我正痛饮着生活的甘露，尽情地享受着。早晨是科技协会，然后下棋、读书（那是在犯人

* 宗教用语。“容器”即“人”。基督教义把人看作一种用以接受某种精神或影响的容器。

当中旅行的书，八十个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队）。接下去是二十分钟的放风——大调和弦！即使冒着倾盆大雨我们也不放弃放风。而更主要的是人们，人们，人们！尼古拉·安德列维奇·谢明诺夫，第聂伯水电站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俘虏营中的好友——Ф·Ф·卡尔波夫工程师。机智、尖刻的物理学家维克多·卡甘。音乐院作曲系学生瓦洛甲·克列姆普涅尔。象林间湖泊那样深沉的维亚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猎手。从欧洲来的东正教传教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基甫尼奇。他并不局限于神学，他大骂马克思主义，宣称在欧洲早已没有什么人认真看待这个学说了。这时候我出来为它辩护，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还会满怀信心地用语录给他以怎样的痛击啊，还会对他进行一场怎样的毁灭性的嘲讽啊！但是这头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内心留下了印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有留意——积累了那么多的事件、见闻和认识，以至于我已经说不出这样的话：这是没有的事！这是资产阶级造谣！现在我只能承认，是的，是有这些事。这么一来，我的全部论据的链条立即松软下来，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我无法招架。

被俘人员仍是源源而来，源源而来，源源而来。两个年头了，这股来自欧洲的水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又是那些俄国侨民——从欧洲来的，从满洲来的。人们到俄侨当中去打听熟人的消息，先问：你们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再问：某某人您知道吗？他们当然会知道的（雅谢维奇上校被处决的事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打听到的）。

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儿——正是我在东普鲁士（两百年以前？）曾强迫他给我拎箱子的那个魁梧的德国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么狭小！……天晓得我和他怎么会又遇到一起！老头子向我微笑，他也认出了我，而且好象还为我们的相遇而高兴。他原谅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来绝对活不了那

么久。另外还有一个德国人，一个细长条的年轻人。这个人从来不答话，也许因为他一个俄国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人：盗窃犯扒光了他的德国衣物，给他换了一身褪了色的苏联军便服。他原是一个有名的德军王牌驾驶员。他的第一次战役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战争，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兰，第四次——英伦上空，第五次——塞浦路斯，第六次——苏联。既然是王牌驾驶员，那就不会不从空中扫射妇女儿童——战争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笼口"*。当然，我们这个监室里也摊上了一名思想纯正的分子（如检察长克列托夫之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畜牲抓进来，完全正确！历史将碾碎你们的骨头，拿你们去当肥料！""狗杂种，你也要去当肥料！"人们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会重新审查，我是错判的！"整个监室咆哮、沸腾起来。一个白发苍苍的俄语教师在板铺上站立起来，赤着脚，向前伸直了手臂，好象新降临的耶稣基督："我的孩子们，和解吧！我的孩子们！"人们向他叫喊："你的孩子们在布良斯克森林里！我们不是谁的孩子！我们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过晚饭，上过傍晚那一次厕所以后，夜幕在窗外的"笼口"上降临，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灯泡燃亮了，白昼使囚犯们分裂，而黑夜使他们靠拢。每天傍晚从来不发生争论，而是举行报告会或者音乐会。这又是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大放异彩的时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谈论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俄侨们介绍巴尔干国家，介绍法国。有人作关于科布席埃的报告，有人讲解蜜蜂的习性，有人谈果戈里。这也正是烟友们大过烟瘾的时光！监室里烟幕沉沉，象浓雾一样飘动，由于装了"笼口"，从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乌拉和我同年，圆脸庞，蓝眼珠，动

---

* 指剥夺政治权利。

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边，朗诵自己在狱中创作的诗，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变了调。他的诗作的标题是：《我的第一次牢饭》、《致妻》、《致子》。当你身在狱中努力通过听觉领会狱中诗的含意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注意作者的节调、重律是否有差错，每行的结尾是押半谐音还是全韵脚。这些诗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泪，监室里在哭泣。②

从那个监室开始，我也产生了写狱中诗的愿望。而当时我朗诵了叶塞宁的诗篇，在战前他的诗差不多是被禁止的。年轻的布勃诺夫，一个被俘人员，原先好象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他不是专家，不是从劳改营来的，而是往劳改营去的。就凭他的纯真和性格的耿直，十之八九是要死在那儿。象他这样的人在那种地方是活不长的。对于他和另一些人说来，七十五号监室的这些傍晚是那个美好世界在他们生命的列车暂时闸住了一下的、致命的滑坡中的突然展示。那个世界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的狠心的命运却没有让他们在其中生活过短短的一年，哪怕是青年时代的短短的一年。

送饭口的木挡板落下了，露出了监头的兽脸。他大声呵叱："睡觉！"不，甚至在战前，当我同时在两所高等学校学习，靠业余教课谋生，并且有着旺盛的创作欲望的时代，我好象也未曾经历过如此充实，如此繁忙，如此充分利用了的日子，象在这一年夏天的七十五号监室。

"对不起，"我对查拉普金说："我后来从德乌里，就是那个

② 现在这个人音讯全无。柯斯佳·基乌拉当时身体已经很不行了，恐怕他已经不在人世。

为‘反苏宣传’得了五分*（当然不是学校成绩表上的）的十六岁的男孩子那里……”

“怎么，您也认识他？他跟我们一批递解到卡拉干达……”

“……听说让您当了医院的化验员，可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却一直被派去干一般劳动……”

“结果他身体完全垮了。从‘斯托雷平’里下来运进布蒂尔卡的时候已经半死不活了。现在躺在医院，第四特别处③发给他奶油，甚至还给葡萄酒。但是他还能不能起来，很难说。”

“第四特别处找你们去过吗？”

“找过。他们问我们，经过卡拉干达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把研究所在我们祖国境内建起来还是可能的。”

“于是你们就热烈地赞同了？”

“还用说！我们现在毕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说，全部设备都已经被硬拆下来，装了箱，他们自己运来了。”

“看，内务部多么忠诚于科学事业啊！我恳切请求您再唱几句舒伯特！”

查拉普金又轻轻地唱起来，忧郁地凝望着窗口（黑色的“笼口”和窗户的明亮的上沿清晰地反映在他的眼镜片上）：

> Vom Abendrot zum Morgenlicht
> War mancher Kopf zum Greise.
> Wer glaubt es? meiner Ward es nicht
> Auf dieser ganzen Reise.**

---

③ 内务部第四特别处的任务是利用犯人的力量解决科学研究的课题。

* 指被判了五年徒刑。

** 大意："有人的头发一夜之间就变成灰白。谁相信呢？我的头发在这整个的旅途中，却没有变化。"

* * *

托尔斯泰的愿望实现了：囚犯们不再被强迫去参加有害的宗教仪式。监狱教堂关闭了。诚然，教堂的建筑物还保留着，但是它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扩大监狱容量的需要。这样一来，在布蒂尔卡的教堂里便可以多容纳下两千名犯人，以每批的周转时间为两周计算，全年共可多通过五万人。

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进布蒂尔卡。我熟悉地穿过四面由监狱楼房围绕着的院子，急急忙忙地向指定的监室走去，甚至超过看守员一肩的距离（急着回家吃燕麦的马也是这样赶路的，用不着皮鞭和缰绳的催促）。有时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筑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笼口”跟监狱主楼的不一样，不是用工业方法制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钢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烂的板条钉成的，它们标志着这座建筑物的次等地位。这地方是专为新判犯人准备的所谓布蒂尔卡的内部递解站。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里迈出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特别庭判决以后，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教堂（正是时候！能祷告一下也不错）。我们被领上二楼（三楼也被分隔成监室），从八角形的前庭把我们分别塞进不同的监室。我进了东南监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四方形监室，当时里面关了二百人。也跟别处一样，板铺（那里是单层的）上面、板铺下面、以及干脆在过道里、花砖地上，都睡着人。不仅窗户外边的“笼口”是次等的，这里的一切待遇都好象不是为布蒂尔卡的亲生儿子，而是为它的晚子规定的。对这一堆蠕动的生物，既不给书籍，也不给棋类；铝制的饭钵和残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饭以后都要收走，因为担

心在起解时的忙乱中被犯人带走。连盛水的缸子也舍不得发给这些晚子们一只，而是要他们喝完菜汤以后洗洗钵子，再用它去喝浑浊的茶水。在监室里没有自己的盘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还是不幸？）收到家里送来的牢饭的犯人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在长途发配前的最后几天，亲属们总要尽力送来一些食品）。亲属本人没有受过监狱教育，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也从来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他们送来的食物，不是装在唯一允许囚犯拥有的塑料容器里，而是装在玻璃或铁皮的容器里。送来的蜂蜜、果酱、炼乳全是通过牢门的送饭孔从原装的容器中无情地倒在或刮在犯人们所能找到的东西里面。可是在教堂监室里你能找到什么？只好用手掌，用嘴，用手帕，用衣襟接着。这在古拉格的各个劳改营里完全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于莫斯科市中心说起来总不大象样吧？"快点！快点！"看守员还催个不停，好象怕误了火车（他们这么使劲催，目的是自己想舔舔没收去的罐底子）。教堂监室里一切都是临时性的，没有受侦查人监室或候审人监室里面的那种长期性的感觉。这一类囚犯是已经被碾碎的肉酱，是准备向古拉格提供的半成品，只是在红色普列斯尼亚为他们空出一点地方之前，不得不在这里把他们再关押几天。这里能享受到的唯一特权是一天三次由犯人自己去抬菜汤（这里不供给麦屑粥，但是菜汤却一天给三次，这确是大发慈悲，次数多，热量多，填进胃里的重量也大些）。给予这个特权的原因是，教堂建筑与本狱其他牢房不同，没有安装电梯，而看守又懒得卖命。沉重的大木桶要从很远的地方抬来，穿过大院，然后沿着陡直的梯子往楼上抬。这是很吃力的活儿，犯人们力气不多，可是很愿意去抬，巴不得多走进一次翠绿的庭院，听一听鸟儿的歌唱。

教堂监室里有它特殊的空气：在即将来临的递解站的疾风先兆和北极劳改营的寒流前锋的影响下，它的空气已经开始轻轻地扰动。在这个教堂里举行着一项人人都必须通过的仪式——"习

惯仪”，你必须习惯于你的判决已成定局而且是十分严峻的；你必须习惯于以下一点，即无论你生活的新时期将是如何残酷，你的头脑都需要适应它、接受它。而要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啊！

这里的人员不象受侦查人监室里那样固定。受侦查人的监室由于人员比较固定，因而变得有点象个大家庭的样子，而教堂建筑里的这种监室里，白天晚上都有单个的或者几十人一批的犯人带进带出，从而地板上和板铺上睡的人们不断地换位置，很少能和某一个人并排躺两昼夜以上。一旦遇到有意思的人，要毫不迟疑地和他拉拉话，不然你就会永远错过机会。

我就是这样错过了和汽车修理工麦德维捷夫深谈的机会。一开始和他谈话，我就想起来“米海依尔皇帝”提起过这个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读到《告俄国人民书》而没有向当局告发的几个人之一。麦德维捷夫得到了一个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丢人的刑期——总共才三年！这不是按五十八条判的，如果按这一条，判五年都算是幼儿园的期限。很明显，他们毕竟是把皇帝当疯子看待的，对其余有关人犯一概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宽宥了。但是我刚刚要探询麦德维捷夫对此事的见解，他就被通知“带东西”离开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设想他是被带出去释放的。这件事证实了关于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传闻。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是一次没有对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后就连板铺底下也没有变得宽敞半分。

我的邻人——一个老“保卫同盟”* 队员被解走了（这些“保卫同盟”队员在保守的奥地利憋得难受，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来，每人被贴上了一张“十元券”**，终于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

---

*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军事组织，参加过1934年2月武装起义。

** 十年刑期。——译者注

的头发乌黑锃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象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您看我是个什么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象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

我好象听到一声爆炸，甚至哆嗦了一下。我已经遇到过两百来个被诬告的间谍，我从来没有想过还能遇到一个真的。我以为根本就不存在真的。

据他自己介绍，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三岁的时候，大人就决定他将来要在总参谋部服务。六岁进了谍报学校。长大以后，他选定了苏联作为将来活动的场所，因为他认为，这里既有世界上最无情的反间谍机构，又有最困难的工作条件，原因是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互相怀疑的。他现在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在这里干得并不坏。战前的几年是在尼古拉耶夫市度过的，看来，他保证了罗马尼亚军队完整无损地接收一座造船厂。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然后又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他走进一个大车间的主任办公室去收工会会费。当他带上房门以后，傻里傻气的笑容立即从他的唇边消失了。那种象战刀劈刺一般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波诺马廖夫！（而波诺马廖夫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用的是另外的姓名），我们从斯大林格勒起就一直跟踪您。

您擅自离开了那里的职守（那人曾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一个大干部），改名换姓钻到这里来了。现在由您选择——是想被你们自己人枪毙，还是为我们工作。”波诺马廖夫选择了后者，这完全合乎这一类一帆风顺的猪罗的习性。他一直在卢考特南特的领导之下，直到卢考特南特本人转入潜伏在莫斯科的德国特务头子的管辖之下。德国人派他潜入波多尔斯克执行专业任务。弗拉迪米列斯库解释说：谍报和破坏人员受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但是每一个人还有一门狭窄的专业。弗拉迪米列斯库的专业是降落伞主伞绳的内部截断。在波多尔斯克，降落伞仓库的警卫班长（他是谁？是个什么人？）在仓库门前接应他并且在夜间把他放进仓库，让他在里面停留了八个小时。弗拉迪米列斯库把小梯子靠在降落伞垛上，不弄乱叠放的秩序，展开伞绳的编织带，剪断它的五分之四的厚度，留下五分之一，让它在空中绷断。弗拉迪米列斯库为了这一夜进行了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现在他发狂似地干着，据他估计，八小时之内毁坏了将近两千个降落伞。（每个伞平均用十五秒？）“我消灭了一个苏联伞兵师！”他的樱桃似的眼珠幸灾乐祸地闪着亮。

被捕以后，他拒不招供。蹲在布蒂尔卡的单人监室里的八个月当中，他一个字也没有说。“您没有受刑吗？”“没有！”他的嘴唇猛地抽动了一下，好象表示他认为对于一个非苏联国籍的人士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为了让外国人害怕，只要狠揍本国人就行了！……间谍可是一个无价之宝，也许有一天需要用他交换什么人。）终于有一天，当局拿报纸来给他看：罗马尼亚投降了。现在招供吧！他仍然保持沉默：报纸可能是伪造的。他们向他出示一份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命令：根据停战条件，总参谋部命令全体谍报人员缴械投降。他继续保持沉默（命令可能是伪造的）。最后，他被带去和他的总参谋部顶头上司当面对质，那个人命令他公开身份，缴械投降。这时候弗拉迪米列斯库态度冷

静地做了招供。而现在，在监室里的漫长的白昼里，他对我也无所谓地谈了一些实情。他们甚至没有审过他！他们甚至没有给他判刑！（他毕竟不是咱们自家人！）“我至死都会是一个职业间谍，他们会重用我！”

“但是您向我暴露了身份，”我指出。“我现在可以记住您的面孔。请您想象一下，如果将来哪一天我们在街上遇到……”

“如果我确信您没有认出我，您可以继续活下去。如果您认出我来，我就把您打死，或者强迫您为我们工作。”

他丝毫不愿意搞坏和同铺邻居的关系。他说这些话是平平常常的，完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也真地相信，他会毫不在意地朝谁开一枪或者割断谁的喉咙。

在我们这部卷帙浩繁的囚徒编年史里面，你再也遇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英雄。在我十一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生活中，这一类的相逢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别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国大量发行的廉价宣传读物却成天价愚弄青年，要他们相信“机关”抓的全都是这一号的人物。

只要好生观察一下教堂建筑里的这一间牢房，就足以看清，当局现在捕抓的头号对象就是青年。战争临近结束，只要选定了什么人，全可以大手大脚地抓起来：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当兵了。据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卢宾卡（莫斯科省内务机关）审理过一起“民主党”的案子。根据传闻，这个党是由五十来个少年组成的，有党章、党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莫斯科中学的十年级学生，担任“总书记”。战争最后一年，一些大学生也偶尔出现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我在各处都遇到一些。当时我自己似乎还不算老，但是他们——更年轻。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

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噘了起来，身体好象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自己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

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走的道路相交了：也在布蒂尔卡的监室里，我曾遇见过维亚切斯拉夫·Д君。在被捕的年轻人当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在自己的小组里他是铁杆，可是在侦查过程中很快就顶不住了。他得到的刑期比谁都短——三年，而且看来暗地里大大地指望着他的有势力的老子的搭救。

后来，当我进了布蒂尔卡教堂监室的时候，他们当中最年长的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着来了。尽管年纪尚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的预备会员。他的笔头明快，惯于运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在政治上他愿意做一个驯良的人，那么在文学上不难打开一条

引人注目的独辟的蹊径。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仪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明宗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④

这些青年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造作、晦涩，

---

④ 在入狱前和在狱中的年代，我也曾长久地认为苏维埃国家制度的致命的发展方向是斯大林一手赋予的。但结果斯大林悄悄地死掉了——轮船的航向发生了什么显著的变化吗？对于我国的事件，他所赋予的纯属个人的印记无非是冥顽不灵、刚愎自用、自吹自擂。在其他一切方面，他只是沿着前人标划出来的路线，一步一步地行进而已。

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米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宥！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分化"、失望、淡漠和对甜蜜生

---

*彼得·彼得罗维奇·施米特（1867——1906），黑海舰队中尉，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后被沙皇政府处决。

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10”因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噹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附录

人 名 索 引

据本书英译本附录编写，仅供参考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A

阿维尔巴赫（Авербах И·Л·）。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的合作者。

艾亨瓦尔德（Айхенвальд, Юлий Исаевич. 1872—1928）。批评家和杂文作家，叔本华著作的俄译者。1932年被驱逐出境。

艾津格尔（Этингер ？—1952）。苏联医生；1952年因所谓“医生案件”被捕。在侦查中死亡。

安德列夫（Андреев, 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1—1919）。剧作家和短篇小说家，接近表现主义；死于芬兰。

安德留施金（Андреющкин, Пахомий Иванович. 1865—1887）。民意党恐怖主义组织成员；1887年因企图行刺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决。

安德斯（Андерс, Владислав. 1892—1970）。波兰将军；曾在苏联境内建立波兰部队，1943年率领这支部队去伊朗。

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Антонов-Сарат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84—1965）。老布尔什维克。在沙赫特案（1928）和工业党案（1930）公审中担任审判员。

安菲捷阿特罗夫（Амфитеат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62—1938）。俄罗斯作家；1920年移居国外。

奥鲍连斯基（Оболе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5）。十二月党人；被判死刑，后减为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

奥里明斯基（Ольминск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63—1933）。早期职业革命家，记者。

奥尔忠尼启泽（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Серго〕1886—1937）。联共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肃反中自杀。

奥利茨卡娅（Олицкая, Екатерина Львовна. 1898—）。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她的劳改营回忆录由“自己出版社”流传，并由西德法兰克福“播种”出版社印刷出版。

奥索尔金（Осоргин〔Илин〕，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1878—1942）。作家；1922年被遣送出境。

B

巴布什金（Бабущкии，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06）。俄国革命家。

巴赫亭（Бахтин，МихаилМ ихайлович.1895—1975）。文学理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自1930年至1963年苏联国内未出版过他的作品。

巴枯宁（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14—1876）。无政府主义创始人。

班杰拉（Бандера，Степан.1909—1959）。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47年为乌克兰反苏武装力量的首领；在慕尼黑被苏联特工人员暗杀。

鲍基（Бокий，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1879—1941）。秘密警察官员；1927年后为最高法院成员；1937年被捕。

贝利亚（Берия，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1899—1953）。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1934年后连任中央委员，1938年成为斯大林的亲密助手，负责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事务。斯大林逝世后被处决。

贝努阿（Бенуа，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1870—1960）。舞台设计家；1926年流亡巴黎。

彼得斯（Петерс，Яков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1886—1942）。拉脱维亚革命家；二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被清洗。

彼什科娃-维纳魏尔（Пешкова-Винавер，Екатерина Павловна.1876—1965）。高尔基的前妻；曾主持政治红十字会。

彼斯节里（Пестель，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1793—1826）。十

二月党人，激进派首领；被处绞刑。

彼特留拉（Петлюра, Сим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1877—1926）。乌克兰民族主义首领；1918—1919年率领乌克兰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在巴黎流亡期间被暗杀。

比龙（或比连）（Бирон）。恩斯特·约翰·比林（1690—1772）的俄国姓。安娜·伊凡诺夫娜女皇的宠臣，建立暴虐统治。

毕力涅克（Пильняк〔Вогау〕, 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1894—1941）。苏联作家；被指控歪曲革命事件，死于狱中。

别德内依（Бедный, Демьян.1883—1945）。苏联诗人。

别尔胡洛夫（Перху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1876—1922）。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首领；1922年在雅罗斯拉夫尔被枪决。

别尔佳耶夫（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4—1948）。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反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1922年被驱逐出境；1924年后定居巴黎。

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文学批评家。

别舍霍诺夫（Пешехонов,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7—1933）。作家，1922年被驱逐出境。

勃洛克（Блок,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80—1921）。象征主义诗人。

波别德诺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1827—1907）。律师，政界人物；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代诉人；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及尼古拉二世初期他的反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观点曾有极大影响。

波将金（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叶卡特琳娜女皇宠臣。

波斯蒂舍夫（Постышев,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887—1939）。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938年被捕，死于狱中。

邦达林（Бондар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03—）。儿童文学作家。

邦奇-布鲁耶维奇（Бонч-Бру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1873—1955）。布尔什维克革命家；1917至192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1891—1940）。讽刺文学作家，剧作家。大部分作品在苏联国内未发表。

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71—1944）。宗教哲学家；1922年被驱逐出境，定居巴黎。

布哈林（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1888—1938）。联共首脑人物之一，经济理论家；1924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总书记；1938年公审后被处决。

布留赫尔（Блюхер, 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90—1938）。1929至1938年担任远东军区司令；清党中被枪决。

布留姆金（Блюмкин, 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1898—1929）。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暗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后来加入契卡；因传递托洛茨基给拉迪克的信件被处决。

布尼亚琴科（Буняченко, Сергей К.？—1946）。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弗拉索夫部队的第一师师长；1946年在苏联被处决。

布宁（Бунин,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1870—1953）。作家；1920年流亡法国，定居巴黎。

C

查苏利奇（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1851—1919）。俄

国革命家。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经陪审裁判宣布无罪。1880年流亡国外。

楚巴尔（Чубарь, 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1891—1939）。苏联乌克兰高级官员；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清党中被枪决。

楚科夫斯卡娅（Чуковская, Лидия Корнеевна.1907—）。苏联文学批评家，作家（“自己出版社”）。

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1892—1941)。诗人；1922—1939年居住国外；返回苏联后受迫害死去。

D

达里（Даль,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1801—1872）。辞典编纂家。他编纂的字典是索尔仁尼琴常用的工具书。

邓尼金（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沙俄将领；1918—1920年南俄白军总司令；流亡国外。

杜鹤宁（Духонин,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76—1917）。沙俄陆军总司令；被士兵刺死。

顿斯阔依（Донской, Д.Д.1881—1936）。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多尔干（Dolgun, Alexander M.Alexander D.1926—）。即亚历山大.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雇员，苏籍美国人；曾在苏联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八年（1948—1956）；1971年获准离苏；曾著文记述被捕与监禁经过。

多雅连科（Дояренко, Ал ексей Г.）。苏联农业学家；1931年“劳动农民党案”被告之一。

F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Феодор Иванович.1557—1598）。伊万雷帝之子，白痴，1584年继位。

费多托夫（Федотов А.А.1864—?）。苏联官员；沙赫特案审判中的被告。

费格涅尔（Фигнер, Ве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1852—1942）。民意党人组织的首领，曾参与1881年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密谋。

费洛年科(Филоненко,Максимилиан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领导阿尔汉格尔斯克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

弗拉基米尔二世摩诺马赫（Владимир II Мономах）1113—1125年基辅罗斯的统治者。

弗拉基米罗夫（Владимиров〔Шейнфинкель〕，Миро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79—1925）。苏联早期负责农业、财政和经济管理的官员。

弗拉索夫（Власов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1900—1946）。苏军中将，1942年被德军俘虏；率领反苏武装。战后被苏联处决。

弗兰格尔（Врангель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1878—1928）。沙俄军官；1920年继邓尼金之后领导南俄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

弗兰克（Франк, Семен Людовигович.1877—1950）。宗教思想家，索洛维约夫的学生；1922年被驱逐出境。

G

盖尔涅特（Гернет,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1874—1953）。刑事学专家，著有《沙皇监狱史》五卷。

高尔察克 (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1873—1920)。沙俄海军大将；1918—1920年领导西伯利亚反布尔什维克军队；被处决。

戈里科夫 (Голиков, фидипп Иванович.1900—)。苏军元帅；负责监督苏军战俘由德国遣返工作。

戈利亚科夫 (Голяков, Иван Терентьевич.1888—1961) 斯大林时代最高法院首席审判员。1938—1949年任最高法院院长。

戈沃罗夫 (Говоров, Леони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7—1955)。苏军元帅。

戈兹 (Гоц, 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1882—1940)。右派社会革命党领袖；1922年公审中的被告之一。

格里包耶多夫 (Грибоед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1795—1829)。剧作家兼外交家。

格里戈利耶夫 (Григорьев, Иосиф Федорович.1890—1949)。苏联著名地质学家。

格里戈连科 (Григоренко, Пе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1907—)。前苏军将军，1961起成为持不同政见者；1969年被关入精神病院，后去美国。

格林(Грин [Грин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1880—1932)。浪漫主义幻想冒险小说作家。

格里涅维茨基(Гриневицкий Игнатий Исахимович.1856—1881)。革命家，民意党组织成员。1881年3月13日炸死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亦受伤身死。

格罗曼 (Громан, 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1873—？)。苏联经济界高级官员；1931年公审孟什维克时的被告。

葛罗米科 (Громыко,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1909—)。苏联外交家；前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1957年后任外交部长。

古里（Гуль Роман Борисович.1896—）。流亡作家，著有历史研究著作；在纽约出版的《新杂志》编者。

古米列夫(Гумилев, 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1886-1921)。高峰派诗人，阿赫马托娃前夫；被控参与反革命阴谋并处决。

H

哈兹(Гааз,Федол Петрович[Haas, Friedrich Joseph]。1780—1853）。莫斯科监狱医院的德国医生；曾研究刑罚改革。

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Хрусталев–Носар,Георг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1877—1918）。1905年被选为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18年在乌克兰反对布尔什维克；被枪决。

J

基则维特尔（Кизеветт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6—1933）。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历史学家；1922年被驱逐出境，定居布拉格。

吉比乌斯(Гиппиус, Зинаида Николаевна.1869—1945)。女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之妻；1920年流亡国外。

吉洪大主教（Тихон, Патриарх, 1865—1925）。1917年后任俄国东正教长；1922—23年以反政府活动罪名被拘捕。

吉施金（Кишк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1864—1930)。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1921年救济饥民委员会审判中的被告。

季亚科夫（Дьяков,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02—）。苏联作家，劳改营回忆录的作者。

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Тимофеев–Ресс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900—）。苏联遗传学家，辐射生物学家；

1924—1945年在德国工作；返回苏联后在劳改营中度过十年。

季诺维也夫（Зиновьев〔Апфельбаум〕,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1883—1936）。苏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与列宁共事；1927年被开除党籍；1936年公审后被枪决。

加林（Гарин Н.〔Михаило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Георгиевич.〕1852—1906）。作家；作品描写青年工程师。

加马尔尼克（Гамарник, Ян Борисович. 1894—1937）。苏联军事领导人之一，清党中自杀。

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Розенфельд〕,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1883—1936）。布尔什维克著名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重新入党并再次被开除；1936年公开审判后被处决。

捷尔查文（Державин,Гавриил Романович.1743—1816）。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的诗人和政治家。

金兹布尔格（Гинзбург, Евгения Семеновна.1911—）。在劳改营中服刑18年，劳改营回忆录《旋风中的旅行》、《坎坷的历程》作者。

K

卡尔萨文（Карсавин, Лев Платонович.1882—1952）。神秘主义哲学家；中世纪史专家；1922年被驱逐出境。

卡拉科左夫（Каракозов, 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840—1866）。革命家；1866年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后被处决。

卡普兰（Каплан, Фаня〔Дора〕.1888—191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行刺列宁后被处决。

卡索（Кассо, Лев Ариститович.1865—1914）。尼古拉二世时期反动的教育部长。

卡塔尼扬（Катанян, Рубен Павлович.1881—1966）。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苏联国家公诉人；1938年被捕。

卡扎科夫（Казаков，Игна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91—1938）。医生，被指控利用“溶成物”（抗体）谋害苏维埃官员；1938年公审后被枪决。

科尔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1870—1918）。临时政府时期俄军总司令；1917年8月领导反克伦斯基暴动；在顿河地区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战死。

科尔左夫（Кольцов，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72—1940）。著名生物学家；俄国生物学实验学派奠基人。

科罗连柯（Короленко，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1853—1921）。民主派农民作家，在沙皇时代被流放，反对暴力革命。

科萨列夫（Косарев，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903—1939）。1929—1939年担任共青团领导人。

科西奥尔（Косиор，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1889—1939）。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清党中被枪决。

科绥列夫（Козыре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08—）。天文学家；1937—1948年被监禁。

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Левитин]，Анатолий Эмануилович.1915—）。宗教著作家；斯大林时代被捕入狱；1960年以后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1869—1947）。沙俄将军，顿河哥萨克首领；1919年流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领亲德的俄国部队；战后由盟国引渡给苏联，被处决。

克拉西科夫（Красиков，Петр Ананьевич.1870—1939）。老布尔什维克；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苏联检察和司法官员。

克雷连科（Крыленко，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5—1938）。1918—1931年任国家首席公诉人；后担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被处决。

克雷洛夫（Кры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1769—1844）。著名寓言家。

克列斯金斯基(Крестинский,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83—1938)。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员和外交家；1938年公审后被处决。

克留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Осипович.1841—1911）。著名历史学家。

克留耶夫（Клю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1887—1937)。农民诗人；颂扬古老俄罗斯传统，反对西方文化影响；三十年代初期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克鲁格洛夫（Кругл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ифорович.1903—)。1946—1956年任内务部长。

库尔斯基（Курский,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1874—1932)。1918—192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28—1932年任驻意大利使节。

库普里扬诺夫（Куприянов Г.Н.）。卡累利阿苏共负责人；1949年被捕。

库斯科娃（Куск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1869—1958)。立宪民主党人,后转为社会革命党人；1921年饥民救济案件中出庭受审；1922年被驱逐出境。

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05—1950）。中将，列宁格勒保卫战组织者之一，苏共中央书记，因“列宁格勒事件”被判罪。

L

拉迪克（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1885—1939）。共产国际官员，后为新闻工作者；1937年公审后被枪决。

拉季谢夫（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49—1802）。反对农奴制的作家和社会批判家；被叶卡特琳娜二世流

放到西伯利亚。

拉科夫斯基（Раковский, 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1873—1941）。布尔什维克官员，1919—1923年曾任乌克兰苏维埃主席，1923—1927年从事外交工作；1938年公审后入狱；其女叶莲娜1948年被捕。

拉里切夫（Ларичев, Виктор А.1887—？）。燃料总局局长；1930年工业党审判中出庭受审。

拉林（Ларин〔Лурье〕,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82—1932）。农业经济专家；前孟什维克；曾为建立苏联计划体系做出贡献。

拉姆津（Рамзин, 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7—1948）。热力工程师；1930年工业党审判中主要被告，被判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新从事专业活动。

拉普申（Лапшин,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70—1948）。哲学家；1922年被驱逐到布拉格，死于该地。

拉齐斯（Лацис, Мартынъ Иванович〔Судрабс, Ян Фридрихович〕.1888—1941）。早期(1917—1921)契卡官员；1932—1937年为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院长；1937年被捕。

拉斯科里尼科夫（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Илин〕,Фео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1892—1939）。布尔什维克外交人员，在法国叛逃；死因神秘。

拉斯普金(Распутин,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1872—1916)。对尼古拉二世皇室影响极大的冒险家；被廷臣杀死。

拉辛(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1630?—1671)。伏尔加河中下游哥萨克及农民起义领袖；失败后被处死；成为俄罗斯民间歌谣中的传奇式人物。

兰索姆（Ransome, Arthur.1884—1967）。英国记者；曾报导十月革命情况。

雷利（Reilly, Sidney George.1874—1925）。英国谍报官；越过苏芬边境时被击毙。

雷列耶夫（Рылеев, Кондратий Федорович. 1795—1826）。十二月党人；被处绞刑。

雷萨科夫（Рысак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1861—1881）。民意党革命者；1881年因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被处决。

李哈乔夫（Лихаче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1862—1935)。历史学家，圣像画专家。

李可夫（Р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1881—1938)。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年公审后被处决。

李森科（Лысенко, 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1898—1976）。农业生物学家；1940年以后直至1964年在苏联科学界和生物学界占统治地位。

李亚布申斯基（Рябушинский,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1871—1924）。俄国企业家，反布尔什维克的头领之一；1930年工业党审判中被提到。

列留申科（Лелюшенко, Дмитрий Данилович.190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将领。

列维坦（Левитан, 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1914—）。苏联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嗓音洪亮著称，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读重大战报及其他新闻而为人们所熟知。

列文娜（Левина, Ревекка Сауловна.1899—1964）。苏联经济学家。

留里克 Рюрик）。传说中的瓦利亚格王子，九世纪中叶来到诺夫哥罗德，建立俄罗斯王朝。

留明（Рюмин М.Д.？—1953）。秘密警察官员，曾炮制所谓“医生案件”，1953年被处决。

卢纳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5—1932）。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

鲁宁（Лунин,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1787—1845）。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过哲学及政治论著。

鲁祖塔克（Рудзутак, 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1887—1938）。斯大林的助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被捕；死于狱中。

罗科索夫斯基(Рокосс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96—196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将领，1949—1956年任波兰国防部长。

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 Пантелеймон Сергеевич. 1884—1938)。苏联讽刺文学家。

洛尔德基潘尼则（Лордкипанидзе Г.С.1881—1937）。格鲁吉亚作家；清党中死去。

洛尔赫（Лорх,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1889—）。著名的马铃薯育种家。

洛里斯—梅里科夫（Лорис-Меликов, Михаил Тарпелович.1825—1888）。权力极大的沙俄内务部长（1880—1881）；若干未实行的改革的倡议者。

洛斯基（Лосский,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1870—1965）。哲学家；1922年被驱逐出境。

洛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 А.〔Дридзо, 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1878—1952）。革命家；1921—1937年任工会国际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外交副人民委员兼苏联情报局负责人；反犹清洗中被枪决。

M

马尔科斯（Markos, Gen.Vafiades.1906—）。1947—1948

年希腊左派起义领袖。

马尔托夫（Мартов，Юрий Осипович.1873—1923）。孟什维克领袖；1921年被驱逐出境。

马卡连柯（Макаренко，Антон Семенович.1888—1939）。教育家；曾组织少年犯习艺所。

玛丽亚嬷嬷（Мария，Мать）。见斯科勃左娃。

马林诺夫斯基（Малиновский，Роман Вацлавский.1876—1918）。沙皇警察密探，曾打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移居国外；1918年主动返回俄国，受审后被处决。

麦尔贡诺夫（Мельгунов，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1879—1956）。历史学家，人民社会党领袖；1923年被驱逐出境；定居巴黎。

麦列茨科夫（Мерецков，Кирил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1897—1968）。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将领。

麦斯基（Майский，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1884—1975）。历史学家，外交家；原为孟什维克；1932—1943年任驻英使节；1943—1946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曼德尔施塔姆（Мандельштам，Осип Эмилевич.1891—1938）。高峰派诗人，死于递解监狱。

梅凯（Мекк，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фон-.1863—1929）。沙俄铁路工业家；1917年后为布尔什维克服务；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被处决。

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1865—1941）。哲学家，小说家；象征主义流派创始人；1919年流亡巴黎。

米哈依洛夫（Михайло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06—）。1938—1952年为共青团领导人；后任驻波兰和印尼大使、文化部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1970年退休。

米科拉奇克（Mikolajczyk，Stanislaw.1901—1966）。波

兰农民党领袖；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波兰流亡政府及1945—1947年间的波兰战后政府。

米留科夫（Милюков，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1920年流亡国外；死于美国。

米罗维奇（Мирович，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740—1764）。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此人曾图谋举行宫廷政变，拥戴觊觎王位者伊万四世安东诺维奇。

米亚科金（Мякотин，Бенедикт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7—1937）。历史学家，人民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922年被驱逐出境。

缅希科夫（Меньшиков，Александр Данилович.1673—1729）。彼得大帝与叶卡特琳娜一世的宠臣。

明仁斯基（Менжинский，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1874—1934）。秘密警察官员；1926—1934年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摩诺马赫（Мономах）。见弗拉基米尔二世。

N

纳包科夫（Набоков [Сирин]，Владимир，1899—1977）。俄美混血作家；F·D·西林之子，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1919年流亡国外。

纳罗科夫（Нароков [Марченко]，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887—1969）。流亡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苏联；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

纳坦逊（Натансон，Марк Андреевич.1850—1919）。民粹派，后为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死于瑞士。

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1744—1818）。

作家与社会评论家；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被囚禁于施吕塞堡要塞。

诺沃鲁斯基（Новорусский,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1861-1925）。革命家，1887年因行刺亚历山大三世案件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同判罪；被判死刑后减为在施吕塞堡监禁。

P

帕尔钦斯基（Пальчинский, Петр Акимович.1878—1929）。经济学家，采矿工程师；1917年任临时政府工商部次长；1929年沙赫特案件审判中的主要被告；被枪决。

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1890—1960）。诗人，小说家；《日瓦戈医生》作者，195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普加乔夫（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1742—1755）。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农民大起义的领袖。

普拉东诺夫（Платонов, Сергей Феодорович.1860—1933）。历史学家；三十年代早期受官方冷遇。

普列特涅夫（Плетнев, 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1872—1953）。医生；1938年公审后被判25年徒刑。

普罗科波维奇（Прокопович,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71—1955）。经济学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1921年饥民救济委员会案件审判中出庭受审；1922年被驱逐出境。

普图兴（Птухин, Евгений Саввич.1900—1941）。中将，苏联空军指挥员；德国对苏发动进攻后被处决。

Q

契霍夫斯基（Чех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Моисеевич.1877—？）。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恰尔诺夫斯基（Чарновский Н• Ф• 1868—？）。苏联经济官员；1930年工业党案件审判中的被告之一。

切尔诺夫（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1873—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1920年流亡国外。

R

热布拉克（Жебрак, Антон Романович. 1901—1965）。苏联遗传学家。

热列亚包夫（Желябов,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851—1881)。革命家；1881年因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被处决。

S

萨尔蒂奇哈（Салтычиха [Салтыкова], Дар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1730—1801）。莫斯科省女地主；以对待农奴残酷无情著名。

萨哈罗夫（Сахаров, Игорь К.）。上校，流亡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指挥一支亲德的俄国军队。

萨姆逊诺夫（Самсо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1859—1914）。沙俄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部队在东普鲁士失利而自杀。

萨瓦（Савва.1327—1406）。俄国东正教圣者；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吉依的弟子。

萨文科夫（Савинков, 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1879—1925）。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24年非法返回俄国时被捕。

沙拉莫夫（Шаламов, Варлам Тихонович.1907—）。作家；在科雷马劳改营中度过17年；《科雷马故事集》（巴黎，1969）作者。

舍施科夫斯基（Шешковский,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1727-1793）。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司法侦查官；以残酷的侦讯手段著闻。

施米特（Шмидт,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1867—1906）。黑海舰队中尉；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后被处决。

什维尔尼克（Шверник,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1888—1970）。1930—1944年及1953—1956年任工会主席；1946—1953年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舒尔金（Шульгин, Васил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1878—1965）。保皇主义者；1917年革命后流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南斯拉夫被红军捕获；在劳改营服刑十年。

斯捷朋（Степун, Феодор Августович.1884—1965）。哲学家；1922年被驱逐出境。

斯科勃左娃（Скобцова, Елизавета Юреевна.1892—1945）。高峰派诗人；流亡巴黎后成为修女（玛丽亚嬷嬷）；死于纳粹集中营。

斯科里普尼克（Скрыпник,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1872-1933）。乌克兰司法（1922—1927）及教育（1927—1933）人民委员；自杀。

斯库拉托夫（Скуратов, Малюта〔Бель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Лукиянович〕？—1572）。伊万雷帝的亲信；伊万暴虐行为的实行者；禁卫军统领。

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 Иван Никитович.1881—1936）。

1923—1927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被开除党籍；1936年审判后被枪决。

斯穆施凯维奇（Смушкевич, Яко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902—1941）。苏联空军指挥员；德军入侵后被处决。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1863—1938）。话剧导演；1898年创立莫斯科艺术剧院。

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1862—1911）。沙俄政治家；1906年后任首相兼内务大臣；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

斯维钦（Свич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1878—1935）。军事史学家；被枪决。

苏德拉勃斯（Судрабс）。见拉齐斯。

苏汉诺夫（Суханов〔Гиммер〕,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2—1940）。孟什维克历史学家；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是在他家中举行的；1931年审判孟什维克时曾出庭受审；因绝食获释；三十年代后期清洗中再次被捕；详细记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著作《革命笔记》的作者。

苏里科夫（Сурико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8—1916）。现实主义流派的历史题材画家。

苏沃洛夫（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29—1800）。军事统帅，指挥反对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

索科里尼科夫（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888—1939）。1922—1926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29—1934年任驻英使节；1939年公审后被判处十年徒刑；死于狱中。

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1853—1900）。宗教哲学家，政论家，象征主义诗人。

T

塔尔勒（Тарле, 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1875—1955）。苏联历史学家；三十年代初期一度受官方冷遇。

塔甘采夫（Таганцев, 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43—1923）。刑法著作家。

唐恩（Дан〔Гурвич〕, Федор Ильич. 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医生；1922年被押送出境。

特鲁别茨阔依（Трубецкой, 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1790—1860）。十二月党人；被判死刑，后改判流放；1856年遇赦。

蒂尼亚诺夫（Тынянов,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94—1943)。苏联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著有历史小说《丘赫利亚》、《瓦齐尔-穆赫塔尔之死》、《普希金》等。

图尔兄弟（Братья Туры）。两个剧作家和侦探故事作家的笔名。这两人是：列昂尼德·达维多维奇·图别里斯基（1905—1961）和彼得·利沃维奇·雷日伊（1908—）。

图哈切夫斯基（Тухачевский,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1893—1937）。苏联军事领导人；1937年以捏造的叛逆罪名被枪决。

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之女）（Толста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Львовна.1884—）。列夫·托尔斯泰的幼女；其父传记的作者；居住美国；在美国建立救济被难者的“托尔斯泰基金会”。

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Бронштейн〕,Лев〔Леон〕Давидович·1879—1940）。第一任苏联国防委员，至1925年；1927年被开除党籍；1929年被放逐到土耳其；在墨西哥城被苏联特工人员刺死。

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1936）。苏联工会第一任主席，至1929年；在清洗中自杀。

W

瓦连金诺夫（Валентинов〔Воль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1879—1964）。新闻工作者，哲学家；由布尔什维克转变为孟什维克；1930年流亡国外。

瓦西里耶夫-尤仁（Васильев-Южин,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76—1937）。革命家；秘密警察及司法官员。

瓦维洛夫（Вавил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7—1943）。著名植物遗传学家；应用植物研究所所长（1924—1940）兼遗传学研究所所长（1930—1940）；1940年被捕；死于监禁中。

维舍斯拉夫采夫（Вышеславцев, Борис Петрович. 1877—1954）。哲学家；1922年被遣送出境。

维辛斯基（Вышинский, 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1883—1954）。法学家和外交家；由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1935—1939任苏联检察长；1936—1938年历次公审的首席国家公诉人；1939—1949及1953—1954年任外交副人民委员，外交部副部长；1949—1953年为外交部部长。

沃洛申（Волошин, Максимил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8—1932）。象征主义诗人和水彩画家；反对布尔什维克。

沃伊科夫（Войков, Петр Лазаревич. 1888—1927）。布尔什维克革命家；1924—1927年为苏联驻华沙代表；被流亡分子暗杀。

乌尔利赫（Ульрих,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9—1951）。最高法院审判长；主持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重大审判。

乌焦索夫（Утесов, Леонид Осипович. 1895—）。苏联乐队指挥，游艺节目著名演员。

乌里茨基（Урицкий, 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1918）。

革命家；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因他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开始实行“红色恐怖”。

乌里扬诺夫(Улья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1866—1887)。列宁的长兄；1887年图谋行刺亚历山大三世，被处决。

乌里扬诺娃（Ульянова〔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1874—1935）。列宁之姐；新闻工作者，编辑。

X

西考尔斯基（Sikorski,Mladyslaw.1881—1943）。波兰流亡分子军事领导人。

夏斯特内（Щастный,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918)。红色波罗的海艇队司令；被处决。

谢尔巴科夫（Щерб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1901—1945）。1938—1945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42—1945年任红军政治部主任。

谢尔吉依（Сергий, Преподобный. 1321—1391）。俄国东正教修士；曾建立若干修道院，其中之一是建在他家乡拉多涅日附近的扎戈尔斯克三位一体圣谢尔吉依修道院。

谢金（Седин, Иван 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石油人民委员。

谢利万诺夫（Селиванов, Дмигрий Феодорович.1885—？）。数学家；1922年流亡国外。

谢列布利亚利娃(Серебрякова,Галина Иосифовна. 1905—）。作家；劳改营回忆录作者。

谢洛夫（Серов,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05—）。秘密警察官员；1954—1958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Y

雅果达（Ягода, 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1891—1938）。秘密警察官员；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公审后被枪决。

雅库鲍维奇（Якубович,Петр Филиппович.1860—1911）。诗人；民意党人，曾服苦役。波德莱尔作品的俄译者；著有描写苦役生活的随笔《在被遗弃的世界里》。

雅罗申科（Ярош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46—1898）。画家。

叶尔米洛夫（Ермилов,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904—1965）。苏联文学批评家。

叶努基泽（Енукидзе,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1877—1937）。布尔什维克官员；1918—1935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肃反中被枪决。

叶若夫（Еж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1895—1939）。秘密警察官员；1936—1938年任内务人民委员。

叶赛宁（Есен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95—1925）。意象派诗人；自杀。

伊利因（Ильин,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82—1954）。神秘主义哲学家；1922年被遣送出境。

伊万·卡利达（Иван, Калита.？—1340）。莫斯科大公国创建者。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Васильевич.1876—1946）。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在沙俄监狱（1901）及苏联劳改营服刑；1941年出走德国。

伊兹戈耶夫（Изгоев〔Ланде〕,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2—约1938）。右派立宪民主党作家；1922年被苏联驱逐出境。

伊兹麦洛夫（Измайлов，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1893—）。苏联文学理论家，普希金著作编辑者。

尤登尼奇（Юдени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62—1933）。沙俄将军；1918—1920年率领爱沙尼亚反布尔什维克力量，1919年进攻彼得格勒，被歼灭。

Z

扎雷金（Залыгин，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1913—）。苏联作家，作协理事。

扎米亚金（Замягин，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1884—1937）。作家；1917年自国外返回，但反对布尔什维克；1932年流亡国外。1924年在伦敦出版小说《我们》，赫胥黎及奥尔维尔等作家均受其影响。

扎瓦利申（Завалишин，Дмитрий Иринархович.1804—1892）。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1863年后从事新闻工作。

机关名称及专用术语

B

巴斯马赤（Басмачи）。1917年革命后中亚反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武装叛乱分子。

保安厅（Охрана）。1881—1917年沙俄秘密警察机构。全称为“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厅”。

保卫同盟（Schutzbund）。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武装组织；1933年武装起义中失败后，盟员于1934年到苏联避难。

布蒂尔卡（Бутырка）。莫斯科的一座大监狱，以所在地的区名得名。

D

地方自治局（Земство）。俄国革命前的地方政府机构。

E

《俄罗斯真理》（《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纲领，由彼斯特里起草。

F

腐泥煤委员会（Сапропелиевый комитет）。1920年成立

的利用湖底腐泥做燃料的科学研究组织。

G

高庭（Вертриб）。革命初期审理最重大案件的最高法庭（Верховный трибунал〔1918—1922〕的简称）。

革命法庭（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Трибунал.Ревтрибунал）。1917—1922年审理反革命案件的特别法庭。

工业学院（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莫斯科的一所培养工业管理人员的学校。

古拉格（Гулаг）。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译音。

国家安全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МГБ）。1946—1953年主管秘密警察的部门；后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мисариа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НКГБ）。1943—1946年苏联秘密警察机构。

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ПУ）。1922年2月以后的苏联秘密警察机构最初的名称，同年12月改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б'едине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ОГПУ），到1934年7月。后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

H

哈勒钦河（Халхын-Гол）。中蒙边境河流，1939年苏日在该地发生军事冲突。

哈桑湖（Хасан）。苏中边境湖泊，靠近日本海。1938年苏

日在该地发生军事冲突。

亥哈鲁兹（Hehalutz）。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组织。

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俄国17世纪初波兰及瑞典人侵时的艰险动荡时期。

J

加尔梅克人（Калмыки）。原居北高加索的民族；1943年以与德国人合作的罪名被迁走。

K

克里米亚鞑靼人（Крымские татары）。1944年以与德国人合作的罪名被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

科雷马（Колым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条河流名称，亦可泛指该地区；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一个中心地带。

克格勃（КГБ. 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

L

卢宾卡（Лубянк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秘密警察总部和监狱的俗称，因附近街道和广场而得名（现已改为捷尔任斯基大街和捷尔任斯基广场）；1917年革命前原为俄国保险公司大楼，革命后历届内务和国家安全部门都设在这座楼内。

M

马合烟（Махорка）。一种劣质烟草（Nicotianarustica），主要生长在乌克兰。

民意党（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旨在推翻沙皇制度的恐怖主义秘密结社；1879年成立，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后解散。

H

内务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МВД）。1953年短期主管秘密警察事务，随即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内务人民委员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ми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НКВД）。1934—1943年苏联秘密警察机构。

Q

契卡（ЧК）。肃清反革命怠工及取缔投机非常委员会（或译肃反委员会）的缩写译音，存在于1917年12月至1922年2月。

切辭人（Чеченцы）。居住在北高加索的民族；1944年以与德军合作的罪名被全体迁移。

全俄中执委（ВЦИК）。1917至1937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37年后改为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联盟的相应机构是苏联中执委（1922—1938），后改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R

人民社会党（Народ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建立于1906年，倾向一般民主改革，反对恐怖主义。

S

沙拉什卡（Шарашка）。监狱俚语，用以称呼一种特殊的研究所，其中科技人员全是犯人。

社会革命党（Социал-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артия〔СР〕，Эсер）。1890年由若干民粹派组织建成；1905年11月在芬兰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左右两派，右派反对恐怖主义，左派赞成恐怖主义；社会党人在临时政府中起主导作用；十月革命后左派社会党人短期与布尔什维克合作。

施吕塞堡（Шлюссельбург）。位于拉多加河畔涅瓦河出口处的一座要塞；沙皇时代曾用作政治犯监狱；现称彼得要塞。

苏联情报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联新闻机构。

索洛维茨群岛（Соловецкие острова，Соловки）。白海中的岛群，岛上有修道院；中世纪曾用作叛逆的僧侣的流放地；1917年革命后在此地建了早期的特种劳改营（СЛОН）。

T

特别庭（Особое совещание，ОС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人委员会，有权不经审判对“社会危险分子”判刑；1953年撤销。

铁路职工会全俄执委会（ВИКЖЕЛ）。铁路职工会，1917

年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

Y

“医生案件”（Дело врачей）。1952年以谋害苏联领导人的捏造罪名逮捕了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至少一人（艾丁格尔）据信死于侦查过程中；1953年斯大林死后其他被捕人员获释。

印古什人（Ингуши）。居住在北高加索的民族；1944年以与德国人合作的罪名被迁走。

Z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ВСНХ）。苏联早期最高工业管理机构；成立于1917年；1932年撤销，分设为若干工业部。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636
SS□=11000363
□□□□=1982□12□□1□
□□□=□□□□□

